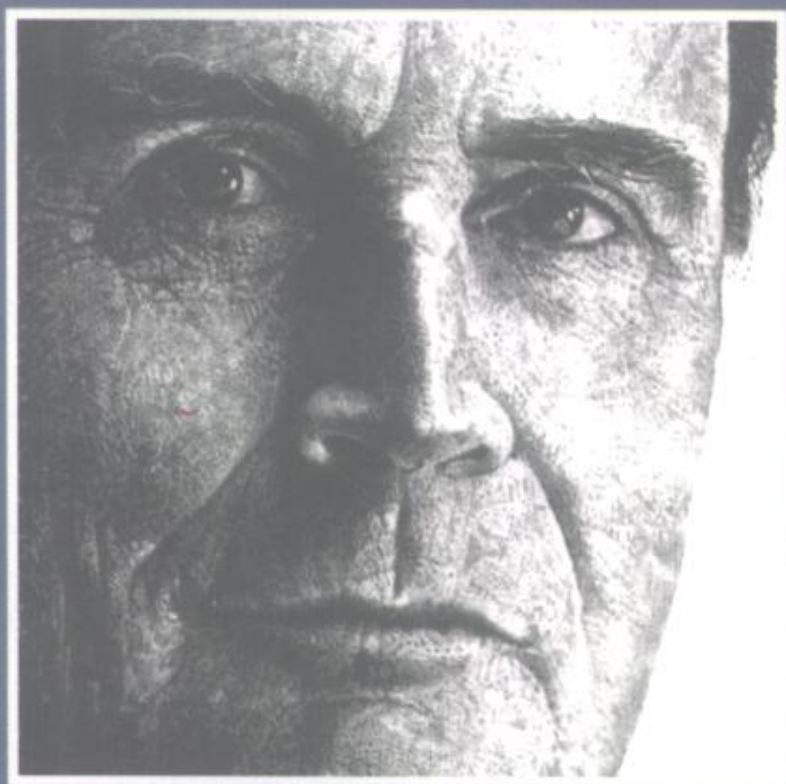


密特朗回忆录

被死神打断的回忆

[法] 弗朗索瓦·密特朗/著

■ 曾令保 沈忠民 樊 赤/译



François
Mitterrand
MÉMOIRES
INTERROMPUS

中国书籍出版社

密特朗回忆录

被死神打断的回忆

[法] 弗朗索瓦·密特朗/著
□ 曾令保 沈忠民 樊 赤/译
□ 樊 赤/审校



François
Mitterrand
MÉMOIRES
INTERROMPUS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说明

《被死神打断的回忆》系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两本回忆性书稿的中译合集。第一本书稿原题《被打断的回忆》，是密氏根据他同法国记者乔治-马克·贝纳穆的谈话记录整理而成，对话体，生动地展示了这位传奇性政治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被俘直到在戴高乐第五共和国时期充当反对派领袖人物的曲折经历以及他对这阶段法国内政、外交各种问题的看法。第二本书稿原题《谈谈德国，谈谈法国》，主要由两个片断回忆组成：其一回顾了1989~1990年间德国统一的前前后后，世界各国的对策及相互间的讨价还价，着重介绍密氏本人作为法国总统所采取的立场和行动；其二记叙了密特朗1981年5月首次当选法国总统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反应——主要是不利的反应，以及他为争取国际理解和支持所做的努力。另有9篇演讲或谈话摘要构成一个附录，主题是包括德国统一和法德关系在内的欧洲建设问题，是为第一个片断作佐证的。两本书稿均由法国奥迪尔·雅各布出版社于1996年4月出版。

考虑到密特朗总统的身分以及中国读者对书籍“分量”的传统观念，两本书稿倘若分别出版，可能稍显单薄，因此将其合而为一。内容未作任何变动，只是加以若干技术性处理：

1. 鉴于两本书稿为密氏“绝笔”，而其一生中若干其他片断尚未来得及写入，故中文版冠以《被死神打断的回忆》这个总题目；
2. 编排上，把原来的两本改为一本四卷，并以时间为序，把

1981年5月总统选举这一卷提到1989~1990年德国统一之前,附录作为第四卷,每卷均改拟或增拟了题目;

3. 每卷下均按第一卷原有模式,据各节内容拟出小标题,以求点题、醒目。

特此说明。

编者

法文版出版者的话(之一)

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其生命最后的一次战斗中,强忍病痛,坚持写完了这本书。在他去埃及作最后一次访问前几天,他把手稿交给了我。

这本《被打断的回忆》是弗朗索瓦·密特朗根据他同乔治-马克·贝纳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文的。前总统曾希望对贝纳穆表示感谢,我谨在此热情照办。

今天,在将其遗著留给我们的同时,弗朗索瓦·密特朗希望把他的政治业绩铭刻到他的文献作品之中。这部著作还标志着他生活中的两大激情——文字与行动之间的、打上了奋斗和意志印记的完美结合。

奥迪尔·雅各布

法文版出版者的话(之二)

弗朗索瓦·密特朗致力于写作,直至生命的终结。那是在埃及,在他最后一次出访中,他投入殊死的战斗,从痛苦和疾病中抢出了这本手稿的最后几页。

弗朗索瓦·密特朗今天把这本遗著留给我们,是想把自己的政治业绩铭刻到他的文献作品之中。这本著作打下了奋斗和意志的印记,是他一生中两大爱好——写作与行动的完美结合。

《谈谈德国,谈谈法国》一书使读者对作者为这两个国家之间的重新和解所做的贡献一目了然。弗朗索瓦·密特朗还已经着手述说在海湾危机和南斯拉夫危机期间,他为法国利益所采取的行动。但死神打断了他的写作,使他只来得及把回忆写到国外对他1981年当选总统的反应。因此,这一章成了他的绝笔。

我感谢多米尼克·贝尔蒂诺蒂的协助,也感谢布里吉特·索雷·斯托法埃斯认真阅读本书并乐意提供若干情况。

奥迪尔·雅各布

目 录

中文版出版说明

法文版出版者的话(之一)

法文版出版者的话(之二)

卷一	从战俘营到戴高乐的反对派	(1)
一、	战俘营时期,逃亡时期	(1)
二、	从维希政府到抵抗运动	(40)
三、	化名莫尔朗	(77)
四、	首次会见戴高乐	(90)
五、	解放	(108)
六、	在第四共和国当部长	(125)
七、	反对派时期	(144)
卷二	1981年5月选举:来自外国的反应	(177)
一、	华盛顿:担心共产党人进入政府	(178)
二、	莫斯科:不如预想的那么热情	(184)
三、	波恩:有分寸的满意心情	(188)
四、	阿拉伯世界:不支持我当选	(191)
五、	法郎危机	(193)
六、	又是中东:塔穆兹核电站事件,贝京与萨达特	(196)

卷三 从法国看德国统一	(205)
一、一切始于莫斯科	(205)
二、普鲁士的灵魂与柏林墙的倒塌	(211)
三、四大国的反应	(223)
四、法国各派的态度	(232)
五、科尔总理的 10 点纲领	(239)
六、11 月 18 日爱丽舍宫的 12 国晚宴 及欧洲联盟条约草案	(247)
七、同戈尔巴乔夫在基辅会谈及 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会议	(256)
八、与东德领导人互访、同东德反对派会见	(265)
九、确认奥得—尼斯河边界不可变动	(281)
卷四 关于欧洲建设的附录	(299)
一、走出雅尔塔	(299)
二、德国的前途	(300)
三、对东欧动荡的初步思考	(303)
四、德国统一应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进行	(307)
五、继续从事欧洲建设	(312)
六、奥得—尼斯河边界不可变动	(318)
七、为实现欧洲邦联而努力	(323)
八、法德伙伴关系	(334)
九、问心无愧	(340)

卷一 从战俘营到戴高乐的反对派

一、战俘营时期,逃亡时期

乔治 - 马克·贝纳穆问:从您的著作和言谈中知道,您的社会生活好像是在“奇怪的战争”和法国战败时开始的。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受伤然后被德国人俘虏的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答:我当时属于殖民地步兵,这支部队和外籍军团夜以继日地轮流守卫,以牵制德军。德军在突破色当后突然转向洛林。我们从阿登省的斯特尼出发,6月3日抵达位于莫尔多姆附近、凡尔登前面的著名的304高地。站在默兹省的高地上,我们注视着德军的突击部队穿着短裤衬衣,在广阔的平原上摆开阵势。平原的远处是隼山。我们背着20至30公斤的行囊,腿上打着绑带。

夜幕降临,万籁俱寂。我们的排长爱德华·莫罗 - 西尔——当老百姓时是哲学教授——站在那里,审视着一条1917年留下的战壕中的一切。我睡在离这战壕10米远的一个弹坑里。突然,早晨5点来钟,机枪和大炮齐鸣,向我们疯狂射击。

我向莫罗 - 西尔靠拢。德国人唱着歌向我们走来。战斗在10点开始。司令部命令我们向莫尔多姆转移。天气很好。突击队停下来暂歇了一会儿,好像是为了向这灿烂的6月致敬,又好像美景可以使人忘掉不幸,可以使战争和流血消失。莫罗 - 西尔和

我只要一伸手就可采摘树林中长满一地的草莓。这时，一枚榴霰弹在我们头上方爆炸了。一块弹片击中了我的右侧，弹片至今还留在我的肩关节里。我被这突然袭击打昏了。莫罗—西尔膝盖受了伤。一名卫生兵——我记得他叫梅里诺——把我扶到连指挥所，并把我放在一个滚动的担架上，推着去寻找野战诊所。

我记得那时的场面色彩强烈。我躺在我那四轮车上，混杂在路上的流亡人群中，我们只得放慢前进的速度。老百姓携家带口奔逃，但不知何往。我这台临时运输工具在绚丽的阳光下摇摇摆摆地前进。我只有任其摆布。正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几架意大利飞机，用机枪向路人扫射。大家纷纷奔向路边低洼处，逃向田野。我的同伴无法把我带走，就把我放下，临行前对我说：“别着急，我会回来的。”我躺在担架上，一动不动，两眼望天，看着飞机向路上俯冲，并发射出连珠般的弹雨。警报解除后，我们又重新游荡。我们所到之处都有伤兵。首先，人们把我带到埃斯纳·昂·阿尔戈纳。外科医生们在地下室里动手术，割臂截腿。我不能再耽搁了。我们重新上路，继续我们的长途跋涉。在维特尔这个所谓的卫生城，现在只剩下前线医生和他们的伤病员。其他人都逃光了。这里只有呻吟、痛苦的叫喊、血和脓的臭味。在火车站上，为伤员们编组了一趟列车。人们把我放进车厢。列车很晚才出发，速度缓慢。德国人已包围了洛林。我们在兜圈子。最后，我住进孚日省的布鲁依尔医院。从6月14日以来，我未得到任何治疗。

6月18日，德国人到达布鲁依尔。从那里，他们把我转到吕尼维尔医院，随后又将我送进附近的战俘营。在我住院期间，我得到该地区青年女子志愿护士们的照料。她们给我打了第一次抗破伤风针。我还记得她们之中的一位，名叫让娜·迪勒，后来我又见

过她,她已在洛林结了婚。我曾将我的照相机和我受伤前拍的一些底片托付给她。那是我的战友们和各种静物的照片,其中有被扔在树林中碎尸的照片。幸得让娜·迪勒的帮忙,我才能同外界通信息。我记得我曾对她说:“我要走,离开战俘营,我要逃跑。”另一位来自里尔的名叫波絮的战俘准备与我同行。但是,正当我们积极准备之时,接到了要我们开赴德国的命令。

于是,1940年9月,我同难友们坐上运载牲口的闷罐车——能容下8匹马或40个人——向兹罔汉方向进发,最后抵达卡塞尔附近黑森州的IXA战俘营。

问:作为战俘前往德国是否真是一件意料之外的事呢?

答:战俘们当时以为他们会很快被释放,关押时间最多不会超过三个月。德国人是很好的心理学家,他们玩弄这一套,让战俘们觉得不必越狱逃跑。他们让我们处于这种精神状态,使我们相信和平协定很快就能签字,我们接着就会被遣返回家。最可靠的牢狱莫过于对明天的希望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个牢狱已持续五年了。

在IXA战俘营,生活条件非常恶劣。3万人被“扔”在黑森州的丘陵坡上,此情此景,可想而知。战俘营就像一座难民城市。开始时,盗贼横行。我们吃得很少。德国人并不野蛮,但执行规定毫不宽容,而且不管战俘内部的事情,在内部是团伙说了算。如能保存一件贵重物品——例如手表、钢笔等,那是了不起的事。在每天一次分发食品时,团伙头头们先将大麦粥或芜菁汤大盆中的东西吃掉,剩下的才给我们。在那些使用刀子的专家们的威胁下,抗议是无用的。往往是一大早,在我们睡的大帐篷里,可以看到陈放着几具尸体。尽管如此,一种比较公正的秩序终于建立起来了,一些

大胆者从群众中站出来,在大家的支持下,起来反对强权法则,建立起组织的雏形。暴力消失了。曾经实行暴力的人现在变成了可怜虫,被人瞧不起,蜷缩在一角,只有苦苦哀求才能得到自己那份食物。“匕首法则”奇怪地被以精确分配为基础的新法则取代了。我原来经常想到这种非凡的“社会炼金术”,它在战俘营里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使我们从弱肉强食时代进化到了文明社会。

问:作为世家子弟,遇到这种弱肉强食的情况,您不觉得这是一种冲击吗?

答:战前我是大学生,我同大学生生活在一起。战俘营的生活使我首次取得介入社会争斗的真正经验。我认识了一些我们以前毫无所知的人,我发现了一些我所陌生的阶级的反应,我看到了我青年时代世界的解体。与此同时,在我眼底下创立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在战俘营,和平时期实行的等级制度,很快就显得不合时宜。当人们看到过去的企业领导人、名教授、大资产者把头伸进垃圾桶里去舔那些沾有果酱或奶酪残渣的包装纸时,难道还会有别的办法吗?

战前的社会秩序一下子被废除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建立起来了,它是以人的道德素质为基础的。我们可以证实这种素质的存在,因为它支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全部旧机构都取消了,我们穿同样的制服,我们遵守同样的作息时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晚上放工回来,直到熄灯之前,我们坐在床架上讨论问题,细心捉拿藏在衣缝里的虱子。第一次看到这些蠢蠢乱动的东西时,我实在难以忍受。我感到极端的失落。后来我习惯了,正如习惯了露天厕所一样,那是一些大战壕,覆盖着残雪,底部有时会躺着一具死尸。我们光着上身高谈阔论,虱子在我们的指甲间劈啪作

响,我们的思绪飘向未来,在那里用梦幻来补偿共同的苦难。我们谈论我们每天的生活、看守人的情绪、各种劳役的相对长处、食物(谈得很多)、女人(谈得很少)。我们等待着星期天的土豆烧牛肉或土豆泥,以便美餐一顿。我们还期望那些已经被叙述者的想象所歪曲了的外部消息,那些使我们接近解放的政治或军事事件。我们经常谈到留在苦难中的法国,她的价值观和她机构的崩溃。我们并不以此指责共和国,而是指责她的人和她的做法。对维希政府我们漠不关心,对伦敦的流亡政府我们不了解。我们的期望成了乌托邦:为什么我们那种人人平等的状况不能在战后连续下去呢?如果我们善于把已有的经验教训强加于人的话,为什么这种状况不会永久持续下去呢?

问:这种“乌托邦状态”有时被称为“战俘精神”,由于它必须以超凡入圣为条件,如同所有的假设的超凡入圣的危险一样,难道它不也是一种危险吗?

答:我们的社会是平均主义的,但又是专断的。我们穿同样带补钉的或破破烂烂的衣服,我们喝同样的汤。把贫困、平等、尊严理论化,即是一种天然的诱惑。它引导我们想象一个傅立叶式的世界,在那里,人们建立起法伦斯泰尔(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社会基层组织成员居住和工作的场所——译注)。总之,我们并非那么不幸。当时有一种危险,我的同志中的某些人陷了进去,而且至今还是这样:他们在铁丝网后面想象着将会有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理想社会。某些人一直陷在这种乌托邦里而不能自拔,后来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的社会党的同志中,都曾遇到过这种人,他们总想象未来的社会能摆脱弊病和实力较量,取得对恶习、腐化和人类野心的免疫力。我没有走得那么远,但我梦想过。在我越狱后,我

正是以这种精神状态迎来了 1942 年……

战俘营的精神,战俘营的博爱,战俘营的灵性,这些都存在过,但千万不要夸大。战俘营精神不仅仅是团结和忠诚,也可能是“人人为己”,甚至会发生自己那份定量面包被最要好的朋友偷去的情况。俘虏们在严酷的现实补偿过去的错误,但并没有奇迹般地转变为“十全十美”的阿尔比教徒。被俘期间天天都有“战争”,但对手不一定总是德国人。

总之,我们不是怀着自己属于一个几千人的集体这种感情而生活的。重要的是有许多由 7 个或 8 个人组成的小核心,同一核心内的人分享外面送来的邮包,分担劳役,并统一安排工作——以便节省每个人的体力。这是一种小团体现象,而不是“大家庭”现象。

问:即使您从未向某些俘虏的乌托邦偏向让步,但这种经历在您身上留下了久远的印记……

答:是的。这种经历使我懂得了,在困境或不幸中,人类价值的等次同我以往认识、尊重,至少是接受的价值等次是完全不相符合的。我从这个发现中产生了怀疑,也就是在被俘期间,我开始从根本上怀疑我赖以安身立命的那些准则。

问:您曾提到你们在捉虱子时的晚间谈话。在你们的话题中,您没有提到宗教问题,诸如上帝、灵魂不灭、天主教或各派教会等等,而你们全体或几乎全体都受过天主教的培养。

答:由于顾及面子或尊重他人,我们把这些话题留在白天其他时候讨论。在我睡的房间里至少有 6 位神甫。12 名波兰人是非常虔诚的教徒。很多人遵守天主教教规。但他们都极其谨慎,以免出现任何传播教义的热忱。一种不成文的协议或公约使我们保

持沉默,不去损害那种对我们起保护作用的氛围。从我们的对话中排除政治争论。我们的小分队是由各色人等组成的。犹太教徒、新教徒、自由思想者都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都是我们的同志。不管是谁,只要挑起无谓的争论,都会受到责备。话虽这么说,还是出现了一种以天主教教义为中心的令人惊讶的精神再生。弥撒集合了数百名忠实信徒,听忏悔的神甫、甚至一般的“知心人”都深受欢迎。他们对德国人的坚定态度,赢得了那些对前途失望者的信任,后者失去了原有的参照物便本能地转向了传统。战俘营中的音乐家和诗人们用一种真正的天才谱曲、写诗、朗诵,他们的作品常常带有神秘主义的灵感。我现在还记得那时听过的一些诗句和旋律。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感动了我。至于我自己,当时一直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怀念过去受过的教育,以及童年时代的执着;另一方面,我对生和死的荒谬、丑和美的混杂进行沉思,因为这些问题使一切信心都模糊不清了。在我周围,宗教信仰和实践之风重新深入人心,而我的灵魂却远离了宗教。我尚需长时间地观察和寻找,直至有机会睁开双眼去看这个疯狂的世界为止,造物主认为让我们居住在这个世界是做了好事。

问:您被关押在哪个战俘营?

答:首先是在 IXA 战俘营,在卡塞尔西南部。随后于 1940 年 10 月转到离鲁道夫施塔特不远的图林根的 IXC 战俘营。在此地,我被编入由 250 人左右组成的小分队,我的小分队编号为 1515,驻扎在沙拉村里。这是一个非常混杂的班组,集合了一些被奇怪地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其中有西班牙的共和党难民、法国军队中的志愿兵、犹太人、神甫、小学教师等等。

我对这个充满博爱精神的沙拉小分队保留着美好的记忆。尤

其是与我同一房间的战俘们,我们之间相处融洽。在这里,我看到了法国在饮食和法权方面的天赋。呵!当我们把从田里偷来的土豆,蘸上皮鞋油在取暖的平底锅上烧烤的时候……

耶稣教会成员阿尔方斯·德洛布尔是我一生中很珍贵的朋友,他当时以高超的技艺主管这类事情。有时,我们的菜谱会因为从农舍偷来的一只鸭子或从谁家屋檐下取下的一块肥肉而丰盛起来,德洛布尔不需求助于神学的精神便能巧妙地烹饪我们的赃物,并且同大家一起吃得津津有味。他是上卢瓦尔省的一个农民,出生在离朱尔·罗曼村不远的地方。他的故事就像是热尔凡尼翁版《善良人》的回音那样。少年时代,他一直同一些棕色的母牛睡在牛栏里,靠母牛的体温取暖。后来进入了神学院,那是当地家里人口多而又贫穷的孩子的自然出路。他天性善良,天资聪慧。人们觉得他疏远了放松要求、变得自满自足的天主教。他专心信奉耶稣和新约的教义,那是一种朴素的信仰、朴素的爱。他自问,为什么天主教神文要把生、死、痛、病这些明显的东西弄得那么复杂。他说,只要爱就够了。因此他爱着。这位耶稣会教士属于里昂省。他以天主教诚笃神甫的身分行事,但对既定教会的存在方式表示不满。他那深沉而不可更改的信仰不需任何证明。他不是鼓吹它,而是体验它。晚年,脑充血使他丧失了说话能力,但他仍然目光炯炯,洞察世事。在辞世前夕他还向我微笑。

法律家方面,有克利蒙—费朗的公证人让·伯纳斯,他善于耍手腕、施诡计,在1940年10月就让我们通过了“沙拉前战俘协会”的章程!对章程条文的谈判非常艰苦,耗费了我们整整一个季度的时间。我们使出了钻牛角尖的本事,最后总算省了选举协会机构的程序。

问：您指的是一个贝当俱乐部吗？

答：不！同它毫无关系！你鬼迷心窍了！谁也没有打算成立这样的俱乐部，而且我本人就曾坚决反对这样的俱乐部。

问：人们指责您曾受到他们的诱惑……

答：“人们”是谁？又是一个恶意中伤！贝当俱乐部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影响。他们在战俘营中组织一些小型集会，邀请非会员出席，我认为这样做是不正常的，而且是滑稽可笑的。当你是战俘时，你是不会参加由看守们支持的示威游行的。在各地战俘营中共有将近 150 万战俘，他们自然敌视把他们继续关押的人。因此，大部分人对甄别留用的企图无法接受。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问：可是，您的朋友让·韦德里纳属于这些贝当俱乐部中的一个……

答：我不知道。我们不在同一个战俘营。我是后来才认识他的。

问：您的小分队在沙拉被分派过什么样的劳役？

答：一些相当艰苦的劳役。我们经常处于带枪流动哨兵的监视之下。我们被派去养护道路或打扫卫生。我主要是在一个捆绑干草和稻草的工厂工作。这是个工厂，离我们住的陶器厂几公里。那个陶器厂是一个便于看守的所在。窗户都拉上了铁丝网，到处都是栏杆。我们被监禁着，但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并不那么不舒服。我在那里结下的友谊始终是我最重要和最持久的友谊之一。德洛布尔、米尼埃、韦尔梅伊、菲尼特、勒克莱尔、夏尔维、莫尼埃、瓦雷恩、伯纳斯等名字使我一生信赖。那些同你命运与共的人，他们经受考验而保持着相互尊重的崇高品质。不需要成文的

公约,不需要口头的承诺,因为人们应该这样生活。因此,信任别人是可能的。

问:您在沙拉当战俘时是 24 岁,当时您想些什么呢?

答:我想逃跑,从第一天起我就这样想。我在吕尼维尔曾试图逃跑,但由于突然开赴德国而未能实施这一计划。这几乎是一个朝思暮想的念头。我有一个个人理由:战争使我离开了我热恋着的姑娘。但这种解释是不足以说服人的。我无法忍受被那些盲目的力量所胁迫。把我的命运绑在一场战争的偶然性上,在整个战争期间我将一事无成,这种状况触犯了我内心深处的一个意向:始终应有一扇门向着未可逆转的命运敞开。我自我培养了某种个人冒险的浪漫主义。我觉得失去自由犹如遭受肉体上的痛苦。是的,这既是肉体的痛苦也是灵魂的痛苦。我曾在什么地方写过,这不是勇气问题。我认识一些朋友,他们具有世间少见的勇敢,但从未想过逃跑。有人天生如此,有人则否。我是天生如此。这是不是想重新拿起武器呢?是要参加为法兰西复仇的雄心吗?或许,由于我这一代人当时并非负责人,因此没有必要证明自己同一个国家几世纪来最严重的灾难之一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能停留于此。但是,应当去哪里,怎样去,同谁去,我当时说不上来。

我并不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作为一个受欺侮民族的公民而生活的。法兰西的历史使我着迷,我热爱她的英雄人物、她的盛大事件和那些来源于她而震动世界的伟大思想。从童年始,我就相信我将续写这部历史。我还感到,对我国的占领就像是一场强奸。我不需要把自己同法兰西历史的强盛时代——黎塞留、马扎兰、沃邦、国民公会或波拿巴的时代挂起钩来。我个人就对一座由人类智慧与立体法则创造的如此和谐的奇妙建筑被摧毁、被蹂躏、被包

围而感到痛心。此外,我注意到,对我来说,法兰西最有代表性的天才就是沃邦。他只想着加强其根茎,紧闭其出口,拯救这块方形的牧场,这种方形牧场早已在菲利浦·奥古斯特或夏尔五世的思想中就由神秘的先知勾画出来了。

问:无聊不也是促使您试图出走的原因吗?

答:不是。我在任何地方都从未感到过无聊。你会觉得这种说法是古怪的。但是,我确实很顺应我的命运。我不是唯一如此的人。已往养成的习惯使许多人不想越狱。我不愿与我的同志们分离。我迅速习惯了人们安置我的地方。我无意再换地方。逃跑的想法和逃跑的需要来自另外一些冲动。甚至今天我也无法确切地告诉你是哪些冲动。我认为,自由就像人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我需要呼吸。我当时失去了法兰西,而离开了她,我就可能窒息。

从戴高乐时代起,人们就对他下述著名的格言展开了辩论:“我对法兰西向来就有某种观念。”对这种说法,我至今感到陌生。对于法兰西我没有观念,而有感觉,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给人的感觉,包括她的体形、她的目光。她并不虚悬在天与地之间。她是一个具有三维尺度的人。我找不到能用什么同她相比。无论如何,不能用某一种观念。她是围绕着四条大河和若干山脉建立起来的,甚至没有名副其实的边界。她是土地、水流、几何学的产儿,然后才给人予和谐的形象。这是欧洲唯一称得上大自然杰作的国家,而非人类雄心与想象力的果实。侵害这均衡奇迹就是伤害我,使我震惊。这并非因为我对法兰西的爱首先出自审美感觉,而是因为,一个像德国那样不成体统的民族居然能侵占她、吞并她,在我看来是亵渎神明:这些人在我家里会干出什么事来呢?他们说话的腔调比他们战车的轰响更使我难受,看看他们那种对一个世

世界上最古老民族颐指气使的方式吧！而他们的历史还不到二百年，……要我这一代人去经受这种考验，对我来说是不可忍受的。我们不是为此而生的，我们在热爱自由中长大，而现在却只听到仇恨的腔调——一种虚构的、从蒙昧主义的血腥冒险中获得的优越感的表现。

谈到这里，人们应已明白，在我的思想中，地理的分量与历史的分量一样重。我把它作为一种参照物。我的爱国主义从拉德罗纳、拉夏朗德或拉维埃讷的源泉中所汲取的营养与从迪盖斯克伦的闪光思想中汲取的一样多。谈到我的国家，这首先是指风景，就像谈到我的爱人、我的朋友，首先是指他们的面貌一样。也许我当时曾有过分占有的倾向。这种倾向来自我幸福的童年。那时，凡事皆顺我心。每棵树都有一个名字：柳树、白蜡树、橡树、椴树。我的河流之水来自土地，来自我的土地，那是我的土地。要不是由于疏忽或叛卖，它是难以被攻占的。我觉得，青青的草地和它那些最不引人注目的小花——伞形花、山菊花、三叶草，都是不可谈判、不可转让的。麦收的香气属于我的鼻子和我的肺。田野和道路的灰尘是从我们的路上扬起的。河流的蜿蜒曲折只经由一个国家——我的祖国。威悉河两岸的居民与此毫无关系。同样贴近、伸手可及的是对于两次战争的回忆。那是反对同一个敌人的战争，是我一生的战争，是我所经历的世纪的战争，两次战争同样疯狂、野蛮、不可调和，但每次战争都提供了不同的模式。我们该走什么样的路呢？是1914年8月法国蓝衫军开往柏林的路吗？或是像1940年那样把世界搅浑去寻找我们的梦想呢？对法兰西的某种观念把我带回到那个已不可触摸的、犹如草叶般干枯的祖国。我更多地求助了《灵感山岗》一书的力量，反复吟诵它那奇妙的节律，以使过

去的喧闹声在我身上回响。我一再重复巴雷斯所说的：“这些地方的力量从何而来，希望应归功于对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归功于一个特殊景点的美丽，归功于那些世世代代来到这里活动的民众的激情，他们的品德更为神秘。他们的品德先于他们的荣誉，并将在荣誉消失后继续存在下去。他们不要怀疑这一点：在这世界上还有无数的精神据点，我们同那些毫无崇高可言的阴暗灵魂不一样。只有漫不经心或过度弱视的眼睛才不能把火同火棘区别开来。”

至于我的火棘不必想象很远。它们就在那里，我也在那里，那是我刚回国的时候，在一个我一无所知或几乎一无所知的地方，它的形象首次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刚刚渡过了卢河，附近有一些高地：阿尔莱、萨都—夏隆、图卢兹—勒—萨都。它们可能是尚未被神示而灵魂正在期待着的数千个精神据点中的几处。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我在一篇回国后不久所写的文章中作了反映。没有必要重新写过。我喜欢直播节目。那些印象是无法再创造的。我无意中把它“陈化”了半个世纪。它带着过去时代的印记和我感官疲乏的印记。下面就是我那时即兴而写的文字，原题为《在通往法兰西的道路上》（发表于1943年4月——译注）。

“那天早晨，法国天气晴朗。太阳驱散了轻雾，中午时分，阳光仍未照进峡谷。只剩下最后一段路了，到接待中心还要走8公里路，我感到前些日子的疲劳减轻了。鸟儿在飞翔，有时掠地而过，然后停下来，仰起脑袋；一条喘着粗气的狗在道路两旁辨认那不定的踪迹。田野肥沃而空旷，在冬天的气息下酝酿着悄悄的新生。道路两旁是白色和灰色的村庄。男人们无精打采的，有些在门前锯木头，有些在互相打听晚间的新闻，有些在缓缓地蹬着自行车。

“我并未为这样地重返几乎已被忘怀的法国而感到生气。我曾想象过可能碰到不知是什么样的狂风暴雨,直至想到云彩变幻的颜色。但那些炊烟、屋脊、十字交叉的窗户,那些方格子的路灯、长方形的篱笆和一望无际的地平线,还有那些没有好奇心的冷漠的男人,这一切正是我离开时的景象。终于重返故乡了!我在流放时曾改写了一些从关于上一次战争的教科书和故事中剽窃来的场面。现在,我回到了故乡,它迫使我在分别两年后去认识可以预料的激动,经过那些粗陋的建筑物。说真的,我有点强迫自己,在每个细节上我都遇到困难:道路、树木、村庄、被平行山丘切割的山谷、暗流中的航标等等,对这次隆重的重逢都只表现出一种出色的冷漠。但我的亲人们用那种无忧无虑的神情来欢迎我,我不指望比这更珍贵的友谊凭证了。这是把面子看得太重了吗?我一直讨厌那些姿态和空话,它们不是接纳你,而是把你推出门外。我的朋友们除了让我允许他们沉默外,从来不需要别的东西。

“因此,尽管我有‘文学的’反应能力,尽管我想模仿某些作品片断中那些生动的情节,但我更喜欢像我的返乡那样少点荣耀,也少点激动。滥造悲剧那是太容易了:连续数小时吸饮早晨潮湿的空气;天空中飘过薄雾轻烟;安排色调,以纠正冬季的严寒等这些都太容易了。既然我已被完全接纳进入事物的内层,对于我这平凡人的平凡故事,我还有什么要做的呢?我既没有召集亲戚,也没有召集朋友,过一段时间再瞧吧。首先,我要呼吸祖国的空气,倾听国人的言语;简单地说,我得用我的耳朵和眼睛,用我的感官,来认识祖国的存在,然后才是其余的。其余的总是随着这些指示,这些直接的发现而来的。

“连走了那么多路之后,我又快步走了8公里,那是8公里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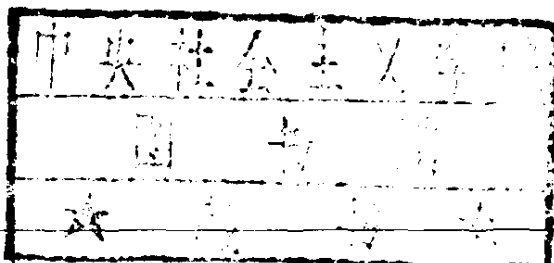
得发青的艰苦的路。我一边走一边回忆起我用自由步伐走上第一条自由之路之前所经历的道路。怀着孩子般的愿望——他相信真理躲藏在地平线的另一边，他观测着天际那不弯不曲的线条，并寻思那后面会有多么美妙的风光；怀着成年人的固执——他总是拒绝依赖他人，只从自身寻求对万事万物的解释。我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否定了过去、传统、法律，甚至爱情等等所有那些由空间和时间绷紧的网。我不得经过长时间的学习才把祖国那失去光泽的容颜从梦幻、希望、失望以及由奇特的幻想所带来的异国情调中透析出来。我从历史书中获得的错误知识教我把祖国放在“理想国”之列，并且一点一点地引导我在抽象概念中漫游。很快地以前容光焕发的面孔褪了颜色，变得毫无生气了。我们这一代人非得经过种种艰难曲折才能懂得法兰西是个人！

“随后，我回想起在战俘营度过的日子，以及如何重新获得朴素的真理——一开始是不自觉的，后来则是有意识的。在那里，人们喜欢谈论自己家里的事，并对那虚浮的希望感到后悔，因为那种希望曾促使我们的思想去漫游，促使我们逃离为我们准备的地方，这些地方与我们如此相似，以至一旦失去了它们，我们就感到有一种说不清的苦恼。人们对所有那些生活中经历过的事进行反思，也对所有那些构成战俘营日常任务的事进行思考。人们坦认遗忘和怀旧是一种背叛。当人们用眼搜寻这块陌生土地的地平线时，却几乎看不见它；在我们无休无止的遐想中，我脑子中现在的形象不停地运转，轻飘飘的，最终在‘过去’的形象面前消失。在我们的言谈之外，那匆匆显现的形体，总是再现同样的轮廓。在铁丝网后面，当人们贪婪地寻找标记的方位时，人们会突然体验到一种惬意之情。

“天空的颜色,屋顶的色彩,耕田的方式,就餐时间,儿童的声音,住房的气味,这一切都是我们在被流放时常常忆及的。那时,我们被迫忍受那陌生的风,不习惯那圆瓦尖屋顶的房子,对那高而窄的犁铧翻种那黑麦地感到惊讶,默不作声地吞食那天天一样的汤。在头些日子里,我们满足于顺应眼前的需要:饥饿使胃痉挛。寒冷使身体蜷缩,但很快,我们恢复了习惯动作无法麻醉的感性和对于相同习惯的博爱。与此同时,人人都靠拢那些同自己一样知道同一个村子的名字、知道从哪边拐弯可以走向农舍的人,靠拢那些同自己一样知道从夕阳余辉中看出暴风雨预兆的人,靠拢那些说话时延长或缩短同样音节的人。

“就这样,恢复了人群与他们所拥有的土地之间的神秘联系,就像原始时代那样,土地属于由活人和死者组成的共同体,那时,土地的果实象征着死者的灵魂;而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黑暗世界的组成部分,个人只不过是这个世界转瞬即逝的表现而已。因此,谁能把这个整体分开呢?人与动物、植物、矿物融为一体,并通过它们而认识自己:人还不是那个在世界之上跳舞的虚假的上帝,那个上帝被自身的疯狂所驱使,竟然不知道去何处落脚了。

“此刻,在这冬天的早晨,当我内心安详而平静地在那重新找到的路上走完第一段路程时,我觉得以前的狂热仿佛是徒劳无益的。现在,我回到了我那窄小的住处,进入了那座白色的石头房子,和那些纯朴而粗野的人生活在一起了。但是,我曾相信存在的隔阂现已荡然无存。我故乡起伏的山丘再也不是我那世界的边界。当然远离这些山丘时,我已学会发掘埋藏其中的宝藏。从今以后,我将注意空气的芬芳、田野的色彩、天空的变化、动物的举止、四季的轮回,注意生活在地球这一角落的人们所特有的习俗,



并使我的呼吸同大自然呼吸的节律相一致。在经过这么多的曲折之后所获得的本事,为我提供了最后的证据:一旦我的自由回复到我自己的土地上,我就变成了自由人。

“对我来说,现在已是完成这一最后仪式的时候了。经过长途跋涉之后,作为走在队伍前列的朝圣者,作为数百万穿卡其制服者的先驱,我知道,我已在流放的山谷中发现了祖先领地的空间及其界限。

“世界上有一些友谊产生于夏日。因为烈日当空,赐给世上万物的色彩,使其辉煌灿烂,但同时又极其短暂;为拯救这稍纵即逝的时刻,你会爱上同你分享这一美妙时刻的人。任何人在临死前都鼓励分担,就像人们相互拥抱以分担恐惧那样。因此,出门远行的旅客在码头或车站都要吻别;留下来的人的心也会被出发者的别情奇怪地打乱,尽管后者原来同他没有什么关系,而现在却突然脱下了陌路人的外衣,因为生命对他们来说,都同时意味着死亡和被遗忘,而生命本身也是由死亡和被遗忘所构成的。

“世界上有一些长时间的相互一致,往往始于一次散步,或面对一幅油画杰作而欣赏趣味相同。在这唯一的时刻里,灵魂在颤动,感官在激动。然后,光阴在年年相似中逝去。如果人们试图跳出他们的界线去会见一位稍纵即逝的梦幻者的话,结果会是多么令人失望,多么难于一致啊!食物太不相同了。肉体和精神受到了伤害,然后又被其他的打击和其他的奇迹所迷醉。在《窄门》一书中,热罗姆从意大利旅行回来,在海岸上,他的手脱开了阿丽莎的手,因为天气太热,他们的身体太笨重,而且,她与他之间再无他物可以沟通。

“人们只有激活喷射清泉的记忆,才能保存那些激动人心而又

温馨的友谊；但不要试图拿魔棍去反复撞击岩石，它是不会裂开的；越是表示要放弃，唯一剩下的将是不幸，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这意味着抛弃了圣宠。

“我突然理解了我对祖国的‘友谊’，长时间坚持下来的，不是那种一时的‘友谊’，而是不为人知的那种强烈的依恋，这种依恋使我无所畏惧，不计痛苦，只需再次重逢，就会袒露出来。

“当人们重新见到祖国的时候，并不发出快乐的叫喊，快乐是有的，它充满你的胸膛，它传遍你腿上的肌肉，它引导着你的视线。不必去抚平这种快乐，它是行走、呼吸的一种风格，这是看到周围事物迅速而又和谐地实现一致时的一种姿态。因此，在这条国家公路上，在这条绿色勾边的蓝色平原公路上，我明白了，我的快乐来自确信与顺利。这一切是多么复杂啊！我真是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思！无边无际、广阔空间、自由自在，这就是我今日的快乐，它是那样自信，它同我那高统皮鞋沉重踏过的这段路又是那么的相像。

“同样，我的解放也只是在摆脱了官方姿态才开始的。拿着简陋的行李，走上这最后一段路时，敲锣打鼓迎接与合乎情理的激动也构成了告别仪式的一部分。一旦独自一人时，我就决定上路，去同我家中的事物进行直接接触。一种巨大的快乐平息了下来，以便培养记忆，就像鱼儿得水，鸟儿翔空，我感到轻快而又清新，不需要任何东西来帮我腾浮，音响、心跳都令人厌烦。

“此外，任何俗套对我都免除了。春天树木总要发芽，夏天不会没有炎热，而那个冬日则明亮而又宁静，到处都是窃窃私语和跳跳蹦蹦；太阳放射出新的光彩，映衬出层次丰富的色调。我的祖国以向我展现一个个出乎意料的面貌为乐事，外国人称这些地方风

景如画,而在我看来只是些熟悉的景物。

“我阔步前进,呼吸舒畅,动作轻松,无拘无束。如果我觉得我的祖国不如我的胃口那样富有活力,不如我的雄心那样宽广,不如我的欲望那样丰富,不如我的要求那么强烈,不如我的希望那么重大,那是多么令人发笑啊!但是,这些山丘,这种光芒,这些被蒙上种种欺骗性修饰词的地平线,它们所显示的全然不是平庸的激情、‘中间色调’和‘缺乏活力的精致’。每块经翻掘而变成褐色的方田,每座巧妙地抗风的房屋,都叙述着一种胜利。在人这一最后的胜利者同世代代被奉献的土地之间达成了微妙的一致。力量产生了对抗。这不是那种折衷之计,不是中庸之道的假聪明,而是粗鲁的暴力、野蛮的征服、强求的顺从。

“土地喜欢这种强暴,它还给人的比人所希望的要多。但是,它在承认人是主人的同时,又把人牢牢地拴住。这种故事就在我眼前发生。没有哪一平方米的土地未曾被农民走过,没有哪一平方米的土地未曾被农民用工具翻掘过。人的劳动甚至还左右着颜色,强迫太阳确认:龟裂的土地是红色,休耕地是灰色,道路是蓝色,不落的叶子是绿色。我每走一步都使我更接近我亲人的荣耀,那唯一永恒的荣耀,以被战胜者而自豪的土地的荣耀。生活于土地并从土地上获取神秘的力量的人们,我可以毫不畏惧地加入他们的队伍。当我远离他们的时候,我养成了渴求高贵的习惯,我现在猜想,如果同他们在一起不可能拥有这高贵的地位。

“在12月的日子里,太阳就是上帝。它选中每样东西以便在其中展示其形迹。每种色调的细微差异都有其真理性,并在它所引起的神秘愉悦中表现出来:它同样表现得不那么肯定,有点混乱,只有为了自己的‘意中人’,才表现得毫不妥协。仅就这样,掉

叶的杨树从明亮转为阴暗,展现在绿色和灰色的山丘之间;道路上是脏土的颜色;屋顶上‘栖息’着棕色的瓦片;蓝色的天空染上了片片金黄色。这种早晨的好处在于:人在不规则的小土路上行走,就像在康庄大道上行走一样,到处都感到惬意,因为肯定被接纳而一身轻松。当我转过头去注视那座有着高耸入云的抛物线状山顶的勃朗峰时;当我从那残存的墙面上认出图卢兹——这道墙还留在那里,证明了只有通过人类的作品才能感到世代的消逝时;当我寻找被掩埋在大地皱褶里的博丹时;当我突然发现蒙肖维埃、它的方塔以及它那些静静屹立在佛罗伦萨画派天空下的房屋时,我就像一位穿上发光衣服的人。真的,行动一点不受拘束,目观四方,一点不觉疲惫。太阳也帮忙:不热不冷,正好排除汗水、烦恼、疲劳,特别是可使思想摆脱那种迫使人以生当死、以死当生的无情游戏。就这样,我能大声抱怨,并且急急忙忙地呼吸而忘记了瘴气。由于天性,我甚至开始幻想不可能的事,想象过一种高贵的生活,既不需努力,也不需‘变容’,人类的地位就能达到事物内在神灵的水平。无论是平原还是山丘,无论是村庄还是道路,无论是教堂塔楼发出的钟声、鸟儿和昆虫快速的鸣叫声,还是骑马人对马失前蹄的抱怨声,这一切似乎什么都没有预示。然而除了它们以外,谁曾想到我那流浪者的身影终于结束了短暂的历险?

“当我到达接待中心时,一位法兰西战友会会员迎接我,把我引进一间低矮而空气新鲜的房子。在左边那间墙壁开裂的房间里,摆着铺了桌布的长桌,以备午餐之用。在右边房间,摆着一张圆桌,上面放着登记册。先从各种表格开始。我再次填写了各个栏目,说明自己的身分并签了字。法兰西,真像是被关在这四壁之间,充满了墨水和面包的气味。人们在交头接耳。战友会会员有

礼貌而且干净(噢,真难得),对我既不怜悯,也不激励,恰到好处地做他的工作,而不把这一工作称之为义务。他同我谈天说地,谈论所有平凡的事情。他只问我从哪里来,而不问我将往哪里去;他知道我将去任何地方,只要这些地方符合我对静默的爱好。至于我,我听他说话的声调、口音,就像他说的话那样,毫无意义,枯燥无味,但随时准备插进各种抑扬顿挫的话语或各种思想。是的,这位法国战友会会员,我获得自由后遇到的第一位法国人,让我感觉到他已友好地准备好了。随后,我坐到餐桌前,当我开始拿面包时,我注意到从那敞开的窗户射进来的阳光,在地板上画出一个规正的矩形。我在上面洒了一些面包屑,尘埃骤起,旋即落定。室外,法兰西神色安详。”

然而,我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的道路将通往何处?在我眼前和在我亲人的记忆中,仍然有着1914年至1918年四年间的战斗形象:为了法兰西的生存而战,以身相许,拼死拼活;整个法兰西抱成一团,面对敌人,肌肉碰着肌肉,耳中可以听到对方的呼吸,感到他心脏的搏动,衡量出他最后的抗争力。那是意志、实力、耐久性的较量,就像以前博览会上的角斗士一样。那种力量使我着迷。英勇顽强,寸土不让,因为只要让出寸土,罗马就成了不设防的城市。没有注意力的高度集中,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在我心目中,若弗尔(以前常译为霞飞——译注)和克雷蒙梭,就是那些被镌刻在花岗岩上的爱国者的榜样:厚重、坚硬、耐久。他们对法兰西的观念,完全是从上千年历史继承下来的观念。他们体现了这种连续性。他们知道,一时的疏忽足以使前功尽弃。人们不能放松哪怕是一分钟的努力,就像巴斯克人的拔河比赛那样,一人倒下,全队皆输。从以后时代的懒散中,在凡尔赛条约所受的破坏

中,我看到了历史那莫名其妙的心不在焉,这是为极度疲劳付出的代价。

20年之后,我们所进行的那场战争是多么不同啊!它把我们这支被俘的队伍抛到了路边!它的发展较难预料。戴高乐的巨大功绩在于他懂得世界的命运。从头一天起他就明白,在一场普通的实力较量中,一切都将成为赌注,首先是文明本身,其结局如何,谁也无法预知。我常想,戴高乐的胜利和由于他而使法国获得的胜利,与其归功于他的爱国主义,倒不如归功于他的历史智慧。在沙拉的晚上闲谈中,我们曾常常试图寻找一位象征性的英雄,而实际上当时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位英雄,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感觉到贝当所缺乏的,是那种不可动摇的统一性,那种对一个民族生命的信念——这个民族崇尚勇敢胜于坚韧。而这正是戴高乐力量的源泉。对法兰西的某种观念不允许妥协。然而,维希政府却不断妥协,换个说法,就是屈服。若弗尔、克雷蒙梭、戴高乐三人用各自不同的方法生活或理解:法兰西的历史不容讨价还价。贝当是不能同他们相提并论的。他对法兰西的观念是属于另一个世纪的,属于梯也尔或巴赞那个世纪的。当人们投降时,我为被排斥在真正的战斗之外而愤怒。我呼吁我所熟识的形象来“增援”。这些人对我来说,不管是什么头衔,都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一个时代。我从我民族的历史中引证那些伟大的见证人,没有他们,法兰西将变得柔顺、变形。我曾提到沃邦,因为我认为他是最伟大的:他建造、守卫城堡,他控制了人民的情绪,他靠一种完美的科学办法阻止了人民的迁徙。我喜欢这位小贵族出身的法兰西元帅在路易十四统治下成长,而最终又教训了国王,成为科学上但也是道德上的典范。我也曾热爱夏尔五世国王,他无处不在,只要哪里有人砸我们

的门他就去哪里。路易十一的反复无常让我讨厌,使我恼怒。我把现代法国诞生的功劳归于夏尔七世这位矫枉济世的游侠骑士。啊!这一切曾使他付出高昂的代价,其中包括同圣女贞德结为“表亲”(他说圣女贞德早在300多年前就已预言夏尔七世的降生——译注)。还有其他人,如蒂雷纳,当时曾一度被视为叛徒;莫里斯·德萨斯,比德国人还德国人;丹东和卡尔诺,这是两只“革命的啄木鸟”,丹东可能已腐朽了,但他那“果敢,再果敢,始终果敢”的召唤弥补了法国的全部弱点。我赞赏卡尔诺,他在拿破仑战败时前来效劳,尽管拿破仑原先并不赏识他。

问:你们是怎么决定逃跑的?是事前酝酿已久的想法或是出于求生的冲动?

答:这要看情况。我准备第一次逃跑差不多花了六个月,第二次是八个月。这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成功了,它是临时决定的。我没有从中得出什么理论。

看起来仿佛是田园诗般的行动,我第一次逃跑是从园艺劳动开始的。请勿想象那是在播种蝴蝶花或玫瑰花的种子,实际上,我们是在锯劈沉甸甸的木头。一些难友告诉我,在鲁道夫施塔特空军汽车驾驶学校的长廊里有一张相当大比例的德国地图。一次劳役换班时给我提供了方便,我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穿过这个走廊,每次都选定1~2平方厘米的图案摹写在一片碎纸上。我画出了一条从沙拉到沙夫豪森河湾的路线,这是德国—瑞士边界唯一的陆地部分(要我游过莱茵河或博登湖,那是我力所不及的)。在把一张张纸片连接起来后,我做成了一张米什兰地图,标明我将走的路,从北到南长620公里,东西之间是20公里的范围。

这个任务一完成,我就不再拖木头,而是返回陶器厂劳动了。

说“劳动”，那是大话。因为天气寒冷，我们轮流在腐烂的草垛中取暖。我们弄了一个“暗室”，就像在金字塔里面一样。我们轮流入内，总有四分之一的人在里面“值班”。我们组织得很好……

问：逃跑前一夜是如何度过的？害怕吗？

答：我们有别的事要操心。我需要一双能走远路的鞋，一套便衣，自然，我当时都没有。1941年3月4日，出发前夕，我割掉我军帽的帽檐，在工厂里德国工人的帮助下，我搞到一件人造丝织物的长雨衣，一直拖到脚后跟，这样，别人就看不出雨衣下是什么了。德洛布尔这个耶稣教徒会缝衣服，他为我做了一个背囊，可装路上用品。我的朋友们为我积聚了很多食物：军用饼干、糖、巧克力。我同未来的逃亡伙伴，修道院院长、阿利埃省圣布尔辛苏斯乌尔的格扎维埃·勒克莱尔神甫一起，计算出每人每天需要十二片饼干、两块糖和一块巧克力，路上要走三周。我们已储存了茶叶，并计划在山溪中取水。我们还带上鞋油和“军刀”，因为德国人可能注意脏鞋，而每天刮胡子是必要的。

问：这次逃跑按时进行了吗？

答：不，我们推迟了24小时出发，因背囊未准备好。我记得我借口病了，要去看门诊——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这是为了争取必要的时间做出发前的最后安排。德国医生给我做了检查，诊断我没有什么病。但这并不妨碍他问我：“要不要我给你开八天的病假？”我回答：“一天就够了……”这使他困惑。在此同时，德洛布尔忙着缝完背囊。夜幕降临时，我们把背包隐藏在工厂围墙内的草堆中。

3月5日晨，天还未亮，我们离开小分队，取走我们的行李，越过铁丝网——此地看管不严。横过铁路，我们就消失在大自然中

了。多亏劳役队长和翻译“同谋”，德国人没有马上发现我们的失踪。他们——队长让·穆尼埃和翻译贝尔纳·菲尼弗特——做得如此巧妙，以至于等到晚上收工时才发现我们不在了。穆尼埃和菲尼弗特受到了惩罚。这是一种游戏规则。

问：你们不怕被人告发吗？

答：不。在我那时候，“告发”这种不道德的事还未见过。

问：您讲德语吗？

答：不，勒克莱尔院长也不会讲……但我们有个规矩：对任何人都不要说话。这个“劝告”是我们在德国人办的战俘营小图书馆里的一本书上发现的。这是阿尔古先生写的书，叙述他逃避 1914 年至 1918 年战争的细节。我们从书中获得关于各种逃跑方式的大量建议和几条基本的“禁令”，如避免与路人交错而过，如果他们对你讲话，你不要答腔。

头三天，我们穿过田野，越过丘陵。山路陡峭，地上泥泞，让人无法放心。我们那沾满泥浆的鞋子令人担忧，因为一旦同他人意外相遇，我们就可能被人认出来。我们的脚磨出了血。我们撕下手帕垫在鞋子与脚底之间减少磨擦，以便保护脚板。我们很快发觉，这样走下去是到不了目的地的，最好是走小路，那样可以减少遇上德国军队的危险。我们晚间行走，白天藏在森林里。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三个星期。

问：在这逃难的三周里，你们是否生活在对被抓获的恐惧之中？

答：我们有成功的意志，这是主要的。而我们也几乎要成功了。事实上，在途中，我们只遇到过两次险情。第一次，一个骑自行车巡逻的宪兵盘查了我们。他是否认出了我们是逃亡者，还是

把我们看作了外籍工人？无论如何，在他看来，我们的身分是不清白的。但由于他大腹便便，显然无意步行押送我们，他就对我们说，他将在镇口等我们。他跨上自行车走了。我们趁机溜走，躲进森林中灌木丛里，然后进入森林深处。

第二次发生在半路上，勒克莱尔病倒了。我到一个小村子去买药。我勉强让药剂师懂得，我的一位朋友得了肠胃病，我总算搞到了所需的药品。我自称是意大利工人。这没引起人注意。接着，我绕到面包铺买了一个圆形大面包。人们都很友好，不怎么好奇。采购任务完成后，我就返回勒克莱尔藏身的山坡。他正在想我是否已被捕了。

夜幕降临时，我们又重新上路。我们感到疲乏，周身湿透，四肢冻僵。在这次为期 21 天的历险中，有 15 天下雨下雪，使我们的身体极其衰弱。由于寒冷，我们不能一次连续睡足两小时。最后几天，我们就根本睡不着了。我们似乎得了幻觉症。但意志始终指引着我们。

问：你们被捕是在你们即将抵达瑞士边境的时候……

答：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搞错了方向。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们抵达南武尔滕背格镇，在埃格斯海姆教堂前路过，有数名教徒去那里做礼拜。就在那里，我们搞错了方向。走了两公里后，我们又返回，穿过同一个村子，路过同一座教堂。那时，太阳已升高，教徒们从教堂里走出来，看到我们这样往返而感到惊奇。特别是当他们看到我们在村后覆盖着积雪和长满落叶树的山坡上往上爬时，他们的好奇心加大了。我们理解村民激动的理由。他们手持棍棒，集合起来追赶我们。这场争斗是不平等的。我们已疲乏，他们却精力充沛。他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很快缩短，最终赶上了

我们。格扎维埃·勒克莱尔同第一个追上并企图捕捉他的人打了起来,他对我说:“请稍等,我们要试试看。我们将会看到……我们已靠近边界,还有希望。”

实际上,我们已输了。德国人抓到我们后,把我们押到埃格斯海姆村政府,并把我们关在谷仓里。村长是个好心人。他的姐姐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小姐,看到我们精疲力竭,她给我们送来了热汤。她心肠多好啊!在村政府大厅里,村民们争着来看我们。我们成了当天的头条新闻。当时是1941年3月底,这个地区还从未见过逃亡的战俘。追赶我们最积极的那个人,手里总是拿着手枪,戴着纳粹的标志,用盛怒的目光监视着我们,头戴纳粹党的帽子并不时发出含糊的吼叫。当一位来自附近城市的宪兵下级军官接过我们的案子后,此人就对我们进行猛烈的抨击,并提醒宪兵注意我们的恶劣意图。他发现勒克莱尔和我把从背囊中取出的指南针和另一些物品放进口袋——这些东西是在我们被捕时搜出并被放在村政府桌上的。上路不远,这位上士就命令一辆小卡车把我们拉上,送进施派兴根州首府的监狱。

这里,我禁不住要提前讲一段插曲。1947年,作为第四共和国第一届政府——拉马迪埃政府的退伍军人部长,我利用柯尼格邀请我出席巴登巴登市一次军事巡视的机会重返了埃格斯海姆。一小群人秩序井然地在那儿欢迎我。人们自我介绍了在新市长指挥下排列在市政府前面的市政委员会成员。我毫不费力地就认出这位新市长正是那位六年前拿枪威胁过我们的、戴着纳粹党帽和袖章的残酷无情的小矮个。我打听那位仁慈的胖村长现在干什么,据说他已被清洗,正是这个戴党帽的家伙接替了他。这件事使得我们对历史的意义作出哲学的思考。

另一桩回忆：在这次旅行后，我在巴黎收到施派兴根监狱前狱长的来信。勒克莱尔和我是他当时看过的仅有的两名犯人。人们至今仍可在1941年3月至4月的监禁登记册上读到，这里曾关进一名神甫和一名“法学家”。这位狱长名叫于贝尔。于贝尔先生也曾被清洗，后来在一家医院担任一个他显然不喜欢的职务。在信中，他称我为“亲爱的部长先生”，最后写道：“我希望您对在狱中度过日子保留着良好的记忆。”当然，他希望恢复其在施派兴根监狱的旧职。他强调他曾在那里荣幸地认识了我。

我要就这件事最后讲句话。1980年我再次重返施派兴根。这一次是我同威利·勃兰特约定，先到鲁道夫施塔特会合，然后沿着当年逃亡的路线走一遍（坐汽车）。当地举行了欢迎仪式，并搭了个台子。台上坐着包括于贝尔先生两个女儿埃尔弗里德和卢德米拉在内的官员们。我拥抱了这两位有着淡紫色头发的老太太。这头发使我忆起了很久以前那两位别有魅力的女学生。她们曾偷偷进入我们的监房，借给我们几本法语书——因为她们正在学法语——和一种周刊画报，那上面尽是战争报道，炫耀德国的英雄主义。她们当时漂亮、快乐，穿着希特勒式的制服。“尘世的荣耀转瞬即逝。”好吧，请相信这一点：我们的重逢是愉快的。

问：在做了如此多的努力之后，这次被捕所引起的失望应是巨大的。

答：当人在行动时，就不会有巨大的失望！在埃格森之后，我们被押送到施派兴根。一个月后，我们被武装押送到IXC战俘营，随后被遣返我们原先呆过的IXA战俘营。我们受到严密的监视。人们有理由不信任逃亡者，设了双重铁丝网、瞭望台、旋转式机枪、探照灯……与此地比较，另一个战俘营简直是小儿科。在IXA战

俘营,我们像是被烧红的烙铁打下了印记,我们不准参加任何营外的劳役。

问:这种严厉措施是否是一种报复?

答:我猜想德国人担心逃亡者有重犯的怪癖,于是采取了防范措施。

问:那您决定试图第二次逃跑……

答:是的。我们有三个人,制定了一项计划。如今,我的两个同伴都已不在人世:皮埃尔·勒弗拉尔死于1992年,而新闻记者皮埃尔·巴伦于50年代初在科特迪瓦的一次车祸中丧生。我们当时注意到,新近安装的一个变压器,在铁丝网沿线形成了一片阴影,在那里可以逃过瞭望台高处哨兵的视线。只要设法到达那个阴影区,通过一块跳板越过两排铁丝网,然后就可“跌入”外沟。这首三部曲并不简单。尤其因为铁丝网外面的那条沟,每100米就有一个哨兵看守,还有流动哨兵在他们之间来来往往。避免发出任何响声,在流动哨兵背对我们而且离我们尽可能最远时往下跳,这就是我们的计划。从那儿,有一条路从战俘营直通数公里之外的齐根汉村,再远一点,就到了大市镇特雷莎。

我们决定在一个星期天——1941年11月28日晚上出走。这一天,该地区的农民将拜访战俘营的士兵,那种热闹场面对我们的计划是有利的。我们弄到了德国雨衣,并约定在特雷莎火车站会面。第一个往下跳的是勒弗拉尔,随后是巴伦和我。我们各自分开,混入德国散步者中间。勒弗拉尔平安无事。巴伦走出数百米后被发现并被捕。警报拉响了,整座战俘营的灯都亮了。

问:您是否已进入安全地带?

答:我来到战俘营外,从沟中爬出,站在路上,沿着我的朋友们

走的同一条路往前走。我看到巴伦受阻,士兵们拿枪向他瞄准。士兵们向我走来。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停下来,看着巴伦在我面前走过。我们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不露声色。我记得,过了些时候,皮埃尔·巴伦再次逃走,藏在一列火车上抵达匈牙利。在布达佩斯,他住在一位马札尔人的家里,并娶了他的女儿……

我们的看守对自己的收获非常满意,得意洋洋地返回营地。我即大步奔向田野。

问:您在约定的地方找到勒弗拉尔了吗?

答:我没有找到他,士兵们或骑摩托,或者步行,牵着狗,沿路搜寻我们。我躲在一座桥底下,水深至膝,使狗无法发现我的踪迹。我在那里呆了一两个小时,等复归平静后,我到达了原先约定的地点。我注意不发出任何声响,即使勒弗拉尔在那里,他也可能没有发现我的存在,我后来知道,他并无多大困难就抵达了巴黎。

我沿着铁路走,直至下一个车站。我曾在外衣袖子里缝了一点钱,我操着刚好让人听懂的德语买了一张票,先到法兰克福,又到萨尔布吕肯,最后到达梅斯。在梅斯,我曾两次试图越过 15 公里之外的边界——因为阿尔萨斯和摩泽尔省当时都已并入德国。但我遇上了德国的巡逻队。

回到梅斯,我极度疲乏,在一个防空洞里度过了第一夜。天气寒冷,我非常难受,以至于我决定不顾危险,不再在外面露宿。我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一座名叫塞西利亚的小旅馆。旅馆主人在门口讲着法语,这是德国当局所禁止的,这使我鼓起勇气向他要一个房间,主人把我带到那里。房间很乡气,有一床红色的鸭绒压脚被和床单,这是长期以来我第一次睡床单!一小时后,我听到敲门声以

及一声如雷般的叫喊：“警察！”旅馆的主人告发了我，当我被警察押下楼时，店主还让我付了房钱。

我被监禁在夏尔三世堡垒中——这里虽是监狱，但却风景如画，同受惩处的德国士兵关在一起。他们受到严格的管制。我静静地坐在我的角落里，看他们跑步、攀绳、爬行，直至五体投地，精疲力尽。没有一人对我感到兴趣。

问：在第二次逃跑失败后，您是否害怕被送返德国？

答：当然喽，甚至可能送去波兰。因为人们都在说要把那些惯犯发配到那里去。不久，果然这样做了。几天后，我被安置到布莱依的临时战俘营。那是摩泽尔省的一个小城市，当时叫波尔山姆。我仍然靠近梅斯，离边界约 30 公里。我寻思，必须抓住机会。我一心只想着逃跑。

终于，我在未做多少准备的情况下逃跑成功了。在被捕后的第七或第八天，由于无事可做，我就毛遂自荐去搬包裹，从战俘营搬到比邻的德国军营，这座军营与道路之间只有传统栅栏作隔。我们穿着怪异，包括红上衣和木头鞋。每一名挟着枪的流动哨兵看管两名犯人。1941 年 12 月 10 日早晨 7 时，天还漆黑一团。我拼命往前跑，翻过栅栏围墙，警报马上响了起来，我听到叫喊声、召唤声，但我已经上了路。我打破了自己的速度纪录。

问：您知道逃到哪里去吗？

答：我知道，我的难友之一雷蒙·巴朗曾交给我一个接待站的地址：布莱依市中心，赫尔曼·戈林广场。巴朗原先是圣米歇尔山“普拉德妈妈”客栈的司厨长。那是位有礼貌的青年，又是战俘营信得过的人。这就是说，在承诺不逃跑之后，他可以走出战俘营，并同外界接触。那地址是一个名叫马娅·巴隆的女报贩的住址。

巴朗对我说,这是“一位非常可靠的女友”。

我已累得喘不过气来,在布莱依的小广场上,马娅·巴隆升起她的金属帘门。德国人还在追捕我,我从帘门下钻了进去并对她说:“我是巴朗派来的……”她非常明理,什么也没问,就把我从后院带到其邻居斯汤热斯小姐的家。

两天后,一大早,马娅·巴隆又来了。她要我跟她走:“我们去梅斯,让我们手挽着手,就像一对未婚夫妇那样,去火车站。如果有人问我们去干什么,我就说我们走一走亲戚。”

在梅斯,我住在马娅·巴隆的亲戚兼同谋纪尧姆家中,他们把我带到一座教堂,我记得好像是圣马丁教堂。在教堂里,有人向我靠近并对着我的耳朵悄悄说:当那位跪着祷告的年轻人起身时,我就跟他走。就这样,在夜幕降临之时,我同另两位伙伴乘上了沿着边界前行的火车。

火车驶入圣特马里奥谢纳(马里尼辛)时,由于修理道岔工程,火车减慢了速度,我们也就下了车。夜晚冰冷、可怕,但如此也迫使边界警卫人员呆在他们的掩体里。我们先向西行,从一个联络标记到另一个标记,但唯一掌管我们路线图的头头却漏掉他的标记了。我们又马上往回走。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无休无止。我对我不幸的伙伴——我忘记他们的名字了——说:“听着,这就够了。法国就在那边……好吧,再见了!”于是,我匍匐着或者弯着腰最大限度地贴近地面前进。带冰碴的雨水使我的后背、前胸都结了冰。我的脚碰到了一条铁路的铁轨。我站起来,面前是一个小车站。我已到了法国。一些铁路工人接待了我。他们在火炉上烘干了我的衣服。他们给我吃了东西,然后安排我坐上去南锡的大客车。在南锡,人们修修补补为我搞了个假身分证,上面贴着一张

陌生人的照片。

从南锡,我坐上去贝藏松的火车。我奉命在预先确定的、靠近穆基尔的一个地方跳车。我不可能搞错,因为还有几十个人也这样做了。我们鱼贯而行,摸索前进,小心谨慎,以免碰上德国巡逻队。我们终于毫无困难地越过了分界线。

我获得了自由。后来到的第一个村子名叫香布莱,是在汝拉省。一位农民让我睡在他谷仓的干草堆里。很久以后,我又多次返回此地:一次是因为它同阿尔埃塞南斯比邻,另几次是因为埃德加·富尔成了该省议会议员,他多次向我发出友好邀请。在香布莱我睡得像难民。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朗,我步行 8 公里,来到了蒙苏沃德雷。由于看到朱尔·格雷维的全身雕像,我才知道这儿是他的出生地。我路过蒙苏沃德雷一事留下了一件令我感动的证据:一位当地抵抗运动的成员记下了在此地停留的全部逃亡者的名字。这个名单现已公布,因此我就进入了该地的历史年鉴。

根据居民们的建议,我乘上开往龙斯勒索尼埃的大客车。我无意识地念着车子经过的村庄的名字,突然惊跳起来,一块牌子上写着曼特里。我想起有一位远房表姐,名叫玛丽-克莱尔·萨拉津的就住在那里。我们于三年前在杰尔纳克,在一位共同亲戚的婚礼上相识。我下了车,在景色优美的乡村中走了 1 公里多就到了她家。玛丽-克莱尔、她妈和她妹妹玛格丽特喜出望外,热情地接待了我。那几天,我简直被宠坏了,她们自制的乳白奶酪塞满了我的肚子,我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然后,我去龙斯勒索尼埃,办了所谓的“复员”手续,并领取相当于今天 300 法郎左右的“逃亡奖金”:这是维希政府的恩赐,所有逃亡者每人一份。

问:您在前面描述第一次逃跑时,提到了劳役队队长让·米尼

埃和翻译贝尔纳·菲尼弗特,认为他们起了一种重要的作用。这是为什么?

答:德国人的编制随着战争扩大,尤其是1941年6月希特勒挥军进入俄罗斯后情况更严重了。我们的看守都是些老兵或因伤致残者。由此,翻译不得不从战俘中挑选,劳役队也由我们的人来负责,此人在德国当局的眼皮底下保证事情的顺利进展。共同生活在一起形成的习惯使德国当局清楚哪一名战俘更能得到我们的信任,从而加以任用,以免被我们拒绝。

只有少数人符合这一条件。在沙拉,谁也不否认让·米尼埃的道德权威。他身体的抵抗力、性格的坚强、始终如一的好脾气使他成为战俘们的基干——这些战俘原来只不过是战争和溃败的厄运聚集到一起、失去了任何上下级关系的松散的一群。让·米尼埃原是勃艮第地区的农民,惯于做重体力活,曾在第戎美术学校学习雕刻技术,会雕镂令人赞叹的圣牌。所有人都需要他,都找他帮忙。在准备逃跑的时候,我也找了他。我们知道,既然涉足了我们逃跑的秘密,他是要为此承担风险的。这就是他用我上面描写过的方式做的事。

翻译贝尔纳·菲尼弗特,原是一名俄国犹太人,出生于埃卡特里诺斯拉夫。他的家庭由于遭受沙俄对犹太人的多次大屠杀而不断迁移,先是到华沙,然后去柏林。他父亲是裁缝师傅,培养孩子做针线活。但是,在柏林,在1933年,贝尔纳成了拳击手。他虎背熊腰,虽然个子矮,但却非常结实。当“迫害行动”迫使他再次走上迁移之路前,他在拳击同行中已开始享有令人自豪的名声。他试图去纽约,在汉堡搭上了一条从事非法移民的丹麦船去美国,用洗甲板的劳动换取船票。船长是个小心谨慎的骗子,他在离美国海

岸几海里的地方把货物和商品卸到一条同谋船的货舱里,而把向往自由的旅客留在船上。贝尔纳继续洗擦甲板,并返回了汉堡。他要寻找一个新的船籍港,并选中了伦敦。在路过巴黎时,他在火车车站月台上遇见了一位华沙犹太人区的老同学,后者吹嘘说在法国生活得很愉快,说法国是个安静而可靠的国家。贝尔纳留在了法国,战争把他卷了进去。他参了军,并在沙拉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活。在那里,我们建立了友谊。我一开始就注意到了他,因为我们同一天到达,在一起办理例行手续,当有人问他“信什么教”时,我听他回答说:“犹太教。”我对他说:“你知道这里有多少犹太人吗?”“是的,我就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人们问我是不是犹太人。我是犹太人。那又怎么样?”

我们再也分不开了。在劳动时,他尽量不让我干重活。我们喜欢笑。德国人尊重他。他讲一口漂亮的德语,仅有一点意第绪语口音。反过来,在口头上,他却粗暴地对待德国人。简而言之,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在我逃跑后不久,他也逃走了。但命中注定我们是不可分离的。我横穿德国花了三个星期,在施派兴根监狱呆了差不多一个月。在被严密押送下重返巴德苏尔扎(IXC 战俘营)的晚上,我被关在兵营的军人监狱里。在一个长方形的小房间里,唯一的装饰是一个天窗,人手摸不着,装有三条横木。监狱里有规定,犯人必须将鞋脱下放在房门口的走廊上。当我躺在地板上考虑这种新情况时,听到了两句完全出乎意料的话:“弗朗索瓦,是你吗?”原来,贝尔纳·菲尼弗特在同一天晚上也被带到了同一座监狱。他认出了我那双鞋,这是他在沙拉多次修补过的鞋!他在被关进自己的房间前对我说“明天见”。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盥洗室里重逢并且聊了天。他向我宣布:“今晚,你将有一张草垫。”夜晚来临时,一个德国兵背着草垫进来,并把它扔在我房内。第三天,还是在盥洗室,我问贝尔纳是怎么回事儿,他向我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在利用看守人的宽容拿到一支香烟后,他就抓住看守,拧他的手腕,眼睛瞪着眼睛地低声说:“我要告发你。”这个可怜虫在脑海里飞快地把战俘营与目前前线所发生的一切作了对比后,同意贝尔纳提出的条件:一包香烟,抽完后再给新的;两张草垫,一张给贝尔纳,另一张给我。事情就这样了结了。这一短暂的力量较量是非同寻常的,显得不大可信,因为当时恰是希特勒权力鼎盛期,而这场较量中控制局势的一方却是一名犹太人!

问:您通过这件事想说明什么呢?想说明基层德国人的反犹太主义不是一贯的吗?

答:不。如果这样说,就否认了当代史上这凶残的一页,忘记了最近一次大战这一最大的悲剧。我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完全有资格作出判断。菲尼弗特的情况在人的勇敢和异乎寻常的坚强方面,具有榜样的价值。没有别的意思。也可能是,纳粹主义的破坏性还未进入德国人的灵魂深处。

问:菲尼弗特这一说来令人不信的插曲导致我向您提出关于德国人对战俘的一般态度问题。人们经常谈论他们的严厉、僵硬、盲目的遵守规定,还谈到他们在集中营里的凶残。依您看,情况究竟如何?

答:我只谈我看到的,避免把它普遍化,我对德国人的成见由来已久。我曾倾向于把法德关系漫画化。我不能原谅德国人在一个世纪内三次占领法国造成的损失,但我遗忘了莱茵伯爵的领地;

维也纳代表大会的瓜分使我愤怒,但拿破仑一世把德国的土地吞并为法国的省却并不使我感到惊奇。总之,我常常认为我们的邻居是无理的,我想他们本性就是好侵略、征服和野蛮的,当我对历史有了更多的知识以后,我就变得较为公平了。但我从哪里学得这些知识呢?因此,当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现德国人的反法情绪不如法国人的反德情绪那样强烈时,不能不使我感到惊奇。

在埃格森,当追捕我们的人知道勒克莱尔和我是法国人时,他们的口气就缓和下来了。村长很仁慈,一个村民——白围裙上的血迹和腰上挂着的尖刀证明他是屠夫,打了个手势,叫我们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取回放在村政府桌上的指南针、地图和刮胡刀;在去施派兴根监狱的路上,一位50来岁的妇女用手隔开押送我们的宪兵队,送给我们一些三明治,然后喃喃地说:“希望你们一路平安。”所有这一切,我都没有忘记。

在战俘营中,人们散播谣言,说所有被抓获的逃犯都将被判死刑。但是,在巴德苏尔扎,我因“无破坏逃跑”而受到一个军事法庭的审判,一位军官律师为我辩护,他的辩护词我完全忘记了。法庭判我三个星期只吃面包和喝水,然后“释放”,也就是说,把我交给战俘营中我们同志们的集体。在施派兴根监狱,狱长在复活节邀请勒克莱尔和我吃午饭:酸腌菜、糕点、咖啡、烧酒。全家都穿上了制服。稍后,我们才明白这个不合时宜的节的真正理由,并为参与其事而不了解其动机感到有点可耻。实际上,在饭快吃完时,主人向我们作了简短的讲话,内中充满了快乐和骄傲:于贝尔先生以及在座各位荣幸地庆祝帝国军队占领贝尔格莱德……

这几个例子显示了被流放者的生活同战俘的生活之间的区别:对战俘来说,死亡并非家常便饭,但他们不抱幻想。经历过科

尔比清和拉瓦鲁斯卡惩戒营监禁的逃亡者在那里受到最无情的对待。战俘营里有时也会突然出现紧张气氛。我们注意到这往往同德军遭受挫折有关。1941年7月14日,IXA战俘营当局允许法国人在一块快速平整好的场地上举行足球比赛,两支队伍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但上半场就表明这两个队并不是没有水平的,数千名战俘都为球员们鼓劲,也为能在日复一日的单调中得到这样一次娱乐而兴奋。但是没有踢下半场。或者说,下半场刚开始,就响起了两声爆炸,两具尸体倒在离观众不远的地方。我们的两位同伴在靠近铁丝网的地方,越过了标志着禁区的石灰线,瞭望台上的哨兵毫不迟疑地开了枪。比赛马上停止。两个队没有听到德国军官的怒斥,不明白为什么节日就结束了。亚眠市的一位神甫、丹丁修道院的院长,怒不可遏,直接攻击战俘营司令,怒斥他,指责他欺骗、不诚实,他用如此的声调和胆气说话,使司令目瞪口呆,仅止于命令战俘们返回木屋了事。数秒钟内,整个战俘营变成了一个“拒绝集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下去。

随后,当头几批南斯拉夫和俄罗斯战俘抵达时,又发生了一系列可以称得上是“事件”的事,他们如此疲乏,如此饥饿,如此待遇恶劣,以至我们不得不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一些食物。德国人禁止这种微不足道的供应。为了表明他们的决心,他们用枪托殴打我们中间那些违背禁令的人。很快,在战俘营中收集尸体成了常事。我们经常被调去收尸,把它们扔到两辆车上,然后或推或拖,直到尸体如此之多,以至木屋充作陈尸室。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僵硬而轻得可怜的尸体,我们抓住他们的臂和腿,把他们抛进两辆车,落到他们同伴的尸堆之上。

人们将会对我说,这一切是任何战争都有的故事,还会说很少

有人遇到过宽宏大量的胜利者。我将不谈每一方对抵抗意图所进行的报复的细节。人质、处决,有时是酷刑,伴随着不管是哪支军队的进行曲。那种不原谅这些事的人阻止用道德的名义去谴责这一方而放过另一方。那种赋予第二次世界大战可恶性质的强调这是一种反常现象,这种现象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因为没有更准确的说法,我姑妄用之——民族冲突,产生于纳粹的意识形态,产生于被升格为理论的种族主义:把人类划分为优等人种和劣等人种,最下层则是“人下人”;上等人种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按不知何种上帝的何种教谕去领导世界事务,去区分善恶,去用医药学、生物学和精神、再教育的办法根据畸形的准则来重新制造人。从这一观点看,《夜与雾》一书以及专为死亡营中流放者安排的命运代表着罪恶和野蛮的顶峰。我所看到的只是这种罪恶与野蛮在我所了解的战俘营中的黑色映象而已。

二、从维希政府到抵抗运动

乔治 - 马克·贝纳穆问:您在战俘营度过 18 个月后于 1941 年 12 月返回法国。您对这次重返祖国有何印象?

弗朗索瓦·密特朗答:我发现了一个各方面都乱糟糟的国家。没有一个机构站得住,一切都是无法运转。在被占区同南方区一样,法国人过一天算一天,避免谈政治,避免表态拥护这个阵营或那个阵营。谨慎高于一切,除了那些人所共知的法奸外,很难了解你的对话人在想些什么。除了几个已经自称为持不同政见但尚处于防守状态的俱乐部外,公共舆论已荡然无存。

逃亡者受到同情的看待。差不多 150 万个家庭有人被俘未返,因而对我们都很理解。

然而,在这些家庭和我们之间存在着隔阂。战争、战俘营,然后是逃亡的经验使我们发生了变化。但我们的亲人,他们仍继续像以前那样对待我们,把我们视作当年的年轻人,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而实际上我们已不再完全是原来的我们。这样就产生了沟通上的某种困难;而与此同时,我的同志们和我想要属于某一新团体的愿望都日益强烈。

问:1941 年 12 月底,您在曼特里您表姐玛丽 - 克莱尔·萨拉津家住了些日子后,您又去了圣特罗佩。这是为什么?

答:因为雅纳克处于被占区,所以我不能回那里了。对德国人来说,我是一名不法之徒。我想找一个休息的地方。在我一个兄弟的建议下,我选择了圣特罗佩。噢,那不是今日的圣特罗佩,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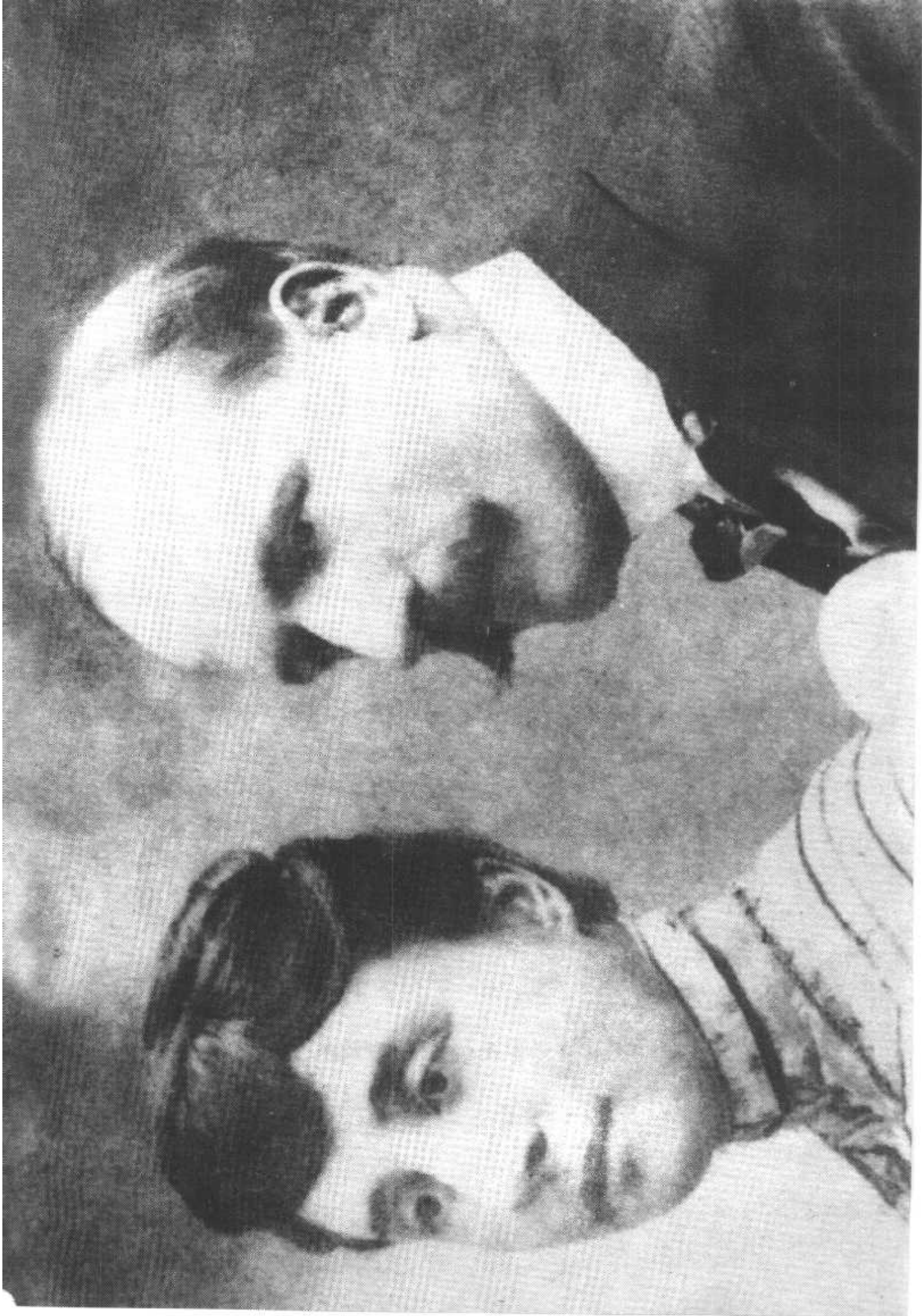


图 1 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父亲和母亲



图 2 密特朗家兄弟姐妹八人,左四为弗朗索瓦·密特朗

时不过是一个住着漆工和渔夫的小村子。我住在我外祖父母的朋
友德帕斯家，德帕斯以前曾同我外祖父朱尔·洛伦合伙做白兰地酒
的批发生意。

让·德帕斯的妹妹雅克琳是个刻板而又敏感的女人，曾获巴黎
音乐学院钢琴首奖，是我母亲的亲密女友。让参加了抵抗运动。
人们在圣特罗佩和瓦尔虔诚地纪念他，在瓦尔还为他竖了纪念碑。
雅克琳嫁给了安德烈·勒维，他是普里絮尼大商店的创始人。今
天，有一件针对我的平庸的“诉讼案”，旨在讥笑这段插曲，借口是
德帕斯家族不是犹太人——在一次电视节目中，我称他们为勒维
- 德帕斯，就像我战前惯常所为，那时在格雷内尔街他们家每星期
三都举行音乐晚会，我总被邀出席。这个家族最大的悲剧是失去
雅克琳的独生子居伊·勒维。他参加了加拿大皇家空军，在马耳他
上空殉职……

回过头来说，我在圣特罗佩受到了令人羡慕的接待。我得到
了休息，消除了前几年积累起来的疲劳。我什么也不干，我在乡下
和内地闲逛。我当时 25 岁，不知前途如何，自由对我来说是美妙
的。

当岁末的节日过后，在 1942 年头几天，我决定去见我父亲，我
为此必须越过分界线。我乘上里摩日—昂古莱姆线火车。当列车
在鲁马齐埃尔—卢贝尔减速时，我下了车。我开始学会这种技术
了。这是夏朗德省的一个小地方，坐落在被占区和南方区的交界
处。这个地方的边界不是真正的边界。我认识当地许多人，走遍
各条道路，探测过各种乡间小路。这就是说，越过分界线对我来说
是儿童游戏。我与父亲重逢了。他身患重病而不露声色。他忧心
忡忡地过日子，因为长时期中不知道因战争而分散的四个儿子情

况如何。我受伤并被俘的消息,他是几个月后才获悉的。

问:您父亲当时在政治上的状态如何呢?

答:他非常爱国,他接受维希政府。对他来说,民族革命毫无魅力,毫无现实意义。同德国人合作的政策是不能忍受的。然而,他尊敬菲力普·贝当这个人,在他心目中贝当一直是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者。在某种意义上,我父亲是那个时代小资产阶级的化身,他们把贝当视作道义价值和民族永恒性的担保人。

如同我其余的亲人一样,他属于传统的右翼,但不走极端,虽然反犹太主义在这阶层传播甚广,但他对此却令人奇怪地厌恶。在我家,我从未听到过一句散播种族主义的话。我甚至在我所保存的母亲的日记中发现了某一个特殊日子的记载,当时德雷菲斯事件正值高潮,她对这种卑鄙无耻的行径表示厌恶。她在陪伴其父亲去圣塞巴斯蒂安向前圣东治议员保尔·德罗莱德致敬后刚刚返回。这位前议员因企图在费利斯·富尔的葬礼上发动政变而被判流放。对此,我们家族的感情是复杂的,因为我们既是共和主义者又是复仇主义者,兼有民族主义的倾向。(我还留有德罗莱德与我母亲之间充满爱国主义狂热的通信。我母亲喜爱绘画,不无天赋,经常向被流放者寄赠有蓝、白、红三种颜色的水彩画。不知为什么,其中一幅未寄到收件人手中,一直挂在我在雅纳克的卧室的墙上。那幅画尽现一块在夏朗德常见的白垩地,上面种满了矢车菊和虞美人。)在从圣塞巴斯蒂安回来的路上,我母亲同几位“爱国者同盟”的领导人占着同一间列车包房。回来后,一系列反犹太主义的大爆发,这使她十分震惊。一切都是犹太人的错。德雷菲斯叛变了。应把这个坏蛋的国家清洗干净。从她的日记中,我抄录一段如下:“但无论如何,作为基督徒,我们怎能怀抱这样多的仇恨

呢？基督和圣母都是犹太人啊……”她当时还不到 20 岁，她的心是纯洁的。

我在雅纳克至多住了一天一夜，然后又返回非被占区。维希政府在龙斯勒索尼埃发给我的复员费和逃亡奖金足够我维持生活的。说到底，“维持生活”是说大话，我实际上几乎一个子儿也不花。我穿别人借给我的衣服。在曼特里，在圣特罗佩和在维希开始一段时间，我都住在朋友家，不用付钱。你知道，人在那个年头是很容易满足的……

问：有谣传说，雅纳克市长拒绝发给您假证件使您能够留在您父亲身边。是这样吗？

答：我不知道。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我父亲可能承受不了这种拒绝。我同他的孩子们还保持着联系。不，我不知道更多的情况了。

问：1942 年初，您去了维希。为什么？是谁叫您去的？

答：雅纳克不能呆，由于同样的原因巴黎也难呆，我就留在了南方区。我没有职位。但我在维希有些朋友——大多是官员，有五至六人，他们还认得其他一些人——他们所去的这座小城市已成为法国的重心和公共行政机关的所在地。他们对我说：“来吧……我们将尽力为您找些事干。”因此，我就在维希下了车。

问：您对这座独特水城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答：虽然那条河很美，但我发现那是一座引不起多大兴趣的城市。在等待给我指示这项或那项工作的信号时，我在城里闲逛。除菲力普、贝当所住的公园旅馆周围有点生气外，那是一座安静的外省城市。我猜想，在这些过时而又豪华的建筑物的里面，人们正在密谋策划各种阴谋诡计。我在街上可以碰到各个时代的无法模

仿的人物，在他们毫无表情的面孔上和六神无主的眼光中，都显示出权力的秘密。对这种人和他们的同类，我见得多了。他们堪称三朝元老，半个世纪以来始终掌握着圣物，始终拥有同样的权势：或是部长们的合作者，或是高级官员，或是罕见的“亚纲”，稍稍有点喜剧色彩。对他们来说，国家就是为他结领带、点香烟、走钢丝和确定约会的某种方式，这些约会不被任何人知道，但却要在会遇到所有人的酒吧里举行。当然也有例外。我本人就曾雇佣过从这口“鱼塘”中选出来的极好合作者。国家行政学校毕业生的资格予他们一种额外的尊严。有些人滥用副词和重复法，没有任何我刚才所揭露的怪癖，只是喜欢我们原谅他们的毛病。因为“反对法语的罪过”不属于刑法范畴。

我的第一个行动是寻找我那些逃亡的同志，首先是马克·瓦雷纳，沙拉 1515 小分队前队员。他是在我之前逃跑的，后被捉回，随后又再次逃跑，取得了成功。这是我在附近地区知道的。当时在维希，各种机构盘根错节，很自然地，我和我的人也就是逃亡者组成了一个小组。我们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一般来说也是同样的精神状态。我们生活艰难，约好在低级咖啡馆就餐。我们满怀乐观，那是年轻人的特点。由于我们都生活在社会边缘，这种乐天情绪就更强烈了。

1942年3月，我在民族路20号租了一间房子。房东叫让·勒诺，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保险公司代理人，娶了一位聪明而活跃的妻子，有两个孩子。我就在此处安了家。如果人们可以说的话，民族街20号即将成为我的“基地”。

就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向我推荐一项政府中的合同雇员工作。这是通过法弗尔·德蒂埃伦司令的渠道提出的。他别出心裁，爱把

事情复杂化,他乐观、聪明而有教养。他用一种既神秘又同谋的神气对我说:“我将说的话可能会使您惊奇:我将要求您提供假情报。”于是,我进入了他的“造假作坊”——那奇特的资料收集处,该处资料的真假是由抛钱币的正反来决定的。

他曾预先告诉我,这几乎是种“娱乐”。人们差不多什么都可以写,写相反的也行。我很快就感到厌烦了。我现在想——虽然没有把握——法弗尔·德蒂埃伦当时是伦敦的特工。战后我又见过他,他已是加尔地区深受好评的画家和很有名气的抵抗战士。尼姆市的一条街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问:皮埃尔·佩昂在他为您所写的书中说,您那次任职是在“法兰西战士军团”资料中心。这是否意味着您曾参加过军团?

答:不。事实上,逃亡者和被遣返回国的战俘们,特别是我在维希经常接触的前战俘们都坚决反对军团,反对军团企图实行垄断,反对贝当在战士中进行煽动。正是对军团的这种敌视导致我们去协商,并考虑成立一个能真正代表我们这个阶层、独立于政权的运动。作为反击,我们开始从事针对军团的活动。我们公开异议,密谋对策,形成了反对派的架势。我们的关系网不断扩展,一带一,我们吸收了许多和我们有着同样经历的新同志。很快地,我们在巴黎、克莱勒蒙、里昂都有了联络员。这还算不上重大成就,但请别忘记,我回法国还不到三个月,开始呼吸的时间并不长。

佩昂从法弗尔·德蒂埃伦的资料处同法兰西战士军团之间存在的关系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法弗尔·德蒂埃伦该为此发笑的。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个军团。我认识第一位军团长弗朗索瓦·瓦朗丹,那时他在维希已经失宠,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为他去阿尔及尔提供了方便。他解放后曾当选为默尔特—摩泽尔省的保守党议

员,后因车祸丧生。

问:即使您没有加入军团,但有些人说,为了能在政府工作,您那时不得不向政府宣过誓。这是真的吗?

答:这是假的,首先是荒谬的。我不属于维希的系统。我不是官员,而是合同雇员。我不必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宣誓。这些人后来却摇身一变成了正宗而强硬的戴高乐派。

我也毋需像卡拉斯费尔德——或是不怀好意,或是摸错情况——所说的那样,在一张证明自己的祖先不是犹太人的纸上签字。即使我有这样的祖先,谁也不要妄想我会屈服于这类调查。我始终有着某种说“不”的倾向。但是人家没有人强迫我做这些事。我与国家部门没有关系,而且谁也没有向我提出什么要求。有段小故事,人们总倾向于把它忘记:在被召宣誓的高级公务员中,只有一个人拒绝了,那就是一位名叫迪迪埃的司法公会法官。请在第五共和国的达官贵人中找一找是否还有其他人这样做的吧!这些人喜欢教训别人,当年他们随时准备为贝当元帅效劳,现在却整天毕恭毕敬地站在你面前,真让我忍俊不禁,因为我知道他们原先是何等样人。啊,这些正人君子!宣誓吗?他们曾用两只手签字!你们想象得到吗?他们当时是大法官、国务委员、最高法院顾问、法兰西官方的泰斗,其中有些人至今还活着……这些人的名单会把你吓一跳。从60年代起,戴高乐就对这整个“上流社会”实行了大赦!更有甚者,在司法界,大赦自解放以来即已付诸实施,法庭在通过一些严厉措施的同时认为,人们将不追究那些执行过反犹太立法的法官。

在维希,我只处于从属的地位。如要了解我如何作出反应、想些什么、意图是什么等等,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没有履行什么

使命,没有占据什么有用或重要的职位,没有可能在这一或另一方向上影响法国的立场,没有任何参与政府的决策,没有介入任何论争。1942年,我25岁,完全是个无名小卒。我没有感到自己受过什么牵连。即使我曾被人诱惑,我那低微的地位也不可能让我做出180度的大转弯。我曾接近过一些高层人物,他们之中谁也没有怀疑过爱国主义,他们先后为维希政府和戴高乐政府服务,没有一点为难。我天性反对同德国人合作的政策。我已说过,我从未染指过反犹太主义。我同当年维希政府内部争权的各个派别毫不相干。

对那些据以指责我的事实的夸大表明,大多数我们的当代人不了解战争的历史、被占领的历史和抵抗运动的历史。在有关那个时代的论战中,人们既不听真正历史学家的声音,也不听真正抵抗战士的声音。人们喜欢那些认为历史只是诉讼案由的人甚于喜欢正统信徒雷蒙和贝达利达。五十年后,只要曾经呼吸过维希空气的人,哪怕是个过客,也足以被指为法奸,或差不多是法奸!是的,在维希,我曾与一些法奸相遇,但他们不是我的朋友。在维希我也曾同一些抵抗战士相会,他们则成了我的朋友和战友。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漫画历史。

问:您曾说过您不了解那个时期犹太人的地位!……

答:我知道,这可能会令人惊讶……当我被俘十八个月后抵达维希时,我真的不了解。但时间不长。我们是在所谓的自由区,德国人尚未到来。人们看不到黄色星星,还没有明显的迫害行动。

当我3月份在民族街的套间安家之前,我同两位像我一样的逃亡战友住在一起。其中一位就是犹太人。

问:而您的犹太朋友,他也不知道犹太人的地位?

答:他没有说过这个问题。我们生活在闭塞的圈子里。我们相处融洽。我们并不真的关心外面的事……后来,到了1942年,当我们看到迫害行动的扩展,看到从政府部门清除犹太人,看到维希政权显然参与了同德国人的合作,简而言之,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不可能再不知道犹太人的地位了。从那时起,我就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同这个平庸的政权,这个后来被揭露为有罪的政权断绝了关系。

问:即便如此,也不能说1942年在维希有许多犹太人呀……

答:许多吗?肯定不是许多!但还是有。尽管有关立法禁止他们居住在城里。当然,他们停留未超过1942年。他们像我们一样,不久就离开了。

问:当您称维希政府为“烂摊子”时,您激起了反感。您这样做不是为了先把这个政权平庸化,最后再迫使它仅仅沦为一个真正的“烂摊子”吗?

答:贝当政权当时展现的景象是结构松散。我使用“烂摊子”一词,意味着谁也管不了事,贝当充当着一口沸腾的大锅的锅盖。但人们需要一个锅盖。一位离职待命的元帅不是天天都能见得到的。然而,一旦没有他,那就什么都干不成了。

维希政权就是赖伐尔和达尔朗之间的尖锐斗争、派系搏斗班子竞争。前者很聪明因而很令人担心,后者更加无法预料。维希政权是一个脆弱的政权,无形无魂,而由法西斯分子、反犹太分子和那些头脑发热的决定论理论家来指导。阿里贝家族、达尔基埃·德佩尔普瓦家族及其一伙,毫无困难地就迫使人们接受狂热性,通过一些简直不可容忍的法律和法令。他们利用这个“烂摊子”混水摸鱼,占据地盘。维希政权不是铁板一块,这些人很快就取得了比

另一些人更重要的地位。更不用说维希人同巴黎人之间的争夺了。巴黎的德阿、多里奥两人意识形态上投靠纳粹主义,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组织,那是几个非常军事化的小党,其头目都从属于德国人,但各有对立的野心。

问:因此,您不相信贝当所主张的“法国式的法西斯主义”这种理论吗?

答:法西斯主义,这样说就太满了。存在着对议会制和第三共和国的仇恨这是明显的。有人试图让一个受到麦克马洪“道义协会”影响的极端保守的理论团体重新振作起来,两者使用同一格言:“劳动、家庭、祖国。”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但由此到谈论法西斯主义,中间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然而,由于在意识形态上曾受过较好的培养和对战前事件有较好的了解,我看得清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靠的是什么,我更加不信任地观察着菲力普·贝当和他那有势力的奸党从共和国的衰落中谋利的方式。我当时尚未放弃“民族的”这个托词——这是个万能词,但从经验上看,这几乎总是在为祖国的敌人效劳。我是稍后才明白这一点的,多亏了40年代那艰难、严酷的经验教训。后来,特别是在社会党内,我认识了一些同志,我欣赏他们判断的可靠性。他们的社会出身、他们的政治斗争经历培养了他们的分析能力,这是我所没有的。但是,我是自由的,不效忠任何人,本能地厌恶暴力和统治的理论。不公道的社会打开了我的眼界。这一成熟过程花了我一些时间。

事实上,行将就木的第三共和国的气氛,与其说推动我入伙,倒不如说促使我造反。我对它感到恶心。但怎样下决心走向一个由斯大林遥控的共产党呢?怎样走向一个软弱的、分裂的工人国

际法国分部呢？而且，它在 1940 年，不顾勃鲁姆的反对，部分充当了“谋杀”共和国的共犯。是的，究竟何去何从？维希政府只意味着撒手，别的什么都不是。对伦敦我们不甚了解。在我眼里，谁也代表不了法律的正统，贝当是 1940 年 7 月 10 日由国民议会根据宪法正规地选举出来的。但由于未履行把他推上政权的那次投票所要求的义务，他在 11 日和 12 日实际上进行了一场真正的政变。他不屑用华丽的法律外衣掩盖他对共和原则的藐视。据我看，这就剥夺了他自夸的道义权威。戴高乐则援引了一种源自民族的非物质永恒的合法性，并表示他把代表这一民族视作自己的使命。结果证明他是对的，至少事实如此。但在 1942 年，拒绝承认失败并不给人予统治法国的权力，不管这一姿态是如何高尚。这种权力无人继承的情况源自第三共和国在赢得这么多的荣耀之后，突然遭到的最后惨败。但既然当时历史正要重写，对任何方面的效忠一开始都并非必要。

我会承认由我作为战俘的空想所养成的骄傲情绪吗？我梦想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唤醒法兰西，并且躲开新产生的乱党。这在许多人看来似乎很奇特。我的年龄和我的权利都不允许我这样做。我没有过去，只有我的雄心所臆造的未来。正是从这一切中我看出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但我遵守我自己订出的一条规则：我不依靠任何人，也不依靠任何不是我自己努力成果的东西。这种处世方式支配了我的大部分选择。在第四共和国，我拒绝加入各参政大党。由于在殖民地问题上的歧见，我辞去了一个部长职位。出于审慎，我婉拒了埃德加·富尔请我进入其政府的邀请，是他接替了孟戴斯-弗朗斯。为了问心无愧，我也拒绝了布尔热·莫努里的邀请，因为他继续奉行摩勒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在戴高

乐 5 月 13 日上任前几个月,我加入了反对派的队伍。我下不了决心去依靠那些由平庸政治家领导的渺小政权中的小流派。我藐视他们一个个地接受了充当水上浮标的角色,听任任何一根鱼竿的摆布。1958 年,我否认科蒂总统有权把共产党人从唯一能拯救共和国的联合政府中清除出去。我在第五共和国的反对派中一呆就是 23 年。我身上有某种东西决定了我,使谁也不能支配我。在议会制度中,这是一种令人不快的精神状态,因为不管这种制度是不是经典式的,都不喜欢这些自由射手。在这种制度下,我将永远不会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我也不会对此有什么遗憾。总之,我是难以归类的人。这使那些凡夫俗子得以把我归入任何一种类别。说到底,我只是在 55 岁时加入了我自己创立的党。而且,我走到那一步,没有遵循别人想为我规划的路。

问:人们找到了您作为 25 岁的年轻人所写的几篇令人感到意外的文章。有一次在剧院看到贝当后,您写道:“他风度翩翩,他的脸庞就像一座大理石雕像。”而在一封信中,您仿佛为他惋惜:“民族革命,不幸的是,这是两个失去意义的词的组合……元帅几乎是孤家寡人,而那些信仰他的思想的人却离他很远……”

答:确实,我在 1942 年 3 月初一次剧院演出时见到过贝当。他给人以那种威严的印象,只要看一下当时的新闻纪录片就足以知道。至于他被其身边的一些人所欺骗,那已被当时所有严肃的历史学家所验证。

当贝当上台时,我像几乎所有的人一样,觉得他能保护法国。人们感到他是反德的,这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老人。人们对凡尔登记忆犹新,这使他拥有了一圈令人难以置信的光环。事实上,他生于 1856 年,纯属 19 世纪的产物,离拿破仑比离我们更近。如果他

把蒙图瓦尔同蒂尔西相比,那决不是偶然的。我认为,一开始,贝当是为政权而政权,除野心外,别无其他动机,其意识形态完全是保守党人的;后来才堕入与敌人合作的圈套。1940年,他已84岁,1944年88岁。这些解释还不够,我承认这一点,那么我再向你重复一下我刚才说过的一句话:他的行为的意识形态根源,或许来自更远得多的地方。

问:那么您接受贝当是“年老糊涂”的说法了……

答:不。我觉得我刚才向你所作的解释正好与此相反。但是,我不是“贝当心理学”的专家。同我有关的是,我发现了这个政权的不一贯,无原则的随波逐流,它的反动方面、它的危害性。因此,我很快就改变了我的态度。

问:然而,佩昂在他写的调查纪实中肯定,1942年时您是元帅派……。

答:什么贝当主义者,什么元帅派,这些都是繁琐哲学,实际上是一回事:是法奸或者不是法奸。这一点,那是非常清楚的!我知道,当时有些人是同敌人一道走的,有些人是冲着敌人走的,而我是冲着敌人走的。

问:人们在维希时能知道谁同德国人站在一起,谁是反对德国人吗?这种情感能公开表达吗?

答:不,情况不是那么一清二楚,不是那么截然不同的。人们预感、猜测、怀疑有反德情感。

问:佩昂还提到,在资料中心之后,人们建议您去主管犹太人问题的特派员公署任职,而您拒绝了……

答:我读过这一段了。肯定有人向他说过这件事。这可能就是我的功德了,但情况不准确。

请注意,佩昂所碰到的证人——其中有些人是我的朋友——像所有证人一样,喜欢把自己置于历史的中心。啊!要是人们听听他们的证词,肯定一切都将更加美好。没有什么比一个“真正的证人”更不可靠的了。你不妨问问他:犯罪那天,你的领带是什么颜色!

关于这段历史,我在1972年,也即23年前,就在接受《扩张》杂志采访时向罗杰·普利乌雷介绍了主要三点。奇怪的是,我自己的话在这么长时间后竟被利用了,而且遭到如此粗暴的歪曲,有许多似是而非的地方。

但他们到底要指责些什么呢?指责我1940年在德国当战俘时没有成为抵抗战士吗?指责我在维希时,作为合同雇员,担任高级职务,领取比今天最低工资还少的薪金吗?指责我曾在这座城市呼吸了几个月的空气吗?——但其他许多人尽管贪婪地吸满肺腑却无需赔偿;指责我因对援助战俘所做的贡献,而受到菲力普·贝当20分钟的接见吗?那次接见在场的还有两位同志,其中一位死于流放中;指责我发表了两篇我至今不否认一个字的文章吗?指责我曾同战俘互助中心和社会行动协会的主要领导人一起接受了“法兰克战斧”(1940年至1944年间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标志——译注)吗?诚然,我本应对这种姿态的动机三思而后行的:维希政府确实力图通过这种办法来扩大其在反对派俱乐部中的宣传。我则从中看到了一种更适合于地下工作的行动方式。我错了。是一种判断上的错误。我承认这一点毫无困难。我在某个地方还读到,说我是维希政府的一名“高层显贵”。这真使我受宠若惊,呆若木鸡!

我已有机会指出,戴高乐曾毫不犹豫地把许多维希政权无可

争议的达官贵人搜罗到自己的队伍中“进修”，对此谁也未表异议，未予注意，甚至这些高官成了戴高乐的部长时也未抱怨。这种不同的待遇，倒使我感到得意。

问：您说您在1942年改变了主意。您是怎样滑向抵抗运动的呢？

答：我非常同意人们使用“滑向”这个词，但我自己没有“滑”的感觉。在1942年2月至5月间，我意识到了一种政治现实，这是我以前未曾想到过的。我离开了一个被保护的社会——战俘社会，其成员被迫处于同一境地。我从战俘营出来时，可以说是处于一种非政治存在的状态，但充满对法国的爱。这种状态怎样变为积极抵抗的状态，这是值得解释的。

首先是“自卫”，然后是“抵抗”的需要，甚至在1942年6月蒙莫尔会议和我离开战俘特派员公署以前，它成为我面临的任务。我同其他一些与我有同样需要的逃亡者一起行动。我们的行动可能受到我们个人处境的影响。但或者由于最初的信念，或者由于取得的经验，对失去祖国一事，我们是无法忍受的。

我们这些逃亡者，利用在战俘营中学到的技术，制造假证明以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因此能够来来往往，并且前往敌占区。我们制造假证件和假身分证，既为我们自己所用，也向别人提供。我们的技能得到了承认，人们从各方面向我们求助。这还谈不上是抵抗运动。但我们越来越把我们的行动与抵抗战士的行动结合在一起了。

问：当您到达维希时，您曾否遇到一些已加入抵抗运动的人呢？

答：1942年初，在维希已有一些非常反维希政府的人：絮齐·

博雷尔,她嫁给了乔治·皮杜尔;莫里斯·内格尔,后来成为法新社的老板;莱昂·罗兰,前阿瓦社老板;贝尔纳·德夏尔弗隆,外交官,后被流放。我们的谈话未对他们的选择以及我的选择提出任何疑问,我对他们怀有同情。然而,我不是通过他们才加入有组织的抵抗运动的,而是把逃亡者重新组织了起来。我们离群索居。我们嘲笑维希的官方小天地。我们厌恶法兰西战士军团。一切没有我们参加或在我们之前所做的事,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值一提或值得怀疑的。应该承认这是新手所共有的保护性反应,而我们相当容易地培养了这种反应。

问:哪一件是您作为名副其实的不同政见者所采取的首次行动呢?

答:我第一个抵抗行动就是未经允许离开德国。我的第二和第三个行动是重犯前科。我的第四个行动是参加战斗组织。我第五个行动是离开法国去英国。我第六个行动是在战争高潮中重返法国。我第七个行动是在一个负责岗位上参与了为解放法国做准备的活动。这些阶段都是容易叙述的。但真正的抵抗,从第一天起,就是精神上的抵抗,就是每天都拒绝接受我国灭亡的前景。这意味着要做许多不太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情历史不会记载,但在四年中却充满了我的生活。如果人们要从报刊上寻找我的抵抗行动,那么除了平平常常,像我所有同志一样之外,只有几个例外:如1942年破坏乔治·克洛德的一次报告会——此事毫无英雄壮举可言,或1943年扰乱由赖伐尔和马松在瓦格拉姆大厅组织的战俘大集会——此事难度更大,或1944年在克莱蒙费朗处决马尔兰——此事相当危险。那时的报纸还无意在头版头条用五栏篇幅报道我们干的事。

问：您同乔治·克洛德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答：乔治·克洛德是位享有巨大科学声誉的人物（他是潮汐动力的设计者，特别是液化气体的发明者）。1942年4月，他不仅为维希政府，也为同敌人合作，组织了一系列宣传性会议，他是为德国人效劳的理论家和支持者。他到南方区的活动通过大量标语和广告大肆予以宣扬。我们同克莱蒙费朗的一名医生居伊·弗里克——未来的多姆山省的戴高乐派议员——一道，决定破坏克洛德在该城举行的那次会议。我要补充一点：当时，赖伐尔和斯卡皮尼企图诱惑战俘们，并把他们拉到所谓的“换班”计划中来，即德国每释放一名法军战俘，法方就派三名法国志愿劳动者去德国“义务劳动”。由几位朋友（如路易·德泰斯，他后来长期担任克莱蒙费朗的社会党参议员）陪同，在组织者的鼻子底下，我们扰乱了会场，迫使乔治·克洛德不得不且战且退。你会说这是一次小小的“战功”。我同意这样说，我也并不以此为荣。这是我直接掌握的行动，它带动了以后的行动。

问：那么，您作为抵抗战士而承担的最早的、明确的义务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答：如果你非得要一个起点的话，那么1942年6月12日至15日，圣灵降临节期间，在上阿尔卑斯省举行的蒙莫尔会议可以算是一个。但这不一定准确。诚然，一些同志，大部分是逃亡者，在那里开会，表明他们反对维希政府，制定了一项战略，并且创立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组织。

请看看这张在蒙莫尔拍的照片吧。照片上的人都是些卓越的抵抗战士，许多人为之付出了生命。我能记住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以及我们当时交谈的话，在我们行动的性质问题上大家是毫不

含糊的。你可以认出来米歇尔·盖约——戴高乐的外甥,人称夏雷特;马塞尔·巴鲁瓦、让·弗德利纳,还有莫迪、蒙约瓦、加涅尔……。这一切都很久远了,已经有 53 年了!

在蒙莫尔,几乎来自全国各地的、为数众多的小组代表首次相会。我们需要相互认识,即以这一点来说,这个会议就非常有益。讨论的坦率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会议的发起人安托万·莫迪,他是位智力出众的人物。但是,如果说他所创立、我们协办的组织“锁链”一直是我們之间强有力的纽带的话,那么说他起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那就过分了。我们继续在我们的战俘抵抗小组中开展我们的活动,直到解放。

问:谁是安托万·莫迪?您说过他是您有幸会见过的人士中最有吸引力的人物之一。

答:他是一位让人着迷的、有骑士风度的人物,一位真正的引路人,为人极其方正。他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自称长期不信教,过着吃喝玩乐的生活。后来他自己皈依了基督教,抛弃全部财产,成为外籍军团的上尉,随后又当了农业工人。他妻子与他有着同样的信仰。

安托万·莫迪当过战俘,在德国的军官战俘集中营获释,随后被派往叙利亚——当时由德国托管。1941 年英国人占领地中海东岸的法国属地后,他就离开了那里。他建立了第一个逃亡战俘游击队的基地。为此,他租下了蒙莫尔古堡这个地方。

后来成为德沃吕伊游击队基地的古堡,不像一个社会中心。它形成某种法伦斯泰尔(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幻想建立的社会基层组织——译注),经常住着 40 至 50 人,彼此仿佛被一项神秘的公约联结在一起。我记得,有一些共产党活动分子一直到

死还继续属于“锁链”这个组织。在蒙莫尔,各种思潮混杂,包括童子军的思想、传统的基督教义、摒弃尘世利禄的追求、战斗的爱国主义等等。

问:然而,在那个时期,蒙莫尔与其说是一个从事抵抗的游击队基地,倒不如说是一个战俘们的避难所,至少开头是这样。

答:又是一个广为流传的历史错误:那个时期还没有游击队。游击队是在“换班”计划出笼后,即强迫数十万青年去德国当劳工以换回战俘的计划出笼后才诞生的。因为不了解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结果以偏盖全,人们就把部分视作了全体。抵抗运动的组织要比游击队的建立早好多年,而游击队又使抵抗运动出现了新的、巨大的飞跃。莫迪是最早想到这一点的人之一。我现在还记得他当年通过步话机同他驻在山上的部下通话的情景——那是他军事生涯的遗产。他穿着一套半民半军令人发笑的奇装异服,头戴一顶阿尔卑斯山猎人的贝雷帽。这一切怎么可能不被人发现呢!

问:从蒙莫尔回来后,您又从事地下或半地下的活动,帮助战俘和逃亡者……。

答:从1942年夏天起,我们原来的小组壮大了,我们的活动范围扩展了。我们帮助那些还是战俘的同志准备逃跑。我们在寄给他们的包裹里藏了假身分证和逃跑路线图,有时藏在衣刷的木柄里,有时藏在框架精美的贝当相片后面。许多我们的人就是通过这种办法回来的。

此外,我们还会见越来越多的、我们估计对维希政府持保留态度的人,我们把他们招募进来。每人带着各自的经验,大家团结互助,斗争目标更为明确。

问:你们负责为逃亡者安排藏身之处吗?

答:我们向他们提供地址,各人自己设法摆脱困难。

问:有人说,维希政府有一段时间允许这种抗德活动……

答:很明显,维希政府不喜欢我们所做的事,尽管它可借此心安理得地向德国人表示活儿不好干。后来,在极端分子的推动下,开始了严厉的镇压行动。

问:维希政府似乎已得悉蒙莫尔游击队基地的存在,而似乎谁也未对莫迪的现实行动抱有幻想。

答:可能吧……你比我消息灵通!德国人在1943年12月发现了游击队基地的存在,当时我正离开法国去伦敦和阿尔及尔,我1944年2月回来时,我在蒙莫尔的朋友们已不知去向。莫迪被捕,然后被流放到了卑尔根—贝尔森。

他在战俘营解放时还活着。为了照顾患斑疹伤寒的难友,他拒绝遣返回国,后来受到感染,病死在那里。在他预定返回的那天,我在巴黎北站与他的妻子一起等他,直到运载他所在的战俘营流放者的列车到站。我们以为他会从列车上下来。在月台上,我们获悉了事情的真相。他虽死犹生。安托万·莫迪从此长眠于圣特菲洛姆纳教堂前,离蒙莫尔古堡不远,人们一直虔诚地纪念他。

问:1942年11月底12月初,您在蒙莫尔又参加了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什么问题?

答:鉴于德国人进犯法国南方地区,我们讨论了开展地下活动新形式的问题。

问:6月14日是蒙莫尔关键性的周末,两天后,即6月16日,您进入了战俘特派员公署……

答:那个周末毫无关键性而言,纯属偶然的巧合。我进入战俘特派员公署是通过让-阿尔贝·卢塞尔的介绍,他当时负责重新分

配逃亡者工作办公室。有一天,他对我说:“你该来这儿工作。他们都很好相处。再者,我们也不是在前线。”我接受了他的建议。而且我在那里发现了几位蒙莫尔的同志。

问:您当时认识了战俘特派员莫里斯·皮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答:一个诚实、英明、勇敢的人。他属于资产阶级上层。他的真名字是皮诺·德佩利戈·德维勒什农。1940年6月战败时,他先是被俘,接着被遣返回国。他的经历使他最了解34.9万名生活在极其恶劣条件下的被遣返者或逃亡者所面临的问题。1941年秋,当维希政府成立重新分配被遣返战俘工作特派员公署时,莫里斯·皮诺是首任署长。1942年,特派员公署的领导机关设在巴黎梅耶比尔街。但它在南方地区也有同等的机构,在维希市于贝尔—科隆比埃街,领导人是乔治·博德。

在特派员公署,大家都很喜欢皮诺。他的性格和诚实赢得了大家的好感。他是一位社会行动的热心人,所以他在每个大区都发动成立了战俘之家,稍后,又建立互助中心,让前战俘们在他们的新生活中能相互支持。

问:他支持抵抗运动吗?

答:当时在特派员公署笼罩着一种普遍反对维希政府、反对同敌人合作的气氛,皮诺未予鼓励,但心里明白。在他手下工作的人都倾向于转入抵抗运动,有的人已经这样做。例如,由于我出差很多,这就有利于我同主要城市中的逃亡者接触。

问:在特派员公署,您的确切工作是什么?

答:我是主管处理同新闻界关系的负责人的助手。他是一位



图3 因援助战俘做出贡献受到贝当的接见(1942.10.15)

正直的人,有点粗鲁而心情愉快。我和他一起负责出版一份联络月报。

问:这项工作允许您进行您的“并行不悖”的活动吗?

答:当然喽。我的职业活动充作屏障。我和我的同志们,我们并未背离我们的拒绝态度。安托万·莫迪还在7月初来维希看我。我们成立了某种委员会,由20或25个坚决抗德的成员组成。几乎各地都有我们的小组。坐落在维希市罔贝达林荫道22号的“鸟网”互助中心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进行非法活动了。

问:但这个中心也得有一些官方活动来做门面……

答:这是显然的。我们在1942年秋天发动过一次募集寒衣的活动。因此,1942年10月15日(星期四)下午傍晚时,马塞尔·巴鲁瓦、阿尔贝·瓦齐尔和我被贝当召见于公园宾馆,他的军事办公室主任康珀将军在座。

问:即便如此,这次同贝当的会见,这张照片,总不是中性的……

答:啊,我们在公园宾馆只呆了20分钟!皮埃尔·佩昂的出版人把这张照片作为他那本书的封面。这种刺激性的形象自然歪曲了事实!因为,这说明什么呢?贝当接见我们同接见其他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的团体的代表们一样,用的是同一种名义。巴鲁瓦和瓦齐尔这两位同志陪我去的。照片中央就是马塞尔·巴鲁瓦,几个月后他就被捕、流放,并死在载他去布成瓦尔德的列车上。贝当那时正对一些他知道是敌视他或对他有保留的团结组织发动一场诱惑运动,这或许可以说明他主动召见我们的原因。

问:由于这张照片被作为皮埃尔·佩昂那本书的封面发表,您是否有被欺骗的感觉?

答：我不这样认为。这不是他的意图。但这种发表方式引起了误会。关于布斯盖，情况也一样。佩昂从未要求我解释我同勒内·布斯盖的关系。他只问我是否认识他以及我对他的想法。我对他说，这位杰出的小伙子眼睁睁看着他的前程被一个错误的选择毁了。佩昂未在这个问题上多花时间。但当他的书出版时，我发现我那句话竟被“供”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我记得是在书的末尾，作为全书的结论——请你想象一下，我当时是何等惊愕！照这种安排，好像对那个艰难时期的回忆只唤起我作出那样一个匆忙的判断似的，好像我在战争年代和抵抗运动年代的经历，与我就我个人所发表的意见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似的。对这个人，我是战后才认识的，而当时曾经判处许多人死刑的特别最高法庭（由法国议会推选组成，负责受理总统及部长等高官的渎职罪行——译注）竟宣判此人无罪，并恢复其全部公民权。我不是他的法官们的法官，无权推翻他们的判决。

问：在贝当同您见面三周后，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11月11日，德国人进犯法国南方地区，从而结束了停战协定以来所形成的局面。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吗？

答：不容置疑。对我们之中许多人来说，德国对自由区的入侵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德国人进入南方地区再也不容怀疑。无论如何，对爱国的法国人来说，是不应再有怀疑了。逃亡者再也没有避难所了。

问：对南方地区的入侵使您感到惊奇吗？或者您认为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吗？

答：正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得不为这日子的到来做更多的准备。

问:这是否改变了您对维希政府的判断?

答:在我看来,维希政府的人不再是简单的傀儡,他们变成了我们的敌手。

问:1942年11月,也是强有力的赖伐尔的统治时期。当时,在递交贝当批准后,他发表了那句臭名昭著的话:“我希望德意志胜利……。”

答:我从未同赖伐尔接近过,同达尔朗也一样。但很明显,他是一位智力出众的人,高居于他人之上。这位第三共和国伟大政客的命运很奇特。他才华横溢。他萦绕脑际的观念也很奇特:同德国结盟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他一直坚持到底,并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问:赖伐尔犯了这么多政治的和道义上的错误,您对此如何解释?

答:因为他缺乏相信某种事物的习惯。由于他具有一种非凡的诱惑能力,因而他所起的作用就更为有害。

问:他相信什么呢?欧洲吗?同布尔什维主义斗争吗?

答:是的。但主要是相信他自己,相信他驾驭一切事变的能力。我经常注意到,那些最机会主义的政治家们,当他们开始为一种思想服务时,就不知所措了。这是他们失败的开始。

问:但同维希当局真正的决裂是由莫里斯·皮诺离开战俘特派员公署引发的。大门向地下活动敞开了……

答:不是这样。我的决裂比这还早。莫里斯·皮诺是1943年1月13日被解雇的,因为他拒绝屈从于维希政府的要求,其中既涉及“换班”问题,也涉及同德国人合作问题。他被一名众所周知的法奸安德烈·马松顶替了。一知道皮诺被罢官,我们这些特派员公

署的职员或合同雇员就决定对他表示声援。我们不愿做马松很快就要实施的政策之工具。1943年1月14日,我利用这一借口,像许多同志一样提出了辞职。他们之中有让·韦德贝纳,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他的,他后来成了我的朋友。我们一齐选择了辞职。

噢,这一举动并非一种多大的牺牲。我们会再次失业吗?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处于决裂状态,由来已久。特派员公署的班子是一个精神上和道义上的“拒绝班子”。但特派员公署本身,同我的网络相反,不在抵抗运动之内。现在是“提档”的时候了。

就这样,1943年1月的一天,在离开那“房子”时,我没有什么不高兴的。我早已远离这一切。我进入了未知领域。由于失去了职业和身分,我转入了地下活动。我当时26岁,几乎一无所有。说到底,当我审视我的一生时,我发现我从来不需要可能迫使我否认或丧失自由的任何东西。

问:在离开特派员公署后,您的抵抗运动网情况如何?

答:有几百个人。到1944年8月,我们将达七千至八千人。开始时,发展成员是一对一,直线联系。我们大约在15个大城市和大部分省设有联络员。7千或8千人准备参加1944年的行动,那是不可等闲视之的。

在此之前,我们应为新同志找到庇护所,提供假证件。这些都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尽管我们人数不多,我们的力量在于都经过同样的历程:一次、两次、三次逃跑失败,入狱,逃跑成功,躲藏,参加地下工作,参加抵抗运动。我们掌握命运。因此我们比许多人更大胆、更自信。这种精神状态为参加抵抗运动做了准备。逃跑者天生就是反叛的,喜欢冒险,渴望同德国人打个明白。

问:您有没有想过搞武装斗争?这是您的优先考虑吗?

答：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个人层面上，都是从对看守不辞而别开始的。在回到法国后，我们觉悟到了集体行动的必要性。通常的程序是：在全国各地成立小组，参加破坏和战斗行动，特别是在铁路上——我们之中好几个人（其中最坚决的是雅克·巴黎）多次参加过空降行动——同其他组织联系。总之，那就是武装斗争。

问：您是否自然地就成了您这个网络的头头了呢？有人说事实是您排斥了莫里斯·皮诺。

答：我们无需相互对立（我们做的不是同一件事），我们总是保持着相互信任的关系。我们在活动中有意不分得太清。在他同舅舅的通信中，米歇尔·盖约总是把我们的名字也写上。我看不出有什么坏处。我是如此尊重皮诺，如果在假装把皮诺列入维希政府一项恢复名誉行动计划时，我没有看出其损害我们行动的意图的话，那是因为皮诺以前的官方职务可以充当借口。米歇尔几乎不是这种情况。

我的运动无需保护人。我们是几个无关系、无影响的逃亡者。我的首批伙伴都是普通人。那些从德国逃回来的人，其第一需要就是组织起来，于是便有几个小组成立了。其中加上几个前大学生同志，至少是那几个我能接近并了解其转变的人：雅克·贝内、安德列·贝当古、保尔·皮尔文、费雷奥尔·德费里、弗朗索瓦·达尔。贝内的鼓动使我们这些小组的人数和工作效率大大增加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他一些人因意气相投而投奔我们：加格内尔、勒吕克、埃德里克，他们都是未来高质量的鼓动家。

1943年3月，在马贡一家酒吧的后厅，我第一次会见了亨利·弗雷内和贝尔蒂·阿尔布雷克。奇怪的是，他们从克卢尼来，在那里住在古兹家，也即我未来的妻子达妮埃尔的家。弗雷内是个举

世无双的人,政治方面没有多少天赋,但却是个无与伦比的军事首脑。作为弗雷内的启示者,贝尔蒂·阿尔布雷克表现出一种绝对的果断,一种无限制的承诺。她是荷兰人,相貌端庄,在我认识她时看来稍胖,精神焕发。她 1943 年 5 月被捕,当时她刚离开我未来的岳父母家。在那天早晨,她对达妮埃尔说:“我晚上没睡好,我做了一个噩梦。我在一条看不到头的长廊里,我找不到出口。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随后,她从胸罩上取下一只小金羚羊,送给达妮埃尔。当天下午她在马贡被捕,并在 6 月初被斩首。

问:1943 年弗雷内曾受到戴高乐的接见,是吗?

答:是的。

问:您对当时的回忆是什么滋味?您是怀着恐惧过日子的吗?

答:不,不。我们谨慎小心就是了。地下工作并不一定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你想得到吗,1943 年那年我笑得多,痛苦少。良好的同志之情有一种令人兴奋的东西,我们生活在风险时局的中心……那个年纪,人们喜欢冒险。1943 年是我们网络建设的关键年头。我们组织得很好,分隔得也很好,所以在抵抗运动经受严峻考验的第一年,当德莱斯特兰将军、让·穆兰这几个主要领袖被捕时,我们避免了最坏的情况。当我们躲开了盖世太保的迫害时,却看到其他网络的头头一个个倒下。就我们而言,痛苦来得较晚,直到 1944 年德国的大逮捕才打击到我们的运动。我们中间有许多人被捕,不少人被杀。

问:1943 年您是瓦格兰大厅英勇爆炸事件的组织者,而且,这一插曲主要反对的是赖伐尔,而不是贝当等……

答:1943 年 7 月 10 日,由赖伐尔任命的新特派员安德烈·马松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再次利用战俘问题为他们的政治

阴谋服务。来自全法国的数千名代表应约而来。赖伐尔出席。警察包围了附近街区。大厅里人头攒动。纠察人员在过道上来回走动,在入口处检查身分证。我溜进会场,口袋里装着一位同志给我的请帖,脑子里决意要质问马松。当马松讲话时,紧张到极点。整个大厅鸦雀无声。当他说到那臭名远扬的“换班”计划时,我登上我的椅子,打断了讲演人的话。我冲他喊道:“不,别以为战俘们会跟你走!”纠察队员立即向我冲来。我消失在人群中。我的干预造成巨大的混乱,以致不得不散会。我混在同志们中间,在他们的掩护下,撤出了会场。

问:然而,整个 1943 年,您保存了在维希的基地。这怎么可能做到的呢?

答:在这几个月内,我在外面旅行很多,但我保存了我在民族路 20 号的“总部”。这个地址是我和朋友们从事活动的一种船籍港,直到 1943 年 11 月 11 日盖世太保冲入企图逮捕我为止。

在那个时期,德国人开始积极搜寻我——或者说,他们力图拿获一个名叫莫尔朗的人。那天黎明时分,在民族路 20 号,保尔·皮尔文因为不知道我在巴黎旅行,就占了我的床位,决定就地等我。在那里的还有让和杰尼特·穆尼埃夫妇,以及我们的房东让·勒诺和他妻子。德国人抓走了勒诺和皮尔文。两个人都被流放到布成瓦尔德。让·穆尼埃爬到窗外,攀着排水管逃走了。至于杰尼特,她藏在壁柜中,德国人把她忘了,没有费力气打开柜子。勒诺没从流放地返回,皮尔文返回了。

同一天,多亏朋友们的勇敢,我得救了。事实上,我已乘火车抵达维希站。在站台上,一方面有盖世太保在等我,另一方面是几位抵抗战士前来向我报警——其中有普菲斯特夫人,一位军队抵

抗组织领导人的妻子,后来被流放。德国人站在月台尽头,监视着下车的旅客。我的朋友们就像将要出发的乘客一样上了车。他们在每个车厢里仔细地、尽可能秘密地寻找我。必须赶快。当我认出普菲斯特夫人时,我已准备跳下下车的踏板。她装出挤我的样子,把我推回车厢,一口气对我说:“别下车,别下车,盖世太保在下面!”我继续乘车直到克莱蒙费朗。我去了夏马利埃尔,住在布约先生家,他是皮埃尔·尼哥拉伊的岳父,当时我不知此事。后来,皮埃尔这位年轻的最高行政法院助理办事员成了我在第四共和国担任所有部长职务时的办公室主任。我再也不回民族路 20 号了。不久,我离开法国去伦敦,后去阿尔及尔。



图 4 化名莫尔朗的密特朗(1944)

三、化名莫尔朗

乔治-马克·贝纳穆：您自 1944 年 2 月 26 日从伦敦回来后，坚持地下工作，甚至蓄起小胡子，以免被人认出……

弗朗索瓦·密特朗：是这样。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蓄留小胡子。这次经验看来不太成功。我的样子像一名阿根廷探戈舞者。解放后，我就把胡子剃了。

问：您是这次回国时选择了莫尔朗这个化名的吗？

答：不。我在离开法国前即 1943 年 1 月就开始使用它了。这是我用以同南方区的抵抗运动组织——解放、战斗、自由射击手……等联系的化名。为什么叫莫尔朗？来自地铁车站，那里有一站名叫苏利—莫尔朗。而且莫尔朗(MORLAND)这个字中藏有我的真名密特朗(MITTERRAND)的首尾(M 和 AND)。这有点孩子气，是吧？我有很多别名，一般是从迪埃普的户籍登记处查来的，该处已被炸毁，也就无法核对了。我最常用的别名是吕西安·巴斯利。

问：莫尔朗回来后做了些什么呢？

答：执行我在阿尔及尔交给戴高乐将军的协议，实施各个战俘运动之间的合并。这一合并于 1944 年 3 月 12 日，由全国抗战理事会代表安托万·阿维宁主持，在田园圣母路实现了。合并后的运动领导委员会由四人组成：二人来自我的小组(雅克·贝内和我)，一人是共产党的代表(德尔科尔，后改为罗贝尔·波米埃)，第四位，我本以为可能是米歇尔·盖约，富有戏剧意味的是，他们网络竟提

名菲力普·德夏特尔!

问:为什么德夏特尔赢了盖约?

答:他的朋友们通情达理。

问:这次合并把来自盖约或共产党方面的一些新人带到您这边来了,其中有迪奥尼·马斯科洛、埃德加·莫兰和克拉拉·马尔罗。在此之前您是否认得他们?

答:也是,也不是。迪奥尼·马斯科洛已经属于我们的运动,克拉拉·马尔罗和埃德加·莫兰(他是共产党人)是米歇尔·盖约的人。我同他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而且一直保持到现在。我们经常在康特雷斯卡普一家咖啡店会晤。我另一位朋友夏尔·博内,人称穆兰。他是大学教师、一位具有罕见知识和道德力量的诗人,在这批有点古怪的人中间充当联络员。他始终是我忠实而不可缺少的朋友。我忘不掉菲力普·德夏特尔,他的光明正大是始终如一的。

问:您同全国抗战理事会的关系如何?

答:我在它的一个小组委员会——社会委员会中工作。该委员会由一位奇怪人物马克西姆·布洛克——马斯卡尔领导。我们为战后的法国制定计划。

问:您参加的网络一开始是不杀人的……

答:不。从安全考虑,有时不得不杀。例如,1943年12月2日我们对克莱蒙费朗盖世太保的头子执行了死刑。此人对我们是一个严重的危险。他特别注意我们的运动。我们必须做出反应。

在克莱蒙费朗,“反恐怖主义斗争”——德国人和维希政权把他们反对抵抗战士称作“反恐怖主义”——的头头是一个法国人亨利·马尔兰。此人曾任法朗西斯特军团(马塞尔·比卡尔创办的运动,比卡尔是战前的法西斯领袖,热心同德国人合作,解放时被枪

毙)少校司令,后为盖世太保效劳。负责行刑的让·穆尼埃把他打死在克莱蒙费朗的一个车库里。穆尼埃是同奥弗涅地区武装抵抗组织首领阿兰·法博福尔上尉和医生居伊·弗里克合作完成其使命的。这位医生曾同我们一起扰乱了乔治·克洛德的会议。这两个人原来都被捕了,弗里克流放,法博福尔在酷刑中丧生。穆尼埃随后去雅纳克乡下休养,住在我父亲家。我父亲接待了他,对他的处境一无所知,但也不向他提任何问题。

后来,也曾轮到要求我执行死刑,但极少;有时则是命运的安排。当乔治·多布罗沃尔斯基带着我们一小笔战时经费逃跑时就是这样。我是在被俘时认识多布罗沃尔斯基的,获释后,他参加了我们的运动并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富有魅力而诡计多端。他开小差使我们不知所措。确实,我们本应处死他的,但让自己软化了下来。没有料到死亡竟在路的另一头等着他:不久之后,他在奉我之命企图偷越西班牙边界去阿尔及利亚时被德国人抓住了。他被拷问,并被枪决,但未向敌人提供任何情报。

问:人们经常对“影子军”的日常生活有一种阴暗的看法。对您来说,抵抗斗争是否就是被追捕和彻夜不眠呢?

答:不是的。行动,冒险,对自由的热爱,某种无忧无虑的心境,风险共担,最后是我们的青春,都帮助我们战胜心中的恐惧。

对我们来说真正的困难始于1944年5月~6月间的大逮捕。此前,我们是相对幸免的。我们的网络是牢固的,分隔得好,组织得好。在战俘营,我们就曾同德国人打过交道。我们了解他们的反应和方法。这就是1943年镇压时我们比其他组织较少被触及的原因。但在1944年6月1日,即宣布盟军将在诺曼底登陆前五天,我们损失了14位领导人。他们是同一天被捕的。从那个恐怖

之年年初起,针对我的钳子就日益卡紧了。

在我从阿尔及尔经伦敦回国时,首都到处都在检查身分证,地铁出口、饭馆等等。我们被追捕,总要靠我们的假证件耍把戏。我们的真姓名从不出口。我们常用一个口头化名,而把记在假身分证上的化名给自己留着。这是一条绝对的纪律。我还记得一次面临危险边缘的局面:在马德琳娜地铁站出口处,我们面对面地碰上了一支德国小分队,他们比惯常更好奇或者说更仔细。还有那一天,在蒙帕尔纳斯饭店吃饭,我们与灾难擦身而过。当时我们五个或六个人在吃午饭,德国警察突然进来了。我们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心里知道他们正在进行异乎寻常的检查。他们未直接要求我们出示证件,而是用了一种新办法以便把我们搅乱。他们知道我们有多个借名,并发现同一个网络的同志也不知道别人身分证上的那个名字,即唯一有效的名字——这是为预防有人被捕而受不了酷刑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所以,一名警察突然向我们中的一位问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那个呢?”如此等等……

要不是让·穆尼埃救了我们,我们差点就被揭穿了。在我们惊愕的目光下,在德国警察更为惊愕的目光下,穆尼埃亮出了一张十足的“魔证”:这是一纸由阿道夫·希特勒推荐并签字的从战俘营释放他的命令。面对这份奇怪的证件,德国巡逻队只好撤退了。于是穆尼埃高高兴兴地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事情发生在他被关在卡塞尔小分队的时候。美国人的轰炸把小分队所在街区摧毁了。战俘们和看守们都纷纷去寻找防空洞。当穆尼埃像许多人一样准备利用这阵慌乱逃跑时,他听到了从一座被炸毁房子的废墟中传出的叫声和呻吟。他停了下来,帮助救援人员扒土寻找幸存者。他亲手从瓦砾下扒出了一名妇女和她的孩子。警报解除了,

他已来不及逃跑。一段时间后,战俘营接到一道命令,其措辞如下:“马上释放士兵穆尼埃,总理手谕。”原来被他救了命的妇女和孩子是希特勒一名副官的妻子和孩子。从此,穆尼埃就把这证件带在身上,作为特别安全通行证。要是你看到他把这证件递给德国人时德国人的表情的话!我们就这样逃离了马蜂窝。

问:也正是从英国回来后您认识了您未来的妻子达妮埃尔·古兹。您是如何遇见她的呢?

答:我首先遇见她姐姐克利斯蒂娜。那是在巴黎,通过维勒班未来的众议员兼市长艾蒂安·加涅尔和我们的军事负责人罗杰—帕特里斯·佩拉——人称帕特里斯——介绍认识的。她住在康帕涅—普雷米埃尔路,在法国电影中心工作。下班后,我们常常见面。我们之间建立了友谊。那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坚决、很有勇气。她不属于我们的运动,但充作我们的“信箱”。人们可把信件交给她,或从她那里取信件,当要在第戎参观我们的勃艮第小组时,克利斯蒂娜对我说:“到克吕尼我父母家里去吧。”就这些。

问:有人说,在克利斯蒂娜·古兹家,您看到达妮埃尔的一张照片,您惊叫道:“她多迷人呵!我要娶她!”

答:这稍有出入。我对克利斯蒂娜说:“她很可爱,你妹妹。”

问:您没说“我要娶她”吗?

答:也许说过,不过方式方法上不会那么断然。

问:您对这个家庭印象如何?

答:这是一个让人喜欢的家庭,非常爱国,非常世俗。他们是坚定的共和派,左翼人士——甚至很左。达妮埃尔的父亲安托万是小学教师,后来成为中学校长,著名的“共和国轻骑兵”之一,曾因拒绝提交他那维尔弗朗什—苏—萨奥纳中学的犹太学生名单而

被维希政府撤职,并取消养老金。他在克吕尼的住房成了抵抗战士的藏身地。贝尔蒂·阿尔布雷什和亨利·弗雷内在那里住过,克洛德·布尔德、皮埃尔·德贝努维尔也曾在那里逗留。后者在他那本优美的著作《早晨的牺牲》中讲了此事,你可去查查那本书。1943年5月28日,贝尔蒂在马贡被捕后,盖世太保闯进了古兹家,安托万·古兹那天幸亏在夏隆;达妮埃尔和她母亲挨了骂,挨了打,但未被捕。我猜想盖世太保是在设陷阱,企图抓获其他路过的抵抗战士。

问:有人说,您发现了一个新的家庭和社会天地,这对您有决定性的意义。

答:让我们不要夸大。自战争开始以来,无论在战俘营,还是在抵抗运动经常接触的人群中,我碰到过各式各样的人,他们不属于我出生、长大的那个世界。然而,古兹一家道德上的严格要求、信念和行为的不妥协性肯定对我有影响。这个与我的法兰西不同的另一个法兰西拥有许多美德。

问:在这次勃艮第之行后,您1944年5月底刚回到巴黎,就差点被捕。事实是盖世太保于1944年6月1日对您的运动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

答:是的。隔了几个小时,我几位最亲密的同志就被捕了。6月1日晨,我们在夏尔—弗洛盖大街44号底楼谈到了从伦敦来的最新文件。除了盖约网络的前成员萨维外,我们十来个人全到齐了。有人按门铃,我去开门。一个穿便衣的男人要见贝拉尔。那是让·贝尔丁的化名。这化名本来是不应为人所知的。我回答说:“请稍等,我去问一下。”

我把他留在门口,返回正在开会的大厅。我走近贝尔丁,咬着

他耳朵说：“有人要见贝拉尔。这是怎么回事？你永远不能把这个地址给别人啊。”他安慰我说：“不，不。别担心。”贝尔丁是洛林人。门口那个人黄头发，戴着金边眼镜，样子不算讨人喜欢。我想他可能是贝尔丁的一个朋友。事实上，他是夏尔·德尔瓦尔，盖世太保的一名法国特工，后来解放时被枪决了。他真正的身分从未得到过证实。他把手枪指着让·贝尔丁的胸膛，对他说：“跟我走！”贝尔丁跟他走了。我陪我的朋友到门口，德尔瓦尔没有管我。我后来知道，他是来抓我的，他以为贝拉尔就是我。我赶快回到同志们当中，一边喊道：“快走，那是盖世太保。”我打开窗户。德尔瓦尔和贝尔丁这时刚出44号，沿着人行道朝军事学校方向走去。我对贝尔丁说：“让，你在干什么呀？你到哪里啊？”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德尔瓦尔转过身来，再次拔出手枪。对面人行道上有四或五个盖世太保的人监视着我们这幢房子。我们的同志已分散到附近的街道。我把散在桌上的文件收拾起来并付之一炬，然后走出房子。站岗的警察没有动弹。他们可能以为我们有枪。远远地，我看见萨维从拉莫特皮盖走来。我迎上前去，向他讲述刚才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走向地铁。我们肩并肩地走着，突然，就在这一刻，我确信正是他告发了我们。

一下子，我脑海中出现马塞尔·巴鲁瓦的形象。他是4月底在古怪的情况下被捕的。当时他同萨维有约会，他被捕了，而萨维却没事。我发现许多逮捕事件都是在同萨维约会之后发生的。瓦朗丁事件也是如此。他的真名是斯特韦兰克。他是我们这个运动文件印刷和分发的负责人，4月中旬在圣雅克路的一间小旅店被盖世太保暗杀。我还想起了瓦朗丁的妻子吉纳维埃芙，她也被捕并被流放。几秒钟内，我把这些事情和其他许多事情都串了起来。

在拉莫特皮盖,我就没有坚持要萨维继续陪我走。

问:在6月1日这一天还发生了其他的逮捕事件……

答:午后,德尔瓦尔和他的同伙来到靠近便宜市场的迪潘路5号。那是玛丽-路易丝·安特尔姆的家(她是罗贝尔的姐妹,玛格丽特·迪拉的嫂子),我就住在她家。当时在家的有玛丽-路易丝、她的兄弟以及我们的几位朋友,特别是让·菲力普和让·穆尼埃。除穆尼埃外,这些人都被捕了。穆尼埃用力推开警察冲上街后,混入行人中逃脱了。

在我刚才所说的情况下离开夏尔-弗洛盖大街后,我也来到了迪潘路,为的是通知玛丽-路易丝,并请她离开自己的套间,因为它已被人怀疑。按照谨慎的要求,我循惯例先进入位于5号一层的邮局。我给玛丽-路易丝打电话。她拿起话筒。我用约定的问题问她:“楼上好吗?没有什么事情吧?”我听到她回答我:“先生,您打错号码了。”我未加考虑,真以为自己打错了,便又重拨了号码,而她还是干巴巴地重复道:“先生,我已对您说过,您打错了。请别再打了。”我这时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不正常的事。后来我知道,一个德国人把枪对准玛丽-路易丝的太阳穴,命令她:“告诉他上楼来。”她1945年5月10日死于流放中。我始终记着她那纯洁而高贵的脸庞。

当夜晚些时候,我同穆尼埃、迪奥尼·马斯科洛、费雷奥尔·德费里重新接上了关系。德费里是宪章运动人士,也是我在104号最受欢迎的学习伙伴之一。此时,他们正分别站在迪潘路的两头,拦阻那些尚不知情的同志。在迪潘路,德尔瓦尔没收了玛丽-路易丝放在壁炉台上的我的一张照片,这时他才知道,他早晨抓贝尔丁时是抓错了人。

问:玛格丽特·迪拉在她的《疼痛》一书中影射了德尔瓦尔。您认为她曾同他有什么联系吗?

答: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人这样认为。玛格丽特是一位忠实的朋友。

问:然而,她的一位抗战同志就是这样说的。

答:为了获得丈夫的消息,她去了索塞路的盖世太保所在地。在那里,德尔瓦尔认出了她并审问她。他向她指出,罗贝尔在弗雷斯内,她可以给他寄一条被子和一些食品。他们之间是某种猫和老鼠的关系。要想象别的事情,这是不够的。

问:在这次逮捕浪潮后,您的网络该是大为削弱了。

答:我们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同一时期,大部分网络都精疲力尽,被拆散了,喘不过气来。

问:然而,离解放是如此地近……

答:是的。6月6日登陆对所有人都意味着有救了。

问:您当时以为还要等很久吗?

答:具体推算是不可能的,但由于有盟军在法国的土地上,希望又恢复了。

问:登陆是否引起了公众舆论的逆转?

答:并不真是这样。

问:那么,您的运动在巴黎起义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答:1944年5月,戴高乐将军的代表亚历山大·帕罗迪向我试探,问我是否愿意在巴黎解放后设立的一个机构中担任主管战俘、流放者和难民的秘书长的职务。帕罗迪对我说:“你瞧,我们即将组织一个班子。法国很可能将有相当长的时期没有任何政府。在戴高乐将军和阿尔及尔委员会的权力下,将由15个人各自承担一

些专门的责任并将掌握法统。”

问：是谁选中了您？帕罗迪还是戴高乐？

答：戴高乐。但帕罗迪很喜欢我，他可能推动戴高乐作出了这一决定。

问：您当时 27 岁，就已相当于一名部长了。您有什么反应呢？

答：那个时候，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使我惊奇的是，从我同戴高乐关系的状况看，这一选择是出乎预料的。但无论如何，这相当符合他的性格。能得到他的信任，我感到幸运。我不讨厌别出心裁的安排。我对行动和责任有很大的兴趣。

问：当时您想到您正在扮演战后的一个政治角色吗？

答：第一个目标是赢得战争和活下来。事已至此，我就做好了政治斗争的准备。我无需请求任何人的允许。这点我已给你说过。我身上有某种东西支使我如此行事。那是某种顽固的东西，概而言之就是：我不能让人摆布。你可以说这是骄傲、自负……，只要你愿意。我下决心时既不与别人相比，更不迎合别人的决定，我不怕孤独。我在 1944 年所做的这些思考和反应指导着我直到今天。它们在我拒绝归顺伦敦的“自由法兰西”时起了应有的作用。我不喜欢别人命令我这样做。我把这一点告诉了他们。

问：不过，您总该意识到战俘将会代表一种了不起的政治力量的吧？

答：是这样。但我从未把正当维护老战士的利益同政治行动混淆起来。正是这种混淆导致了 1914 ~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许多灾难。

问：在发动巴黎起义中您起了什么作用呢？

答：起义是 8 月 19 日开始的。我同让·穆尼埃和罗杰 - 帕特

里斯·佩拉一起,我们为在巴黎和郊区的同志们应采取的行动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起义前夕,我们收到了帕罗迪的指示。战俘、流放者、难民,这意味着我们在头几个小时就得占领十来幢房子,其中有梅耶贝尔路的战俘特派员公署、歌剧院的布神内东特派员公署(主管在德国的劳工事务)、斯卡皮尼大使馆。天蒙蒙亮,我在以乔治·博尚为首的10名非常果敢的人的陪同下,拿着枪,进入梅耶贝尔路的特派员公署。这并非难事。没遇到认真的抵抗。维希政府方面的负责人莫罗在让位前曾试图口头上同我们对抗;他还不清楚,维希政府已属过去,巴黎已经解放。最后,他夹起皮包走路,我则进驻了他的办公室,坐到了他的位子上。我们马上就开始工作。燃眉之急是把房子变成堡垒。每个窗户都配备了手榴弹,到处都摆上了武器。入口处交给法国内地军的一个小组把守,正式命令他们不要打开可通车辆的大门,为此不惜任何代价。与此同时,其他同志控制了其他的建筑物,克利希广场的战俘之家、昂坦道的互助中心总部、塞巴斯托波尔大街的社会行动特派员公署、科尔当贝尔路的斯卡皮尼办公楼。

问:你们的小组在占领梅耶贝尔路时是否遇到过危险?

答:当时没有,但后来遇到了。德国人的战车在该街区巡逻,梅耶贝尔路与歌剧院广场的德国人司令部所在地邻近,从那里向四面八方射击。我们害怕有人告发。维希政府的官员们还留在原地。当时还发生了一桩“有趣”的事故,至少说我今天看来如此:在我们的楼房前面,抵抗战士的一辆汽车向一辆德国战车开了火。双方打了起来。德国人先停下来,寻找支撑点以便还击。我们这幢房子能通车辆的大门半开着,法国内地军的队长心不在焉,或者

怀有与其身分不相称的好奇心。总之德国人进了门。他们对这位犯了错误、十分尴尬的队长下命令说：“找你们负责人来！”这位听话的队长毫不犹豫地服从命令，上楼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了几句让我惊奇的话：“应该下楼去，有人要您去。”我对他说：“谁能要求我去？”他回答：“德国人。”在他看来，这很自然。我转身对让·穆尼埃说：“你跟我去吗？这可是件苦差事。”我们拿着手枪慢慢地走下楼梯。下到二层楼时，我对他说：“得开枪了。”在我们上面，克利斯蒂娜·古兹、帕特里斯·佩拉、乔治·博尚、勒内·波特曼都焦虑不安地注视着我们。恰在此时，另一辆装满法国内地军的汽车经过这条街。看到德国人挤满前厅，他们就朝楼内射击。德国人立刻进入战斗位置，追赶那辆汽车，拦堵附近道路，把我们忘记了。我们要做的只是赶快关上大门。

问：如果德国人企图抢占房子，你们怎么办？

答：我们将保卫它。

问：您同起义的领导人有直接联系吗？

答：当然有喽。当首批解放者抵达巴黎时，我正在警察局，随后又去市政府大楼。事实上，我们头天夜里就等他们了。但德国战车沿着圣米歇尔·塞巴斯托波尔中轴线开进，打乱了这个计划。

问：您如何看待支持起义的共产党人和对起义有保留的戴高乐派之间的分歧呢？

答：戴高乐担心共产党人夺取舵把。这种担心不是毫无根据的。某些人说，他自愿推迟起义是因为存在德国人摧毁巴黎城的危险，他的代表们曾试图用他的观点压服共产党人，但在后者的决心面前，他们不得不让了步。这或许说明，为什么后来戴高乐对共产党人如此不能宽容，以至通过公开羞辱罗尔-唐居伊或塞尔热·

拉瓦内尔的方式来发泄其恶劣情绪。我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弄清此事,我不大相信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问:作为抵抗运动一个组织的首领,您觉得同谁最亲近?是希望等待时机的戴高乐派呢?还是赞成马上行动的共产党人呢?

答:没有什么事情是这样一清二楚的。人们不能说:在我右边是主张策略谨慎的等待主义者,在我左边是准备投身所有战斗的狂热活动分子。不,事情不那么简单。戴高乐命令勒克莱克尔的第二装甲师向朗布依埃急行军,刻不容缓地开进巴黎,这就是证据。当然,在戴高乐和共产党人之间有权力之争。

幸得国家利益占了上风。本有可能爆发的大规模冲突,最终只限于一些地方性的斗争。这些斗争是严酷的、经常是流血的,结果是整省整省被这派或那派所占有。但是,这一切都逐渐烟消云散。戴高乐在这种境况中再次表现出他那惊人的控制能力。他的威望也随之增加了。

问:他不怕国内抵抗运动夺取政权吗?

答:这种想法从未离开过他的脑海,这不是说他的行动并非出自爱国主义,或者他对历史没有其他的观念。但他从未摆脱过对权力的欲望。

四、首次会见戴高乐

乔治 - 马克·贝纳穆问：您听见了戴高乐 1940 年 6 月 18 日的广播号召吗？

弗朗索瓦·密特朗答：要找到听见过这一广播号召的人，在今天看来那是属于考古学的事，要么属于古生物学的事，至于我，那天正在布吕伊埃尔当战俘，因伤住院，要听广播是有些困难的。

不，我没有听见 6 月 18 日的号召，正如作为号召对象的千百万法国人一样。在我担任总统的 14 年内，每年 6 月 18 日都要重播这一演讲；可以说我已补上了这一课。但这不是原版讲话录音，原件已丢失，而是由一位演员来模仿戴高乐的声音。这令人感动。1973 年是由莫里斯·舒曼模仿的。

因此，在 6 月 18 日当时，谁也不知道戴高乐是何许人。诚然，我听说过他的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似乎富有象征意义，如此而已。我没有读过他写的任何一本书，包括《职业军》一书。

那是 1940 年 8 月，在吕内维尔战俘营，我才知道他曾拒绝承认战败，并从伦敦借 BBC 广播电台的电波发了一份号召书。一位年轻的喜剧演员曾对我谈到过他，最后说：“对历史来说，这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名字呀！”后来，在沙拉，我有时同我的战俘难友们一起提到过那个要求人们做出努力的声音。对我们来说，只要那边有一位不知名的、造反的将军用命运预定的名义对法兰西讲话，这就够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个从来不是戴高乐主义者的人，也从来不

是“反戴高乐主义者”。因为在那些黑暗的年代，是戴高乐带来了希望。

6月18日号召是否就是抵抗运动的发起书呢？今天，事情仿佛就是这样，提出这个问题纯属胡搅蛮缠。但是那个时候，如果说国内首批抵抗战士们因获悉在伦敦启动了另一种斗争形式而感到高兴的话，他们对此并不知道更多的事情。在巴黎、马赛、里昂、蒙彼利埃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成立了一些反对维希政府的小组，它们思考如何打败德国，并准备为此做出贡献。职业的戴高乐派人士，50年来一直非常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对6月18日的宗教礼拜仪式。没有这种仪式，没有象征的力量，没有同历史的有力联系，没有那种圣女贞德式的姿态，戴高乐就不可能成为法兰西的化身，就不可能为自己后来重返政坛辩解，犹如1958年5月15日他所使用的语言：“以往，陷入深渊的国家信托我引导她的全体，直至得救。今天，面对再次向她迫近的考验，请她知道，我已准备好承担共和国的权力。”要是不把6月18日这个新神话的关键日子神圣化——在许多方面被证明是正当的，戴高乐就不可能像所发生的那样盖住国内的抵抗运动——其作用被有计划地、不公正地缩小了。

问：戴高乐是如何成为没有争议的抗战领袖的呢？

答：他做工作。人们越来越多地听BBC。他的发言人只引用他的话。6月18日号召是个强有力的姿态。他这个人有大家风度，有点神秘。他在抗战中得以掌权来源于一种复杂而又长远的现象。除他以外，其他人本来也可能把国内的抵抗运动统一起来的。而且他们尝试过，直到戴高乐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取得无可争议的合法性时为止。当我从战俘营逃回时，这些还没有实现。

在德国我所在的战俘营中，人们很少听到谈论他。对我来说，

贝当和戴高乐不表示两种相互矛盾的政策。同伴们普遍说,既有一个戴高乐,又有一个贝当,这是幸事。每一位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法国效劳。这是种误解,我也有过。由于我只有 25 岁,我的心更倾向于伦敦的叛逆者,但我虽然蔑视民族革命,却对贝当有一种本能的崇敬反射。

问:您说人们分不清戴高乐和贝当。或许是因为这两个人相识很久的缘故吧?您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何想法?

答:1912 年戴高乐毕业于基西尔军校,被分配到阿拉斯,而贝当在那里任上校。1918 年停战后,两人又重逢,贝当元帅对这位年轻指挥官的生涯很感兴趣,便召他到自己的办公室工作,并授权他去军事学校作了多次不那么随波逐流的报告。贝当元帅这样做是有若干道理的:戴高乐曾帮他编撰过几本书。他甚至还为贝当写过在军事科学院新院士入院仪式上的讲话稿,那是一项相当微妙的任务,因为元帅必得颂扬他一点也不喜欢的前任福煦。真的,这是许多科学院院士的共同命运,在那里,同事之谊很快就达到了极限。

问:有人说贝当是戴高乐的儿子菲力普的教父。

答:这没有多大的重要性,何况,有关人士已辟谣。他比你我更有资格作出决断。

问:1942 年初,在您逃离战俘营后,为什么您未受伦敦和戴高乐派诺言的“诱惑”呢?

答:说那时的法国,除一小撮赞成同德国合作的人外,都是抗战派,那是过于简单化了。我们已经谈过这一点。1942 年初,法国既不是抗战派也不是合作派,而是等待派。法奸和抵抗战士都是极少数。至于贝当,尽管他站到了合作派一边,但在法国人看

来,他是他们的安全保障。他们认为,这位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者、法兰西元帅,是唯一能够抗拒德国人的非分要求之人。他的威望非同寻常。如果当时进行民意测验的话,结果将很能说明问题。但从那时起经验告诉我们,这些调查都是虚浮的。为数众多的赞成票并不证明统治者们做得对,而只是证明他们懂得顺从舆论,然而他们的义务恰恰是要引导这种舆论。

问:1943年底您离开了法国。您将首次会晤戴高乐。此行是如何安排的呢?由谁安排的呢?

答:1943年,我正在激活流亡战俘的抵抗运动。然而,抵抗运动的统一已在进行。我坦告我的朋友之中与伦敦经常往来的人,我想会见戴高乐并在我们的运动与全国解放委员会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

我的动身在物质上是由军队抵抗组织安排的,他们有时通过英国布喜马斯特网(以其头头之名命名)秘密飞行。事实上,在国内抵抗运动、伦敦和阿尔及尔之间存在一些“天桥”。我就是通过这英国网络离开法国的。我回国则是靠帕西上校的帮忙,他在伦敦为戴高乐领导着军队抵抗委员会办公室。

帕萨热上尉(几年前去世时是将军)通知我,有一架飞机正在昂热郊区等我们。1943年11月15日晚上,我们在昂热与拉弗莱什之间的塞什苏勒卢瓦村一座房子里集合。几名抵抗战士请我们坐在他们的自行车上,同他们一起到了苏塞尔牧场。我们运气真好,天刚黑,飞机就着陆了。我之所以说“运气好”是因为有时要一夜又一夜地等候。于是,在1943年11月15日至16日夜间,我离开了法国去伦敦。尽管德国人向英吉利海峡打了几发高射炮,我们还是平安抵达伦敦。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

问：您去阿尔及尔之前在英国逗留了一段时间。您对此印象如何？

答：我走访了自由法兰西的各个部门。在伦敦同在维希一样，看来一片混乱——非常法国式的混乱，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不断相互争吵。反戴高乐的一派，如雷蒙·阿洪和《法兰西日报》的人大肆讽刺谩骂戴高乐将军，常常称他为“见习独裁者”。

但除了这些歧见中的歧见外，戴高乐牢牢地控制着法国人的伦敦。他的人掌握着所有的机构。在到达时，人们要我在一种登记表上签字，让我用莫尼埃的名字加入自由法兰西。对这种强制招募，我表示了不满。又是一个坏印象！

从布里斯托尔出发，经停直布罗陀，我终于到达了阿尔及尔。在旅途，我结识了另一位法国人。此人不久成了新闻专员办公室主任。在卡斯巴赫，我同他共住一间房，这使我们一齐染上了顽癣病。

我同亨利·弗雷内通了话。通过他的中介，我在抵达阿尔及尔两三天后，即1943年12月3日或4日走进了紫藤别墅。

别墅内部凌乱不堪。与其说它是军事总指挥部，倒不如说它是杂物仓库：几张行军床挤塞在杂乱无章的纸张、各种小玩意儿、不成套的家具和几台打字机中间。亨利·弗雷内和戴高乐将军的一位副官参加了会见。

问：戴高乐是如何接待您的呢？

答：我现在还可看到他那时的样子：坐在扶手椅里，两只大手垂在两边，好像不知把它们怎么办似的。他站起来迎接我，并不那么郑重其事，反倒较为随便，甚至可以说和蔼可亲。他第一句话使我有点惊讶：“那么你是乘一架英国飞机来的。”我承认我并未留意

这一点,我不知道除此而外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而无论如何,我乘上了人们推荐给我的第一架飞机。或许这段简短的对话导致了戴高乐派人士长期散布的那个谣言:我可能是英国特务。

我们谈到战俘。戴高乐很重视战俘营内的宣传和逃亡者在法国的活动。150万战俘的回归提出了一些亟待研究的问题。按他的看法,首先要统一三个相互竞争的抵抗运动,即:全国战俘联盟(我所倡导的运动),战俘和流放者抵抗运动(米歇尔·盖约领导),战俘全国委员会(共产党人)。他认为,三个运动的合并越快越好。我是从他口中才知道有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存在。该组织实际上是民族阵线的专门性分支机构,就像专为青年和妇女设置的分支机构那样。我请他注意,我所领导的、只吸收逃亡者参加的运动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德国人,而且是唯一真正有组织的运动。

问:戴高乐想让谁来当这个新统一的运动的头呢?

答:夏雷特。我表示反对:“夏雷特?您是说您的外甥米歇尔·盖约(这一提醒使他脸部抽动了一下)?要是我不同意,您不会见怪吗?”我对他解释说,据我看,米歇尔·盖约没有能力担当这一重任,抵抗意味着严格,要提防挑衅者,而夏雷特太不慎重。我特别向他指出,国内抵抗运动有自己的法则,不能靠简单执行来自国外的指挥。他对我的论证置若罔闻,并且专断地说:“你应该接受。我们的空降行动、我们的财政援助、我们的军事援助都靠他。”我接受统一,但保留我对任命夏雷特的反对态度。

后来,我常考虑,戴高乐为什么要坚持强加一个显然不能起这种作用的人呢?答案只有一个:他对任何事情都不得脱离控制,都不得改变他对国内抵抗运动的优势。再者,我觉得他好像不喜欢战俘,在他不妥协的精神中,战俘们未到时候就放弃战斗那是罪

过。稍后,当我得知戴高乐本人在1914~1918年大战期间也曾当过德国人的俘虏后,我修正了这一印象。

问:谈话是怎样结束的呢?

答:挺亲切。戴高乐再次站起来,并同我握手。

问:如果戴高乐对您说:“到我这里来吧,我委托你领导一个重要的指挥部。”这是否会改变你们之间的关系呢?

答:也许吧。如果我较为顺从点。如果我需要我正在执行的任务之外的别的任务;如果戴高乐对国内抵抗运动更尊重一些,而不是力图把它关在他自己的网络中的话。

尽管如此,那次会晤进行得不像你们所报道的那样坏。尽管我对他的方法持有异议,后又反对他的政策,但我们深为赞赏这位自由法兰西领袖的性格、勇气和智慧。他熬过了一个艰难的时期。他为摆脱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控制、维护法国的权利而表现出来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对我来说,始终是政治坚定性的楷模。正是在那个时候,他是最伟大的。

问:您为什么不愿意在伦敦或阿尔及尔任职呢?

答:因为我想回国。与我的人相会!我对每个向我提问的人都一再说:“他们在那里等我。”

问:戴高乐曾否建议您留在阿尔及尔?

答:他的合作者们曾试探我是否愿意进入咨询议会。这是一个荣誉性的建议。但我有别的计划,简言之就是回国。我还担心戴高乐的策略,即用荣誉头衔把国内抵抗运动领导人拴在阿尔及尔或伦敦,从而使这一运动群龙无首。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当国内抵抗运动的首领到阿尔及尔时,人们便向他们建议种种让人高兴的官职:解放委员会成员、咨询议会议员、最高行政领导成员或

自由法兰西外交代表等等。戴高乐派的事业如日中天,而且消除了潜在的反对派。许多人跌入了伦敦的“猎网”和阿尔及尔的陷阱。但若他们自愿,为何不可呢?

意识到这种骗局,我拒绝了一切旨在使我在战争期间远离祖国的建议。障碍激发了我的斗争精神。我决心回国。这并非易事。但我终于如愿以偿。

问:您要离开阿尔及尔所遇到的困难可能是因为人们把您当成了吉罗的支持者……

答:我不知是谁散播了这种荒谬的说法。皮埃尔·佩歇说,我通过我的姐妹科莱特同吉罗派人士保持联系。真实情况是:科莱特和她丈夫——一名北非骑兵军官,大战前是塔里邮局局长,在30年代曾同吉罗的一个儿子亨利——也是北非骑兵,有过联系。这下子吉罗这位据说是极讨人喜欢的儿子,在我那些报刊传记作者那里,便成了我生活中的中心人物,他的影响可能支配了我的选择!真是笑话!

1943年12月初,当我到达阿尔及尔时,吉罗对戴高乐已丧失全部政治权威,只是表面上保留着军事指挥权,而且是在全国解放委员会主席的严密监视之下。吉罗的幻想持续了不到六个月。在人们考虑过达尔朗之后——但达尔朗已被暗杀,吉罗,这位被免于向海军上将起诉的、贝当的可能继承人来得正是时候。美国人曾希望利用他来削弱戴高乐。他们为手中有一位有威望的将级官长而高兴。此人的威望由于从德国逃回而增加了,但却不像他的对手那样令人讨厌。在1943年12月吉罗已被遗忘了。头年在英美压力之下,戴高乐曾不得不在摩洛哥的昂法同他达成妥协,现在不能再原谅他了。戴高乐并无多大困难就把他摆脱了。我同这一切

毫无关系。

还剩下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人们怎么可能成为吉罗派呢？我还记得这位将军声音刺耳，蓄一字胡，好处是身材高大，体态威严。我想起他对法国发表的一篇演说时，就禁不住要发笑：“现在，让法国人去战斗，阿拉伯人去种地，犹太人去摆摊吧！”他那世人公认的军事才能不足以说明他有能力承担那样一种政治责任：这种责任已压倒了戴高乐之外的其他许多人。

问：您在阿尔及尔被困了一个月。您说这是一座后方城市。在那些强制逗留的日子里您做了些什么呢？

答：我过日子呀。有几家人热情款待了我。我一直感激地想起海军上将阿达姆一家。他女儿马塞尔，愉快、勇敢，具有了不起的服务精神，亲自为我开她的小车。我找到了我的兄弟——空军上尉雅克，以及来自国内的抵抗战士和朋友们。他们之中有乔治·达扬，他是最亲密的朋友，记得宣战时，我们同属于第23步兵团的一个连。1940年初，他在勒芒附近的奥沃尔被接纳为士官生。当人们有某种大学学位时，他们就可以成为军官。我和达扬就是这种情况。我毋宁说是反对军国主义的，因此我拒绝了。就这样，有一天，我们在马奇诺防线前面道了别。从此我就再未见过他了。

问：您是靠了乔治·达扬才熟悉犹太世界的吗？

答：不完全是这样，但达扬对此贡献甚多。我曾在他家度假。他的一弟一妹都很出色。我从未见过比他们更高的智慧了。我也很喜欢他的妻子伊雷娜和内弟安德列·贝尼舒。就我而言，犹太人就是我的同学，他们像别人一样，没有任何理由另册对待。

问：您发现他们有某种特异性吗？

答：你这个问题，放在那个时期，可能引起误解。我的弱点是相信人人皆有其独特性。这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适用。

某些人对在我所接近的人中间总有许多犹太人感到惊奇，仿佛因为我欣赏他们身上的特殊气质似的。说句笑话，达扬和他的朋友们不像我所接触过的夏朗德省的同胞们（我也一样）那样迟钝。

我一直被犹太人某种形式的智慧所感动。这种智慧是由严格要求和对绝对性的感觉形成的。但注意不要把这过于普遍化，不要走上种族类型学的邪路。我不是由于这些才欣赏达扬和他的朋友们的。他们是我的朋友，具有罕见的高尚和真正的忠诚。幸亏他们，我才把那些原先只是本能的反应深化了。我无法忍受种族主义。所有那些针对这些我感到如此亲近的男人和女人的歧视性措施都会伤害我，并激起我的反抗。

问：您同他谈到过反犹太法吗？

答：当然谈过，他的反应是所有受迫害的犹太人的反应。但是我们当时还远不能衡量那次降临到犹太世界的悲剧的广度。

问：他个人感到痛苦吗？

答：他在阿尔及利亚就已受当地强烈的反犹主义重压之苦，这种思潮是当地法国人灵魂的根本，下述小故事可作证明：乔治和他的兄弟让以及几个朋友约好在奥兰的沙滩上会面。突然，一些年轻人成群结队地冲过来，非常激动，摆出打架的样子叫道：“犹太人滚出去，滚开！”他们气势汹汹，但达扬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料。冲突似乎不可避免。这时，一位非常威严的老人插了进来，对侵略者说：“你们干的事儿太可耻了。”打架没有发生。乔治·达扬告诉我，那位老人是接近“法兰西行动”的一名法官，在奥兰任职。

1956年任摩勒政府的掌玺部长时，我在奥兰、阿尔及尔和康斯坦丁设立三个司法管辖区，而不像以前那样只在阿尔及尔设一个。当要任命新的检察长时，我想起了这位法官，就问当时在我身边工作的乔治·达扬这位老人怎么样了。他一直在履行同样的职务。我便把他召到巴黎，同他谈了话，并任命他为检察长。他问我：“为什么让我干？”我回答他说：“你还记得奥兰沙滩吗？”

问：您怎么得以离开阿尔及尔并返回被占领的法国呢？

答：顽固不化呗。任何尝试都无结果，所有的门都朝我紧闭。让·皮埃尔·布洛什——当时是内政部的副警察局长，战后向我述说，他看到过一道命令，措辞如下：“对化名莫尔朗的密特朗，命令将其留在非洲或英国一支适当的部队里，作为保证其安全的措施。”但在1943年12月那时，在阿尔及尔，他话没那么多，只是提醒我：“戴高乐方面，许多人不怀好意。”我猜米歇尔·盖约在这一切中起了某种作用。但我并无物证。

问：1943年12月底，您终于离开阿尔及尔，经摩洛哥回法国了。怎样离开的，通过什么途径？

答：确实，最近的地方是摩洛哥，何况还要坐飞机！拉什尼利埃尔的司令官是我母亲的朋友，在军队参谋部工作，是他来帮了我的忙。当我向他说明我的处境时，他对我说：“这事不易，我试试能否帮你忙。此前，要耐心……要谨慎。”终于，由于他的关照，我乘上了一架飞往马拉盖什运邮包的飞机。我离开了阿尔及尔的牢笼。

在马拉盖什机场，刚下飞机，法国陆军一位漂亮迷人的非战斗女队员问我有什么事情她可以帮忙。我告诉她，我在摩洛哥不认识任何人，身上没有证件，我要去英国。她提醒我——这正是我担

心的,去伦敦的飞机甚少,即使她能为我搞到一个座位,她也怀疑我没有必要的证件是否能上飞机。她补充说:“从现在起,我就安排你住在一个人家里,他将是一位十全十美的主人。”

就这样,我偶然有幸住到了若斯菲娜·巴克尔家。她当时同法国情报处的一位军官雅克·阿普泰上尉生活在一起。他们住在马拉盖什最豪华的一座宫殿,它属于奥斯曼帝国首相第二个儿子西莫哈默德·本·梅内比。接待非常殷勤。我睡在露天阳台上,她请我与她一起进餐。

刚吃完饭不久,机场的姑娘又来了,并催促我说:“快走,快走。我给你找到一个座位了。”我向若斯菲娜告辞,我们直奔机场。在降落跑道上停着一架小飞机,在那时是非常漂亮的。我的女保护人告诉我,那是护送蒙哥马利将军的。

蒙哥马利从埃尔—阿拉眠回来,将要回伦敦,在艾森豪威尔领导下,担任奉命参加“霸王行动”(即未来的诺曼底登陆)的军队的第二号统帅。我没办法任何手续就登上了飞机。在我之前已有两名法国人在那里。他们是皮埃尔·德什维涅,未来的常驻马达加斯加总代表、第四共和国部长;卡米尔·巴黎,一名外交官,保尔·克洛德尔的女婿,娶了克洛德尔的大女儿雷娜。在蒙哥马利身边,有两名或三名参谋军官在聊天,一名穿制服的德国兵呆在那里,让人觉得有点意外。

我坐在机舱后部,在两个法国人旁边。我们相处很好。在飞近爱尔兰海岸时,蒙哥马利把我叫去,亲切地对我说,他感到很为难,因为我不合规定,我既无证件,又无出差任务书,进入英国接受检查是完全必要的,我会有风险。我回答他说,他让我搭他的飞机,真是好心肠。他没让我说完:“为避免给你我带来麻烦,我把你

放在苏格兰的普雷斯韦克格拉斯哥军用机场。以后的牌就得你自己打了……”

问：您就这样秘密潜入了英国。

答：在某种意义上吧，但在谁的陪同下啊！如同约好的那样，蒙哥马利的飞机在夜幕降临时把我留在了普雷斯韦克机场的跑道上。我无病无伤地走出了机场。在城里，我坐上去伦敦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下了车。我马上叫来卡米尔·巴黎，他直接把我介绍给马米夫妇，这两位不带行李的法国人的保护神，向我提供了房间和床。

我经常去巴黎家，他们常常通宵达旦地打桥牌。我有时也参加。我因而得以接近这家人的常客帕西上校，他是自由法兰西情报与行动网头目，非常重要，非常可怕，很可能是戴高乐身边真正数得上的三或四个法国人中的一个。我很快就欣赏起他的爽直、明晰、果断。我们建立了联系，并一直持续至今。

正是帕西帮我离开了伦敦。1944年2月底，我本应空降法国，但由于浓雾而不许飞行。最后在26日至27日晚间，我在科努埃伊的一个小港达尔茅茨坐上了皇家海军的一艘摩托快艇。它把我和其他两位旅客载到靠近罗斯科夫的贝格安弗里。剩下的就靠一条小船了，一只罗盘指引着我这个蹩脚的水手。峭壁脚下，机要处的通讯员梅西埃·德吉马斯在等我。他是一位粗犷而又勇敢的同伴。他用一辆运鱼的小卡车把我送到莫尔雷，在那里我改乘一趟去巴黎蒙帕纳斯车站的火车，一番长途旅行到此结束。

问：您在《秸秆与麦粒》一书中曾写道：“我把不断地接触酷刑和死亡的、在本国领土上进行的抗战看作是与国外抗战性质不同的抗战，并且不承认后者自夸的那种优势地位。我不同意把抗战

一词用于在伦敦和在阿尔及尔进行的战斗,那是传统战争的插曲而已。有人以某种方式把人民的抗战据为己有。”对抗战的这种看法至少是无视常规的……

答: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写的。国内抵抗运动与国外抵抗运动之间竞争的历史尚待认识。历史学家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忽视了国内领导人同在伦敦或阿尔及尔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之大超出人们的想象,对法国政治生活的影响长达50年。这是官方历史编纂工作常犯的毛病。那些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犯了个评价错误,把抵抗运动描写成铁板一块,当然是清一色的戴高乐派。

然而,抵抗运动并非一个,而是多个,它们的抗战动机、行动方式、影响范围和精神状态均因时因地而异。由戴高乐在伦敦代表的抵抗运动顺从这位伟人的专横决断,对其他抵抗运动占了上风,但它并非唯一的运动。在国内,从一开始,抗战就是由一些极其不同的团体或个人从事的。例如,在由左翼人士组成的人类博物馆联络网与杰出的职业军官亨利·弗雷内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在1940年11月11日组织香榭丽舍大街那次惨遭镇压的游行示威的大学生们与由泰让、比杜尔或芒东鼓动的基督教民主人士小组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在军队抗战组织与共产党之间又有什么共同点呢?在同一个抗战团体内集合有各种完全不同的人士,他们之所以参加抗战,或出于仇恨德国人,或由于亲英,或因为被反犹迫害行动所激怒……例如,在“南方解放运动”内,一位不因循守旧的贵族埃马纽埃尔·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与同情马克思主义的雷蒙和吕茜·奥布拉克夫妇共处一堂;在“平民和军事组织”中,我们可以看到雷诺汽车公司未来的老板皮埃尔·勒富舍,也有思想明显保

守的马西姆·布洛克－马斯卡尔。时间越长,分歧越增加、越浓缩。1941年的抗战不同于1942年或1943年的抗战,更不同于1944年。

这就是为什么说,只限于承认国外抗战,那是一种时代的错误,一种对历史的曲解。国外抗战的功绩是巨大的,行动是决定性的,但它掩盖了基层人民运动的光辉。

问:在这一切中,您是什么情况呢?

答:由于我不是戴高乐派,有人多年来竭力放风说我不是一个“好出身”的抵抗战士。但我一点也不以此为耻。

问:既然国内抗战与国外抗战之间有区别,那么怎样给它们下定义呢?

答:我或许会有重复。国外抗战不仅仅是古典式的军事和政治之举,而且也是权力行动,简言之,它是同戴高乐的性格相吻合的。

国内抗战,触及法国人民,触及他们的疾苦与向往,因而它就是法国人民的抗战。它打算在完全现代的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对解放后的法国加以革新。全国抵抗委员会的纲领成了解放时通过的全部重要法律,并成为至今还管着我们的1946年宪法序言的根据。

问:然而国内抗战的卓越象征弗雷内,他也强烈谴责了第三共和国和议会制!

答:弗雷内不是一位政治家,而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军事领导人。他被阿尔及尔“吃掉”了。同其他一些领导人一样!我是得以在巴黎和伦敦之间、阿尔及尔和巴黎之间有去有回的少数人之一。

弗雷内为这种对阿尔及尔的依赖和他视之为被剥夺的处境感到痛心。他觉出被排挤在外。在他1942年和1943年同穆兰来往

的态度激烈的信件中,你可以读到这种心情。

问:这也许说明为何弗雷内曾指穆兰为共产党的“鼯鼠”,NKVD的特务——这种说法是蒂埃里·沃尔东最近提出的。

答:我不相信。让·穆兰是左翼共和党的一位省长,一位受尊敬的人士,但他没有领导过任何运动。他之所以变得重要,是因为戴高乐责成他建立全国抵抗委员会。从此,弗雷内就对他怀有强烈的恶感,并公开指责穆兰“剥夺”了他的“抵抗运动”。穆兰曾当过皮埃尔·科特的办公室主任。他身边有许多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同情者。但他不是共产党的特务,更谈不上是苏联特务。我同意达尼埃尔·科尔迪埃的意见,同他一样,我不认为穆兰曾受法国共产党或莫斯科的操纵。

问:1993年让·穆兰被害50周年之际,您在先贤祠的一次仪式上曾向这位伟大的抵抗战士致敬。您的致敬词同马尔罗1964年12月19日在先贤祠穆兰骨灰迁入仪式上发表的致敬词有点相似……

答:我不愿1993年的仪式在先贤祠外面的台阶上举行,以免讲话人高居于听众之上。我更喜欢地下室。我只给马尔罗的奔放诗情打50分。他是戴高乐派戏剧创作的主将之一,并最终成为这种创作的组织者。马尔罗在发表致敬词时,把自己摆在、并迫使人承认他作为穆兰战友、影子军战士的地位。他非这样做不可!

问:您是否有过向戴高乐派编造的穆兰神话让步的印象?

答:穆兰之死是可怖而又让人赞叹的。但我已对你说过,他首先是受戴高乐指派,在伦敦控制下去统一国内抵抗运动的人,他自己不属于国内抵抗派。

问:对让·穆兰在卡伊尔被捕负有责任的叛徒是谁,至今仍是

个谜。事实上,那次约会的安排是很轻率的。您曾是一位惯于千方百计小心的抵抗战士。那样一种粗心大意使您感到惊奇吗?

答:应当向贝努维尔的皮埃尔·吉兰去说。是他当时负责安全保障。无论如何,戴高乐和穆兰为一方,国内抵抗运动为另一方,双方之间确曾有过名副其实的冲突。对于戴高乐派制服国内抵抗运动的那个时期,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说出来。

问:您好像不赞成统一抗战这项原则似的,然而,那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呀!

答:这项原则应由一个人来实现,那就是戴高乐。

问:说到底,除戴高乐外,真有另一种替代办法吗?

答:有啊。人们本来可以有另一种做法的,例如加强国内抗战……。但正是他这样做了,统一抗战的功劳应归于他。何况,人们找到了比他更好的人吗?

问:您就这样结束了一次长途旅行:伦敦、阿尔及尔、马拉盖什、爱丁堡、伦敦,然后坐上船渡过英吉利海峡。您在巴黎下了火车……

答:1944年2月28日,由梅西埃当向导,我在莫尔莱搭上去巴黎的火车,同行的两位伙伴就是头天晚上在达尔茅茨上了我们船的法国人。尽管不知彼此的真实身分,旅途中我们仍相处融洽。在将近巴黎时,我对那位不断同他讨论问题的同伴说:“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再见。”他的回答令我惊讶:“我不信我们的路会再次会合。此外,我应告诉你,我是一名英国军官。”我片刻也不曾怀疑过他。他向我承认,曾在兰斯学习过。当火车在蒙帕纳斯站减速时,我们互道再见,然后就各奔前程了。

在出口处,一些负责打击黑市的警察粗暴地拦住了我:“经济

检查！把你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我把箱子递给他们，同时环顾左右，寻找何处可以脱身。事实上，箱子里有一件在伦敦买的风雨衣，一支人们在我每次回法国时都给我的手枪，以及一只装有氰化物的小丸子的小口袋。完全是地下工作者的小家产！他们翻箱子，拿起风雨衣，看到了手枪。怎么办？我再次审视周围，并准备开溜。终于，他们把箱子还给我只是对我说：“没有黄油，没有鸡蛋？食品检查完毕，走吧！”在巴黎，我找到了我的朋友们，决心进一步巩固我所创立的运动：全国战俘抵抗运动。

问：戴高乐对您^在阿尔及尔不守纪律并同他的外甥冲突未予抱怨吗？

答：事情未到满城风雨的地步。此外，可资证明的是，在我们会晤数月后，即1944年5月19日，他驻法国敌占区的总代表亚历山大·帕罗迪宣布，我已被戴高乐任命为主管战俘、流放者和难民事务的临时秘书长。巴黎解放时，我即就任此职了。

五、解 放

乔治 - 马克·贝纳穆：1944 年 8 月 26 日，当戴高乐在香榭丽舍大街阅兵时，人们是否已肯定他就是法国的主人？

弗朗索瓦·密特朗：是的。无可争辩……即使如此，当时竟有这么多的戴高乐主义者，那也是令人奇怪的。数周前，当贝当去巴黎圣母院出席一个仪式时，人们看到也有这么多人。有人已注意到这一点。我重提它只是为了强调全国性大激动的极端相对性，不是那么绝对的。

问：这次游行，在某种意义上是戴高乐的加冕礼。据您看，它是导演出来的吗？

答：我不这样认为，他的最高权位是自然的。热情冲破了所有的堤防。

问：您当时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吗？

答：在戴高乐后面第六或第七排。我没在那张历史性的照片上露面，为突出脸部人们只照到前三排。

问：有人说，在游行过程中，戴高乐对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皮杜尔很严厉，是这样吗？

答：没有任何情况使我可以这样说。

问：在你们第二次见面时，有人说您救了他的命……

答：那是 1944 年 8 月 26 日，在他走上香榭丽舍大街受到巴黎群众欢呼之后，我们一起进入市政府的一间大客厅。为了发表演说，因为没有阳台，戴高乐登上了窗槛。突然，他猛地转过身来对

我们嚷道：“别推了，别再推了，天呀！”他即将跌落下去。皮埃尔·德什维涅和我两人正好在那里，便马上牢牢地抓住了他的腿。我认为，他从不知道这件事。

问：两天后，您出席了巴黎解放后的第一次部长理事会。

答：这是我第三次会见戴高乐。严格说，那不是部长理事会。全国解放委员会大部分成员还在阿尔及尔。戴高乐已获得俄国人的承认，但盎格鲁—萨克逊人还没有承认他统治法国的权利，在此条件下他拒绝接管政权。在等待期间，他成立了一个由 15 位所谓“临时”秘书长组成的机构，在他的领导下维持法统。我在其中任战俘、流放者和难民事务秘书长。理事会在圣多米尼克路国防部会议大厅举行。我们排队站在大厅入口处，戴高乐从我们面前走过，非常庄重地同我们一一握手。我排在队尾。当他来到我面前时，他大叫起来：“还有你呀！”他这种说法自然带有幽默感，因为正是他自己任命了我。这也表明他心情愉快，言谈中含着微笑，好像想说：“瞧瞧，要摆脱你也不容易。”我正是这样理解的……他说的有道理。

问：1944 年 9 月 1 日，在戴高乐改组政府班子后，部长们陆续从阿尔及尔回来时，您不再担任秘书长了，您感到难过吗？

答：不。亨利·弗雷内按约定接管了一个部，在他返回法国前，人们一直让我担任着他的代表。新政府中只保留了 15 名临时秘书长中的两位：罗贝尔·拉科斯特和亚历山大·帕罗迪。弗雷内建议我担任他主管部的秘书长，那是一个行政职务，我拒绝了。

我当时 27 岁。我的雄心不是成为一名官吏。

从 1940 年 6 月 18 日我被俘起，四年来，我学到了不计其数的东西。在战俘营，然后在抵抗运动中，我学会了在法国人民的熔炉

中生活。我并非对一切都有了很明确的想法。但我要按我自己的决定来从事我的政治生活……

问：稍后，您曾令人惊奇地承认：“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这是戴高乐将军的时代。我有时想，为什么这一时刻没有把我同那位给我如此教训的人进一步联系起来。”人们感到在戴高乐和您之间仿佛再次演出了一场“错过的约会”。在解放时，如果他向您推荐一些重要的负责岗位，您是否会愿意跟他走呢？

答：戴高乐那时已有四年的统治经验，其判断惊人的可靠，有一种天然的、无与伦比的权威。同他在一起，就是置身历史之中，就是体验历史、创造历史。我已觉察到这一切，我还曾说过我多么赞赏能像他这样统治。但我从未试图在政治上追随他。不。我本来是可以这样做的，我的大部分抗战同志都加入了戴高乐主义的运动。我在那里面有许多朋友。但戴高乐身上有某种军人作派、某种调子不适合于我。我仿佛闻到一种个人冒险气息。他对权力的爱好，他的权力欲望，在我看来一目了然。他的第一个使命业已完成，确实令人仰慕，但我对今后感到担心。

问：他使您反感吗？

答：我不用这个词。同感或是反感，就戴高乐而言，不能断然而论。他使我惊奇。我赞赏他属于一种不怎么流行的模式。他专横，但又显得很会外交，彬彬有礼。他的镇静沉着，他的精神力量吸引我。但他把法兰西看成自己私有之物，这使我厌恶。他对权力的认同达到这种程度，以至未给民主的觉醒留出任何空间，而他对这种觉醒，本来是负有责任的。他难以容忍他的意见让别人讨论。对这个正在开始的年代，他比任何人都更不适应，尽管那是他自己的作品。

问:为什么您同其他的重要抵抗战士相反,没有被授予解放战友称号呢?

答:曾经提到过。但这是为那些经审批的忠心耿耿者保留的禁苑。弗雷内推荐我。最后,戴高乐更喜欢我的副手皮埃尔·勒穆瓦涅。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在齐根海姆战俘营关押逃跑者的木板屋里就认识他了。我喜欢他、尊敬他。

问:归根到底,对于您来说,存在下去的唯一办法不就是早早地同戴高乐对抗,洗刷他的印记吗?

答:人们经常提出这种解释。它并不完全错。我没有“追随者”的习性。历史不是这样发展的。历史就是相互对抗与肯定自我。我从未以戴高乐的仆人或伙计的姿态行事。这样做,对我们的关系是不利的。在他自己之外存在的一切,都使他生气,使他难受。但是要说因我反对戴高乐而确实使我显得突出的话,我认为不管有他无他我都有办法存在下去。

问:20年后,1965年12月竞选总统时,您同戴高乐对抗,迫使他进入第二轮选举,他为此大感沮丧。您在1944年想得到吗?

答:为什么呢?生活就是这样形成的。但在一种局面没有形成前,我不在精神上创造它。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我是预先准备进行这场战斗的。

问:甚至在巴黎解放后,包括9月初您离开部里之后,您一直做战俘工作。在一本对话录中,雅克·福卡尔肯定曾于1945年初参与过制定一项空降行动计划,该计划旨在把法国士兵和特工空降到战俘营和集中营去。据说您是这项计划的倡议者。这段不为人知的插曲是否准确?

答:雅克·福卡尔的回忆录是极有选择性的,读起来要注意。

他夸大了那次行动,但他忘记提到,当战俘营开放时,戴高乐将军确实交给了我一项特别使命。

问:是的,1945年4月底,戴高乐再次召唤您去打开达肖战俘营。

答:对,盟军一个接一个地解放了集中营。戴高乐希望能有一位法国人呆在美国将军刘易斯身边——刘易斯是被其国家指派去打开并控制这些集中营的。戴高乐选中了我。1945年4月29日一天内,我和美国人一道接管了朗斯贝格和达肖两个集中营。我讲述这件事,我写过这件事,我们所见糟到极点,不可思议,让人震惊。

那是疯狂的一天。

在朗斯贝格,并无一人幸存。数千具尸体被人用火焰喷射器燃烧。我们打开几条壕沟,发现了三个三个排起来的数千具尸体。八千至一万。他们的脸部已同泥土混为一体。

在达肖,死尸遍地,吊死的、煤气毒死的、焚尸炉烧死的、用枪打死的都有。斑疹伤寒的流行给幸存者雪上加霜。我观看了对美国人抵达时对抓住的德国士兵执行枪决。每响一枪,流放者们就把帽子抛向天空并大声欢呼。我看到两个年轻德国士兵被打死并被扔进坑里。我走上前去,他们还在喘气,还在呻吟。与此同时,在德国某个地方,他们的亲朋好友正在为他们祈祷和祝福。无疑的,与流放者承受过的痛苦相比,这种痛苦算不上什么。然而,我无法使自己不想到他们。

在达肖,出于无意我重新见到了罗贝尔·安泰姆,他是1944年6月1日与我们运动的其他一些同志一起被捕,然后又被流放的。他病得很厉害,以至于被人扔进死尸堆。当我们跨越尸体时,他看

到我,便低声喊着我的姓名,更确切地说是我的名字。同我在一起的皮埃尔·布戈听到后便转身对我说:“我觉得有人叫您。”

由于他患的是流行性斑疹伤寒,刘易斯将军不同意我当晚把他和我们同机运回。返回巴黎当晚,我立即让人印了一些与人们交给我以便进入集中营的那些文件相似的文件。我们在印刷术上相当熟练。我的三位同志迪奥尼·马斯科洛、雅克·贝内和乔治·博尚跳上一辆车,急驰直抵达肖。他们在指定地点找到了安泰姆,他还活着,他们帮他穿上美军制服,像抬一个醉鬼那样抬着他,毫无困难地通过了暗门。

在斯特拉斯堡,他们以为他死了。送入医院,人们又把他抢救过来。当他们进入圣贝努瓦路5号大门时,我和我的妻子玛格丽特在那里等着他。他已像一个散了架的木偶。当时在场的医生认为已无希望把他救活。然而,他终于痊愈了。数年后,人们读到了他所写的一本书。那是关于流放生活的作品中最好的作品之一,书名是:《人类》。

问:集中营世界的被发现在人们对纳粹主义甚至对德国的看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人们对您1995年5月8日的演说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您的竞争对手们指责您在演说中对昨天的敌人显得过分宽容了。

答:这场争论毫无意义。在现场,在柏林,谁也没有对我说的话吹毛求疵。我知道,这次由法国电视2台全文播出的演讲受到了听众们激动而又严肃的关注。我不明白,或者说我太明白了,是什么东西激怒了我的批评者们。需要加以论证,补充证据。像惯常那样,他们并不太把事情真象放在心上。但让我们先回到演说本身。我是在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德国总统赫尔佐格、英国首

相约翰·梅杰和俄国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之后最后一个作演讲的人。我事先没有写讲话稿,我的发言很短。我列出要点作为提纲。我经常这样做,我并不真正即席讲话,但我也好像戴高乐那样背讲稿。我也不照本宣科。我先离开我的要点,然后再回来。

我就是这样发表那次演说的。人们正好指责我在其中为纳粹军队辩护,还不止如此! 鉴于我那假设的“贝当主义”和我同勒内·布斯盖的“友谊”,就可肯定我不是一个爱国者,我实质上是同情纳粹政权的。为了从中得出一种想法,就应找来录音稿,特别是引起争论的那一段。我说了些什么呢? 我说到“德国士兵在为一种邪恶事情服务时的勇气”。我事先非常注意这一段,真可谓字字斟酌。如果我只讲“德国士兵的勇气”而忽略了指明他们是“为邪恶事业服务”的话,我就会理解人们为什么指责我了。但现在,这样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再让我们想一想仪式进行时的气氛吧。我们是在柏林,德国的首都,庆祝盟军胜利,也就是说庆祝我们东道主的失败。而他们在同我们一道庆祝这件事。我考虑到了这些境况,以及此事不仅在我们这里,而且也在他们那里唤起的痛苦回忆。我把这篇柏林讲话视作法德和解的一个宣言,其中每个字都经过仔细斟酌,无一可易。

还有,那些对我进行这种伪造指责的人,靠弄虚作假对我进行指责的人,忘记了戴高乐在 1962 年 9 月汉堡军事科学院落成典礼上的讲话比我走得更远。他赞扬了德意志的传统,并且声称:“无论在法国人方面还是在德国人方面,要是没有军方的杰出参与,他们就完成不了任何从国家观点或国际观点来看堪称伟大的事业,这就是法国人的历史,这也是德国人的历史。”对这篇演说,人们却

不吭一声。是不是我的书报检查官们对戴高乐特别宽厚呢？

在汉堡演讲后不久,1963年1月22日法德条约签字前夕,谁也没有指责戴高乐特赦了在法国的盖世太保头目奥贝格;而1985年我任总统期间,克洛斯·柏尔比却从玻利维亚被引渡回法国监禁并受审判。

问:让我们回到1945年。您作为前战俘全国联合会的副主席,于1945年6月2日在互助会大厅组织了一次集会,最后变成一场有十万战俘参加的示威游行。您受到了戴高乐的接见,而他则可能威胁您,如示威不停止,就要逮捕您。这是真事还是一种传奇?

答:事关一场毫无根据的论战。那场论战是由米歇尔·德罗瓦在六十年代发起的,始终带着戴高乐派的强烈情绪。真实情况是:6月2日,我们在香榭丽舍大街组织了一次强大的战俘示威游行,有十来万人参加。戴高乐不喜欢这样。6月6日,他接见我们——社会党人乔治·科尔努奥、共产党领导人雷蒙·泰韦宁和我。他首先用严厉的腔调教训我们说:“怎么?让人上街!……在这样一个艰难时刻!”接着,他委托我们向前战俘宣布,很快将采取一些措施。但他从未说过米歇尔·德罗瓦所引的那句话:“请下令示威者解散。”

问:他没有像人们所说的威胁着要把您关进监狱吗?

答:不,这不准确。他不讨厌耍嘴皮子。他特别喜欢向他的亲近助手们讲一些有时是想象出来的话语。会晤是在紧张气氛中进行的,但并无威胁。我们是不会接受威胁的,所以威胁也就没有发生。

问:巴黎的解放也就是地下报刊的兴旺,例如《战斗报》、《自由

射手报》……等等。您的运动当时也有一份报纸。

答：是的，我们曾决定，我们的运动来办一份自己的报纸《自由人报》。我们在克罗瓦桑路——即 1914 年饶勒斯被暗杀之路——征用了几间办公室……在那里，我们出版了头几期《自由人报》，刊登了我头几篇解释我们战斗的意义，以及战俘与逃亡回归者应起作用的文章。在我看来，这是继续斗争的一种方式。我对此感兴趣。我感到自己有点记者的灵感。每天写篇社论并不难。且养成习惯，就应专注于一件事、一种想法，千万别三心二意。这样自然就会笔底生花。但我很快就发觉这种轻松自如取决于报纸的周期性。为日报写文章是容易的，为周刊呢，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了。至于为月刊写文章，那就要费很大劲了！由于不能在月刊中谈论最新发生的事情，人们很快就倾向于每一期重建一个世界了。

问：在当时的新闻界，人们对“清洗”谈论得很多。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阿尔贝·卡缪曾就这个主题进行过长期论战。在这两个人中，您感到同谁更接近？

答：卡缪—莫里亚克论战当时没有今天人们赋予的那种重要性。清洗对所有总结内战的各个时期来说都差不多。人们做了，但往往做不好。有些人是非枪决不可的，我敢说有些人并不是非枪决不可，而另有一些人则本应必须枪决的。

问：您把谁归入这最后一类？

答：噢！我不会在 50 年后再去揭发人的。但总之，有很多人，漏网了。

问：据您看，哪些已被枪毙的人并不是非死不可的呢？

答：那些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伤痕的人。这种人在巴黎几乎到处都有，在外省就更多了。

问：从 1945 年 5 月起，您同戴高乐派和戴高乐本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然而，您在 1945 年 1 月就已站到了他们那一边。当时，全国解放运动正在举行代表大会，参加抗战的各派组织会聚在一起，而共产党人想打大会的主意。

答：我诚然属于这个运动，但并无多大幻想。依我看来，老战士各党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因为当过老战士或老战俘，这不是一种信仰，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不是一种斗争的理由，而是意味着一个共同生活过的时刻，如此而已，——这样说已经够可以的了。从一种共同的经验出发，就以为可以永远联结在一起，这种感情上的幻想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各种意识形态会介入，各种利益会相互对立，生活又开始了新的过程。这是历史的本质。请看看 1914 ~ 1918 年大战后一些强大的老战士协会的命运吧！它们不是逐渐自动瓦解，便是从 1936 年起蜕变为前法西斯团体了。

在这次著名的全国解放运动代表大会期间，共产党人借苏联红军胜利威望之光，企图篡夺这个运动，将它变为法国共产党的卫星组织。马尔罗和我本人，以及其他许多人，我们成功地挫败了这个阴谋。数月之后，正是从全国解放运动的内部分裂中诞生了民主和社会主义抵抗联盟。当时，马尔罗和我达成了协议，但并未继续下去。

问：这次同马尔罗的会面是偶然的呢，还是在抵抗运动中您就已经结识了他？

答：不。原因就不必说了。正如埃马纽埃尔·贝尔告诉莫迪亚努的，马尔罗只是在被占领时期的最后几个月才归顺了抵抗运动。贝尔就此讲了个很有味道的故事。马尔罗来到科雷兹住在他家，自称上校。早上出去，当晚回来时，他佩带有 5 条杠的肩章，证明

他已晋升了。此外,他穿着军装出席全国解放运动代表大会,不能不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马尔罗是一位伟大的演员,像所有大演员一样,除天才之外还具有率真的本质。

我十分了解他第一任妻子克拉拉。她在1944年合并后参加了我们的运动。她既是抵抗战士,又是犹太人,所以受到双重的威胁。当时她和女儿弗洛朗丝一起过,做了大量的抗战工作。当我在1965年、1974年以及1981年竞选总统时,我发现她总是站在我一边。1982年12月她逝世时,我极其悲痛地出席了她在希伯莱习俗在蒙帕纳斯基地举行的葬礼。

克拉拉·马尔罗不是一位可以小看的作家。她比安德烈·马尔罗少些卖弄,少些夸张。她写得恰到好处。最近,我重读了她的回忆录《我们的脚步声》,我觉得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

问:您同马尔罗的合作没有继续下去。您以后再见过他吗?

答:1956年夏天,我曾同他在瑞士的克朗苏西埃尔一起度过几天假。这是偶然之事。我们每天一起散步,长时间地讨论问题,同他交谈时题目不难找到。他有点神经质,口齿不太清楚,但总能让人听懂。他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当他讲到蒙古人的马队来到撒马尔罕时,我听得见大地震撼的声音。此后,我曾两次访问撒马尔罕,每次都想起马尔罗,因为我始终处在他那种神奇魔力的冲击之下。我的内兄弟罗杰·古兹,多年来一直试图说服我,让我相信马尔罗是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人们到处颂扬“这位世纪的大作家”。例如,有些人甚至把他抬高到与普鲁斯特同等的地位。他的风格过于雄辩,有人说他是位古典诗人,却又赘词太多。但这是何等的冲击力呀!与此并存的是那些古怪的对比,那些对历史大而化之的叙述。那是他抒情的天性和内在热情使然。这种天性,这

种热情使炽燃中的火炭都来不及充分燃烧。如一定要我选择的话,我将记住他那本《希望》。《人道的条件》在我看来已不堪卒读。我始终无法把《反回忆录》或《想象中的博物馆》视为杰作。他最后的几本书更接近真实生活:生命即将结束时的苦恼、不幸。从真实的马尔罗所留下的主要是一个人物,是他自己塑造的英雄作家的形象。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战前在互助会大厅的反法西斯集会上,我曾听过他的演说,我像其他人一样从电视节目中看过他纵论艺术和文学,其中包罗万象,有金山,也有烟灰。归根结底,我在想马尔罗是否属于那样一位作家:他的天才在交谈中得以表现,却在写作时淡化了。

问:您怎样评价作为政治家的马尔罗呢?您怎样看待他的戴高乐主义呢?

答:他靠拢戴高乐是个人因素多于政治因素。西班牙战争对形成他的传奇色彩起了很大作用。1936年时他还是年轻作家,是一位左翼浪漫派作家。当确信戴高乐将会胜利时,他便很快转向右翼,投靠戴高乐。那不是任何一种右翼,而是从1940年6月18日起占了理的右翼。这样做,无论如何是有气派的!戴高乐需要这样的支持,以便摆脱自己的右翼形象,即贴在他身上的法兰西行动型右翼标志。马尔罗的人伙帮了他大忙。

但马尔罗并非是一位传统上的戴高乐主义者。他是在参加抵抗运动后不久,在解放时遇上戴高乐的。这种新生的戴高乐主义注定既勇猛又多疑。我还记得1949年,在法兰西人民联盟时代,他曾抛出他那出了名的论断:“明天,在法国,将只有共产党人,我们不会再有其他人了。”他的预言没有实现。在1965年总统选举时,他真是肆无忌惮地攻击我。在第一轮投票前,他用下面的话招

呼我：“喂，共和派的候选人，让共和国睡个安稳觉吧！”在评论我未来的政府时，他说：“密特朗先生许愿给我们的政府，那是历史的幻想，正如科学的幻想一样。”这一切说明戴高乐将军在第一轮投票中未获过半数票一事多多少少让他感到意外。第二轮投票前，1965年12月14日，他在巴黎体育宫组织了一次盛大集会。他在会上列举了韦尔森热托里斯、克洛韦斯、贞德、路易十四、公元2年的士兵，等等，目的是向法国人解释，为什么他们不应该投密特朗的票。我国历史上这一次总动员，毋宁说是对我的抬举。

1974年，即戴高乐死后四年，他加盟不幸的候选人雅克·沙邦-戴尔马的竞选。电视上曾有一个让人同情的场面：马尔罗以令人好奇的诅咒者的姿态出现在镜头前，老态龙钟，微露谗妄，神思恍惚。人们一点也听不懂他说些什么。或许他自以为干得很好，但我确信这种场面不会不给他所支持的候选人带来麻烦。

问：如您同意，让我们回到戴高乐上来。当他1946年1月辞去委员会主席职务时，您的反应是什么？

答：当戴高乐于1946年引退到科隆贝双教堂时，我认为作为法兰西大国地位的一个组成部分远去了。那些感到高兴的人心中充满了与此事有着同谋关系的平庸渴望。对这种乱糟糟的状况，我感到很不习惯。

事实是，由于他的高高在上和传奇经历，戴高乐将军承受不了新议会给他的刺激。他不断被质询、被批评。奄奄一息的第三共和国的那些坏毛病重新占了上风。

戴高乐陷入了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的矛盾之中。他并无实在的议会支持，他同各政党关系已极其恶劣，而他还得继续仰仗议会民主的牌子，尽管他本人也不怎么相信。只是1958年以后，当他那

妥协时期开始之时,他才承认这些矛盾。

1946年,他觉察到他所说的话对各种事变已无足轻重。他为此生气。于是,1月份的某一天,他就走了。他本以为六个月后人家会去找他。是的,我想他是希望被请回来的,但却一等就是12年!我并不对此感到惊讶,我是在从里尔到巴黎的火车上获悉他辞职的。在同一包厢中,有一位属于戴高乐最著名的伙伴之一、也是被视为最忠诚者之一的旅客。他很健谈,不断为戴高乐辞职表示高兴,强调自由法兰西的这位首领脾气怪,气量小,爱记仇。这次谈话有助于我看清事变的后果。以被戴高乐认为是最可靠的党而著称的人民共和联盟不断地挖苦他。事实上,戴高乐是位不可同化的人物,他只能使那样一群人生气,对那些人来说,任何他人的优势地位都是无法承受的。

问:法国人听任戴高乐辞职,是否说明他已失去人心?

答:当时戴高乐并非不得人心,但他没有足够的威望去挤压那个领导社会,并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它。这种命运,不是他独有的。温斯顿·丘吉尔曾是英国抗击纳粹的象征,但在军事胜利后的第二天就被地位低微的工党领导人克莱芒·艾德礼击败了。事情就是如此发展的。是否应责备人民忘恩负义呢?克莱蒙梭1920年未能当选共和国总统,人们更喜欢保尔·德夏内尔。仿佛人民在完成一项伟大的英雄壮举后,所感到的只是厌倦,包括厌倦他们的英雄。但是,如果他不首先使人民疲劳,他又怎能成为英雄呢?

问:1946年戴高乐之所以引退,主要是法国资产阶级不需要他……

答:资产阶级总是选择他们的利益或那些他们认为是他们的利益的东西。爱国主义只是在为他们的财富带来利润时才成为他

们兴趣的组成部分。1940年,他们把戴高乐看作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异端分子。除少数例外,他们把他当作一个背叛本阶级的危险人物。他们大批投奔贝当和“民族革命”——后者不过是麦克一马洪那陈旧的道德秩序的代用品,而资产阶级却虔诚地怀念这种秩序。

当1944年戴高乐回到巴黎时,资产阶级容忍了他,如此而已。戴高乐让共产党人进入了政府,这就超越了被允许的限制,变成玩火了,不管他怎么做,资产阶级还是更喜欢他们亲爱的传统右翼、中间派和位于软腹部的小团体。他们不需要戴高乐。我认为,要是陷于结构性混乱和殖民战争中的第四共和国不如此迅速地丧失一切信用和威望,资产阶级可能就听任戴高乐在政治流亡中腐烂消失了,在戴高乐和他1940年曾反对过的人们之间,和解的天地可以打开了。其中不乏反常现象。但是资产阶级明白,1958年的戴高乐需要他们以便夺回权力,正如他们需要戴高乐以便保持权力一样。

问:当他1958年卷土重来时,据您看,这位造反派的个性是否变得有点枯燥无味了?

答:无疑的,对权力的渴望使他丧失了严厉……1958年将使他得以同那些他曾如此不放心、如此藐视过的人们和解。这个过程持续了11年。人们常把这个时刻称为特赦与和平的时代。戴高乐从未得到休息。多数派内部欧洲派与反欧洲派的分裂,阿尔及尔将军们发动的兵变,全国总罢工,遭到失败的矿工请愿,货币贬值危机……什么灾难都落到了他头上。可笑的是,今天有人把这个时期称作第五共和国的黄金年代。实际上,那是半个世纪中日子最难过的政府中的一个,戴高乐不得不担当起领导这样一个

政府的责任。

这种联盟毕竟是脆弱的。资产阶级从未真正接受过他,当他意欲进攻其堡垒之一参议院时,资产阶级就把他抛弃了。就这样,他在1969年4月20日的公民投票中失败了。他的对手们得到了乔治·蓬皮杜的间接帮助和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直接帮助:前者拒绝按马尔罗的要求声明不会谋求接戴高乐的班,后者号召人们在公民投票中投反对票。资产阶级放心了。继任人将是他们之中的一个。

问:1946年戴高乐离去是否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答:第四共和国是第三共和国不清不白的重新涌现,就像复辟时期同合法君主制的关系那样。从1946年至1958年那个时期是一个过渡时期。第三共和国的最后一代人,至少是还剩下的那些人,仍紧紧地掌握着政权。未来几代人尚无自我意识。戴高乐需要喘息的时间。大家过一天算一天。

问:第三共和国的复活难道没有使抵抗战士的年轻一代感到失望吗?

答:唉,他们很痛快地接受了现实,也被很痛快地接受了下来。当时登上政治舞台但并非真正掌权的一代人是:雅克·沙邦-戴尔马,莫里斯·布尔热-莫努里,乔治·皮杜尔,莫里斯·舒曼,皮埃尔-亨利·泰让,费利克斯·盖雅尔,埃德加·富尔和莫里斯·富尔兄弟两人,我本人以及其他一些人。可以看到这一代人不乏天才,但也许缺乏雄心。我要说,当人们选择政治这条路时,唯一有价值的雄心就是掌权的雄心。还有,不应把权力同它的外在表现、它所带来的优厚条件、它的日常骗局混为一谈。

问:在那个时期,您觉得同谁最接近?

答:雅克·沙邦-戴尔马、莫里斯·布尔热-莫努里是我的战友,埃德加·富尔是平易近人的政治家,莫里斯·富尔早已是我的朋友之一。同其他人,我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虽然我们走的不是同一条政治路子。

问:您的政治路子是以您 1945 年加入民主与社会主义战士抵抗联盟为标志的,该组织在第四共和国起过大作用。

答:我不把这次入盟看作是我政治生命中的突出事件。

还有,在这个凑合起来的小党里,在勒内·普利文同我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竞争,是的,首先是政治上的,然后才是个人间的。政治上,就像所有在抗战中诞生的政党一样,很快就分成了拥护戴高乐派和反对戴高乐的两派。人民共和运动已因此送了命。左翼分裂者大部分是对第四共和国感到失望的人。勒内·普利文、勒内·卡皮唐、克洛迪斯·佩蒂对自由法兰西的首领保持着深深的依恋。这就使他们对他们政府的行动完全丧失了精神独立性。人们猜测我依然更热衷于批评。不幸的是,这种对戴高乐的依恋相当快地转变为几乎是无条件参政的态势,或者更确切地说,参加任何政府的态势——这样的政府当年很多,一届接着一届。这一切最终都表现为一种因循守旧的心态,从而使日常生活变得令人窒息。1958 年,我们分手了。在此之前多数派的变化已把我推到接替勒内·普利文的议长位子,这是 1958 年分裂所证实的一场演变的突出标志,因为我们这个议会党团只有 4 名议员:迪沃、迪马、迪布瓦和我投票反对新宪法。随后就是各走各的路,民主和社会主义人士抵抗联盟这个多数派越来越倾向于同保守的多数派混为一体,以至无法再把它们真正区别开来。5 月 13 日以后发生的事件最终导致这个议会党团的解体,并使各人复归原位。

六、在第四共和国当部长

乔治 - 马克·贝纳穆：您是在戴高乐引退的时候进入第四共和国的。然而，他仍然无处不在，直到这个政权的结束！

弗朗索瓦·密特朗：确实是这样。1946年他勉强离开后，1947年便抛出了那个古里古怪的法兰西人民联盟。我在尼埃弗尔地区有所经历。当地的法兰西人民联盟头目主动接近我，但时间不长。只要看看加入这个联盟的都是些什么人就够了。他们都属于右翼中的渣滓：小右派、记仇的右派、令人讨厌的右派，等等。这个运动是模仿战前的一些联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不管其创始人愿意与否，它还是吸收了贝当派的一些达官显贵。右翼越过了自己内部的争吵，但并未真正忘记他们不和的根源。但是，保守派的反应超出了所有其他人能够接受的程度。法兰西人民联盟失败了，因为它不符合法国人的脾气，而且是建立在太多的模棱两可之上的。

它净做蠢事，玩弄恶人政治。在印度支那，戴高乐反对勒克莱尔将军的意见，支持蒂埃里·达尔让利厄海军上将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战争。在阿尔及利亚，他的支持者反对执行1947年法令。在黑非洲，我当时所采取的使首批民族解放运动同法国和解政策受到戴高乐派新闻工具系统而猛烈的抨击。

当我听人说戴高乐奉行“进步和解放的非洲政策”时，我以为他们是在玩文字游戏。这个政策比它所处的时代已经晚了10年。我们所知最典型的例子是那出了名的布拉柴维尔演说。对这篇演

说,人们曾大加赞扬,却从未真正读过。在其中,他置英国人在印度和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所承认的历史演变于不顾,拒绝任何的“自治”思想。

直到 1956 年通过加斯东·德菲尔法律总则,才允许前殖民帝国的每个成员国选举领地议会,并拥有一个摆脱了总督绝对权力的执行机关。那些重大的解放法令,例如取消强迫劳动的乌弗埃·博瓦尼法,在戴高乐 1946 年下台后都被通过了,但却遭到那些自称是他的支持者们的顽固反对。戴高乐的非洲政策老是违背历史的现实和需要。它不过是一系列判断错误的积聚,外加由冒险分子网组织的反对有关国家现行领导班子的若干阴谋活动和恶行。诚然,历史记住了金边演说,特别是阿尔及利亚的和平解决。这是他当之无愧的。但历史对塞蒂夫轰炸及其 3 万名死者却依然守口如瓶。我这里写的将会令人惊讶。人们将会思考,为什么像戴高乐这样一个在许多方面都有先见之明的人,却偏在这一点上如此难以理解殖民地历史的演变呢?甚至曾被引为非殖民化先驱样板的著名的布拉柴维尔会议也纯属误会。会后的宣传“改造”了会议的内容。为说明这一点,我愿引述这被人称为“头等重要”的会议所通过的建议中的一段话:“布拉柴维尔非洲会议在讨论人们建议它审查的总纲的这一部分之前,认为应先提出下述原则:法国在殖民地所完成的文明成果的目的在于排除任何‘自治’的思想,排除任何在帝国的法语集团之外演变的可能性;在殖民地建立自治政府的可能性,即使是遥远的可能性也应排除。”人们从这里如同从别处一样,可以发现他所依靠的阶层有害而危险的影响。

在那些人看来,孟戴斯-弗朗斯和我都是“廉价出售帝国的人”。30 年之后,我对当时在《常设的政变》一书中所写的下面这

段话一个字也不会撤回：“戴高乐将军的伙伴们，那些极端派中的极端派，在非洲的所作所为比在任何地方都更能暴露他们真正的政治身分。他们在那里散播仇恨，制造混乱，煽动内战。在马达加斯加、乍得、中央刚果、苏丹（今马里——译注）、科特迪瓦，他们先是因愚蠢和自大而挑起动乱，然后又出于对报复的嗜好而严加镇压。不顾他们的反对，那些倾向于实现更多进步、更多正义的法律，得到了通过。但他们还是顽强地维护那蛮横无礼的少数人、滥用职权的公司、专事投机的资本的特权。”

例如，在来自宗主国大物主的压力下，非洲物主间的生产合作就被禁止了，在同一个市场上“非洲的”咖啡不如“欧洲的”咖啡售价高。法律甚至注定要惩罚那些不遵守这一规定的人。人们可以明白，当巴乌莱部落的贵族、年轻医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为抵制这种状况而开始组织保护非洲生产者的行动时，为什么在他四周充满了敌意。

问：人们感觉到，对黑非洲殖民地状况的揭发对您向左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您立场的激进化不无关系。这样说对吗？

答：说得对。我通过实际得以了解了殖民形式下的资本主义至高无上的权力及其恶行，从而使我孕育出一种深刻的造反感情。那些制定法国政策的人并非是在巴黎选出的领导人，而是蔗糖、咖啡、可可、贵重木材、香蕉业的老板们。这同我想象的法国政策不是一回事。

问：您在法国海外部期间的工作，是以您同达卡尔一些白人神甫间的一场论战为标志的。最后您对他们进行司法追究。这是否表明您一劳永逸地远离了那曾在您生活中起过作用的教会呢？

答：我希望我在法国海外部的经历是以别的事情为标志的，而

不是那种生动有趣但却微不足道的事端。那些白人神甫——他们一共两人——在同总督贝夏尔的一场冲突中违犯了有关公布司法辩论情况的法律。我让他们遵守了法律。被告人被判 50 法郎罚款，缓期执行。在不久后举行的立法选举中，我在涅夫勒省的对手们就此大做文章，口号是：“我们不能选一个曾让人枪毙两名白人神甫的人。”

问：1947 年 1 月 28 日，您被任命为退伍军人部长。从 1947 年至 1958 年，您当了 11 次部长。您觉得这样连续当部长有什么意义呢？在那个共和国里，您感觉如何？

答：不舒服。别忘了我曾投票反对 1946 年宪法。我从那部宪法中看到了无政府状态的官方化。后来年月中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证实了我这一预感。

问：在第四共和国，您曾遭到无情的攻击。戴高乐派是这一切的后台吗？

答：右翼人士介入了 1954 年的泄密事件，有的是戴高乐派，有的不是。但戴高乐派他们心里明白自己干了什么。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不断相互指责和相互咒骂的策源地。在第四共和国时期由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极端分子策划的所有阴谋中，无论是在宗主国还是在地中海彼岸，我都有机会发现这些乱党分子。

这个泄密事件占了 1954 年的大部分时间。我当时在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中任内务部长。我们在进行战争，印度支那战争。

一切开始于 1954 年 7 月，最后以 1956 年判处罪犯伏法而告结束。中间历经曲折。法兰西人民联盟的一些议员梦想把我送上高

等法院,并以此案为借口于1954年12月4日试图推翻政府。

他们指责我什么呢?至少说我把1953年和1954年国防委员会审议情况的副本交给了共产党——本意是说交给了支持越盟的莫斯科。1954年7月2日,警察分局长让·迪德得到一名共产党告密者的通知后,便去突尼斯和摩洛哥事务部长克里斯蒂安·富歇——他是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老战友,属戴高乐派——家中通报:国防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速记稿已被雅克·杜克洛在法共政治局会议上全文朗读了。据迪德看,能泄露这一秘密的只有我。富歇当然急匆匆地直奔孟戴斯-弗朗斯那里,口袋里装着迪德的报告。

孟戴斯-弗朗斯于是委托他的办公室主任安德烈·佩拉邦进行调查。此人并不着急。他把报告放进了保险柜。他拖着不办。谁也没有对我谈起此事。所谓的情报泄露出去了,事情闹大了。直到9月8日,国土安全局才被责成着手调查。我很快就被排除了嫌疑。此后,孟戴斯-弗朗斯全力支持我。

问:尽管如此,在泄密事件过程中,孟戴斯-弗朗斯同您之间并不完全是田园诗,他当时可能对您表现出不信任,而这严重影响了您在整个第四和第五共和国时期同他的关系。

答:最近我了解到,玛丽-克莱尔·孟戴斯-弗朗斯怀疑我指责她丈夫在这一事件中的态度。这是不真实的。相反,在1954年那个艰难的年头,在那长达六个月的攻击我的运动中,他是完全正直和乐于助人的。我们正在印度支那事变中挣扎——奠边府刚刚激起人所共知的精神震荡,而我们却被右翼、极右派和戴高乐派指责为——我强调一下——“廉价出售帝国的人”、“国家的掘墓人”、“法兰西的敌人”。我们感觉到——我们实际上也是——我们非常密切、非常接近、非常团结,因为我们共同面对着来自同一方向的、

空前猛烈的攻击。

诚然,开始时,当他得悉这一针对我的骇人听闻的指控时,他没有立即通知我……他宁愿把那份报告撂在一边,而不让我知道这件事。但是,那一年,他在两个特别重要的时刻支持了我。

第一个时刻是在泄密事件爆发之前,但同即将发生的事情不无关系。那是1954年夏初,7月10日,在共和国总统勒内·科蒂的办公室里。那天是星期三,恰在内阁会议之前。我一到内务部,就决定撤换巴黎警察局长让·贝洛,此外,让·迪德是他的前助手。我一直记得头年7月14日游行的情况:约有15名反对约瑟夫·拉尼埃尔政策的示威者——越南人、马格里布人——在普遍漠不关心的情况下,死在治安部队的枪下。我担心这仅仅是一次排练,而孟戴斯-弗朗斯班子的上台将受到可能造成更多死亡的射击的“欢迎”。我要求把任命一位新的警察局长列入内阁会议议程。但我整夜未能入睡。人们从各个方面、从所有有影响的人士那里向我打电话,劝我收回这一建议。触动警察局长那是一种不能容许的自高自大,将使共和国处于危险之中。第二天一早,我收到了共和国总统的召见令,要我在内阁会议开始前一小时到达爱丽舍宫。勒内·科蒂恶狠狠地接见了,并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拒绝接纳我要让·贝洛去职的建议。我反驳他,说他无权这样做。他回答说,他将得到这种权利。于是,我对他说,我将提出辞呈,(这是第四共和国的习惯做法)但一当我恢复议员席位,我当天下午就登上议会讲台,以未履行宪法义务为由要求解除他的总统职务。调子升高了。勒内·科蒂这时转向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他是与我同时到达的,一直默不作声地听着总统的怒斥——要求后者与他用同一个声音说话。总理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回答国家元首:

“我将赞同内务部长将要做的事。”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但是，我理解这位总理的坚定性和互助精神：孟戴斯－弗朗斯是不让步的。而科蒂呢，面对我们的决心，他不得不作出了让步。

另一次是1954年10月。我曾要求逮捕警察分局局长让·迪德，他是反对我的阴谋的根源。调查刚一结束，我的无辜得到证实，国土安全局的人就开始对迪德进行跟踪。这样，我可以知道调查的结果和收集到的情报。当我获悉9月18日迪德再次去富歇家递交所谓“证明”我有罪的文件时，我简直目瞪口呆！真太过分了。我说服孟戴斯－弗朗斯让人把他逮起来。我没有太坚持，他就同意了。

那个阴谋家被关进了监牢，尽管《费加罗报》和《震旦报》掀起了猛烈的宣传运动，揭露“内务部长的专横”……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迪德已无法干坏事了，而他的“情报员”——国防部常务秘书长的两名助手——也被揭露了！

问：然而，从那时起，人们就说孟戴斯－弗朗斯和您之间互不相容……。

答：我们当时是两名年轻的部长——他是总理；我比他小8岁，是他的内务部长。应当回顾一下第四共和国的气氛，它已被共产党人和戴高乐派的结盟而毒化了。我们不属它们哪一派——他是激进党，我是民主与社会主义人士抵抗联盟，我们尤其让当时的反动派特别是强大的殖民地院外集团讨厌。是的，那时我们非常孤立。如有需要，这一切已足以使我们接近。

问：当您的无辜被确认后，那件不幸的泄密事件的后遗症还存在吗？

答：它一直存在。那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揣测。但随着时光的

流逝,人们又去想别的事情了。

问:在泄密事件未了,警察分局局长迪德让人转交给警察局长杜布瓦一封证明您无罪的信。警察局长把信交给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但后者没有告诉您这件事。依您看,这是为什么?一封这样的信本来有可能破坏反对政府的敌人的信用的呀。

答:我不了解警察分局局长迪德这种 180 度的转变。

问:1954 年,您是很孤立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他的《快报记事本》上一直支持您。您能谈谈莫里亚克吗?您是怎样认识他的?你们的关系如何?

答:莫里亚克是我母亲的一位朋友,他在波尔多和巴黎读书时认识了她的兄弟罗伯特·洛兰。我的舅舅 20 岁就去世了。这一悲剧对莫里亚克打击很大,他经常来雅纳克向我母亲致意。当我成为大学生时,由于母亲认为巴黎的生活很危险,她就把我委托给四位很有声望的联系人:吉约马将军,他是我们的亲戚;皮埃尔·马尔西拉西,他是未来的夏朗德省参议员和雅尔纳克市总参议的父亲;皮埃尔·儒亚诺,他是凡尔赛行政长官,又是我祖母家的朋友;还有就是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我礼节性地拜访了前三位,但很快就把他们忘掉了。我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却建立了友谊,并且一直保持到 1970 年他去世。我们每周都共进午餐。我们聊天。我们对戴高乐派的不同看法是我们经常性的话题,我们有时为此哈哈大笑。

问:您是否想过,您把莫里亚克说成“地方文学作家”是不公正的吗?

答:是的,当然。这是反驳他政治愠气话的一种方式,他对我反对第五共和国感到多么生气呵。我称他为“我们最优秀的地方

文学作家”时正打中了他的痛处。他不会喜欢这个头衔的,并因此受到了伤害。我今天为曾使他难受而感到遗憾。在友谊和忠诚方面我欠他很多。

问:在第四共和国时期,您经常批评殖民主义。然而,1954年您作为内务部长负责阿尔及利亚事务,您曾强烈重申阿尔及利亚属法国所有。人们长时间里指责您那句话:“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这句话当时是什么意思呢?

答:在法律上,那样说是恰当的,因为当时的阿尔及利亚是由法国的三个省构成的。但政治上是错误的。

问:您对黑非洲所发生的动荡估计得越准确,您对阿尔及利亚的历史发展及其对独立的向往却越显得估计不足。您是否认为您当时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缺乏判断力呢?

答:也是,也不是。同孟戴斯-弗朗斯差不多,我没有站到赞同独立的人一边,当时法国的政治环境不允许我这样做。不像今天这样,明确表态比较容易!但我反对那场战争所引起的一切过分的反应。

问:1956年~1957年,您担任摩勒那个可鄙政府的部长,并一直干到了最后。然而,有很多左翼人士离开了这个政府或不再支持它,以抗议它的阿尔及利亚政策,例如:孟戴斯-弗朗斯、阿伦·萨瓦里、爱德华·德普勒、达尼埃尔·梅耶……。您不认为这样不顾一切地留在那里是犯了一个道义和政治上的错误吗?

答:从政治上看,那样做更谨慎一些。我已经因为殖民地问题从一个政府辞了职,我不愿意老是这样做。再者,正是由于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所作所为,我拒绝了居伊·摩勒的继任者布尔热·莫努里要我留任的邀请。

问:1956年任掌玺部长时,您把司法问题让给了军人处理。那是一个错误吗?这构成了辞职的一个动机吗?

答:那是一个错误,肯定的。

问:戴高乐派并不是唯一威胁第四共和国的人,共产党也是。

答:在第四共和国时,人们常常看到戴高乐派和共产党人之间某种客观上的结盟,他们构成人数众多的议会党团,一起投入有选择的战役,联合起来耍弄第四共和国的内部矛盾。他们都有把抗战成果据为己有的倾向,一致敌视一个统一的联邦制的或非联邦制的欧洲的构想。由于他们在国民议会中人数众多,因而成了各届政府寿命长短的主宰,能在揭露政府不稳定的同时,又挑起这种经常性的不稳定,最终使这一政府体制丧失信誉并取而代之。

问:那个时候,您是像基督教民主人士那样的欧洲联邦主义者吗?

答:“联邦主义”一词意味着赞同一种概念、一种尚未深化的结构中去。我只想说,如果我倾向于统一的欧洲的某种组织类型的话,那就是倾向于这种类型。对欧洲问题,左翼方面历来意见分歧。

问:后来,您向联邦主义演变了吗?

答:考虑到人们无法靠某种法律程式的魔力来排除民族国家的现实,因而我没有变成联邦主义者。但由于逻辑精神,我还是接近了联邦主义的思想,却过于忽视了历史进程的缓慢性。

问:当时第四共和国对欧洲建设的推动是可观的,但未被人知。您在1948年曾参加海牙会议。您对那次重要会议留下了怎样的记忆?人们能否说,它开辟了签订罗马条约的道路?

答:海牙会议是这类会议中的第一次。它把昨天的主要敌人

会集到了一起。会议由丘吉尔主持。我看到了大部分欧洲领导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我想后来被人们称为“缔造者之父”的那些人士都在那里了：莫内、舒曼、加斯佩里、阿登纳、斯巴克等等。我到那里是出于偶然。我收到一张请帖，不知是从哪儿来的。但我深深预感到这次聚会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在两个时代的交接点上，即在欧洲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刚刚结束两年的时候举行的。

问：1958年，第四共和国政权完全进入了死胡同。您也不再在政府内了。您是否预感到第四共和国只剩下最后几个星期了？

答：是的，这很容易看到。

问：那个时期您是怎么过的？您怎么考虑未来呢？

答：我是共和主义者。我为共和国而痛苦。无论如何，我无意停止战斗。

问：1958年5月31日，戴高乐利用阿尔及尔将军们的兵变重新上了台。当时您会见他了吗？

答：1958年5月31日，在组织他的政府之前，或者更确切地说，当勒内·科蒂试探他让他组织政府时，戴高乐作为第四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召集当时除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领导人开会。我作为民主和社会主义人士抵抗联盟的主席，像其他政党领导人一样受到了邀请。戴高乐把我们请到他在巴黎的官邸拉佩鲁丝宫，向我们宣布，他将向国民议会自荐，希望了解我们的想法。

我们都老实地到齐了。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代表们共40来人，坐在一间改作他用的餐厅的藤椅上。我们面前的戴高乐是一个神色威严的戴高乐，但却古怪地穿着皱巴巴的夏装。他以他独有的礼貌问问这个人，问问那个人。第四共和国整班人都在

场：摩勒、比内、拉马迪埃、迪歇、盖伊、达拉迪埃、孟戴斯－弗朗斯、人民共和运动的全体成员。各党领导人、历届总理、资深的议会名流 12 年来一直疯狂地反对他，现在却连连行礼。那些早上还发誓“永远不要戴高乐”的人，现在却向他鞠躬，就像加莱的新资产者急急忙忙把垂死政权的钥匙交到天意所归者手里那样——我想这一形象来自韦安松－蓬泰的画作。尽管我这些年来并未像他们那样强烈反对戴高乐，我却为这种爬行动作感到难受。关于这一点，我建议你去读一下摩勒同戴高乐之间交换的信件，那是很有教益的。唯一缺席的重要人士是奥兰奥尔总统。然而，他的影响对自由法兰西首领的重新上台是决定性的，正如他在戴高乐辞职时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一样。

戴高乐扮演着典礼主宰、殷勤的东道主的角色，让客人们舒舒服服。他向这些人探问，向那些人打听，在阿尔及利亚事务上安抚右派，在欧洲和罗马条约问题上平定中派，又用社会政策方面泛泛的许诺讨好左派，但都是三言两语，从不多谈，从不进入细节，特别是从不承担义务。在对一切都同意、对什么都首肯的同时，掺杂着漠不关心和不屑一顾的神情。奇怪的是，我是唯一或几乎是唯一发觉这一点的人。对戴高乐来说，这次同各党的聚会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他之所以将就这一形式，是因为他深知，已经永远摆脱了它。他对这最后一次让步并未付出多少代价。在他面前所呈现的景象却大大地补偿了他。过了一会儿，他决定摊牌，便问大家：“好的……那么，你们能否说一说，当我正式向你们毛遂自荐时，你们会有很多重大反对意见吗？”鸦雀无声。这时，我站了起来。我有点胆怯，因为我该是国民议会最年轻的议员，因而也最少决定性，何况我又是民主和社会主义人士抵抗联盟这一小小的议

会党团的普通代表。我说：“我的将军，如果您不公开拒绝承认阿尔及尔的公安委员会和军事暴乱的话，我将不投您的票。一个共和政权不可能在兵变胁迫下产生。”

戴高乐曾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威胁：几个月来，他的密使分赴各地，人们到处都发现阴谋——有些是他们策划的，有些是别人加诸于他们的。叛逆军人侵占了科西嘉。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居然斗胆声称：“阿尔及尔事件可能标志着某种复兴的开端。”……谁也没有作出反应。当恐怖笼罩着国民议会时，他们都躲进了“老鼠洞”。人们不是天天都碰得上一个米拉博来关捕鼠器的。

在他巴黎官邸的天花板下，戴高乐一声不吭，用眼睛打量着我。我乘机补充说：“我仍有可能进入军事政变的时代……。继将军们之后，将是上校们的时光。何况，我的将军您也是会死的人。”当我如今忆及于此，我仍为他的古怪反应感到震惊：他只是干巴巴地扔给我一句话，并未要我回答：“那么，你是希望我去世喽，你希望我死，是吗？”我们的对话被一片嘈杂声掩盖住了。在离开我们时，他只是说，无论如何，他将出席国民议会的投票。第二天，他是这样做了。我对他的回答感到困惑，因为显然同我的问题无关。可能他在想别的事。我没有必要再见他了。

问：戴高乐重新上台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吗？

答：如果人们想一想 50 年代头几年戴高乐的情况，就可知道这对他来说是个意外。他曾认为自己已经完了。在 1953 年法兰西人民联盟自动解散后，他把自己禁锢在高傲的孤独之中，确信人们再也不会召他出山了。他停止了等待，并终于听天由命了。他专心致志地撰写着他的《战争回忆录》。

但是政府的削弱、阿尔及利亚局势的恶化以及在阿尔及尔、巴

黎、拉巴特等地多方面所策划的阴谋,这一切又重新给了他希望。即使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泄漏底牌,但对他东山再起的假设似乎不再被排除了。

尽管他从未承认过,但戴高乐对由阿尔及利亚军人和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活动分子所策划的兵变准备工作是知情的。他根据不同的时间和事态的变化对此加以调整。为此目的,他拥有许多同谋,掌握着阴谋的线索。他身边的奥利维埃·吉夏尔同米歇尔·德勃雷及其他同谋分子保持着经常的接触。迪瓦尔将军负责阿尔及尔同科隆贝之间的联系。另一位将军、科蒂总统的直接助手加内瓦尔履行他在爱丽舍宫办公室的同样使命,并毫不为这种不光彩的事感到痛心。一切都经过精心准备和策划。所有这些都参加了反对第四共和国的同一个阴谋。他们一会儿提出武力威胁,宣布对法国本土实行武装登陆,宣布总起义或宣布凡尔赛的装甲部队包围了巴黎;一会儿又说要用软的一手把希望寄托在议员们的最后投降之上。戴高乐比较敏锐,他把宝押在议员投降上,但又准备应付各种可能性。对合法性表面上的尊重对他有极大的好处,即使他可以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的重新缔造者而置身于历史面前。尽管必要时他会不惜采用军事政变,但他认为这样做可能打乱他的计划,玷污他的形象。因此,他对那些像我这样谈论“伪装的政变”的人感到生气。是我戳穿了正在形成的传奇故事。没有比这更不可原谅的了。

问:您提到他注意使自己符合共和国的法制,您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吗?

答:他是一位暧昧的共和主义者,至少在他本人成为共和国元首之前是这样。我刚才对你说,有两个戴高乐,各有其用。但真正

的戴高乐是有历史意识的,害怕不得不靠武力重新掌权。为此,他可以指望其策略上的优势,指望他从普遍软弱中掌握的王牌,指望他对那些人的认识:他们的抵抗很快就会到达极限。“重新排队”的运动超过了他的期望。国民议会的议员们和大部分党派向他们自己的本能作了让步,没有怎么勉强自己。这时,戴高乐只需把合法性装进自己的口袋了。

问:1958年6月1日,在同戴高乐会晤次日,科蒂总统告诉您,他差点就建议您任总理了。几个月来,关于您当总理事,人们谈得很多。您真的希望得到这个任命吗?

答:勒内·科蒂确曾把我召到爱丽舍宫,我同他进行了一场可笑的谈话。他一开始就对我说:“我很想让你组阁。但人们知道你的立场。你会召共产党人入阁的,而且阿尔及尔可能出事故。”我赞赏他用了“事故”这个词,而且用的是条件式。此时是6月初。阿尔及尔叛乱发生在5月13日。“事故”发生在我们谈话之前。但把我国历史上这一重大事件缩小为“事故”,这表明,巴黎的领导人,首先是共和国总统,同叛乱者之间存在着或许是无意识的默契。科蒂被将军们号召阿尔及尔人民造反的“不良方式”所震惊,但这不过是表面文章。那只是事故而已,是自家人内部的事嘛。他觉得同这些“维护秩序的人”比同那些反对“事故”的人更靠近。

当我对他说,共产党人的协助在我看来确实是不可或缺甚至是有益的时,他的愤怒之情溢于脸上。我不认为他真的考虑过让我组阁。他只是凭其职业意识,尽量试试各种办法罢了。我的职业意识则自动消失了。在提到共产党人入阁问题时,我已画上了句号。

我真的希望得到这个任命吗?这确实是一个崇高的使命。但

我知道,那是实现不了的。在国民议会中,我只可能取得少数的赞成票。在一切官方场合,共和派的势头已经消失。谁也不相信它,谁也不欢迎它。人人都顺从于一条平安的出路,即使许多人明明预感到这将是他们时代的结束,但那些狡滑的人还继续控制着议会的走廊,自欺欺人地宣称他们将进入未来的政府,说什么人家已向他们做出担保。人们观察到这些人精彩的滑稽剧:他们自以为已经保住了自己的职业,便以被他们出卖了的政权的救世主自居。更有甚者,他们到处说:“他(戴高乐)呆不了六个月。”他们自己想象目前这次内阁危机就同 10 年来发生的其他危机那样,可以友好地解决。总之,他们把戴高乐降低到了同他们一样的水平,即使他们害怕他并非如此,也要让别人相信是这样。

问:那次任命撞到什么上了呢?是因为您可能接受共产党人在国民议会中的支持票吗?是由于居伊·摩勒吗?或是由于阿尔及尔的野心家们呢?

答:你提出了三种解释,而这三种解释又是相互联系的。接受共产党人的支持票过去和将来长时期中都将是禁中之禁。孟戴斯-弗朗斯就曾两次不听我的建议,拒绝了这种支持。一次是 1953 年当他向议会介绍其政府班子时导致了他的失败;另一次是 1954 年他虽然获得了信任票,但没有真正的多数,因而只好听顺右翼特别是殖民地右派的摆布。1958 年那些所谓掌权的人首先关心的是逃避这种责难。因此,我采取的立场只能是把我自己排除在政府之外。

在后来的几年里,我坚持自己的选择,并不是我屈服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实际做法,恰恰相反。但我已经认为,只有团结起来,左翼才有前途。这意味着要经过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进程。法

国人还未准备好接受一个共产党人占优势的左翼,这种心理状态一直持续到1978年。因此,恰当的做法是,一方面恢复社会党左派以前的力量,另一方面保持同共产党联合的机会。居伊·摩勒没有摆脱所谓“反常”拒绝这一联盟的心态,尽管在每次选举前夕都要说几句关于联合的空话。至于阿尔及尔的野心家们,谈他们也无用。他们吃的就是反共产主义的饭。

问:那时候您认为第四共和国还有救吗?或者说那个政权已不可救药?

答:客观事实表明,第四共和国已不可挽救。要不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它甚至不希望得到挽救。在那些焦躁的时刻,我经常想起1851年12月3日雨果和普鲁东在新桥上相遇时的对话。普鲁东当时是马扎监狱的犯人,被允许出狱走走。他冷嘲热讽地瞧着那些被路易·拿破仑赶出来的议员们。雨果鼓励他加入议员们的队伍,他回答说:“为什么?将要发生的事不会比现在更坏。”1958年,大部分选民和很多由他们选出的左翼议员都作如此反应。然而,我认为,为了荣誉应该说不,并为未来做准备。很明显,未来的路途将是遥远的。

问:1958年6月1日,您在议会发表了一份著名的公诉状,宣布您将不对议会的总理授权投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很有趣,您说:“但有人来对我说:‘过一段时间,你将会归顺吗?’是的,会归顺的。女士们,先生们,如果戴高乐将军是一种新型民主的缔造者的话;如果戴高乐将军是非洲人民的解放者的话;是法兰西在海外存在的保持者的话;如果他是国家统一的再造者的话;如果他给法国以应有的连续性和权威的话,我将会归顺,但有一个条件……”您的对手们的喧闹声使人们听不见您的条件是什么。今天,您或许

能明确一下吗？

答：我相信，向我发出挑战的是拉维热里省的埃马努埃尔·达斯蒂埃。他说“你将归顺”时那种语气使我受不了，仿佛他是在说“你也将背叛”那样。请允许我提醒你一下，我演讲的开头是这样的：“在1940年，您有两个伙伴：荣誉和祖国。今天，这两个伙伴名叫武力和叛乱。”这样的开场白就没有给未来的赞同留下多少回旋的余地了。确实，我所受的教育太容易使我诉诸大罪的概念。而戴高乐所为者正是一种大罪，所以是不可原谅的、无法改正的、反民主的。是我搞错了吗？戴高乐如此才智出众，我那样说，错、对并有。

问：面对戴高乐，您立即就成了一名正面的反对派。当摩勒等社会党人归顺他后，您却不给他任何机会……

答：摩勒在祭告伟大的祖先并宣布自己像博丹或德雷克吕兹那样为想象的内战做出了贡献后投降了。戴高乐没有看错人，他用最友好的方式回答了这些牛皮话。结果是，摩勒重返了政府。我想起一件让人发笑的事：摩勒刚被任命为国务部长，他就在自己的新办公大楼里召见了包括我在内的最后“一小撮”反对派，不带一点反话地叮嘱道：“请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提高警惕。”我又笑了起来，我希望结束这种人们邀请我去观看的滑稽剧，不再同这个两面派王国来往。反之，我却热衷于研究戴高乐同领导阶级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它比那些阴谋诡计更真实、更有趣。

不惜一切代价重返政权的渴望使1958年的戴高乐同1940年的戴高乐相比完全换了个人。1940年选择归顺贝当和民族革命的资产阶级，把戴高乐视为一名野心勃勃的不忠诚的士兵、一名本阶级的叛徒。1944年，刚刚摆脱了恐怖的资产阶级容忍了作为胜

利者的戴高乐,但始终把他视作异端——共产党人进入政府把他们吓坏了。戴高乐在玩火。他使那些正统派狼狈不堪。资产阶级当其利益或他们认为是其利益的东西受到威胁时,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从不手软的。从1946年起,他们就认为依靠右派或中间派的传统政党来保护其地位更为可靠。他们曾期待第四共和国及其宪法的成功。因此,他们不再需要他了。

但第四共和国很快就陷入了机构混乱和殖民战争,丧失了一切信誉和一切威信。在戴高乐和领导阶级之间,和解的天地打开了。但双方达成了一项妥协:禁止戴高乐涉足一场有风险的领域。由于有了这项妥协,加上一个昂贵而脆弱的联盟,戴高乐得以连续执政11年。他有时强加于人,有时又放弃一些东西。他把自己的宪法观点和战略看法强加给政府,这些都不是小事,我承认这一点。他放弃了社会的重新组合。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他不是不知道,资产阶级并未接受他,只是因为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才利用他。一旦资产阶级有了机会——或者更确切地说,一旦戴高乐给资产阶级提供了机会,后者就将因厌倦而抛弃他。他就是这样于1969年4月的全民公决中被击败的。资产阶级感到解放了:戴高乐的下台没有引起政权危机。乔治·蓬皮杜在那里。他早已潜伏着,准备接班,准备领导法国。资产阶级松了一口气,完全彻底地打发了这位老造反。

七、反对派时期

乔治-马克·贝纳穆：戴高乐重新上台后，您成了第四共和国的人，某种人人躲避的“鼠疫患者”……这种孤独使您感到难受吗？

弗朗索瓦·密特朗：某种习惯……也许还有一种隐藏的愉悦补偿了此事带来的烦恼。尤其使人吃惊的是，我曾猛烈批评第四共和国，它的殖民地政策和它的机构——这些机构不过是第三共和国蹩脚的翻版，前者所吸取的主要是后者的缺点。我从根源上发现了那个制度的缺陷和矛盾，曾投票反对 1946 年宪法。在那个已故政权的官方人士中，那些曾为这种或那种原因而被排挤在权力之外的人，对我怀着强烈的仇恨之情。

确实，那个时期我很孤单，但要比你想象的好受得多，要比我如果加入新的阿谀逢迎者之列好受得多。当时，反对戴高乐的人不多：共产党人、一些左派小党、若干少数派社会党人、孟戴斯-弗朗斯和我。可以说，不存在左翼报刊：各大日报都归顺当局了。没有独立的电台和电视台，到处听到的都是“法国之音”。一切都被查封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65 年总统选举为止。从这点来看，那次选举成了救星。

自从我 1958 年 6 月 1 日在国民议会发表拒绝授予戴高乐全权的演说之后，我就成了新政权（人们已忘记它在开始时是何等严酷和专横）所要打倒的人了。就这样，我这个被人称作任何政府的当然伙伴、典型的机会主义者的人，便当了 24 年的反对派。当然，这是我自愿的。24 年中，我从未或近或远地同政府打交道，从不

前往官方机构所在地,从未在家里接待过任何部长,从不为我与之斗争的政府办事。这样做有好处:免去了一些令人厌烦的礼仪活动。但也有不便:丧失或降低了我在尼埃弗尔的信誉,警察监视,不能在电台和电视台发表讲话或露面。在那个时候同戴高乐斗不是好受的!

问:政治前途被堵塞了,您成了孤家寡人。您没有怀疑过吗?

答:我本能地知道,没有时间的帮助,什么事都办不成。我没有怀疑,因为我不指望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任何东西。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势所使然。我依靠我自己以及一小群忠诚的朋友。我自我感觉拥有无限的耐心。我并不希望我自己的努力会得到报偿——1981年的选举否定了这种预感,但我准备把我的立场坚持到底,因为我确信我是对的,确信左翼将获得胜利。如果愿意,人们可以相信我,但我当时认为胜利在我之后才会到来。当我离开政权时,或者不如说离开政权的“外壳”即政府时,我是41岁。我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是64岁。那已不是开始梦想的年龄了。

所有权力都掌握在戴高乐派手里,人们以为事情将长期如此。从此,人们应当耐心、交换交换意见、谈谈话、写写文章……。但实质上,我相当自信。我知道,如果善于更新面目,使自己的思想现代化,形成自己的班子,在国内组织起一支战斗的力量,那么我这个反对派是会达到目的的。

问:从1958年起,孟戴斯-弗朗斯同您是竞争对手吗?

答:他是我的兄长,我尊敬他。他的生活经历,他的选择,都注定他应起首要作用。他那智力和道德的勇气造就他成为我们民族生活中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我曾说过,他是少数几位能于1958年反对戴高乐、1965年同其竞争的人中的一位。但他认为这样做不

合适。他本可以合法地同戴高乐对抗。他是戴高乐的真正对手，但是，他却闭门谢客。他从内心里反对 1958 年宪法，反对普选共和国总统——这使 he 想起 1848 年那令人不快的先例。他毫无保留地谴责这个政权。作为法学家，他看到了机构中的毛病和实践中的问题。

当时，反对戴高乐的人不多，他、我以及其他几个人。我们是孤立的，但我们团结一致，只是后来在反戴高乐的战略问题上，我们产生了不同意见，即左翼联盟是否适时的问题上，他和我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是不管我们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波折，我们从来没有停止维护个人之间良好关系。

问：您似乎说，孟戴斯 - 弗朗斯未曾明白 1958 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

答：不。我没有这样说。但他不相信一种人民运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个运动不排斥任何人，它将接受共产党的协助和参与。

问：您是什么时候觉悟到需要同共产党结盟并组成左翼联盟的呢？

答：1958 年，在此之前四年，即孟戴斯 - 弗朗斯政府时期，如果说我对排斥共产党人感到惋惜的话，我那时还没有想到结盟。除了由参谋部委派的秘密使者同他们悄悄会晤外，不存在同他们的其他关系和合作。那些会晤也是为了试探道路以便更好地把它们关闭。四年后，面对戴高乐，特别是面对保守势力恢复了的权力，我认为同共产党的联盟是必要的、是不可缺少的。左翼分成三个或四个党，工会的分裂，知识界的分裂，以及共产党人在混乱中所占的优势，这一切都使得任何政治上的胜利成为不可能。除非

发生一次难以设想的冲击,我看不到这种局面何时才能结束。唯一可能采取的态度便是开展一些不起眼的、日常的、教育性的活动。

首先,我于1958年11月在尼埃弗尔的第二轮立法选举中实现了左翼联盟。在现场并非没有碰到困难。共产党人和我,我们在前几次投票中,曾猛烈地对抗过。这几年,我学会了了解他们,在抗战时,我曾经常同他们来往,此时,我又这样做了。我不让他们为所欲为,我也不随心所欲。尽管我们之间慢慢建立起常常是亲切的私人关系,但就集体而言,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世界。然而,在尼埃弗尔,我们终于达成了关于立法选举的协议。在第二轮选举中,共产党撤回其候选人转而支持我竞选,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候选人则还保留着。因此我就与共产党人共同竞选。那是个人的地方性的主动行为,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因为我丢了我的议员席位。

这件事没有使我产生浅见,也没有使我失去对左翼联盟必要性的信念。我确信,如果左翼想要有朝一日获取政权的话,那是唯一可行的战略。因此,在1959年3月夏都—希农的市镇选举中,我再次推出了一份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候选人名单。这一次,我们赢了。我利用这个机会同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建立了直接关系。但左翼联盟的政策只是在1964年准备总统选举时才真正显出其分量。

问:左翼当时的精神状态如何?您的组织占多数吗?

答:在其他各党的机构中肯定不是这样。孟戴斯或罗卡尔的俱乐部强烈敌视左翼联盟。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也如此,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历史上出了名的争吵仍在继续进行,反反复

复,积怨日深。在国外,在大部分社会民主党内,这种倾向也占了上风,在社会党国际的代表大会上,人们用好奇和不信任的目光审视着我。

问:左翼联盟的战略处在与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的战略完全决裂的状态,您曾在1954年当过他的部长,他作出了怎样的反应呢?

答:完全决裂,那是言过其实了。我想起在1954年某个时候,当他任总理遇到困难时,他不听我的意见,拒绝把支持他的共产党议员的票数记在他的名下。我并未因此而拒绝当他的内务部长,我们的关系也丝毫未受影响。

他当时的姿态很神气,但在政治上毫无用处。结果,他的政府只存在七个月就被推翻了。那七个月有其神话般的价值,但不足以让孟戴斯-弗朗斯展现其巨大才能。尽管我们就此进行了为数众多的谈话,我始终未能说服他。

当1965年加斯东·德菲尔引退后,我提出要当总统候选人时,我们之间的争论变得尖锐了。首先我建议(我不是唯一强调此议的人)由他当候选人。他拒绝了。在他思想中,有两个论据起着作用:这种类型的选举都具有全民公决的性质,他不愿为此捧场。尤其因为这种选举不会给左翼候选人任何机会获得相称数目的选票。另外,鉴于莱昂·布吕姆的经历,他担心他参选会引起反犹太主义的复苏。同共产党人结盟之事还没有提及,如果他参选,也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的。左翼再次出现无候选人的情况。因此,我决定参战。

在孟戴斯-弗朗斯之后,我又征求了尼埃尔·梅耶、加斯东·德菲尔、莫里斯·富尔和居伊·摩勒的意见。孟戴斯-弗朗斯胸有成

竹地接待了我——既慷慨而又严厉。他问我对共产党人作何打算。我回答他说,他们积极参与战斗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没有力量把自己的条件强加给我们。瓦德克·罗歇表现出某种和解的精神。一些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自他就任总书记以来,已尝试做出无可争议的努力,以澄清共产党的立场并使之现代化。我认识瓦德克·罗歇,我欣赏他的性格、他那慢条斯理的争论方式和明显的勃艮第人口音——在尼埃弗尔,我对这种口音很熟悉。我同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告诉我,他是在父亲教育下参加共产党的。他父亲是老派的共和主义者(他儿子的名字就是据此而给定的),但后来被所读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伟大理论家的著作征服了。他是在基隆苏萨奥内市场上将要出售的大车上阅读这些书的。罗歇为布拉格事件感到痛心,并因为曾相信莫斯科的许诺而感到自己对杜布切克下台负有个人责任。他对此一直感到惭愧。我认为他是真正地、真诚地同情非斯大林化的第一位法共负责人。他不无焦虑地看着总统选举的到来,一方面害怕他的党获得的成绩太令人失望,另一方面又担心失去重振本党活力的机会。我们在圣路易岛上罗朗·迪马家中,在朱尔·博尔盖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了两三次会谈。我们知道这位律师是赞成我们的行动的。瓦德克·罗歇并不掩盖他倾向左翼单一候选人的主张,而这也正是我的主张。

由于他的支持,我试图争取孟戴斯—弗朗斯赞成这一主张,并派罗朗·迪马和克洛德·埃斯蒂埃轮番去做工作。一切都枉然。孟戴斯—弗朗斯还是持保留态度,认为我们将成为那些强者手中的玩具,认为在以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为标志的共产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本质上存在如此大的差别,如果把左翼放到一条船上去冒险,那等于把它引入歧途。孟戴斯—弗朗斯之所以这样说,

是表达了一种坚定的信念,但人们也感到在他身上存在某种被伤害的东西。他仍未摆脱 1954 年的记忆,像他那一代人那样作出自己的反应,因为他们对人民阵线时期多列士的侮辱性攻击记忆犹新。他也可能认为我有领导左翼同戴高乐作斗争的野心,这相当符合人们加到我身上的想法,从而使我的行动变得可疑。面对我的决心,他祝我好运,但只答应在其业已觉悟到的事情上与我合作:为左翼而奋斗,但不去助长因共产党参与而产生的混乱。

我并未因此退让。我们在这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没有缓和。当他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谴责左翼的共同纲领时,我们的分歧加剧了。实质上,他从未相信在以左翼联盟为标志的力量较量中,共产主义会“高抬贵手”,而让我所领导的小党得利。他低估了我认为是不可抗拒的、人民运动的活力,而把自己禁锢在政治斗争的传统框架里,只看到共产党在人数和纪律方面的优势和社会党的某种没落趋势——这一趋势始于 1936 年,然后由于 1945 年起实行的“第三势力”型的联盟而进一步加速了。

反之,我确信,力量对比是可以颠倒过来的。共产党刚缓过气来,身上还带有斯大林主义的烙印,它在法国没有任何取胜的机会。如果由共产党来控制,左翼将失去意义,并将丧失民心,对此,瓦德克·罗歇有感觉,而且很明白。但他已经走得太远,内部矛盾重重,在总统选举前,已来不及改换航向。这是我们的机遇。为缺乏活力的左翼注入生机,使它摆脱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那没完没了的争吵,这是我们应做的工作。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只有聋子才听不到它前进的声音。

我感到时间紧迫,因为经过阿拉贡定稿的、具有他的风格和思想的尚比尼宣言表明,共产党人已开始快速前进了,左翼在等待一

种新的语言。它将迎着用新语言与它对话的人走去。我有这种雄心,我觉得自己有办法实现这一雄心,有办法恢复社会主义的特性,恢复被列宁主义的胜利所打破的团结,重新使社会主义的潮流朝着它天然的方向奔流:在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基础上建立起自由的至高的地位。但这一切都应通过同共产党的结盟来实现,而这个共产党是强大的、封闭的,背靠世界上两个帝国之一,决心顽强地捍卫自己的立场。

我的党好像是发疯了。如果人们用比政治多棱镜看得更远的眼光来分析的话,情况并非如此。人们总是说我策略考虑太多。我承认我不能离开那些我认为是达到预想目标的最可靠的方法。但目的本身尚待确定。那个伟大的思想运动导致了社会主义的产生,后来又使它分裂、割裂、撕裂,其中一些首要的、基本的主题则始终代表着希望,动员了被剥削阶级的意志。这些希望和意志曾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充公”,而后者自己又被斯大林的专政所歪曲了,这难道不也是放弃了自己使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错误吗?是否可以肯定对于那些已经重新找到人民信任之路的人来说,赌局已经输定了呢?

同孟戴斯—弗朗斯的这种对话没完没了,最好的办法还是各人凭自己的直觉行动。我们就这样做了。但从未断绝那种别扭但却有益的联系——同他这位深思熟虑的、极好争论的,却总是诚实无欺的人的每一次谈话都包含着这种联系。尤其因为,我们在总统选举问题上的分歧只涉及我们关系中的一个特定方面。我几年以前之所以追随他,主要就是因为他这种智力和道德上的严格性。这种严格性加上他的政治胸怀,造就了他同戴高乐一样,成为当时无与伦比的历史人物。我们对殖民地形势演变及处理方式的分析

是相同的：既必须碰一碰法国人的社会，也要了解我们在占统治地位的因循守旧思想面前，办法是有限的。

直到那时，我同他的实质分歧只有一个——这是我的猜测，因为我们双方从未确切谈过，那就是欧洲建设问题。我总觉得他对欧洲建设不放心，纳税的欧洲人让他怀疑。当1954年8月19日，他去布鲁塞尔对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草案进行辩论时，政府分成两派。其中某些成员，大部分是戴高乐派，激烈反对。另一些人从一开始就站在莫内和舒曼一边，要求法国加入条约。各方都发出威胁：如其意见不被采纳就辞职。我的立场较有分寸。如果拒绝欧洲防务共同体，就会冒推倒这座刚建立起来的如此脆弱的欧洲大厦的风险。接受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话，那是违背常理的。在还没有一个政治权力机关严肃的雏形之前就建设“将军们的欧洲”，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就会给各国参谋部留下太多的自由行动的余地，他们便可以通过唯有他们才能判断的“军事需要”，来决定欧洲以及欧洲各国的命运。而当你用多数指称参谋部时，那不过是一种想象。因为这个防务共同体实际上只是听从五角大楼支配的一个辅助机构而已，也就是说听从美国人支配的机构而已。我没有忘记，在皮杜尔的要求下，福斯特·杜勒斯竟然曾设想要在越南使用原子弹。我想象不出欧洲达到被殖民化的地步，但我害怕那在我看来是我们同时代人的伟大雄心的实体与灵魂被摧毁。然而，我又不能投入欧洲反对派的阵营。我承认，孟戴斯-弗朗斯关于政府辩论的决定让我松了一口气。但是，我并未因此而更多地了解他的真实想法。他的直接顾问们几乎都不掩盖他们坚决反对加入的态度；但由于他们像我一样对总理的意图把握不准，所以当他出发去比利时时，大家脸上都露出将要发生灾难的表情。

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个夜晚简直是个守灵之夜。孟戴斯-弗朗斯在布鲁塞尔受到了冷遇。保守党和基督教民主人士在巴黎对他的仇恨扩散到了布鲁塞尔。保尔-亨利·斯巴克粗鲁地接见了。孟戴斯-弗朗斯不是那种能容忍这种态度的人。谈判失败了。回到巴黎时,陪同他的小班子显出幸运的样子。我无法分享这种乐观情绪,但我也并不抱怨这次失败,因为它维护了未来。政府弃权了。欧洲防务共同体被国民议会否决了。另一段历史开始了。我不在此地详谈这段历史,但只想指出,孟戴斯-弗朗斯的欧洲政策对我来说始终是无法解释的领域,尽管法德和解的第一幅蓝图已在孟戴斯-弗朗斯同阿登纳的多次会谈中开始形成了。我在巴黎参加了他们的首次会谈,我很为他抱不平,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此事归功于戴高乐。我还要补充说,在那些不是试图摧毁我就是打击我的论战中,我总是看到他站在我一边。

我对他在国民议会就泄密事件为我作证一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此,我前面已谈了很多。我不相信我曾有机会向他讲过蒂希埃-维尼昂古在审理该案时对我提出的令人惊奇的建议。我们当时在司法部。蒂希埃-维尼昂古是迪德的辩护律师。他走来走去,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一直走到了军事法庭庭长尼沃德维尔达里的办公室。在休庭时,庭长请我去他办公室等候重新开庭。这时蒂希埃走了进来,以保护人的友好姿态向我们致敬,毫不客气地跨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尼沃德维尔达里大概认为是自然的,所以没有做任何表示。蒂希埃用他的男低音对我说:“掌玺先生(我当时是司法部长),我们丝毫不反对您。但请您就孟戴斯-弗朗斯说一句话,国民就会把您举起来欢呼胜利了。”我为庭长的默许感到惊奇,并回答律师说,我认为谈话到此结束了。他带着嘲笑的神情

离去了,我也悄悄地走了。孟戴斯-弗朗斯和我,特别是他,被那些先生们视作危险人物。他们嘴上只挂着“国民”二字,尤其是在和平时期,当这个词儿不代表任何危险时,更是如此。当被指定为总理后,孟戴斯-弗朗斯就成了一切最恶劣的攻击的目标,他不仅应该下台,而且还要不体面地下台。人们提到要在他外出参加晚宴时下手。“对这半个卖国贼,6枚子弹就够了。”在此情况下,如同在任何其他情况下,我得以赞赏这位与众不同的人物那令人惊奇的刚强性格。他在印度支那谈判和安抚突尼斯的工作中的处事方式始终是这方面的典范。但他受到了多少谩骂,多少不公正的待遇啊!

我现在还在想,这位天生就是统治者的人,历史给予的时间太少了:同布鲁姆合作了几个月。同戴高乐一起工作了几个月。在1954年人所共知的困难条件下的经历。同摩勒相处了几周。然后就是长期的等待,并以失望告终。1981年我是有机会起用他的,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太多的矛盾阻止我这样做:他反对共产党部长入阁,反对共同纲领,反对莫鲁瓦班子的构成。鉴于他的能力,鉴于他的判断在我心中引起的共鸣,鉴于我在道义上欠他的债,我真为他感到惋惜。诚然,他当时已处于一种极端疲惫的状态,不多久就去世了。但主要是他性格的崇高和奇特妨碍了他适时作出反应。太多的异议和疑问涌进他的脑海。在他看来,仿佛事变并非自然发生的事情,就像那骑手不得不去降服的烈马那样。孟戴斯-弗朗斯喜欢行动吗?他在印度支那已证明了这一点。他喜欢行动达到了把它作为自己生命线的程度吗?我怀疑。他那使几代人受益的思考能力所赋予他的巨大荣誉应该说更符合他的口味。没有其他任何一位政治负责人对几代年轻人拥有如此强大的

驱动力。

问：在 1959 年，您是如此地孤立，以至于在反对戴高乐派的左翼中也有人反对您。有人说人家拒绝您加入自治社会党……

答：我是被打上了印第安人记号的人：我当部长的时间与次数都超出了惯例。这是不可原谅的，尤其在自治社会党这样的小党内更是如此。确实，自治社会党没给我好脸看，而我也未坚持。我做梦也想着联合，这些左翼小党却只想着相互争吵和排斥。在自治社会党内部或其周围，各种各样被排除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之外，或从 1958 年起因摩勒归顺戴高乐而离开该党的人在转来转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重新开始往来了。我们制定了一些计划，事情没有进一步发展。只是在执政的或即将执政的社会党有几个职位要分配时，我才重新见到他们。

问：在那个时期，戴高乐对您怀有特别的仇恨吗？

答：我不知道。我同他没有关系。在 1959 年天文台事件时，他表现得爱报复。

问：那次天文台事件标志着您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有人组织了一场针对您的名副其实的宣传运动。这件事持续时间长吗？

答：直至 1965 年。是的，……长达五六年时间，在我所去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着令人不愉快的标志。我记得甚至在 1965 年，当我同戴高乐竞选总统时，针对我的司法预审仍在继续进行。戴高乐在这一事件上的行事方式几乎是残忍的：当由于缺乏证据，案子就要结案时，他却要求法官们重开诉讼。事情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年。

问：作为前内政部长，然后是掌玺部长，您可能掌握着米歇尔·

德勃雷总理与某些反对第四共和国的阴谋有牵连的证据。这一事实是否能说明戴高乐这种顽强精神呢？

答：在第四共和国全过程中，德勃雷始终站在第一线。他通过他的小报《愤怒先驱报》定调子，一种极其辛辣的调子。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可以利用的。在将军们兵变后被判刑的阿尔及利亚军官们知道的比我多。当他们看到正是他们以前的启示者把他们投进监狱时，我想象得出他们会何等惊愕。

1957年，在由柯瓦克医生和几名阿尔及利亚的极端分子策划的、针对萨兰将军的暗杀事件后——实际上只杀死了其副官罗迪埃少校，我担任了掌玺部长。司法部已获悉，米歇尔·德勃雷同因这次恐怖行动而被捕的组织者们并非无关。他听到了风声，通过其在国务委员会中的同事、我的办公室主任皮埃尔·尼科拉伊要求见我。那是一个奇特的时刻。米歇尔·德勃雷以为他即将被追究，因而一边哀求，一边辩解。我只是回答说，他不必担心会有任何专断的行动，如果他是无辜的话，他将拥有法律赋予他的一切手段来证明这一点。数年后，在天文台事件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当我听到当时的总理米歇尔·德勃雷对我控告时，我不能说我对此感到意外。我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数日后，我在参议院详细讲述了1957年的那个场面。我感到自己摆脱了任何的礼仪约束，用下面的话指责他：“昨天的反对派曾毫不犹豫地要求法律保障——他获得了这种保障，有什么比这更正常的呢！那位当时在我们的房间里神经质地走来走去的人，当他认为自己的权利有危险时，毫不犹豫地要求政府保护，政府保护了他。那个人就是现在的总理，就是米歇尔·德勃雷！女士们和先生们，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人们无权去做的，那就是玩弄或听任别人玩弄一位政敌的名誉，试图通过制

造莫须有的罪名来使反对派丧失竞争的资格。”

问：事实上，右翼从未停止过对您的仇恨，而且是非常强烈的仇恨。依您看，这是为什么呢？

答：右翼所保卫的利益是如此强大，以至它可以毫不犹疑地消灭那些挡住其去路或妨碍其事业进展的人。第四共和国时期殖民地院外集团强大之时，以及归顺过维希政府的资产阶级又归顺戴高乐主义之时，情况都是这样。要是那不识相的人来自他们自己内部，这仇恨就更大了。

在某种形式上，他们对原来就同他们对立的人不那么激烈。当然，他们对共产党的工人领袖如多列士或马歇的敌视是强烈的；他们对温和的左翼领袖们如勃鲁姆或孟戴斯 - 弗朗斯也表现出少见的激烈态度，但没有对我的那种仇恨。对这个右翼资产阶级来说，一名工人当共产党员，一名职员当社会党人，那几乎是正常的；但要是他们阶级中的一员脱离了本阶级，那就是不可饶恕的了。

问：在您第二个七年总统任期结束之时，特别是在皮埃尔·贝雷戈瓦自杀后，右翼是否以同样的仇恨来同您作斗争呢？

答：有几名不讲原则的记者曾试图要我对可怜的皮埃尔·贝雷戈瓦之死承担责任。在这场赌局中，新闻媒介、第二左翼和右翼有着共同的利益，首要的是，贝雷戈瓦不让人觉得是他们自己开展的运动的牺牲品。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试图进行恐吓。他们利用了所谓的同行互助。他们进行威胁。当人们参照其他的宣传运动，例如打倒萨朗格罗的运动时，他们就感到愤慨。然而，这是同一码事。这是同一类型的直接谋杀。

实质上，什么也没有改变。用暗杀、车祸、投毒、关押来消灭异己同当代某些宣传运动并无多大差别。在萨朗格罗或贝雷戈瓦的

案子里,人们只能说是谋杀。要是这些牺牲品不自杀时,人们可以找到别的方法把他们消灭。人们创造了不是从肉体上而是从政治上消灭对手的方法,通过一件案子、一个有组织的圈套、泄密、巧妙地进行的宣传运动来加以消灭。皮埃尔·贝雷戈瓦无法忍受了,因为他在精神上受到帕特里斯·佩拉借给他的100万法郎的困扰。请想一想,当时贝雷戈瓦刚辞去财政部长职务。他没有什么钱为自己买一套公寓套间。他用最正当的方式借了100万,而且由他的公证人记录在案。然而,当时我们正在选举运动中,他不能进入任何一个大厅,否则就会听到尽是100万、100万的叫喊声。全国新闻界轮番攻击,不断扩大。每个星期三,国民议会会议都以辩论此事开场,他精神极端痛苦,进而无法摆脱。他老说此事,不说别的。任何友好的话语都无法使他笑脸重开。一个星期五的晚上,米歇尔·夏拉斯对我说:“我担心皮埃尔·贝雷戈瓦会自杀。”我马上打电话去内维尔,约定下星期一同他见面。但星期六晚上,皮埃尔·贝雷戈瓦向头上开了一枪。当然,罪犯不受惩罚的时代已成过去。但无论如何这是杀人,直接也好,间接也好。这总是杀死对手。这是历史的常数。

问:在《永在的政变》一书中,您把戴高乐说成是“独裁者”,您把1958年5月13日比作一场军事政变。今天,您还坚持这一分析吗?

答:我一直认为那是一场军事政变,但当他离职时,戴高乐已站到民主这一边,他因此改写了自己的历史。至于从《永在的政变》一书中所引用的话,它并没有说出人们要它说的话。但我承认,提问的方式已包含了刺激政变者的内容。我写道:“戴高乐何许人也?是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语、英语和法语中的领路人吗?”

提这些问题有什么用呢？连宪法学专家们也不知所措，只好按习惯求助于我的定义游戏了。我之所以把戴高乐政权称之为独裁，那是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它同独裁最相像，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朝着个人权力膨胀的方向发展，已由不得他来改变航向。”我之所以在1964年写这本书，那是因为我感到一切都是伪造的，都是弄虚作假。人们谈论共和国，谈论宪法的权力，但事实上，戴高乐却全权独揽——那是自贝当以来从未有过的，那是一个徒有其表的共和国。在头几年里，戴高乐很明智地把握着这种事态。

问：然而，您曾抨击1958年5月13日，把它比作那位原被称作拿破仑三世者的12月2日政变！

答：把一次政变同另一次政变相比，这没什么让人感到惊奇的！但戴高乐的军人已不需要去圣克卢了。把戏事先已经耍过了，也不需要再来个吕西安·波拿巴了。只要勒特罗盖用尺子在书桌上敲几下就足够了。要是你看到那几天国民议会的情况就好了！我曾讲过那位洛省议员的故事，他在投票时用演戏的腔调哀求我：“起码您别退让。”而他自己手中却已拿着一张弃权票了。

问：1851年12月2日和1958年5月13日不会是同一性质的事，但却同属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关头。共和国从1789年特别是从19世纪末被所有人承认以来，为什么在法国还不是一种不容争议的政体呢？为什么不是一条水流平静的长河呢？

答：并非共和国，而是整个人类充满了矛盾以及相互对立的权力欲。文明接近于野蛮。其间没有鸿沟。当然，野蛮从来就不是命定的，人可以进化、学习、自我培养、培训他人……。这个共和国经常受到威胁：1851年12月2日，1894年德雷菲斯事件时期，1934年2月6日，1940年，1958年，以后可能还会受到威胁。但她也可

能因此而变得强大。受到威胁或变得强大,两种说法都是真实的,明天的一切取决于其领导人的智慧与坚定。他们应该保持警惕,因为任何事情都不会一劳永逸,永远不会!

问:《永在的政变》这本书当时的反应如何?

答:受到了封锁。包括左翼。因为他们不喜欢我攻击戴高乐派,更不喜欢我的左翼联盟战略。

问:如今,您对这本书会有所增删吗?

答:这本书已写就30多年,我一行字也不会删去。可能还得加上几章,讲后来发生的事情。例如:加一章关于法官的权力、关于新的司法权……还应谈谈这个新的权力,这个由视听传媒变成的自在的权力,而不仅仅是金钱的权力。从那里可能产生反民主的偏向。请你设想一下,那样一位总统:他拥有制度赋予他的政治权力,外加大众传媒的拥护。我从未得到过媒体的好处,但我可以想象得出!这可能使这位总统拥有过度的实际权力,而使民主失去保障。

问:您曾说过,“第五共和国的体制在我之前是危险的,在我之后也将是危险的。”除字面外,您想说明什么呢?

答:我要说的是某种不平衡。在第五共和国的体制中,议会被置于次要地位。但当它有朝一日发怒时,诱惑人们重返第四共和国混乱状态的欲望将是巨大的。

问:1971年,关于戴高乐您曾写道:“他的存在比他的作为更重要。”您想借此说明什么呢?

答:就像一切简约的判断那样,那句话包含着不公正的成分。戴高乐在行动上也是伟大的。

在很多方面,他是保守派,十足的保守派。例如,那个出名的

“参与”只是个圈套而已！在自由方面，戴高乐第五共和国的特点是专制：没收报刊，书刊检查事件，警察的压力。在国际方面，在我看来，戴高乐没有抓住当代世界的演变和法国的利益，尽管人们为使他适应时代而给他说了许多话，他始终敌视欧洲建设。

问：戴高乐是反对欧洲呢，还是更确切地说反对欧洲联邦？

答：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用卢森堡妥协和人们所称的民族利益至上粉碎了“欧洲冲动”，而所谓民族利益实际上是那些为其土豆和谷物担忧的国家所确定的。总之，他反对我们关于统一的、联邦制或非联邦制的欧洲的设想。那个著名的富歇计划恢复了欧洲各国的传统作用。19世纪新经验未起任何作用。话虽这么说，但我承认，某种亲欧洲的宗派主义过于藐视历史，而对民族国家的谴责包含着某种不现实、轻率偏执的东西。

亲欧派或是反欧派，人们从中再次看到了国内抗战同国外抗战之间历史对立的痕迹。因为欧洲思想在国内抵抗战士中广泛存在，它指导了許多人——特别是基督教民主党人——去思考，去梦想。无论如何，从这方面来看，戴高乐也同我所想象的19世纪的人物相像。

问：那么，您将从戴高乐主义中留下些什么呢？

答：事物的本性和历史的判决引导我将其中某些东西作为法国获得的宝贵经验加以保留。他在战争中的作用，他关于“并非一切都已失去”的思想，6月18日及其结果已属于历史。他在外交、军事和核方面的先见之明……。第五共和国的体制——不管人们赞成与否，从而一个新政体的建立。所有这些都是重大的行动。

问：人们把非殖民化记到了戴高乐主义的账上，然而实际上，除了阿尔及利亚外，非殖民化是由第四共和国准备和实行的。依

您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历史的疏忽呢?

答:因为第四共和国不善于做总结,而让戴高乐代它做了。

问:您认为戴高乐主义运动今天还有持久性吗?

答:那是一种幻想,那是一种口头胜于真实的传统。很久以前,自1969年乔治·蓬皮杜当选共和国总统以来,戴高乐主义的使命就不再存在了。

问:阿兰·迪亚马尔说:“戴高乐是法兰西,密特朗是共和国。”您从这一说法中得到何种启示呢?

答: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戴高乐在1940年就已成了法兰西历史的化身。人们能把我说成是共和国的化身,我对此感到非常荣幸。

问:您对戴高乐主义的变态性反对是否也基于他把法兰西占为己有的作派?事实上,您一直反对那些自誉为“国民”的人,此外也有戴高乐主义的波拿巴一面,即所谓“不右不左”派。

答:戴高乐主义显然是右派,只是加了点大众化的作料。波拿巴主义者吗?我说他是民粹主义者。人民总是在其历史的伟大时刻不认识自己的。

问:人们指责您执政后忘掉了您在《永在的政变》一书中对1958年宪法的批评。

答:这是恶意攻击的典型。当我听到有人把我的总统任期同戴高乐相比时,我真想建议他们去读读那本书以及书中所揭露的事实。不是我把反对派、不满分子以及那些因写了或让别人写了使我不高兴的东西的报刊社长投入监牢的!不是我成倍成倍地增加特别法庭、专门法院和其他治安法院!不是我对体制和宪法滥加解释!在所有各点上,我施政实践都与他的做法大相径庭。

戴高乐派的法制对我并无太多的妨碍。与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相反,我确信,真正的问题是实施问题,因为这些法规的优点是很灵活。对于各种机构,我为它们解除束缚。我改变了习俗——比宪法专家们说的或比政治家们想的要多得多。在法国存在某种关于法制机构的神话,即各机构可以“阻塞”司法机关对本机构的裁决,实际上,那些被人们像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称之为习惯法的东西远比人们想象的厉害,甚至在拉丁语系国家也如此。但如说我改变了法制的实施的话,我却未能改变其文字,因为未获相应的议会多数,参议院中保守派多数实在太强大了。

问:作为戴高乐的传统敌人,参议院真的反对改变第五共和国的体制吗?

答:我尝试过,但没有成功,政治工作人员并不为司法的一丝不苟所束缚。戴高乐的宪法并不受欢迎。我的改革计划亦如此。

问:1965年,您不顾孟戴斯-弗朗斯的反对,同共产党人结盟,参加了总统竞选,并使戴高乐在第一轮投票中未获过半数票。当时还有其他一些大人物候选,您怎样就成了左翼的唯一候选人呢?

答:1965年,左翼中谁也不愿上阵,尤其是孟戴斯-弗朗斯,他本来是最有资格的。人们对我的候选资格没有信心,我自己也半信半疑。如果有民意测验的话,结果将是悲观的。至于对左翼候选人能否进入第二轮,也即戴高乐在第一轮中拿不到过半数票,谁也不抱幻想。

在宁静的朗德省度暑假时,我有时间反复思考。1965年9月初我作出了决定,我立即开始接二连三地拜访那些不可逾越的人物:对一些人出于须有的礼貌,对另一些人是出于友谊,对最后

一些人是出于需要。

我曾给你讲过8月2日我去拜访孟戴斯-弗朗斯的情况以及他如何向我保证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谋取候选人资格。

9月8日一早,我前往加斯东·德菲尔的寓所——让-雅克·塞尔旺-斯克雷贝尔称他为神秘的“X先生”。他已不得不撤回自己的候选人资格,因为有他参与起草的一项政治总决议中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而遭到基督教民主党的反对。居伊·摩勒只等这一消息以便撤回对他的支持。加斯东·德菲尔对我说,只要我不同共产党人结盟,他将帮助我。对此,我回答说:“我不能作出这一承诺,因为我正力求联合所有的左翼势力,包括政治方面和工作方面的力量。”德菲尔思考片刻后说,他将尽力同我站在一起。

我并非不知道统一社会党对我参选感到担心,它坚持要达尼埃尔·梅耶出马。但梅耶对摩勒的态度不抱幻想,他本人也并不真愿去冒险,他非常亲切地接见了,明确表示,他当候选人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你是候选人的话,你要知道,我是不愿成为候选人的”),并保证赞助我作为左翼的单一候选人。我是在战争结束时认识他的。我从未看到他背弃过他那坚强而正直的性格。我没有理由怀疑他说的话。我们相互信任地分手了。第二天,9月9日,我再次会见莫里斯·富尔,他一如既往,忠实而善良。他没有听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那些“美人鱼”的诱惑之声——他们只为他一人独唱。他眉开眼笑地向我宣布,他当天上午就要去希腊呆半个月。他补充说:“我不愿参加竞选,我这里有去雅典的机票。我去那儿度半个月的假。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

剩下的就是去对付居伊·摩勒了。

我离开莫里斯·富尔后,当天就去了马勒斯埃尔布区,工人国

际法国支部的首领正在那儿等我。他坐在办公室里他母亲和莱昂·勃鲁姆的肖像下面。我毫不犹豫地展开攻势：“情况就是这样。既然没有候选人，那么，我就决定当候选人。”居伊·摩勒眼睛瞪着我，惊愕异常：“好，非常好……。不管怎么说，这是可以研究的，但你得给我留点时间召集党的领导机关开会啊。”我反驳说：“我想这难以办到，因为我打算很快就对外宣布。”他显得更加震惊了，问我：“啊，是这样吗？什么时候？”“今天上午。”这就引来了他对我的警告：“你是疯了，你不该去冒这样的险！同共产党人的协议还远未达成。而且你也知道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对同共产党人的任何协议都是有保留的。”

我就这样离开了他，到蒙帕纳斯的棒槌饭馆去午餐，那个时期让-保尔·萨特是这里的常客。我在那里遇到了五六个朋友，其中有乔治·博尚和罗朗·迪马。我向他们宣布了我的决定。我补充说，我们将在戴高乐的记者招待会的同时发表一项公告，目的是让这一消息在某种意义上仿佛是由戴高乐本人宣布似的。

在吃饭时，我在饭馆的纸桌布上起草了我的声明稿。先横着写，又加以涂改，并撕去边缘，最后委托保尔·博尔迪埃带到法新社去。此人是一位前海外省省长，同我一样是夏朗特省人，又是我在乌迪诺路的助手之一。我的一位同志还保留着这个声明的原件。我在声明中写道：“对我来说，主要的问题是要反对个人权力的专制，反对民族沙文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代之以尊重法律和自由、抓住欧洲建设全部机遇的意志，以及通过实施一项民主计划来协调经济扩张的能动性。”就这样，我正式成了总统候选人。

我的声明如预定的那样正好在 1965 年 9 月 9 日戴高乐记者招待会的高潮时发表了。它在政界引起了轰动。反之，在新闻界

却震动不大。《世界报》只用带边框、占两栏的小地方刊登了这个声明。第一栏关于我的候选人资格,另一栏与前一栏同样长短,报道了统一社会党的反对意见。

大行动便由此开始了。共产党人将不提自己的候选人来反对我。但我知道,这已足以供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作为退出竞选的口实了。

于是,我决定于9月21日在吕泰西亚旅馆举行记者招待会,邀请了记者、社会党和激进党等左翼主要领导人以及共产党人,其中有瓦德克·罗歇。我正准备登上临时搭就的讲台——有点像小戏院中带后台幕布的小舞台——这时,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副书记克洛德·菲兹埃抓住我的手臂并对我说:“我有一个紧急口信要转告你。目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还不能支持你,因为你不该说你希望同共产党联合。”我表示异议:“但这正是我行动的基础呵!”他说:“听着,我告诉你,是居伊·摩勒派我来的。”我说:“我将做我已决定做的事。”我甩掉了他,登上了讲台,坐在我的小桌子旁,念起我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刚念完,马上有人把博盖的一张小纸条递给了我。我不知道他是怎样获悉那最后一刻的阴谋的,他写道:“你做得好。”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竞选活动。

居伊·摩勒的反应不等自来。数日后,我在戛纳出席了欧洲运动非常代表会议,为欧洲建设事业辩护,此事不会让共产党人感到高兴。就在那里,在大厅出口处,我被一大群记者围住,他们问我是否读过最近出版的《巴黎新闻》。原来,该报于1965年10月2日刊登了居伊·摩勒给皮埃尔·夏皮的长篇答记者问,以头版头条开始,下转最后一页整版。摩勒在其中特别声明:“我们现在不推密特朗了。我们曾决定支持他。现在确切的是,我希望比内先生

出任候选人。因为只有他才能在自由民主派家族中获得最多的选票。”

我回到巴黎,随后就去看望居伊·摩勒。在他办公桌上摊着上述答记者问的稿子,上面画了很多红道道。他对我说了一些含糊不清的话:“但是,我没有说得这么明确嘛。你知道,记者们是些什么东西。”

考虑到我再也不可能从居伊·摩勒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于是我就另想办法了。我让我兄弟罗伯特请比内吃中饭,而我则前往同他们一起喝咖啡。我对安托万·比内略有所知,因为1948年我们曾在克伊政府中共过事。我对他说,他第一轮就可能被淘汰:“这只能损害您的声誉和威望。”他回答说:“我不这样认为,我同摩勒、阿贝伦、阿尔迪伊和其他人谈过,他们都向我保证投票支持我,以便我能进入第二轮同戴高乐较量。”“不。是我将位居第二,而且得票权足以使我在第二轮中面对戴高乐!您没有现实的基础,只有参谋部人员支持您……。自然喽。您完全有权自由参选,但我也将参选,很遗憾,我将把您远远抛在后面,因为我有左翼的选票。”我不知道是否这次谈话使他头脑清醒了,反正安托万·比内不久之后表示他不参加竞选。竞选运动开始了。

问:当竞选运动开始时,您是否真的认为您能进入第二轮,单独对付戴高乐呢?

答:不。我没想到第一轮中竟无一人得票超过半数,而且那个时候谁也无法想象这一点。但若一旦出现第二轮,我想很可能是有我在里面,为此,我必须进行难以想象的马拉松障碍赛,而部分障碍正是来自左翼:摩勒障碍、比内障碍、盛怒中的统一社会党障碍。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米歇尔·罗卡尔发明了一种颇为别

致的战术：统一社会党号召投我的票，但其成员却保证“不参加投票”。在知识分子中间，或是自己或让别人写些怒气冲天的文章。对他们来说，所有的人，除我以外，都属左翼……。《观察家报》想要在我宣布参选后的一期中对我的候选人资格加以评论。当时在这家周刊当记者的克洛德·埃斯蒂埃了解到该期的封面标题拟用：“密特朗吗？永不可能！”主意出自吉尔·马蒂内，他对我从未客气过。

最后经过数小时的讨论，克洛德·埃斯蒂埃终于说服了编辑班子，采用更为简明的题目：“密特朗？为什么？”

问：本世纪这第一次总统竞选运动像什么样子呢？

答：我们只在卢佛路 25 号有一个套间，五个办公室，四部电话，有 15 位朋友同我在一起。我们的全部预算不足 100 万法郎。这并未妨碍我们组织一场漂亮的竞选运动。

头几次开会时，谁也不上台站在我身边支持我，各党派都在旁观。当时，我什么都亲自动手！自己宣布开会，作自我介绍，发表演说，组织讨论，然后离开会场。但在 10 天后，大家都争着上讲台了。

问：在您与戴高乐在阿尔及尔会晤 22 年后，您在第一次总统竞选中就使戴高乐在第一轮投票中未获过半数票。您知道他对此有何想法吗？

答：他没有对我讲过悄悄话！因此，我只知道若干记者和作家说过的东西。从这些证词可知，他感到意外、愤怒和伤心。他更不高兴我成为他在第二轮投票中的对手。这一挫折成了对他的一种考验，他似乎泄气到了想退出政治生活的地步，就像他在 1946 年做过的那样，他可能犹豫了一阵以便决定是否把这次竞选较量进

行到底。

问：孟戴斯 - 弗朗斯对您的成功有何反应？

答：谁也不相信我的成功，特别是孟戴斯 - 弗朗斯，其理由我已对你谈过。一进入那场令人绝望的竞选运动，我马上当场懂得，发生了某种事情。竞选进行 10 天后，我确信事情玩得转。我记得举行第一次群众集会时，我有 6 个伙伴在一起，我们估计会有 500 人出席，结果来了 4000 人！在那时，可以说没有电视，而左翼报纸正如我对你说过的那样，并不支持我。事实上，让·勒卡努埃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从戴高乐那里拉走了一部分中间派选民的票。我以中间派候选人二倍的得票进入第二轮。因此，由我的得票纪录和戴高乐在第一轮中未获过半数票而造成的震动就更大了。

我还记得有一天——应该是第一轮投票当晚，即 12 月 5 日，已经确定我将同戴高乐对抗。我们聚集在共和派俱乐部里，时间肯定已经很晚，我们还在反复思考如何推进第二轮竞选运动。乔治·达扬陪伴着我。我们决定在黑沃利路他家开个会。孟戴斯 - 弗朗斯和他在《观察家报》中的朋友们，其中包括让·达尼埃尔，也赶来参加了。

我建议孟戴斯 - 弗朗斯在外省的某些集会上帮助我，在那些地方他的影响比谁都大。我记得，我们想到了阿尔萨斯、斯特拉斯堡。他原则上接受了，但事情一直未做，理由很简单，他没有找到时间！我再次去看他。他坐在扶手椅里，让·达尼埃尔在他身边。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厚厚的记事手册，左翻翻，右翻翻，检查了未来 15 天内的日程安排，先是预定日期之前，接着是预定日期之后，逐日逐晚地检查，结果很遗憾，运气不好！他连一点点时间都抽不

出来,在第二轮投票前去出席一次那样的集会,他也竟然如此。这个孟戴斯呵!

问:1968年,您突然丧失了1965年积累起来的对孟戴斯-弗朗斯的领先地位。有人说,您没有抓住五月事件的意义。

答:你老是从竞争的角度来看我同孟戴斯-弗朗斯的关系。这是不确切的。我们曾面对同样的事件。我们经常以同一种方式作出反应。可以肯定,孟戴斯-弗朗斯对1968年5月的造反青年有着强烈的共鸣。我却没有。他出席了夏莱蒂的大型集会,我则拒绝参加。我很难接受学生领袖们那种假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我在想他怎么能接受得了那种语言呢?我从来就不大喜欢大杂烩。这种语言使我寒毛直竖。我认为我理解,1968年5月是对社会、家长、老师盛气凌人的讲话的一种主要的精神反抗,而不是一种社会反抗。

还有,5月23日,当拉丁区的动乱正处高潮之时,孟戴斯-弗朗斯晚间来我家看我,夏尔·埃尔努陪着他。我们讨论了同学们站到一起,对他们反对警察镇压的斗争表示支持的时机问题。埃尔努坚持说:“应该去。”孟戴斯-弗朗斯有保留。他长篇大论,使我们相信这一举动为时尚早,我们的岗位、政治家的岗位不是在街上,学生们自己可能把我们理解错了。“回收”一词是致命的!最后,我们同意了他的意见。但第二天我从广播中得知孟戴斯-弗朗斯——头天晚上还如此持重——竟然去夏莱蒂出席了学生大集会。这怎么不使我惊得目瞪口呆呢!

问:您是否认为他当时背叛了您?

答:不认为。他没有背叛我,因为他没有对我作过承诺,我仍然认为,他这样做是犯了个政治错误。

问:那么,您如何解释当时左派分子对孟戴斯-弗朗斯的蛊惑和对您的厌恶呢?

答:孟戴斯-弗朗斯体现了道义的严正性。他解决印度支那事件的方式被视作处理许而不诺、悬而不决问题的典范。奠边府惨败曾被看作五雷轰顶,法国为此丧失了少许荣誉。左派分子当时同温和派人士一样憎恨共产党人。当然,他们自己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躲在毛派分子或托洛茨基分子的意识形态屏风后面,但他们自有其阶级的本能反应。1968年5月是年轻的天主教资产者向他们父母的伪善造反。这些天主教的资产者开始谈论马克思主义,但他们自己也不满意自己,还算幸运的是,他们没有染上意大利和德国同类集团的毛病:把犯罪同自由混为一谈。

当然,我并不否认,在1968年的造反者中有些真诚的人,他们反对当时社会的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令人钦佩的也有些具有忠诚、牺牲、忘我精神的人。但那些用自己的名字把这场“假革命”的意义“理论化”的人不在此列。

人们曾谈及这些人同我之间的“误会”。但这绝非误会,理由很简单:我只要听听他们讲话就足以分辨出他们来自何方,他们代表什么阶层,说到底,那是些公证人的胚子。在1945年我曾想象他们是戴圆框眼镜的饱学之士,而我所看到的却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

总之,各人有各人的分量。历史不是为那些自以为会与历史共存的人而创造的。

问:人们总是把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的名字列入统一社会党,他在这个党里舒心吗?

答:我不相信。他在该党内有一些真朋友,但却遭到许多人的

猜疑。统一社会党的人暗中指责他在经济方面的温和意见——在将近 1968 年时,他本人曾告诉我,他对他新朋友们的言行感到担心。然而,这并未妨碍“第二左翼”制服他,数年后又把他变成了注定成为我对立面的象征。这种“回收”在他去世前就已开始。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它竟来自那些过去从未宽容过他的人,来自那些从未为使他重掌政权做过任何事的人。

问:我们曾提到过孟戴斯-弗朗斯 1968 年的错误。但您本人于 1968 年 5 月 28 日,在总统并未缺位的情况下,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自己要做共和国总统候选人。这难道不是您所犯的而且付出了高昂代价的错误吗?

答:这段历史整个被讲反了,让我们回到当时的背景吧。1968 年 5 月 24 日,显然无能为力重建秩序的戴高乐将军宣布就“大学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革新”举行全民公决,他还要求在这次公民投票中获得大量的赞成票。我代表反对派讲话。我不能接受这种孤注一掷的做法。应对法国人说,共和国不管有无戴高乐都将照样运转。正是为此理由,我行使了参选的权利。我没有要求戴高乐将军下台,而是他自己以此作为筹码。请你读读第二天的报纸吧,你会看到一些政治负责人都同意我的意见,如比内、阿贝伦、勒卡努埃。我并未要求他们赞同。他们像我一样作出了反应。这是个尊严问题。至于公民投票本身,它很快就被遗忘了。蓬皮杜也竭力让国家元首相信最好用立法选举代替公民投票。

谁也不再记得五天前戴高乐所作的声明了,而我却背上了“弑君者”的黑锅。然而,正是老头子下的命令:“要是你不做我要你做的事,我就走人了。”

问:戴高乐派常常利用这件事攻击您。

答:是的,戴高乐派当时控制着法国广播电视台。有人声称电视台未能拍下我的记者招待会的实况。这是瞎说的。因为他们已经播放了一些经过粗暴剪接的片断。在这些片断中,他们用最让人反感的方式处理我的镜头:两臂高举,顶视拍摄,仿照墨索里尼的形象,胡子拉茬,我自己看了都吓了一跳。

问: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是否也谴责您的倡议呢?

答:不,我想他不会这样。在戴高乐5月24日声明后,他也发怒了:“全民公决,那是互相残杀。”我甚至在我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我希望同他一起组阁。我准备好听他指挥——因为他比我更得到青年人的拥护。而当时正需要对这些青年人作出回答。

问:在这样一对中,您将当总统,他将当总理,也就是说您的第二把手……

答:我未曾向他谈过我的倡议。本来我是应该告诉他的。我的倡议确实使他很为难。他是不是为此怨恨我呢?下一年,他却从加斯东·德菲尔手中接下了这个我曾交给他的角色。

问:然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当时正遇到严重困难……

答:是的。社会党人再次受到严重的内部纠纷的折磨。在议会方面,他们没有能够进行大舌战的能言善辩之才。简言之,一切都表现为1965年所产生的希望(暂时的)崩溃了。当阿伦·萨瓦里战胜德菲尔,当选为一个类似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兄弟的社会党的总书记时,他竟无法激起那种必要的冲力。他拥有当总书记的资格,他的人品和历史无可指摘,但他的热情已荡然无存。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之死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问:这个组织敌视您吗?

答:在有决定意义的埃皮内—苏—塞纳代表大会上,会议的政

治和物质组织都掌握在摩勒分子手中。他们对我至少可以说是不欣赏的。他们控制着一切。在辩论和投票期间,他们占据了大厅。从逻辑上说,他们不该输的。但最后,由于强大的北方联合会的支持,我以51%的票数当选。

问:左翼报刊——《世界报》和《新观察家报》——过去非常敌视您,现在还以某种方式继续敌视您,与此同时却在把孟戴斯—弗朗斯树为偶像……

答:对于你最后提到的名字,请你对自己的问题负责。请你去问问这些报刊吧。我不应做他们的化妆品!他们强烈敌视共产党也好,或像许多人那样,赞成与一个不存在的中派联盟也好,他们没有原谅我搞的左翼联盟,就这些了,请注意连续性。我要说的是:政治形势的固定性。自1978年立法选举失败以来,社会党所经历的历次危机除了相互竞争的野心外,根源都在于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同左翼结盟还是同中间派结盟。我作出了选择,我将继续走我的路。我认为,只要社会党对中间派表现软弱,就会导致它的失败;而当同中间派结盟的愿望似应占上风时,它就变得脆弱了。社会党永远不应忘记,它的战斗远远不是政治战场的战斗,而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一场反对社会势力的战斗,因为这些社会势力决定着政治战斗的条件。

问:能否说后埃皮内代表大会时代标志着您对敌视同共产党联合的“第二左翼”的胜利呢?

答:不能说这是个胜利。反正,我并未追求这个胜利。由罗卡尔率领的统一社会党的大部分人都加入了社会党,这些都要征得我的同意才有可能。我觉得这次归依是令人鼓舞、使人充实的。诚然,罗卡尔在南特代表大会上说的有道理,现实中存在着两种左

翼文化。我相信把两种文化结合起来是可能的。不幸的是,我得承认事实,这首先是一场权力斗争。这场斗争被人用战略术语表达了出来,因为这样显得更严肃,而且左翼欣赏这样做。1979年梅斯代表大会就此提供了说明。但不要搞错,全部结果——1981年的胜利,然后是1988年的胜利,都是靠了梅斯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而取得的。要是我的对手取得了胜利,左翼联盟破裂了,右翼就会依然执政。在那之前的时期,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左翼跟在中间派后面跑,而中间派根本不在它所想象的那个位置。中间派曾同波埃一起反对蓬皮杜,然后又同蓬皮杜一起反对左翼。从这不幸的经验中我们应该吸取的主要教训是:社会党人的战略,除扎根左翼和左翼联盟外,别无他途。如不承认这一点,那就不仅会丧失力量和身分,而且将无可救药地走向失败。

明天和昨天一样,我相信左翼将会取胜,条件是始终保持本色。它不应忘记,它的家庭是整个左翼。除了人民力量的大联合外,没有别的救星。过去从来没有,将来也永不会有胜利动力学。

自1965年以来,由于单纯的机械作用,社会党候选人在低潮时期能得票20%至23%,最好水平是25%。这是它的底线。不能再压低了,这也是自我领导这个党以来的最低线了。这样,左翼候选人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机械地计算,得票率应达到46%至48%。如因竞选运动搞得好好或因个人影响大,左翼候选人成功地把举棋不定者吸引进来的话,其得票就应更高。

当然,我还是头脑清醒的。意识到力量对比的状况,我过去说过,右翼在我国政治上占多数……事实上,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下,应当通过缔结上层之间的必要协议来拓宽自己的基础。但这一切只能在左翼的战略制定以后、原动力发动以后才能实行。因此,不

应改变航向:整个左翼在左翼的大联合!

卷二 1981年5月选举： 来自外国的反应

在法国历次重大选举中，很少有像1981年5月选举那样使各国政府如此沮丧与冷淡的。我本人赢得了那场选举。

大使们就这“意外事件”发回的电报证实并加强了我阅读所谓“消息灵通”报纸所留下的这一印象。无论在华盛顿、莫斯科、波恩、北京、伦敦、罗马或是在大马士革，这些报纸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人们到处忧心忡忡。因为任何地方都不希望变动。这里同那里一样，一旦既定秩序出了问题，正统派便马上结成了同盟。人们已习惯于一个守旧的法国，已学会辨认其领导人，已找到某些协调的基础——就像人们在外交界一向看到的那样，只要相互屈就一下就够了。而当局势发生逆转时，就得重新审查已经达成的妥协，就得停止装模作样，就得不再要人相信走音也是和谐，不再相信一切顺利、万事大吉。

一、华盛顿：担心共产党人进入政府

在这场转变中，美国人所起的作用是最合乎逻辑、最恰如预料的。他们怎么会有一位得到共产党人支持的左翼候选人获胜感到高兴呢？这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将进入一个西方主要盟国，尤其是西方军事合作体系成员国的政府吗？他们原以为三十四年前就已摆脱了这一心病，而现在却又突然冒了出来，且有可能“传染”给南欧。解散国民议会将导致新的立法选举。所有这一切都使人预感到，倘若我态度宽容，共产党就会重返睽违十五年之久的政府。这成了新闻界全部争论的主题。每当我会见记者，首先提出的就是这个问题：你会接受共产党人进入政府吗？

我本可用同共产党人所缔结的选举联盟和共同纲领来说服提问者，但我避不作答，以免让种种评论招摇过市，没完没了。只是6月26日在涅夫勒省大屠杀周年纪念活动上同记者们一次断断续续的交谈中，我才点出了一个并不那么明确的方向：“先让我赢得选举，然后你们再看。”事实上，获胜后我将作出的决定取决于所获胜利的大小。假如我不用共产党人的选票就获胜的话——后来的情况就是如此，因为社会党议员占了绝对多数——我将容纳该党的几名部长。否则，还得研究研究。另一方面，我不想让各方面的攻击集中到这一个把我的对手凝聚在一起的问题上。我情愿不说话，固守沉默。这自然只能加深人们的忧虑，尤其在外国，我并不为此感到惊奇，更不觉得愤慨。我只是通过我的话语和我的行动让美国人懂得：我是他们忠实的盟友，他们混淆了时代和局势，



图 5 密特朗与里根第二次会见(1981.10.18)

法国准备同美国达成许多谅解,但有一条除外,那就是法国不会屈从于一个盟国的政治和思想统制(这个盟国习惯于其合作伙伴对它顺从或讨好)。我补充说:“我决定了一项政策。我容纳那些接受这一政策的人。我不接受那些拒绝这一政策的人。共产党的目标不同于我的目标,这是显然的,但共产党的部长们进入政府不是为了执行他们党的政策。我要前进,我要创造历史。”

这就是我当时打算对罗纳德·里根匆匆派到我这里来“救灾”的乔治·布什所说的话。与此同时,国务院发表了一份公报,内称“作为盟国,法国和美国的关系或将因共产党人进入政府而受损”。当被问及此事时,我回答:“我未曾考虑过我的决定是否符合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希望或意愿,今后也不会考虑。”美国人的反应,那是他们的事;作什么决定,那是我的事。我继续说道:“我的信念是:法国的决定越是自主,法国将越受尊重。因此我在将来是不会更加‘谨慎小心’的。”法国是美国这个与我国相近的国家的“好盟国”,两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有着一些不受暂时事态支配的共同利益。美国人地理上离我们远,他们不了解我们的演变历史。“这一切,”我补充说,“都是一时的任性罢了。”

“另一方面,”一家通讯社报道说,“国家元首认为里根先生比人们所想象的要精明、坦率,而布什先生则极予人好感。”“美国,他解释道,可能担心某种形式的传染(如葡萄牙、意大利等等),我很理解他们,但我希望他们能像我理解他们那样同等地理解我。”“在那次交谈中,密特朗先生强调指出了美国的态度,并表示:有人写道:‘里根生气了。’后来呢?里根打喷嚏了。再后来呢?我不想马上把小手指捅破的裤子用针线缝了。”“对于他在7月20日、21日参加渥太华工业化国家首脑会议后可能在华盛顿中途停留的流

言,国家元首担保说:‘没有这回事。’”

美国新闻界的反应是官方精神状态的反映,悲观的调子占了支配地位。这是意料之中的。“新总统的经济纲领未指明今后的道路,而是让人想起过去的老路。”《华尔街日报》这样写道。如果它采取相反的立场那才是令人瞩目的呢。政治上略有差别的《华盛顿邮报》则有点夸大其辞:“激进的改革,国有化,对外国投资包括美国投资的某种敌视情绪,这一切将使对外货币的贸易关系解体。”最有听众的社论作者之一约瑟夫·克拉夫特(我同他保持真诚的关系,他曾说我是“忧郁的理想主义者”)指出,“美国由于吉斯卡尔的失败而失去了一位最亲美的法国领导人。”吉姆·霍格兰在《华盛顿邮报》引用了这一看法,并把它扩大到了世界其他地方:“连续三届美国总统都把吉斯卡尔·德斯坦视作最有能力、最有决心同美国一起致力于维护西方在第三世界利益的欧洲元首。随着吉斯卡尔的失败,那些强调巴勒斯坦自治必要性的欧洲人失去了一名领袖。勃列日涅夫失去了他同法国总统所保持的特殊关系。赫尔姆特·施密特也同样,因为他所在党的左翼大概会因密特朗的当选而得到好处。密特朗还同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的社会党领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将赋予法国一种不合吉斯卡尔口味的拉丁欧洲色彩。”

这位记者似乎忘记了,法国人民是相当不考虑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口味的,因而拒绝了他的第二个任期。但这无关紧要。《洛杉矶先驱调查者报》的约翰·华莱奇用下面这句话相当准确地概括了当时的气氛:“归根到底,华盛顿神经过敏了。”《巴尔的摩太阳报》的社论则比较温和:“美国人历来同法国造反派比同他们的国王或将军们相处得好。密特朗先生或许将把这一传统延续下去。”

但各种议论终于暂时停止了。1981年5月22日,我下令解散国民议会。6月21日,法国人在569个议席中选出了285名社会党议员,占了绝对多数,并由此给了我自由活动的天地。1981年6月23日,我组成了我的第二届莫罗瓦政府,里面有四名共产党人部长:夏尔·菲泰尔曼,负责运输的国务部长;约克·拉利特,卫生部长;马塞尔·里古,职业培训部长;阿尼塞·勒·波尔,公职和行政改革部长。我打算通过此举履行向共产党选民所作的政治和道义上的承诺,他们在选举中忠诚地支持了我,而且往往不惜因此而反对他们的领导人。我还打算借此加强左翼联盟,这是广泛动员民众的源泉。一个偶然的机曾使我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场面的见证人之一,那就是四十多年前以莫里斯·多列士为首的五名共产党人部长离开保罗·拉马迪埃政府的场面。现在,事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对来自各方面的疑问作出了回答。我可以行动了,但深知等待着我的困难有多大。

当我接见乔治·布什时(克洛德·谢松当时即将去华盛顿),局势是明摆着的。但这丝毫没有损及会见的亲切感和效用。布什表现得得体,直到他自己的任期结束,始终是一位宽厚的合作伙伴,对情况十分熟悉。我不能担保他已相信我的立场是有充足根据的,但他信任我的预见,我们对此谁也不感到遗憾,尤其是当他本人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我可以说,正是从这次特殊的会晤之后我们两人便成了朋友。

二、莫斯科：不如预想的那么热情

在华盛顿，国务院还在继续犹犹豫豫，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但冲击已经过去。预定10月初在渥太华举行的工业化国家首脑会议的准备不再勉强。国际社会的激动情绪转瞬即逝。在东方国家中也是如此。一种过于直觉的推理可能使人认为集团政策服从于某种反向平行法则：使一个集团不高兴的事必定让另一个集团高兴。这就错了。这太简单化了。事实上，游戏要复杂得多，表面现象胜过现实情况。任何人都并不为此感到难堪。苏联对我当选所作的反应就是如此。大多数评论员把重点放在对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去职而感到惋惜的理由之上，而不是法国左翼获胜似应在苏联引起的满意心情。《真理报》表达了这种失望之情。我已对这种只能使新手感到惊讶的态度作过一点解释了。变动扰人啊。人们已习惯七年一届的法国总统任期，在此期间，这位总统有时间建立友谊，有时间制造种种假象。例如，巴黎曾避免过于严厉地谴责俄国对阿富汗的侵略，或者避免对欧洲核力量的失衡表示忧虑。很容易看出来，这种宽容只不过是假象，因为俄国人并非不知道即使他们的总统出于机会主义而缓和了谴责的用语，法国仍持有与它西方盟国相同的观点。

阿富汗、在欧洲部署导弹，这是那时唯一真正使苏维埃帝国感兴趣的两个问题，因为它们涉及东西方的力量对比。其余不过是小事一桩，是肚皮舞而已。但是，在政治上，如同在爱情上，字眼往往比事实分量更重。我的前任最近在威尼斯欧洲大会上就巴勒斯

坦人的要求所采取的立场就是这样。其中,阿拉伯利益走在了同以色列的友谊前面,传统上亲巴勒斯坦的苏联接受了吉斯卡尔·德斯坦的结论,如获至宝。这个结论引出了一些公报,强调苏联外交在世界上取得的进展。而人们知道,这些徒有形式的文章对莫斯科那僵化了的世界所具有的重要性。我在别处曾谈论过起草这些文件时那种极端的细心周到,但每位签署人都知道它们马上就要与字纸篓为伍了。通常,苏联人来到会场,带着一份准备就绪的、直到每一个细节都已拟定的文件。人们在文件里所说的在谈判时根本未置一词。这种文件什么都说到了,但什么也没有说。显然,他们那些不太适应这些方法的伙伴们总是措手不及,即使他们提出这样或那样的保留意见,他们仍处在向他们建议的逻辑之中,以至当宣读最后文件时,他们发现自己竟糊里糊涂地同意了两个小时以前曾谴责过的事。当我领导社会党时,我曾领教过这种做法,我告诉他们我以后再也不能容忍这种装腔作势了。苏联人没有再坚持,这种喜剧就此停止了。

除以上种种原因之外,还得加上巴勒斯坦问题以及我就这些计划表示的保留意见。聚集在威尼斯的欧洲人首次承认了巴勒斯坦自治的要求。我曾认为人们廉价出卖了以色列的安全及其防务手段,我这样说了。尤其因为西方所获的补偿不过是一句空话。勃列日涅夫先生曾告知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好几个师的俄国人将逐步从阿富汗撤走。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把这当成了真事,并毫无保留地大吹大擂,而后这消息却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我曾对这种玩笑提出抗议,俄国人因此被触怒了。我们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曾不得不直接面对苏联驻巴黎大使阿勃拉西莫夫先生的坏脾气,因为我坚持要求向大量申

请出境的俄国犹太人发放签证而使他大为生气,以至最终不欢而散。俄国人甚至取消了法国社会党对莫斯科一次预定的访问。我还参加了声援 Alioutch 和 Boukovski 的行动。最后,在法国政界人物中,只有我曾赞同埃及人与以色列人的戴维营会谈。

因此,我的当选在莫斯科没有受到热烈欢迎是毫不奇怪的。我所有的姿态并非出自敌视一个国家的有系统的思想。对这个国家,法国所欠甚多,同它保持友谊符合法国的最大利益。必须让对方理解这一点。我为此花了许多功夫。头年,我曾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过莫斯科,我着重重申了我国外交的这一基本选择。由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表现出一种不常有的暧昧态度。一切都显露在脸上,而那天早晨的颜色是灰色。

然而,气氛还是很快缓和了。苏斯洛夫有一副数学老教授的面孔和头发,施展起他那特有的幽默。当被问到“您是否认为,如果法国拥有共产主义制度的话,在它地下就会有更多的石油”时,他整了整夹鼻眼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放声大笑,用洪亮而自信的语气逗乐道:“当然喽,是这样的。”大家都笑了起来。苏斯洛夫乘势说了下去,演剧似地摆出了苏联的伟大成就,并同西欧的停滞不前作了对比。苏斯洛夫在读一张纸,他的两位邻座不时加以纠正。当他“环顾世界”后,我发现他更多地强调葡萄牙的分歧,而不是阿富汗的冲突,并把 Cuuhal 置于当时共产党人士的前列,毫不迟疑地威胁任何试图阻碍亚速尔群岛同葡萄牙分离的人,前者归美国,后者跌入苏联的“大钱包”。我马上把这些情况通报给我们的盟国,以便他们认真考虑这种假设。

勃列日涅夫的接见特别热情。他甚至对我“歌功颂德”,好话说得那样过分,使我如坐针毡。过则必反。5月12日《世界报》的

大小标题忠实地反映了我当选次日的事态,华盛顿惶惶不安,满腹狐疑;莫斯科处境尴尬,留有分寸。不能比这说得更恰当了。

三、波恩：有分寸的满意心情

要说德国人的赞同补偿了美国人和俄国人的保留态度的话，那是过头了。德国方面，也是保留多于热情，事实上，德国人对此不可能是热情的。我同施密特总理之间在社会党国际内部曾有过相当敏感而且反复的纠纷。我了解他同德斯坦总统的私人友谊。这种良好的关系曾产生幸运的效果，为推进欧洲建设做出了贡献，主要是授予欧洲理事会新的权力，并通过普选产生欧洲议会的成员。这两位之间的友谊，他们观念上的近似，为欧洲共同体的前进提供了方便，我愿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进，尽管我同施密特的个人关系不含有任何特别的热情。还是看看标题的艺术——《世界报》这样写道：“波恩：有分寸的满意。”

德国总理同我的首次会见是5月24日，在巴黎。着重点是法德关系的连续性及其优先地位。总理答应支持法国货币，联邦银行购进了数亿法郎。确实，德国经济难于适应一场使欧洲货币体系陷入危机的货币风暴。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就此不无卓见地指出：赫尔姆特·施密特由此在法国增强了一个与人民阵线极其相像的选举联盟获胜的机会，但他这样做并不是心甘情愿的。

作为回报，我接受了北约关于欧洲导弹问题的双重决议。我这样做毫不勉强，因为这是我长期以来的信念。双重决议意味着，西方盟国将不顾苏联的反对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直到苏联开始撤走其导弹为止。我的做法脱离了我国外交的传统态度，即认为（这是正确的）法国同此事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因为法国置身于

军事一体化组织之外。我之所以同意这一决议并非出于欧洲均势的考虑,而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不管法国地位如何,它不应脱离欧洲均势所必须的条件。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表示,我期待着苏联人做更多的事,因为冻结战区武器使拥有225枚SS20导弹的苏联人占据了无可否认的优势。

我同施密特的关系后来逐渐缓和了。但我还是记得在一次欧洲理事会会议上,他那粗暴的、咄咄逼人的样子,这使他的脸孔变得棱角分明,使他的视线放出狂怒的闪光。他发言时脑袋抵着一只臂肘,不时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些纸片扔在桌面上,目的是强调联邦德国在财政上为欧洲所做的牺牲有多大。撒切尔夫人不时向我递来半是认真、半是嘲弄的眼色。赫尔姆特·施密特给人老是发怒的印象。一想到人家可能加重他的负担,他那白发下的面孔就涨红了。但是,风暴之后便是宁静。因为施密特骨子里是狂热的欧洲统一主义者,因而极其谨慎地注意自己的言行决不超出一定的界限。

慢慢地,我看到了他那另一副面孔。那是在他汉堡的小屋里,当他坐在钢琴旁巧妙地、热情地弹奏德国19世纪的浪漫曲时,屋内的气氛是平静、安谧的,富有节律与幻想。与此同时,他的夫人在整理瓷瓶中的插花,这是她作为植物学家所追求的艺术。我设想,吉斯卡尔欣赏这一智力活动,因为这同他自己的爱好相似,也许更加敏感,更加接近普遍兴趣,向着在我们这些国家的废墟上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大方向。当我们沿着城市的滨河路散步时(船只的喧闹声使这个城市恢复了它原先的特性),我同施密特谈到了这一点。汉萨产的鸭舌帽紧扣在脑袋上,施密特是属于那个世界的。他就是那个世界的表现者、解释者,他走在一个爱讨价还价的民族

的前列。我忘不掉五月首脑会议上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惊愕之情,当时我谈到,如果我们不同步推进“人的欧洲”、“社会的欧洲”(我当时首次使用了“欧洲社会空间”这个说法),财政经济共同体将会发生多大的危险。

四、阿拉伯世界：不支持我当选

我现在转向阿拉伯新闻界的评论。他们不支持我当选，主要是因为我曾亲自宣布将访问以色列。尽管这僵硬态度是预料之中的，但仍引起了我的严重关切。我把同阿拉伯人友好视作法政策的一个支柱，但我不愿把这一友谊建筑在对以色列不公正的基础之上，不能对使以色列工商业利益受害的经济制裁表示满意。另一方面，我正打算运用我的新职务所赋予我的权力来促进近东的缓和，我认为这是维护世界和平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最明智的做法是待以时日，注意使我对双方的用语严守中立而且始终如一。我想，诚意所至，终将金石为开。

但是，当加速步伐，事情就走得快了。克洛德·谢松称威尼斯会议的结论是荒谬的。这句话引起的争吵越来越扩大。阿拉伯世界反应频频而且强烈。最激烈的表现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伊斯兰协会，它们毫不犹疑地指责法国想重新武装以色列：“您（对以色列）的访问是对法国及其在保护人权方面所起作用的亵渎。这是对一个曾经处于纳粹占领下的国家的亵渎。我们要求您重新考虑您的立场以及您对全世界所有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新的敌意。”这种过火的语言并无人响应。我表示，我主意已定，我不会反悔，法国将去它想去的任何地方，无须任何人盖戳批准。

我同黑非洲国家没有那么多烦心的事。用桑戈尔的话说，他们无一例外地从我的当选看到了某种殖民主义精神状态的终结。从西班牙方面，无论是国王、政府，或是当时由菲利普·冈萨雷斯领

导的反对派都向我表示了友谊和鼓励。事实上,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曾因拒绝西班牙进入共同市场而“成功地”使所有西班牙人团结起来一致反对法国。在葡萄牙,我可以指望我同马里奥·苏亚雷斯长期、亲密的友好关系。至于作为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的撒切尔夫人,她虽然对我不赞同“一个欧洲、两种速度”的思想感到放心,但仍继续为法国的经济政策可能远远偏离她朋友里根的货币主义彼岸而忧虑。

赫尔姆特·施密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 5 月 12 日在 Chequers 会面。他们面对法国的新牌局,决定捐弃前嫌。施密特一直为通货膨胀可能加剧的念头所困扰。法国在这方面的政策使他忧虑,以至忘记了欧洲建设不是靠货币百分比来进行的。施密特的这一立场使玛格丽特·撒切尔着迷,她对弗里特曼的理论一往情深,对里根的“创举”跟得最紧。“单向思维”一词从未像当时那样确切。但是,“单向思维”与货币强迫症的社会协调相比几乎无关紧要。有两个当时鲜为人知的词开始成为日常用语:“单向思维”和“问题的世界化”。在我所谈的那个时期,“单向思维”控制着美洲,不愿从经济这一狭隘门户中走出来,尤其不愿从通货膨胀中走出来。

我要提一提中国的态度来结束这一段快镜头式的回顾。在那三个月之前,我曾前往那个国家,并且恢复了我同当时的主要领导人,首先是邓小平的关系。中国人那时竭力反对部署 SS20 导弹,对一切可能扰乱西方世界团结的事都感到忧虑。因为在他们眼中,这是抵御俄国人野心的最佳壁垒。

大家可以看到,我所谈及的是我政治责任中一个艰难的时期。但任何人都不会对此感到惊奇,而我本人也未因此觉得意外。

五、法郎危机

我国的主要合作伙伴们这种普遍的精神状态只能加剧法郎挣扎中的沉重气氛。早自4月份以来,源于美国高利率的美元上扬就窒息着我国的货币。5月11日,证券交易所一片恐慌。因无购单而中斷开价48小时。几天之中,行情下跌了20%。法郎价位在欧洲货币体系内部跌至谷底。从5月10日至我就职的21日,我们损失了几十亿外汇。雷蒙·巴尔5月13日辞职。此后几天我们又损失了50亿美元。必须立即作出反应。我21日任命皮埃尔·莫鲁瓦为总理,22日解散国民议会,并以同样的速度组成了新政府。

在我被授权当日,在前往香榭丽舍大街的汽车中,皮埃尔·莫鲁瓦向我报告了局势,讲了他的忧虑。我坚决反对法郎贬值,不愿让那种认为左翼上台就等于财政崩溃的思想在公众的脑海中生根(当年的人民阵线就未能摆脱这一思想的纠缠)。但是,我们着手对外汇兑换严加控制,把法兰西银行的指导性利率定为20%。

施密特总理的访问以及关于法德货币互助合作的协议煞住了法国金融的溃散之势。我还决定接见资方和工会的负责人。我不指望这些安排会一下子制止我国面临的困难,但我认为申明我们的意志将为复兴创造条件。为了表明投机者们是打不赢这场神经战的,我从6月3日起就着手采取我的竞选纲领所预定的首批社会措施,把各行业应增至的最低工资额确定为每月2000法郎。

在实行皮埃尔·莫鲁瓦所宣布的货币措施后,这场金融风暴开

始平息。但这并未挡住德国新闻界普遍采用一种使人不安的调子：欧洲货币体系的均势受到威胁，法郎稳定已成历史。正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第38届法德首脑会议于7月12、13日在波恩举行。一则以“法德双重协议：保卫法郎和关于欧洲导弹”为题的新闻电讯担保德国当局将支持法郎。一则来自法国方面的消息甚至说，德国总理从会谈一开始就主动谈到了这个问题。在此期间，在法国，某些人士试图散布恐慌情绪。许多有产者准备把自己的资产转移到国外，甚至准备携家移民。让他们自己去思考这短暂的耻辱吧。他们中间的一位，居伊·德罗特希尔德先生就此写了一本很有教益的书。为了显示宽宏大量，我回答了《Stem》报记者的问题。该报执意让人尴尬，因而不掩盖任何回答。我讲得明明白白：“我希望在我们两国之间的优先关系中将增加领导人之间高质量的个人关系。”欧洲战后真正的大事，那就是法德和解。我们成功地克服了我们之间的对抗，这是欧洲共同体建设的一大因素。这一基本条件将指导我准备实行的政策。

我曾于1947年在海牙参加了第一届欧洲历史大会。我始终忠于所承担的义务。一则“来自德国方面”的消息又说，二位对话者对美国过高的利率均感忧虑，同时认为必须继续努力以避免欧洲经济和美国经济分道扬镳，并协调共同体内部的经济与货币政策。消息还说，我还要求把曾经使我们团结起来的关系以及规范这些关系的协议继续下去，也即继续执行1963年的合作条约，每两年举行一次法德首脑会议。我是这样说的：“长期以来，德国和法国保持着优先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应同共同市场欧洲的总体发展相隔绝，但它意味着要讨论一些重大的特殊问题，而且部分地决定着世界政治的前景。”就这样，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以一种缓

和的方式继续发展。人们注意到的只是词汇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毫无意义,但丝毫未改变事情的根底。

六、又是中东：塔穆兹核电站事件， 贝京与萨达特

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第一场我不得不认真对付的严重的国际危机，而且这不过是一系列其他危机的先兆。6月7日，按照以色列总理梅纳汉姆·贝京的命令，以色列空军轰炸并部分摧毁了伊拉克的塔穆兹核电站。该核电站的两座反应堆是由法国提供的。其中一座看样子完好无损，另一座没有燃料，损坏严重，但“无中子泄漏”。这种设施在全世界还有50来座，用于物理研究，以便开发核能。这些设施都处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它在当年年初曾对塔穆兹站作过视察。伊拉克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并从而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我上任伊始就强调要采取必不可少的措施，以保证这些设施用于和平目的，避免任何挪作他用的危险性。法伊核合作协定是1975年11月18日在巴格达由法国当时的工业与科研部长米歇尔·多尔纳诺先生签署的。1986年8月，希拉克先生和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在前总理同以色列记者本·波拉谈话之后进行过一场论战。希拉克先生否认对此事负有任何责任，因为据他说，这是由多尔纳诺先生和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直接处理的。

从技术上看，塔穆兹反应堆是法国奥西里反应堆的仿制品。功率为78兆瓦，位居研究用反应堆系列的上阶。其价格为15亿法郎。1977年动工兴建。1980年初，第一批燃料装置（12公斤铀）发货。外交部1981年5月14日的一份照会曾指出，按当时的施

工进度,塔穆兹反应堆可在当年夏天准备运转,但同时请注意三个危险:极为富集的铀燃料可能直接被用作爆炸物;已发货的76公斤铀足以制造炸弹;伊拉克已能用从任何地方都可得到的天然铀制造钚,数百名就地培养出来的科学家为伊拉克提供了实施一项自主的军用核计划的手段。针对这些风险,法国政府曾采取各种法律和技术的预防措施,但无法担保百分之百有效。

是这种不确定的情况导致贝京先生发起对塔穆兹的攻击吗?或是另有新情况?在巴黎,对此并不完全感到意外,在我当选次日,外交部的一份报告即已向我指出可能发生的危险。其中包括下述警告:卸任政府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充满谎言、盲目和自相矛盾的案子,其中掺和着某些技术领导人和本来意义上的政府领导人的责任。亟需作出关键性的抉择。应朝什么方向进行呢?

有件事加剧了局势的严重性。一名法国工程师在袭击行动中被打死了。皮埃尔·莫鲁瓦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空袭是不可接受的,对一个外国的领土的任何袭击都是对法律的蹂躏。这一口头谴责没有马上引起别的后果。人们估计至少需要三年时间才能修复这些设施。梅纳汉姆·贝京一再奚落法国并以此为乐,对我国大使向他提出的问题避不作答,却认为有必要向罗纳德·里根作出解释。

这种刻毒,这种不敬实在令人吃惊,尤其因为它来自这样一位总理,其文化传统及其政治倾向本应促使他热爱并尊重我国的。确实,他被自己的性格左右了。在智力上他是杰出的,但在作出决定时是不妥协而坚定的。他或将在那些传统上鼓舞了犹太人世界的先知长廊中占有一席之地。直到那时为止,我同他保持着极好的关系。我曾多次访问耶路撒冷,其中有一次,他极其亲切地接见

了我。由此,开始了我们之间的联系,当时还看不出下文如何。我很敬重他。他是一位执著的反对派,难于对付的民族主义者,酷爱读书。我为他的晚年感到难过:他妻子的去世,他那疑云笼罩的退隐,他自愿远离外部世界的一切活动,他的内心自省,其中宗教感情起了部分作用,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认为,他对以色列安全的近乎神秘主义的焦虑使他不能作出清醒的判断。塔穆兹事件就是例证。随着几周以后的黎巴嫩战争及对黎巴嫩的占领,他把自己的逻辑一直推至狂热,而狂热对于各国人民来说从来不是好向导。

于是,一场舞步多样但不断回复到双人舞的芭蕾舞剧开始了。去还是不去以色列?我答应过要去,我还愿法国能发出同这个国家建立和缓关系的信号。但历史自有它的魔障。塔穆兹被毁一事不允许我马上就去访问。因为这会给人以赞同此举的样子。如果不去,就会加剧不和。我决定延期。但这并不等于完全休息。1984年11月26日,我通知克洛德·谢松说,我打算第二年2月10日至12日前往特拉维夫。接着,克洛德·谢松严厉批评了威尼斯欧洲大会声明的内容,为随后扩大到阿拉伯国家的论争开了头。我的想法同克洛德·谢松相去不远,但他使用了他习以为常的生硬语言——他可能说过,那是荒谬的。必须把棉纱重新放到织机上。在一次接受皮埃尔·德洛劳普采访时,我表示:我将要在耶路撒冷所说的话,我在利雅得说过,我在阿尔及尔说过,我在拉巴特说过,我在安曼说过。这同样的话就是:“以色列有生存的权利。这个国家是联合国所承认的,如同它的历史及其人民的勇气得到承认一样。”

但日历总是同我们作对。每天都有一大堆过激的声明,一个接着一个,终于在法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造成了一种恶劣的气候。

这是违背我的意向的。我是否过于相信我的个人外交了？我采取的行动是否不合时宜？我国驻约旦大使的一份电报使我充分警觉起来，从而着手进行这番内省，而不回避任何疑问。一名负责人的每一个声明都会成为各种最荒诞的评论的对象，这是很自然的。就这一点来看，阿拉伯的评论家们不乏想象力。以色列也一样。人人为自己的贞操辩护。无益而危险的是，人们陷入了辟谣和反辟谣的恶性循环。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克利布先生在一次预定是秘密的会谈后透露说，我打算推迟这次反复讨论过的旅行。外交部在它的报告书中很不谨慎地插入了这样一句话：“对世界这一地区局势演变可能产生的后果将在1月初联合国的辩论之后再予评估。”这又引起一场纠纷。这种说法马上被以色列方面解释为仿佛我的决定将取决于安理会的评估似的，而安理会看来是不准备支持北京的，尤其是在以色列刚刚占领了戈兰高地的时候。另外，我忽视了在类似情况下必须复诵的老调，忽视了拨动那“转经筒”，而只要离开了它，外交马上就失去了坐标。这就是语言的力量！我将很快学会这严峻的一课。一切都译成发电码。我也将学会以有时不得不破坏这密码为乐。但我首先得当好学徒。

我曾认为再次推迟作出决定所冒的风险要比访问以色列所带来的可以预见的麻烦更糟。北京曾表示希望尽快见到我。在我抵达特拉维夫的第二天，我们就在他的办公室作了一次长谈。我们是在一间挂满地图的小房间里，所有这些不同比例尺的地图都标志着以色列同黎巴嫩的边界。北京手里拿着一把尺子，强调因地形及距离之故，从北方入侵是极其容易的。确实，以色列这一地区的居民正处在一场突然而又迫近的袭击的威胁之下，而叙利亚人、

伊朗人和黎巴嫩民兵的意图迫使以色列强化了它的预防措施。这番谈话的结论预示着将有一场新的战争。

贝京了解法国同黎巴嫩的关系,因而小心翼翼告诉我他的计划将止于何处,说他无意越过位于正式边界北方、离贝鲁特不到40公里的一条界线。我强调了以色列同叙利亚和伊朗打交道时,自身将遇到的严重危险,因为前者是不太会听任以色列主宰黎巴嫩局势的,后者则在黎巴嫩内部挑拨离间并鼓励圣战者频频从事恐怖行动。

但是,不管戴高乐的著名公式怎么说,简单的思想在临近复杂的东方时很快就变得不简单了。阿努瓦尔·萨达特恰在此时被暗杀一事打破了一切制定得最完善的计划。人们还记得为了庆祝埃及对以色列的军事胜利在开罗组织的那次游行。正当仪式进入高潮时,大炮和机枪把烈火喷向观礼台的中轴,打死、打伤了萨达特周围的几名外交官、军官和萨达特本人。可以想见随后的混乱情况。萨达特的家庭成员逃过了谋杀。但几天前曾来巴黎见我的副总统穆巴拉克臂部和手部多处受伤。

按照惯例,第二天就举行了葬礼。法国代表团人数相当多。我邀请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与我同机旅行,但他谢绝了。杂乱无章的人群在临时搭起的帐篷下等了好几个钟头。然后,送葬的队伍上路了。里面有世界各国的代表。我同意意大利总统亚历山德鲁·佩尔蒂尼手挽着手,尽力搀着他前行。尼克松、福特和卡特这三位美国前总统跟在他们的保镖后面,像螃蟹一样横行向前。大家信步游荡,使送葬队伍有名无实。人们不时听到射击声。队伍一会儿趴在灰尘里,一会儿又惊恐地站起来,继续走路。人们难于区分枪声和人的号叫声。萨达特的遗体被安放在一座炮架子

上。从机场起,一切都被包围起来了,窗户紧闭着。担任警戒的士兵背向人群,监视着外部,也就是说监视着沙漠。军官们搜士兵的身。足足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到达匆匆树起的纪念碑。观礼台保持着悲剧发生时的样子。为了向萨达特夫人致意,人们在尚未被清除的血泊中行进。吊唁的时间很短。然后我应约前往穆巴拉克的住所同他会面。

整个城市陷于惊慌失措。萨达特个人的分量,纳赛尔继承人之间的对立,使这个已遭蹂躏的地区所出现的真空更加凸现。我过去同萨达特接触不多。他把自己的职业生涯、自己的雄心和自己的生命全都押到了那次把他带往耶路撒冷、带上以色列议会讲坛的壮举之上了。我见过他几次。正是靠了他我才在一次开罗的三人午餐上结识了雅赛尔·阿拉法特。他的脸型仿佛是从一种努比亚陶壶上移植过来的,其俊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思想充满理想与象征。他曾虔诚地向我描述了通往圣卡特琳的几条山谷交会的地方,他打算在那里建造自己的住宅并退隐,在那里,东方的各种伟大思想将相互交流在那里汇合。通常,死亡负有扰乱生者想象中的秩序并摧毁历史所创造的美丽建筑物的责任。死亡不行使追及权。永远闭上的眼睛紧紧关住了已经消失的世界。为什么要把生前和死后联系起来呢?或许是一种徒劳的希冀、持久的感情吧。

萨达特—贝京之间的双人论争、两重对话曾使我激动万分。埃及总统站在以色列议会讲台上的场面在我看来仿佛出自一则传奇故事。尽管我尊敬贝京,但那到达历史峰巅者则是萨达特。我觉得贝京的答辞像是一位上气不接下气的乡下人在推销自己的产品,而全世界数百万的电视观众对此曾抱有多大的期待和希望呵!

不幸的是,猜疑占了上风。很少人有能力相信伟大,相信真理。当这场对话开始降调时,仿佛出现了某种断裂。正当未来向你敞开大门时,你却不得不选择平庸,这是多么可怕的政治义务啊!

从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中没有产生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至少在当时是这样。然后,便着手进行“阴谋之后”应有的例行公事:诉讼、绞刑、猜疑、失宠。萨达特家族被指控腐化堕落。他的亲信被追究。幸亏埃及有一位胡斯尼·穆巴拉克那样的领导人,他反对走极端,其良知压倒了复仇的欲望。那种本可能把埃及拖入内战漩涡的复仇情绪平息下来了。原教旨主义团体或被解散或自行散伙。阿拉伯世界在其中心部位保住了一位善于抵御各种极端主义的领袖人物。这一点之所以难能可贵,因为大多数阿拉伯人不原谅萨达特那极其勇敢的创举,把他的死视作正义的惩罚,并在很长时间内抵制埃及,抵制它的产品和它的精英。



图6 密特朗喜欢带着狗,独自一人
在拉什附近的大西洋岸边散步

卷三 从法国看德国统一

一、一切始于莫斯科

一切都是从莫斯科开始的。独裁受到怀疑就无法生存,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却对苏联的制度表示了根本性的怀疑。但是,新思维只思改革不想革命,不久就暴露出自己的局限性,它只是通过冲击国家机器的等级制度来动摇那破旧的大厦而已。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看到国家机器一再失灵又不能排除故障,也用各种方式做过自己的努力。但是白费劲。他们把改革看作巩固自己政权的补充手段,这就从本质上破坏了改革,因此官僚体制很快就让一切恢复了原状。为了结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革命,应该在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进行另一场“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革命。新思维没有这种雄心,就如同法兰西革命之初某些制宪会议成员认为通过取消特权和拒不承认国王的否决权就能挽救君主制一样。但是,一切都今非昔比了。新思维发出了信号,产生了冲力。从莫斯科出发的新的革命,这一次以不可阻挡之势,在横扫欧洲所有共产党国家的首都后重返了莫斯科。1991年8月末遂政变的发动者在撤销戈尔巴乔夫职务时并未找错对象。因为正是他并通过他刮起的自由之风卷走了70年代的历史。

我不相信现代史曾经历过类似苏联突然垮台这么重大、这么令人感到意外的事件。42年前,纳粹德国被打败后,斯大林在解

放中、东欧国家的借口下把战火引到那里，并占领了多数国家。他忘却了在雅尔塔对盎格鲁—撒克逊伙伴们作出的将在各地举行自由选举的承诺，建立了军事帝国，并由此出发把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强加于人，试图征服世界。

然而，不是打了败仗，不是发生政变，不是遇到有组织的反抗，也不是出现了阴谋活动，而是因为内部受到腐蚀，因为官员们的僵化、经济破产、理论空洞无物，犹如空旷的天空下的转经筒，帝国自行倒塌了。在勃列日涅夫长期统治时期，颓势的蛛丝马迹已经显露，但还看不太清。在我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后不久，我曾力图辨别这些蛛丝马迹，我记得我曾要求我的亲密合作者们，首先是皮埃尔·贝雷戈瓦命令下属以 2000 年苏联帝国将垮台这一重大假设为中心进行外交反思。1982 年，我与赫尔姆特·施密特总理会谈时又重提这一话题。我对他说：“德国统一已载入历史。苏联帝国应该削弱，15 年后这件事就会发生。”接着，在 1984 年，当时持怀疑态度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又听我对她说：“我感到，到本世纪末，苏联帝国将会崩溃……它跑不了长途。”也许我说得太远了。但是，其他许多人，特别是西方的许多政治领导人和社论作者继续在揭露民主政权的脆弱性，认为其本质上太虚弱、太不稳定，不能抵抗当时被形象地称为“斯大林式压路机的压力”。在他们看来，只有恐怖平衡和军事集团才能保障战后形成的秩序。这一秩序让人放心。首先，这是一种秩序。其次，这是已经存在的秩序。七十年来，人们已经有了目标。人们知道在谈些什么。尽管害怕它，憎恨它，苏联帝国对于总体平衡看来仍然是不可缺少的。1982 年我在向法国人发表元旦贺词时曾表示希望结束雅尔塔的欧洲，这不仅激怒了西方，也激怒了东方。我对这种反应并不感到惊讶。躲在现成

的思想、汇编好的现成资料后面,比设想共产主义以后也就是设想一个属于自己的、区别于以前任何形式的欧洲,当然要惬意得多了,只要不回复中世纪的混乱就行。而美国方面则满足于由两个国家领导世界,由两个国家单独仲裁或处理地区冲突、扩军或裁军的规模和速度、共同主宰空间。更有甚者,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这一简单化的两极模式也扼杀了观察社会的其它方式,扼杀了设想社会如何适应由于技术、习俗演变所产生的新的需要的其它方法。但这却省了许多人的事。

让我们再说一遍,苏联帝国是被自己压垮的。作为对这另一个“垂死”者的挽歌的伴奏,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勃列日涅夫及其接班人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相继去世,这就为在以前接班中被党的机器和等级制度排除在外的——可能那时人们就已隐约地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一切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开辟了道路,从而加速了结局的到来。

1984年我应契尔年科的邀请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在他为我举行的隆重的晚宴上,我会见了戈尔巴乔夫。我曾在别处描述过这位未来的苏联总统在这种场合颇为与众不同的言行举止。晚宴开始后,我在祝酒时提到了当时被软禁的萨哈罗夫的名字,伊凡雷帝时代的拱顶下顿时一片寂静,人们脸上也都失去了笑容。不久之后,我在契尔年科的葬礼上又见到了他。一个小时的谈话使我相信俄国将要改朝换代。餐桌上有人窃窃私语,说不能接受这种侮辱,说我的访问将到此结束。但当我念完祝酒辞后,我听到戈尔巴乔夫面带微笑接着刚才中断的话头,向契尔年科诉说宏观计划一败涂地及其对农业生产造成的严重后果。契还让他重复了一遍。这一印象在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首次出访西方国

家,我们在巴黎长时间交换意见后得到了证实。离开那天早晨,在我爱丽舍宫的办公室里,他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正面看着我说:“苏联需要自由和首创精神,需要民主,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这需要时间。你应该帮助我。”他是真诚的,还是说得好听?我曾告诉我的大西洋联盟的主要伙伴,特别是罗纳德·里根,我倾向于认为他是真诚的,应当给予重视。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巴黎会晤时还举行了棘手而有益的记者招待会,如同在西方惯常所为,所有负责人都毫无遮盖地暴露在全世界的记者面前,接受通常是尖锐甚至粗暴的提问。那天下午,确实是世界新闻界都拥挤在爱丽舍宫贵宾厅的金黄色吊灯之下。他很快就显示出擅长进行这种活动,但我注意到他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矛盾之中,因为他既想强调他忠诚于共产主义(他下午在巴黎大学说明,他指的是列宁的共产主义),又想强调摆脱共产主义的必要性。他是不是试图在同一篇讲话里,既要回答自身良知的质问,又要消解莫斯科警惕的官僚体制对他的猜疑呢?几个月后,我们又在克里姆林宫会面,我发现,在灵活、策略的词藻后面,他的思想正变得日益明确。

当我专门谈德国统一问题时,我还要重谈戈尔巴乔夫。无论如何,今天人们已估量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欧洲均势的打破和世界事务新潮流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历史学家们很可能把1987年界定为卫星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发生动摇的一年。那一年,戈尔巴乔夫决定不用武力支持这些国家。他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他恰当估量了苏联拥有多少发号施令的手段,因而,是出于朴素的现实主义呢,或是他打算为站在他一边的新领导人在这些国家执政提供方便呢,还是因为他

已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进程不可逆转而且最终是值得欢迎的呢？只有他自己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倾向于认为，他执政后，也可能包括执政前，通过阅读了解情况，通过出访，对共产主义社会以外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好奇，亲眼看到他所掌管的制度迅速解体的景象，便总结出了一条教训。那就是他曾在巴黎推心置腹地对我说的：没有首创精神，没有自由，什么都办不成。他被任命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后不久即提出新思维就证明了这一点。1979年，他在他的亲密顾问瓦丹·扎格拉迪纳的陪同下以私人名义访问了法国。瓦丹·扎格拉迪纳不时来看我，提醒我注意这位鲜为人知的出类拔萃的领导人（他告诉我这是位“思想和判断都很自由的人”），提醒我他具有一旦被授权执政就将通过法律进行一场革命的意志。共产党商人、伊恩泰拉格拉节目主持人、富有魅力的让-巴蒂斯特·杜芒是通晓克里姆林宫秘密的知情人。他也对我说了类似的话，并提议在戈尔巴乔夫与我之间建立联系。他们两人都认为，如果死神给安德罗波夫留下足够的时间，安德罗波夫将会率先发动变革，而且确信戈尔巴乔夫作为安德罗波夫家族圈内的人物将会接过变革的火炬。

但是，其它因素对他的决定也在发生作用。前些年，在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工会积极分子中间开始出现引导人们拒绝接受和反抗的舆论。天主教教会和经过改革的教会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约翰·保罗二世的精神权威对教会的影响推波助澜，并与煽动波兰集结在他的主教们和他们世俗的帮手团结工会周围的那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结合起来。90岁高龄的红衣主教托马谢克从他在布拉格的大主教殿堂里，领导着一个被迫害、被驱散的教士团，体现了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运动的灵魂。在东德，路德教教会承担了同

样的英雄使命。人们还记得,托克斯牧师在蒂米什瓦拉风驰电掣般登上了罗马尼亚革命舞台。所有这些都强烈仇恨并准备超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需要时也可能准备打倒戈尔巴乔夫;但戈尔巴乔夫拥有只属于他自己的功绩,那就是:当苏联的民族对抗及被压迫少数民族的复仇愿望苏醒之时,他使那破坏现存秩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合法化了。新思维一旦被粉碎,在东方到处都能听到震耳欲聋的轰鸣,预示着即将令大地震动、并把所有社会都吞没下去的地震的来临。戈尔巴乔夫看清了爆炸即将发生,这是明白无误的。但他是否相信自己强大到足以控制这种爆炸,就像其他人把核试验控制在玄武岩深处那样呢?

但是,所有革命都不像玻璃那样不堪一击。戈尔巴乔夫将要处于经济灾难和机构无力这双重威胁之下:经济灾难会剥夺他政治行动的自由,使他越前进越困难;而软弱无力的机构和结构,其不切合实际的情况已暴露在所有人面前,这一结构的最后支柱——集中营则即将崩溃。我越回忆这段历史,我就越对苏联培养的最后位伟大的国家领导人所做的大量工作,所表现的丰富想象力、智慧和勇敢精神钦佩不已,因此也越来越不为他最后的失败而感到惊讶。是失败吗?如果从权力的角度来思考,那是失败;但若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那就不是。因为,一切都是从莫斯科开始的。

二、普鲁士的灵魂与柏林墙的倒塌

美苏共同主宰世界使西方领导人习惯地认为自己生活在凝固的时间里。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好像我们大陆的力量对比永远不会改变似的,并期待德国人能够逆来顺受。夏尔·戴高乐了解历史和历史的常数,对这类幻想忧心忡忡。他曾希望重新分割德国,分割得比1945年还要厉害,以保证法国能控制莱茵河左岸,并使鲁尔地区国际化。他的《希望回忆录》说到他在1960年3月向尼基塔·赫鲁晓夫重提16年前他向斯大林提过的一个方案,即:“在不粉碎德国人民的情况下,把他们带回那合乎情理的欧洲结构中,因为在普鲁士利用法国的一次失败而建立帝国之前,德国人民就一直生活在其中。作为邦,每个地区恢复它过去的自治。除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外,所有平等的地区将组织它们的邦联。”在同样的思想指导下,他向在柏林的盟国联合管制委员会的法国代表科兹将军发去指示,以便“他能运用否决权反对所有旨在恢复德国统一的提案”。对这个问题,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是这样描述的:“由于我如此热爱德国,所以我为有两个德国而高兴。”戴高乐和莫里亚克事实上表达了多数法国人的想法。但这不是我的感情。我深信,尽管德意志第二帝国犯了错误,第三帝国犯下了罪行,在承受了如此多的痛苦和牺牲之后,在抱着如此多的希望之后,一个感觉到自己是德国人、内心愿意自己首先是德国人的民族在其多样性中的统一是不可逆转的。在俾斯麦的德国的肌体上画出的那条分界线,反映了在特定时候、特定情况下的战争厄运。它只不过是一

场战争失败后的现场证明,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因为,被置于苏联控制下的东德,其领土已不限于原普鲁士的领土范围,而普鲁士则已被彻底解散,这不是偶然的。请深思这个问题,它能说明一切。西方普鲁士原是一个由各种混杂居民临时拼凑起来的国家,但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围绕着国王与军队,形成了强有力的结构,以至于在逐一降服几个世纪繁衍起来的日耳曼诸民族之前就已提升到欧洲强国之列。西方国家之所以把普鲁士抛给东方,目的就是让斯大林去压垮这个可怕的国家,使它长期或者永远不得翻身。至于斯大林,他曾不得不在希特勒面前退却,深知希特勒把眼睛盯着富饶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平原(希特勒曾对国际驻但泽高级专员卡尔·比尔克阿德说:“我需要乌克兰,以免人家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让我们挨饿。”),他不会错过,也未错过消灭德国战斗部队的机会。既然有人向他献上普鲁士,他就将它瓜分了。他把西里西亚和波米兰尼省让给波兰,与波兰平分古老的东普鲁士,作为交换从波兰夺取了其三分之一的领土。一项强劲的宣传称,摧毁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是根除纳粹主义的最可靠的方法。两者是一致的、相同的,消灭它们就是消灭来自同一个地狱、走向同一座坟墓的德国魔鬼。西方对由他人来完成这件事显然感到宽慰,默认了这种宣传。温斯顿·丘吉尔 1943 年在德黑兰就曾谈过此事:“我愿强调指出,普鲁士是万恶之源。”他搞错了,但却是明知故犯。正确的态度是,承认摧毁普鲁士就是打击德意志民族的要害,承认各邻国通过对德国的瓜分达到了长期以来追求的目标。18 世纪初,拥有 200 万人口的勃兰登小邦突然出现,并出人意料地加入了大国之间的赌赛,从而把牌搅乱了。现在它出局了,原来的传统大国对于欧洲中部出现的德意志真空又逐渐适应了。俾斯麦比萨多瓦

早三个月预感到了这一点：“如果普鲁士的力量有朝一日被粉碎，德国将很难逃脱波兰的命运。”这是显而易见的，丘吉尔无需俾斯麦或别的人来说服自己。1947年2月25日，当取代德国政府的盟国管制委员会颁布其46号法令时，前普鲁士首相的预言应验了。该法令称：“普鲁士国家很久以来一直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策源地，特此废除。”

人们想惩罚谁呢？是希特勒，还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一石两鸟。我不能想象“军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策源地”这种表达方式是从桑赫斯特或圣—西尔军校的语汇里找出来的，那里不使用这种语言。这里和其它地方一样，是斯大林说了算。所有的人，或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那种广告式的指鹿为马的意识形态宣传。我在那个时代生活过，记得那个时代的气氛。纳粹主义和普鲁士一股脑儿被普遍否定后，把它们遗骸扔进坟墓，那是最简单不过的了。但人们怎样写历史呢？希特勒不喜欢普鲁士，普鲁士不喜欢希特勒。稍加思考，就可以发现，纳粹思想与弗里德里希二世珍视的文明价值是相反的。希特勒想粉碎普鲁士的特性，就像在他死后斯大林所做的那样，他们两人最后都占了理。这就是普鲁士的巨大不幸：它在战场上把人吓着了，人们始终不肯原谅它。厄运还在继续，以至于当有人说柏林在全盛时期曾经是自由的首都，不论是谁，如果因信仰和思想受到迫害，肯定能在那里避难等等，这种话竟难以让人相信。事实上这种传统如此富有生命力，因此在柏林，长时期中，人们对必须拥有身分证感到厌恶。让我们重读一遍伏尔泰给他的侄女德尼的一封信中的几句话吧：“我终于来到了波茨坦。在老国王的统治下，这里曾经是一个没有魅力、没有欢乐的军营。如今，它是奥古斯丁堡，思想、希望和光荣的圣地。”事实上，弗里德里

希二世登基后,与他父亲——可怕的“中土国王”的执政方式彻底决裂了,他命令军队尊重人民;开放国有商店,低价把面包卖给贫穷的人;禁止虐待新招募的年轻战士;取消酷刑。还有,在那每个教会都声称有权支配人的灵魂和躯体的时代,他宣布:“在其所在邦,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愿望拯救自己。”这使得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布卢什在两个世纪后写道:“由于君主的业绩”,普鲁士政权“可能是欧洲最宽容的政权”。他宣布教育为所有人服务,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把普鲁士建成世界上最早的立宪国家之一。但是,我们也不要被这些漂亮的条文所迷惑。弗里德里希二世与他的家系一脉相承。征服精神萦回在他脑子里,他不想把自己国家的疆域限制在参差不齐的地域内。他攫取西里西亚后,在穷兵黩武中度过一生,同时往往成功地在奥地利、俄罗斯、英国和法国之间制造不和。他对启蒙运动哲学的热爱未能阻止他扩充兵员,直至与法国国王的军队并驾齐驱为止。众所周知,他利用军队战胜他的敌手们,蒙骗他的伙伴们,一再在患难中奇迹般地重新崛起,当他结束执政时,被公认为当时最伟大的统帅。但是,具有同等的天才,他与拿破仑·波拿巴以及几个世纪以来曾统治过整个或部分欧洲的其他所有征服者没有任何区别;却无论在思想还是方式上与阿道夫·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沃尔夫冈·弗诺尔写道:“在普鲁士与纳粹思想间隔着一个世界。后者是中世纪北欧的神秘主义和肤浅的达尔文主义难以置信的混合物,外加技术和机械化。”弗里德里希二世可能藐视与他的哲学相去甚远的这种混合体,反对把“普鲁士的国家思想”与“一半日耳曼性、一半世界性的第三帝国思想”混为一谈。但是,知道象征物威力的希特勒“组织”了混乱。1933年3月23日在波茨坦,在普鲁士

国王的庇护所即驻军的教堂里，普鲁士人兴登堡老元帅庄严地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来自奥地利的征服者、所有德国人的元首。这个仪式就是这种混乱的第一个证明。新总理需要以弗里德里希二世真正接班人的身分出现。后来，当失败来临时，他再次使用这种手段来激励军队。但这不过是一种幌子。冲锋队的日报《黑色军团》毫无顾忌地指责普鲁士为“德国内部最凶恶的敌人”。确实，普鲁士有东西要说，要证明，但那不是希特勒的狂热主义，而是一种需要保卫的文明形式，为此不惜使用武器。他们中有些人就曾为普鲁士这样做过。他们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从小在对国家和军队的迷信中成长起来，他们以生命为代价选择自己的营垒。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位在西方鲜为人知的领导人物海尼格·冯·特拉斯科。他以第二军参谋长的身分参加了1944年7月20日的未遂暗杀，当时他是德国军队中最年轻的将军，本来是有最光辉的前程的。暗杀失败24小时后，他独自开着指挥车深入波兹南南部的科罗洛维森林，在那里歇脚，然后下车，一直走到苏联军队的前哨。发现他遗体时他的头部已被打碎。当天上午，他还向他的朋友和副手施拉勃朗多夫简单告辞，他说：“我们任何人都不要埋怨命运。一个人一参加反抗，同时也就穿上了染有毒血的祭衣。一个人的价值只能用他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生命的能力来衡量。”几个月前，在波茨坦为他的儿子们举行宗教接手礼时，他还说过：“永远不要忘记你们是在普鲁士土地上长大的，今天你们被接受来到圣—塞纳教堂，这是古老的普鲁士最神圣的地方。这包含一个重要的义务：为真理服务，履行义务至死不渝。永远不能把真正的普鲁士主义与自由观念分割开来……。”

这就是斯大林扼杀前的普鲁士的灵魂。我这种看法与我赞成

德国统一不是格格不入的。我觉得海尼格·冯·特拉斯科的祖国有权重新找回她失去的,把德国缺少的一部分归还给德国。

此后不到 10 年,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消灭了,德国被粉碎了。1953 年 6 月 16 日、17 日,东柏林和东德的其它城市马格德堡、哈雷、爱尔福特、莱比锡的工人起来反抗他们新的主人。总罢工的命令一发出,工厂立即停工。海尼格斯道夫钢铁厂的一二万名工人抄着手,抵制一切生产。在两天的时间里,马路上挤满要求乌布利希、格罗提渥、皮克辞职和进行自由选举的人群。人们从勃兰登堡门上撕下苏联的国旗。17 日中午,多贝里茨师的俄罗斯坦克开进了柏林市中心,宣布了戒严。一直战斗到夜里。第二天,东德新闻界对此事一字未提。官方公报提供的伤亡数字为死 25 人,伤 380 人。西方有人说死 400 人,伤数千人。格罗提渥向执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递交的报告中称,30 万工人参加了罢工运动。闹事者造反不是梦想两个德国的统一,他们只是对劳动条件、增加生产定额和生活水准下降表示抗议。但是,镇压和处决接踵而至,由苏联和政府的坦克来镇压骚乱,几个小时内就把一场工资冲突演变成一场政权危机。政府只能通过加强警察和官僚机构,建立直接由中央委员会领导的民兵战斗小组,在西部边界竖立起一面从严格意义上把分裂的德国人抛向两个敌对世界的隔离墙。从那以后,东部居民如果想逃避压制,只能冒着生命的危险借机移居国外,或者只能在鄙视屈服中保持沉默。布莱希特在他的《答案》一诗中放肆地写道:

“6 月 17 日暴动后,
作家联盟的书记在斯大林小道散发传单,
传单上说人民随随便便失去了政府的信任,

要恢复政府的信任,只有加倍努力。

政府决定解散人民,

再选出另一个人民,

是不是将更为简单?”

沃尔夫·比尔曼在《歌唱者的开幕式演说》(《铁丝网的圣诗》)中更为咄咄逼人:“过去敢顶住机关枪射击的人惧怕我的吉他。我一张开歌喉,恐惧就传遍他们的全身。当我以歌声骚扰大厅,冷汗就湿透了官僚主义的长鼻。真的,我应该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广场上跳舞的一个害人精,一个怪物,一条恐龙;应该是在大炮里爆炸的炮弹;应该是什么也不畏惧的负责人们喉咙里的一个球,只要责任……。”“呵!失败属于压迫你们胸膛的可怕的皮带!呵!如果你害怕心脏受到损害,至少把皮带松开二至三个孔,习惯于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喊叫……让我们高昂着头迎接明天!”最后,“我们的父辈是叛逆和自由的孩子,让我们真正成为我们父辈的儿子。”

6月17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官方的历史文献中变成了反革命日,是存在着“美国人组织和支持的地下法西斯运动”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在联邦共和国,反抗的这一天相反被当作“德国统一日”来庆祝,还被宣布为“法定节日”。洛塔尔·巴尔在他的《一个从最近一次战争中出生的德国人》一书中对双方的过激反应作了另一种解释:“联邦德国这个节日是反映50年代气氛的粗劣的谎言。西德领导人把斯大林小道和其他工地的工人尊为德国统一的烈士,是为了把分裂国家的形象彻底颠倒过来。长期以来,阿登纳总理与其说是倾向统一的观点,还不如说是倾向分裂主义观点,他通过这种做法廉价地成了统一的赞成者,同时把分裂的重荷完全压在民主共和国身上。”不管如何,1953年6月的骚乱从某种程度上

把德国的分裂固定化了，证明了伊萨贝尔·法尔萨《从波茨坦会议到统一的德国》一书中的如下判断：“对于德国的每一方来说，统一道路要通过能把另一方吸引过来的不可缺少的强盛来实现……但是，两国的每一方的权力是与双方分裂的程度同时增长的。每个德国越是强大，德国的分裂将越为深刻。”诗人、评论作者、创办先锋派杂志的47人集团成员汉斯·马格尼斯·埃兹斯伯格以他的方式证明：“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个敌人在相互斗争中变得日益强大。每一方都以另一方的标准来衡量自己。”

当我第一次就德国重新统一的可能性公开表态时，正巧我站在到巴黎进行国事访问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身边。那是1989年7月5日。人们知道苏联人是反对重新统一的前景的，甚至有人谈到他们会使用否决权。当天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们各就各位。他们利用我们对德国问题显然不同的处理方式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们一石二鸟，还希望能对流传中赫尔穆特·科尔与我在同一问题上的分歧得到证实，他们对后一点更感兴趣。

长期以来，重新统一问题是一个禁区，自从两个月前东德人向匈牙利大批外逃后，重新统一才成了热门的政治话题。多数西方负责人对这一现象的表态极为审慎，特别是德国人注意避免做出会唤起不合适的回忆的任何蠢事。因此，当我们谈到这个敏感问题时，无论是联邦共和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还是总理科尔，亦或是副总理根舍，总是指出：国家分裂在每个德国人心中是一个流着血的伤口，但现在有更紧迫的事情要解决。这一表态一直持续到我后面还将谈到的柏林墙倒塌之后。九天后，赫尔穆特·科尔在巴黎举行的欧洲特别理事会开幕式上所作的长篇发言中从头至尾对重新统一一词保持沉默，因为他担心在12国中引起新的

紧张。莱昂·甘必大使阿尔萨斯和洛林所说的“永远想着它，永远不要谈它”的话超越了时空。但是，记者们不像政治家们那样受国际上各种偶然事件的约束，他们不那么小心谨慎，于是毫不掩饰地向我们提出了问题。

我对《柏林日报》记者的答复太简短了：“统一的愿望是一个合理的愿望。”这个答复有待展开。因此，几天后，即7月27日，在与五家欧洲大报——其中包括法国的《新观察家》周刊谈话时，我又回到这个题目上来了。这五家报纸问我对当时主要问题的看法。当我们谈到德国问题时，我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我前面说过的话，接着补充道，“统一只能‘和平地、民主地’实现。”这两个分量很重的副词包含了我坚持的原则。据我看来，这些原则应该指导德国统一。最后，这些原则确实占了优势。如果说统一目标是合理的话，这不意味着不管怎么做统一都能成功。另一方面，为捍卫和平，必须解决以下五大困难：德国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而且立即由联邦德国承认；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四个接管国就向统一的德国移交权力达成协议；德国放弃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德国继续归属于大西洋联盟；确认德国对欧洲共同体的承诺。大家知道，这五个条件都得到了满足，最后的协定已于1990年10月3日签署。

大家看到，在达成上述协议前，四大国中的每一个国家都主要支持最符合其各自利益的优先条件。当然，这是正常的。美国特别关心将来的德国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苏联人还在德国统一的不可避免性上摇摆不定；至于英国人，通过玛格丽特·撒切尔之口，设法推迟统一的期限。

我把预先承认边界放在主要地位。后面我将阐述为什么这一

要求在我与赫尔穆特·科尔之间引起了长时间的、艰难的、但一直是友好的辩论。法国的保守的反对派还以此为论据指责我们的外交“没有赶上德国统一的列车”，因为没有闭着眼睛登上第一节车厢。此外，正如我已经强调的，没有任何西方领导人冒此风险，只有我与乔治·布什是最早向统一的前景表示敬意的。我对我国如此多的负责人再一次忘记历史教训的反常现象感到惊讶。当然，两德间的边界问题是特殊问题，赫尔辛基会议认定的边界不可变动性保证了民主共和国享有欧洲其它主权国家相似的地位。两大集团对此充当了担保人。它们为各自的“牧场”划定界线后，就竭力阻止一切可能动摇战后均势的活动。像一切均势一样，战后的均势也是脆弱的。但是，他们在赫尔辛基还宣布自决权，即人民拥有自己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怎么克服这个矛盾呢？事变是时代的主人，人们让事变作出决定。而事变已经发生。为了不至于措手不及，最简单、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参照形势要求的公平和谨慎的原则去处理。

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部分居民开始向西方逃跑，到1990年5月18日两德间签署货币联盟条约，事实上，认定统一只相隔一年。这时间之短，超过了德国人的想象力。从东欧各国返回的成千上万名原籍德国的德国人回到了联邦德国，这首先激起了热情。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回国者自称德国人，但并不都是德国人。他们得到的实惠过于丰厚：给予就业，提供一小套住房，按照他们的职业重新建立退休金。人们开始就有关人员的民族出身提出疑问。冯·特哈顿教授长期在弗里德兰德集中营附近的戈蒂根教书，他对我们的大使说了心里话：有些来自波兰的回国者所带的证件是根据情况制作的。西德总理科尔受到猛烈的攻击。他是不是走

错路了？人们宣布发生了政治危机。但到7月，随着民主共和国“真正的德国人”的到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其它东欧国家归国的人流停下来了。9月11日，在不莱梅举行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代表大会上，赫尔穆特·科尔面对不知道“小步政策”已执行到什么程度的反对派，谈了统一问题。同一天，布达佩斯政府决定从午夜起向在其国土上的德国难民开放与奥地利的边界。同月30日，联邦德国驻布拉格大使馆的6000名东德难民被允许进入西德。相反，在东柏林，昂纳克还在顽固地坚持他的立场。民主共和国于10月6日庆祝国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7日参加了常规的阅兵式。他在那里向新闻界发表讲话时，宣布赞成在东德进行的改革，并讲了“迟到的人将受到生活的惩罚”这句名言。每个人都知道，昂纳克已不被承认，苏联在这个华沙条约成员国保持的40万士兵是苏联帝国的主要部分，这些士兵不会向游行者的开枪。第三天，7至10万德国人涌到莱比锡的大街上。后来几天，人数更多了。其它大城市在烛光下燃烧起来。安静的人群把蜡烛安放在广场上，安放在教堂里，安放在所有十字路口，好像是为了画出一个充满喜悦的同心圆。由于内心充满喜悦，希望重新恢复了活力。18日，埃里希·昂纳克被免职。埃贡·克伦茨是见证人。官方的讲话改变调门了。人们在努力维护产生革命的思想秩序和政府体制的同时开始妥协了，这一场革命由于承受了太多的失败、太多的暴政、太多的失望和太多的盲目而奄奄一息。11月9日的柏林还处在混乱之中，东德共产党的政治局通过其发言人谢博沃斯基先生之口宣布开放两德间的边界。几十万东德人立即涌向西部。正如在华沙、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一样，人民创造了历史，这个历史是另一场革命的历史，这场年轻的革命是法兰西革命在两个世纪后的生动

继续。人民粉碎了主子们的权力和主子们的机器的权力,战胜了恐怖,摆脱了各种各样的警犬、警察、军队、官僚、新闻、官方文学、学校、封闭式的观察哨所。没有任何组织、任何政党、任何真正的领袖对人民进行动员。他们从自己身上吸取力量,看出政权的失败和制度的腐败,通过关闭的门窗辨别一线光明,感觉到不可遏制的自由接近了。正如塞尔日·布瓦德韦所描写的:“11月11日,当已成为东德政权的第二号人物的谢博沃斯基来电话时,我和我的美国、英国的同事们都在西柏林市长蒙帕尔先生的办公室里。这是疯狂。怎么阻挡游行爬上勃兰登堡的大门呢?谢博沃斯基有一个想法:应该转移注意力。他建议蒙帕尔先生和他本人第二天8时30分起带着推土机在波茨坦广场的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他说,电视记者得到通知后将携带摄像机来,特别是备有聚光灯的美国人会在夜里照亮墙和大门,所有的人都会接踵而至。后来的经过就是如此。”

三、四大国的反应

我们回忆到这里的时候,暂时停下来观察一下最近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德国地位的保证国的反应。与莫斯科相反,西方三国早已承认两个国家的德国人有权重聚。但是,它们没有预见到苏联的突然崩溃,它们愿意对这惊天动地的事件进行冷处理。因此,它们在做法上有些优柔寡断,我们就来看看它们做法的变化。

在英国,1989年11月10日,首相新闻处发表了一份公报,撒切尔夫人通过公报对取消东德居民向西方移居的限制感到高兴,希望这是拆除柏林墙的前奏;期待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认为逐一处理所有事件是合适的。但是对统一未置一词。三天后,在伦敦市长在市政厅举行的晚宴上,她谈到东德的自由选举和政党多元化,讲到与中欧新生民主政权的合作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应该发挥新作用的问题。但是,仍然未谈统一问题。11月24日,她在《时报》提问后声称应该把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第一位重要的是“努力让民主来到东方各地”。她还说明,当民主建立后,“可能在十年内,也可能在二十年后,欧洲的地图将变得很不相同”。还是不谈统一问题。11月18日,我在巴黎主持了欧洲特别理事会。她从巴黎返回后,英国广播公司要求她发表评论。她以难得的韧性重复说,唯一重要的是民主的来到,东方的变化应该导致加强大西洋联盟,并给东西方关于裁军的谈判以新的机会。她还利用回答问题的机会否定12国的欧洲共同货币计划。但关于东西德统一仍守口如瓶。一直等到1990年1月

24日,才在回答《华尔街日报》的问题时谈到德国统一的“遥远的前景”,说德国统一“应该考虑其它的必要性,并在给予解决这些问题所需时间的条件下进行。否则,它只能造成不稳定”。话是说了,但还是爱理不理的样子。最后,2月18日,撒切尔夫人在英国犹太侨民的代表们面前承认,统一已不可避免和已经临近。她说:“毫无疑问,德国的两部分将重新聚合在一起。”这样,从1989年5月到1990年2月的十个月期间,她坚持不接触她认为不合适和危险的领域。她对德国统一的沉默——在所有人都在谈论统一的时候——远不能掩盖她想推迟统一到来的愿望,反而凸显了她的这一愿望。

从1月24日到2月18日之间发生了什么能够解释这180度的突然变化呢?只有一种解释:历史在快步前进。

莫德罗先生在访问莫斯科时谈到“德国,统一的祖国”。戈尔巴乔夫先生回答他说,他不再排除统一的可能性。在波恩,人们在考虑建立两个德国之间的货币联盟。赫尔穆特·科尔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认为,只有人民能决定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生活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赫尔穆特·科尔和汉斯·莫德罗同时看到“现在统一是可能的”。德国人和法国人重申他们赞同正在发生的进程。意大利政府首脑朱利奥·安德雷奥蒂和科尔总理采取了相似的立场。最后,2月14日,乔治·布什和科尔总理在戴维营会晤,以结束四个接管国和两个德国(即4加2)的谈判。英国不能再置身事外,撒切尔夫人懂得这一点。从此,她将加快步伐,赶上事态的发展,参加将导致德国统一的安排,如果可能的话,还会在安排前采取行动。她以她惯有的活力改变了自己的立场。2月25日,她向《星期日泰晤士报》说:“英国要求统一应考虑它的国际影响,因此

是唯一正确的……我们是首先表明这一态度的,现在所有人都是步我们的后尘。”亲爱的撒切尔夫人!人们在这里又看到了她那“思想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难以模仿的表达方法。事实上,她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提及“国际影响”的。但是,如果她在公开演讲中能做到对她的思想守口如瓶的话,那么,她在与能吐露心声的对话者私下会谈时并没有掩盖自己的思想。我可以证明,比如1989年12月8日、9日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理事会上,她就曾顽固地以著名的“影响”(联邦德国承认边界,四个接管国的权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大到民主共和国)为掩护,避免作出任何决定。据她说,任何决定都将增加德国的分量,导致欧洲的严重失衡。我还记得,当赫尔穆特·科尔一开始拿出一张王牌(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1967年通过的一份文件中有利德国统一但已被所有人遗忘的一段话——那时,只要决定看来得不到执行,大家可就一切达成协议)时,她目瞪口呆和怒气冲冲的样子。我后面还将谈到那次讨论。不管她态度如何,在整个辩论过程中,我经常用我1990年1月20日在伦敦同她共进午餐时说过的话或用几乎相同的措词向撒切尔夫人重申我的观点:“我不说反对重新统一。那将是愚蠢的和不现实的。我看不出欧洲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我不能肯定苏联今天能这样做。最好睁开双眼,接受重新统一,并把德国的统一与欧洲的建设和保证边界联系起来。”那时,她激动地举起一张被强盛的德国统治的欧洲地图,请我研究为抵消强盛的德国而实现法英接近的条件。正如每次我们谈及这一问题时那样,我回答她:我深为遗憾的是,在官方的演说中大家一直在颂扬我们两国之间的联盟,但没有什么内容。我们从未就哪一个目的达成过一项协议,包括协调最为简单的武器装备系统。英

国没有摆脱美国控制的足够的活动余地。德国是欧洲建设的支柱之一,我不能拿只限于得到良好感觉的法英谅解来与欧洲建设做交易。我曾多次开诚布公地就这种状况与联合王国先后驻巴黎的大使们交谈过。他们所有人都装出痛心的样子,并向唐宁街发去令人不安的电报。但是一切照旧。我每次去伦敦都受到很好的接待。我主动建议举行的所有法英首脑会晤总是气氛良好。人们反复保证将恢复联盟的活力,恢复我与玛格丽特·撒切尔之间良好的个人关系。但这一切均未能导致推动真正行动的任何倡议或决定。在12国会议上或是在我们两人的会谈中,撒切尔夫人继续无事自扰:决定前往往是小小的暴风雨,决定后更是怒发冲冠。众所周知,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英国首相毫不谦让地在确认德国统一的协定上签了字。

在美国,布什总统对宣布东部德国人开始大批涌向西部的反应是迅速而谨慎的。说其迅速,因为他在1989年5月16日就声明说,“如果人们能在适当的基础上获得重新统一”(自决原则)那将是“完美的”。说其谨慎,是因为他还补充说:“我不主张这种情况迅速到来。”事实上,他甚至在措词上都是重复着国务院的传统立场。15天后,即5月31日,他在美因兹就欧洲和东西方关系发表的一篇重要讲话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德国统一,实际上是进一步介入了。他以欧洲大陆的统一——“自由国家共同体”和推动德国及东欧自决为轴心描绘了一幅广阔的欧洲图画。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阐述。当然,日后的事态证明美国人、法国人对欧洲统一的观点是不同的。但是,乔治·布什的讲话证明他已懂得欧洲动乱的广度。“德国的自决”这是美国外交的经典说法,但由于说话的时间和地点(在美因兹),这种说法有了更新

的含义。他在多数欧洲领导人之前表态,又明显地与撒切尔夫人唱反调——这种态度在罗纳德·里根时代是不可思议的。他在9月18日大声说:“某些人感到重新统一的德国对西欧的和平是危险的,我从根本上不同意这种说法。”简言之,乔治·布什在德国下了赌注,不同意英国对德国中立主义愿望的担心。10月25日,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重申了这一点,同时从经典的外交均势的角度说明:“不应该因此而人为推动重新统一的思想,也不要确定日程表,这需要时间……”

11月10日,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他在白宫发表声明时就更谨慎了:“谈重新统一尚为时过早。”大家可以看出,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以不同的方式分析着20世纪欧洲历史的这一决定性阶段,一个怀有疑虑,一个表示信心,但他们一致认为不必着急,要放慢步伐。“为时过早”,这是那一时期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伙伴们口中最常说的一个词。

在莫斯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态度的变化对当时的力量对比是很有意义的。11月15日,苏联总统向共产主义青年团讲话时还坚持以下观点:存在两个德国是历史形势造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的胜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有效认同,因此将一劳永逸地存在下去。“这两个国家的重新统一问题是不存在的……别有用心地谈论这个问题,等于干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内政……在民主德国发生的一切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复兴进程的范围。”他把东德内部的动乱看作新思维带来的改革运动的自然结果。总之,他拒绝考虑德国人统一愿望所提出的问题,只乐于把一切解释为共产主义社会内部对改革和自由的向往。11月29日,他的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反映了这种态度,立场毫不

含糊。在对科尔总理 11 月 18 日向西德联邦议院提出的 10 点纲领作出反应时,他指责科尔总理在无视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意见,首先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利益和意见的情况下推动重新统一。

这一明确的消极反应并未导致与波恩关系的真正紧张。谢瓦尔德纳泽先生 12 月 6 日在基辅再次发起进攻。他重复说,统一不是当务之急。他还警告那些想在柏林加速事态发展从而使东西方关系接近复杂化的人。但是,德国当局不会没有注意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及其外交部长讲话时使用的是“好伙伴”式的语言,因此难听的话也显得温和了。这种暧昧态度在谢瓦尔德纳泽先生 12 月 18 日对欧洲议会政治委员会的讲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先警告说苏联“不允许冒犯我们的战略伙伴、华沙条约成员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然后心平气和地列举了德国统一所必要的、充分的条件:保证安全,边界问题,同盟关系,托管国的权利,非军事化,等等。只要莫斯科不再设置障碍,所有这些条件都是可以实现的。苏联的态度忽冷忽热,各有其用。所谓冷,就是 12 月 11 日要求召集托管国的大使们开会,以重申四国对德国的权利。所谓热,就是 2 月 13 日在渥太华 4 加 2 谈判开始时,苏联赞成重新统一应在外部问题由外部监督的情况下进行的思想。如果掂量一下自 11 月中旬以来说过的话的分量,就可以感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越来越缓和了。从 1985 年到 1990 年,我经常同苏联总统讨论德国的形势。我欣赏他思路清晰,看得很远。我和他一样,想为欧洲争取一个新的地位,他的“全欧大厦”方案最正确地表达了我关于“统一的欧洲”的观念。但是,他作为一个强国的领导人,显然永远不会赞成德国的统一。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事态的



图7 美国前总统布什邀请冷战结束时在位的四位
国家领导人聚会(1995.10)

发展所引起的变化非常确切地反映了苏联和德国之间力量对比急剧的、总是有利于后者的变化。俄罗斯帝国的解体是在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对整个大陆,特别是对东德的居民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之时发生的。戈尔巴乔夫甚至不再准备求助于恐吓手段,因为他那在欧洲无敌的武装力量,由于无法进行能让人害怕的威胁而显得一无用处。他所积累的武器和庞大的核武库还顶不上博物馆的一支步枪,因为俄罗斯不可能使用它们,而且所有人对此都心里明白。

1990年2月20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受《真理报》采访时,对苏联的两难处境画上了最后的句号。他说,“德国重新统一不仅与德国人有关,形势发展到今天,先由德国人自己统一意见,然而由他们邀请其他人来批准他们已经作出的决定,这是难以想象的。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允许模棱两可……”这些话他已曾说过,新意还在后面:“问题是要(在4加2范围内)详细和分阶段讨论德国重新统一的所有对外方面,就此作为准备,以便把这个问题列入欧洲的进程之中并审议未来对德和约的基础。”

禁区终于打破了。

四、法国各派的态度

我已经阐述过 1989 年 5 月至 10 月间法国的政策。在我看来,统一是天经地义的。但实现统一至少需要承认现有边界并谈判向德国移交四大托管国的权利问题。我同乔治·布什一样,公开地在公众面前表示接受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还在回避的统一的前景。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承认统一的不可避免性后,我同他们一样要求审议有关统一的所有国际方面的问题。乔治·布什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强调未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作用和统一后的德国在该组织中的地位,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我则强调尊重赫尔辛基协定。但我认为,只要民主德国不再援引赫尔辛基协定,该协定在两德分界线上就不起作用了。1989 年 10 月 25 日(柏林墙倒塌前 15 天),我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上发言时宣布,我认为东欧正处于将要横扫共产主义直至其最后堡垒的一场革命的开始;意识形态的圣经也罢,政治制度也罢,无情的镇压机构也罢,都无法抗拒这场革命。“一切都将扫荡一空,因为别的东西来了,这就是我们幸拥有的自由。”我最后说:“人们有什么理由指责德国人重新统一呢?怎么会认为仅仅在华沙和布达佩斯存在着民族特性的问题呢?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首都到另一个首都,运动的方向是一致的,将会遇到同样的矛盾,遇到同样的障碍。历史不可能提前数月或几年预先写出来,但是到时候一切都能写下来。但愿这一页历史能迅速写完……”大战结束以来,我常常推心置腹地对法国人说,我希

望能看到雅尔塔欧洲的终结。这个时刻现在来到了。在我的思想里,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欧洲被一分为二是与德国的分割同步的,一分为二的欧洲把德国变成了冷战的决斗场;因此,欧洲的统一必然要通过德国的统一来实现。我在11月3日即柏林墙倒塌前6天在波恩举行的法德首脑会晤后得出了符合逻辑的结论。

当我们从两排鸦雀无声和焦虑不安的记者和官员中间穿过,进入专门为举行记者招待会之用的总理府大厅时,大厅里摄影师和摄像师摩肩接踵。赫尔穆特·科尔刚刚还在同我谈他出访波兰的计划,对于突如其来地、粗暴地向我提出有关德国统一的问题看来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在我简单地作了开场白后(“欧洲的事态发展越快,我们越应加速和加强欧洲共同体建设,越应为引导占据人民整个身心、使人民兴奋不已的运动提供一个各部分相互协调的、坚实的欧洲轴心”),一名德国记者首先向我发起进攻:“你对德国可能重新统一是否感到胆怯?”但是,可能由于扩音器声音太弱,也可能由于译员思想不集中,翻译没有跟得上。科尔侧过身来,轻声对我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应该让所有人都听到。”吕克·罗森兹威格和克莱克·特雷昂在第二天出版的《世界报》上指出:“赫尔穆特·科尔的表情如同参加一场艰难的考试。他听着,怀有信心,但极度紧张,好像强迫‘弗朗索瓦朋友’接受的考试对他本人也是危险似的。在后来提出另一个关于德国东部边界问题时,他索性变得局促不安了。”我自己也感觉到,我的回答可能会引起不可控制的后果。我的回答如下:“这个问题不应从胆怯或同意的角度来考虑……不,我不害怕重新统一。历史发展了,我顺应历史。”另一名记者希望我对未来10年欧洲的结构会发生哪些变革作预测。

我补充道：“这会快的，很快的。今后任何一位欧洲政治家在进行思考时都不能忽略这个因素。”这时，吕克·罗森兹威格问我是不是认为德国统一会引起奥得—尼斯河边界的改变。我只作了这样简短的回答：“没有必要旧话重提。”而实际上，这个问题成了法国与德国持续几个月的辩论中心。

法国的反对派起初当哑巴，这时开始大吵大闹起来。过了整整一个月，他们中最有政治远见的人围绕经过深思熟虑的论据组织了他们的表态。莱奥塔尔先生在12月13日的《巴黎日报》里写道：“让德国人自己去处理他们重新统一的合理愿望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应该通过与他们一起控制重新统一的范围、方法和日程表，使友好的人民在掌握自己命运时不至于使他们的邻国人民感到不适。”为此，他建议这么说：“在赞成一个更强大的德国的同时，也要赞成一个更强大的欧洲。”我之所思所言与其别无二致。同一天，在同一张日报里，雅克·希拉克先生确定了他所谓的“德国人民自决”的条件：“我们关于德国统一的讲话应该是建设性的。我们不应该再满足于说我们是赞成德国人民自决的。我们应该补充说，从今以后，这是我们理解和支持的一个目标。同时，鉴于法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希望波恩承认德国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这不仅是由于过去，而更是为了我们愿意一起度过的未来。法国不害怕德国人民的统一，法国已决定采取能使德国人民自由选择自己命运的行动。但是，这一进程的实现应尊重我们的德国朋友们完全接受的某些原则：

——首先，目前的边界，尤其是波兰西部的奥得—尼斯河边界不可变动（在这里，这位前总理使用了后来大家才领会其意义的前瞻性说法：不能离开了雅尔塔的欧洲，又回到萨拉热窝的欧洲）；

——其次,按照国际协定重申德国不得拥有原子、细菌和化学武器;

——最后,如同科尔所指出的那样,德国继续紧密地与西方拴在一起,即在共同体和大西洋联盟内发挥积极作用。”

大家看到,这些分析和建议与我的分析和建议几乎字字句句相吻合,这是相当罕见的现象,因而很突出。继续论战已不再有任何意义。但出于内政方面的原因,论战还在继续。特别是吉斯卡尔·德斯坦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在谴责我的政策的同时,在11月10日几个小时内先后向《费加罗杂志》和法国国内广播电台的《异见》节目发表讲话,尖锐地提出他自己的政策。当卡特琳·娜伊代表《费加罗杂志》问道:“当你听到弗朗索瓦·密特朗说他不害怕德国重新统一时,你是否同意他的想法?”他并未拐弯抹角:“我认为他说得太早。”“尽管民主共和国的事态在急剧发展,弗朗索瓦·密特朗还是走得太快,走得太远。不应该超越阶段……我认为法国的步骤应该如下:首先建立西欧联邦,然后东德与这个联邦接近。”他在《异见》广播节目里与四名记者对话时重申了这一思想,我从中摘录一小段如下。皮埃尔·勒马克问:“关于两德重新统一问题,你似乎比密特朗总统更犹豫。为什么在你看来他的态度为时过早?”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回答:“我认为,你们所有人思考问题的节奏都太快,包括密特朗总统,就好像人们必须经历德国统一的一个阶段似的。但是,请好好想一想,如果实现重新统一,欧洲的地图和状况将会如何呢?”第三天,他又重申了这个论点:“有些人显得不谨慎,特别当共和国总统说到柏林墙的消失意味着重新统一已非常临近时更是如此。”他自我解释道:“经历一个重新统一德国的阶段对于欧洲是危险的。拥有8000万人口和经济占优势

的德国重新在帝国时代的首都柏林定都,这意味着我们将进入与共同市场的欧洲根本不同的一个欧洲。为了避免这一危险,给予欧洲共同体一个联邦制结构是紧迫的。这是第一位的事情。只有在西方完成这一进程后,才能设想吸收包括民主共和国在内的许多东方国家。此后,统一才是可能的。”总之,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确定的轻重缓急顺序与客观上自然形成的顺序是相反的。他下面的话说得更明白:“我的看法是我希望联邦欧洲适时地欢迎东德,而不单单由联邦德国来欢迎东德。什么时候?我看在本世纪末。”持这种看法的并非前国家元首一人。在重新统一的德国不可逆转地与西方建立牢固关系之前,众多的各色各样的负责人,由于担心德国重新统一的前景,因而持有与他一样的看法。我对他们的论据并非无动于衷。远非如此。但是,我要处理的是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梦想中的历史。不仅德国统一已经启动,正在失去其帝国地位并正在解体的苏联的虚弱状态只会加速德国统一的到来,而且我认为那被战胜国的法律一分为二的人民重新拥有共同的祖国,那是正义之事。但我对法国强大的邻国重振旗鼓后将给法国带来的危险并非视而不见。这种新形势要求法国作出异乎寻常的持久努力,以便承受一个新的德国的竞争。这个新德国人口更多,组织有方,有条有理,拥有比法国更活跃、更稳定的工业与货币,出现在世界所有的市场并在欧洲的心脏部位占据得天独厚的空间。但是,我们应该接受这些挑战。法国能够接受这些挑战。为此,我们应该鼓励人口增长(这方面已比德国更有希望),使我们的工业现代化,在改革经济的基础上巩固我们的货币,为显示我们的发明、创造能力而勇往直前,继续推进社区建设直至其完成。德国的统一就是这样要求法国把实现上述目标作为国内政策的依托。

至于被迅速发展的事态突然超越的欧洲建设,我自己对其拖拖拉拉也是感到遗憾的。我并非不知道,在1989年底,12国之间未就我所优先关注的联邦结构问题达成任何协议,连远期的协议也没有,而德国的进程却在加速进行。我看到,苏联已江河日下,匈牙利和波兰与莫斯科拉开了距离,整个共产主义欧洲摇摇欲坠,柏林墙的倒塌开始造成连锁反应,分隔两个欧洲的堤坝正在断裂。奇怪的是,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在热情主张应把德国重新统一推迟到欧洲大厦建成之后的同时,竟揭露所谓我们的外交对立即实现这一进程缺乏热情。反对派步其后尘,肆无忌惮地全体出动,对我们的“落后”、“不能胜任”发起系统的攻击,这些攻击又被忽视核实消息来源的记者们夸大了。俗话说,谎言重复不等于真理。只要追溯一下这一时期法国对各种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我不想指责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错误地判断了事件的逻辑和没有抓住推动德国统一运动的动力。据我回忆,比他更具洞察力的美国、英国、苏联、德国或法国的国务活动家也不多。但是,没有哪一位像他那样提出了如此远离现实的方案。在德国统一的道路上有多少曲折,有多少障碍呵!撒切尔夫人的意见与法国前总统的意见是接近的,但她也只限于要求东德先恢复民主,只限于提及赫尔辛基协定。就这样,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把自己摆到了德国统一反对者的最前列。然而,他的判断也是随着四季变换的。在秋天,他是完全的欧洲联邦主义者;接近冬天时,他成了德国邦联主义者(12月11日他在蒙特卡洛电台的扩音器前向伊夫·穆鲁西吐露了心声);一闻到春天的气息,他就成了统一的十字军战士:“我认为,我们应该习惯于两德合并是正常的这种想法。”(2月16

日在卢森堡广播电视台的讲话)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最终的观点未能在某处对接。我是乐于对接的。要不是在夏至前不久,吉斯卡尔·德斯坦因肾病而同我保持了距离,我们差点就要一致了。他指责:“弗朗索瓦·密特朗错过了德国统一的列车。”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通过阅读上面这些段落,大家都能看到,有许多人同我一样还站在月台上呐!

五、科尔总理的 10 点纲领

1989年6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庆祝建国40周年,通过新闻机构出版了一本长达600页的颂扬其无与伦比的成就和德国在世界上重新赢得的地位的著作。当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威尔纳·维登费勒德先生为这本著作作了序。尽管这一著作的发表与我们将要转述的事件是同时发生的,但在这本厚厚的著作里,却找不出预示着即将发生改变德国、从而改变整个欧洲的动乱的任何迹象。这是因为,在苏联卫星国相继发生的戏剧性变化对西德人来说仍然是不可想象的。消息最灵通的人士和最雄心勃勃的人士的政治眼光,均没有超出联邦总统府国务秘书布莱克先生1989年3月与法国驻波恩大使谈话中吐露的对未来有节制的构想:“对于整个德国来说,邦联的思想今后已不再被排除在外。”

在柏林墙倒塌后一周,西德总理在联邦议院要求他的同胞们保持最谨慎的态度:“从民主共和国获得新的自由空间给我们带来的欢乐,不应使我们忘记我们还只处在一场演变的开端,我们还远离目标……我们在所有行动中应当保持稳健,保持头脑冷静。”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以同样的谨慎态度在进行思考。前总理维利·勃兰特充当了该党的代言人。特别是他接受《世界报》采访时的谈话有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即执政党的内部辩论中,批评也表面化了。赫尔穆特·科尔是否已控制不了局面?这时西德总理出面讲话了。11月28日晨,他在联邦议院宣读的10点声明,是联邦共和国第一个详细论述政策或透露其政策的文件。

对这个纲领的严密分析显示,这个纲领的影响非常深远,或者说其影响比作者原先想象的要大得多。在波恩政府里和 12 国共同体的政府里无人知晓西德总理的用意,除了他的某几位助手。当时担任赫尔穆特·科尔特别顾问的霍斯特·特勒茨希克在他 1991 年出版的《统一的 329 天内幕》一书中指出,前一天,正在润色文件的赫尔穆特·科尔表示,实现联合至少还需要 5 至 10 年。特勒茨希克补充道,“即使到本世纪末才实现统一,人们还可以说,这是令人高兴的历史巧合。”总之,西德总理显然是在最后一分钟决定讲话的,因为为了把 10 点纲领提交议会,他不得不利用预算草案二读审议的机会。从那时起,我和他就此问题开始交谈。与德国新闻界广为传播尔后又被法国新闻界引用的消息相反,我没有对西德政府首脑采取主动行动的权利提出异议,因为这关系到他祖国的命运,我理解和承认,由于舆论的不明确和他的党的担忧,有采取主动行动的必要。何况,只要认真读一读 10 点纲领,就会发现这与他过去的做法没有割裂之处。为了不刺激当时仍然仇视统一的苏联,赫尔穆特·科尔只限于把统一作为前景提出来。是即将来临的还是遥远的前景呢?谁能说呢?欧洲还刚刚受到震动。但是论点是清楚的:有两个国家,只有一个德国人民。因此,两个国家有统一起来的天职。这一切完全符合联邦共和国 1959 年建立时产生的宪法。没有什么与我所知道的西德总理的思想、方法,同他与我所谈的相矛盾的地方。他随着棋局的展开在棋盘上走棋,但未改变游戏的规则。我对他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小步”变快了?那是因为事态发展加快了!在法德关系中没有意见不和或关系重新变得冷淡。如果听听最仇视我们国家的德国新闻界的应声虫、缺乏理智的法国反对派的表态,人们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但是,



图 8 在“二战”胜利 50 周年庆典仪式上
与科尔碰杯(1995 年 5 月莫斯科)

哪条不可动摇的原则规定法国必须自动地向德国利益看齐呢？但是，确实有辩论。科尔与我开诚布公地进行了辩论。我们认为，我们两国把话说清楚对大家都有好处。当然，我曾对西德总理对德波边界问题缄口不言表示了担忧，而且我对他说了。我们同意就此进行讨论。赫尔穆特·科尔强调我们之间在实质问题上不存在分歧，但法国应该考虑“时机”问题。确实，在1989年初，很少有人就统一问题提出原则性的要求。维利·勃兰特曾不无讥讽地说：“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这样一些盟友：只要有人要求，只要不花钱，他们就会天天签署文件，说德国应克服分裂。”他补充说：“科尔谈了一些很不起眼的事情，想不到这会引来什么抵制。”事实上，从字面看，10点纲领没有什么可使对德国政策最警觉、最多疑的审查官担心的内容。纲领开始有一段长长的开场白，对那些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表达自由意愿的（民主共和国和东欧国家的）人士表示赞扬，对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复兴的缔造者”表示感谢。12国共同体、大西洋联盟、“做了榜样的”波兰和匈牙利、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等等，无一被遗忘。最后是结论和提醒。结论是：“今天，每一个人都看得到的是，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时期的前夜，它指出了走向超现状、超越迄今欧洲现存政治结构的道路。”提醒是：“德国问题是目前紧张局势的关键。不解决德国问题，就不可能最终、持久地解决欧洲问题……”。所有这样的解决办法都应排除东欧和西欧之间那违反自然的壁垒，其中最明显、最残酷的表现就是德国的分割。”这段文字是从我前面引用的1967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决议中全文摘引的。第一点列举了为了两个德国的关系，特别是为了两德之间的旅游而应采取的紧急措施；第二点杂乱地谈到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谈到改善电话网和铁路的连接；第

三点谈到西方对东方改革的援助,自由选举、多党制、市场经济、向西方投资开放。第四点触及了问题的要害。总理复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汉斯·莫德罗关于建立一个契约共同体的思想。在这个契约共同体里,将设立各种共同的机构和专门管理经济、运输、环境、技术、卫生和文化的工作委员会。第五点目标更高:“我们准备再向前迈进一步,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准备建立起邦联结构,目的是共同创建一个联邦,即在德国实行联邦国家制。新的组织机构的合作形式将会产生并逐步扩大”,但最后又放低了调门:“今天谁也不知道最终重新统一的德国将是什么面貌……”

赫尔穆特·科尔是10点钟走上讲台的。中午12点,他那最权威的发言人霍斯特·特勒茨希克向法国、英国和美国三国大使评论他的演说。对于德国将向何处去这一中心问题,特勒茨希克先生对总理的讲话加以发挥,并概括说:“走向两国之间的利益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有朝一日可能导致某些邦联结构,尔后朝德国统一的方向会合。”大使们记下了到处都适用的提法:“利益共同体”,“有朝一日可能导致”,“尔后会合成”。作为德国爱国者,赫尔穆特·科尔在把自己放在统一运动的先锋地位的同时,明智地未对民主共和国为改变意识形态、机构、做法,从而使统一可以实现所需的时间作出预测。维利·勃兰特认为这个纲领是“有节制”的。也许,在西德总理阐述纲领之时,他已做到尽可能大胆了,因为当时他还不知道苏联的意图。事实上,11月底,德国领导人还在坚持其“小步政策”,并认为走完几步之后,还要走许多步,才能到达终点。

最传统的是第六点,参照戈尔巴乔夫提议的“全欧大厦”,提到了欧洲的未来架构。第七点论述12国共同体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现在和将来的关系。第八点,关于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第九点,

军备和军控。至于第十点,重申希望看到德国人民通过自由的自决恢复统一。结论是:“我们认识到,在通向德国统一的道路上,还会有一些特别难办的问题,对此我们还不能给予一劳永逸的解答……”

概言之,10点纲领是建立在一个“契约共同体”的思想之上的。纲领谈到了紧急援助、合作、长期援助、合同、改革,但关于东德消亡的假设是含含糊糊的。赫尔穆特·科尔重申,不管情况如何,向德国统一演变都将与欧洲的统一齐头并进。然而,尽管演说范围很广,内容很多,仍有三个问题没有涉及,即边界问题、联盟问题、重申保证国的权利问题。

但历史在加速步伐。在东柏林,大家不再相信一个被人民唾弃的国家会有什么前途。莫德罗先生建议西德总理主持勃兰登堡大门的开放仪式,他声称准备缔结“创建利益共同体条约”。1990年1月28日,他与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们开过圆桌会议后,介绍了政府的新纲领:人民院的选举应提前至3月18日,市镇选举将于5月6日举行。1月30日,莫德罗抵莫斯科访问。在得到戈尔巴乔夫首肯后返回柏林时,他提出了一项争取各国统一的4点计划,并在一群记者面前承认“一切都疏散了”。

联邦德国方面在准备两德之间的谈判。政府成立了“争取统一内阁会议”,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由6个工作小组组成:货币,社会立法和教育,司法问题,国家结构,外交政策和安全。于是,决定性的日子开始了。2月10日,戈尔巴乔夫先生在莫斯科向科尔总理和根舍先生发表了期待已久的谈话:“应由德国人自己解决德意志民族的统一问题;他们应自己选择以何种形式、按何种速度和在何种条件下实现这种统一;这种统一应与欧洲的整体构架及东

西方关系的整个进程紧密地联系起来。”我回头再谈谈最后发生的那些事件。

六、11月18日爱丽舍宫的12国晚宴 及欧洲联盟条约草案

在此期间,我以1989年下半年欧洲理事会执行主席的身分邀请共同体成员国于11月18日在巴黎开会。

我曾说明,这是一次非正式的会议,会后不发表公报,会议将在一次晚宴上进行,为12国就东欧的、特别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形势交换看法提供机会。尽管多日来法国一部分反对派一直主张把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的会期从原定的12月6日提前,我仍觉得在没有准备和未经预先磋商的情况下召开这样重要的会议是不慎重的。我在11月15日的部长理事会上说,“物各有时,斯特拉斯堡会议将从与今天的会议不同的角度召开,并要有必要的时间距离来审议德国统一提出的全部问题。”我就这样不顾多数西方负责人内心的忧虑挺身而出。撒切尔夫人缩在后面,还为她认为的形势发展太快而惶恐不安。她把一切加快破坏东方稳定的事看作“巨大的危险”,不愿冒损害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风险。她忠于她11月4日致戈尔巴乔夫的信件精神(“我同你一样认为这些变化如此之快本身就隐藏着不稳定的危险……”),竭力想让科尔总理保证在爱丽舍宫的晚宴上把他对共同体的承诺置于德国问题之前。

虽然赫尔穆特·科尔完全同意我的做法,但我们驻波恩的大使布瓦韦先生在他的电报里指出,“德国的政治阶层同舆论一样,对于从正在进行的演变中想得到什么和能得到什么还没有明确的想

法……。虽然一致同意东方的自由选择,但当想要确定优先顺序时,德国人自己之间的讨论倒变得模糊起来:提供什么样的经济援助?在什么条件下提供?什么样的自决?什么时候?采取什么形式?德国统一采取什么形式?在什么样的欧洲内?建设什么样的德国?……”西德总理通过霍斯特·特勒茨希克,在爱丽舍宫晚宴前48小时告诉我,人们强烈希望看到共同体重申“民主共和国的居民自由旅行的权利和取得言论自由、工会自由、建立独立政党、组织自由公正和秘密选举的权利”,重申决心“为克服欧洲的分裂做出广泛的努力,并为在欧洲争取和平而奋斗,而德国人民将通过自由的自决恢复统一”。

在德国,大家都在充满激情地讨论这些问题。11月6日,在联邦议院的一次辩论会上,西德总理强调,“联邦德国无意强迫任何人,也无意教训任何人。”下面这句话透露了他的内心想法:“自由是德国问题的核心。”他的财政部长魏格尔先生说得更清楚、调子更高:“自由高于统一。”维利·勃兰特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员作了同样的表态,同时表示重新统一一词可以意味着回到过去的状态,因此担心会造成新的幻觉。然而,这表面上的一致掩盖了尖锐的矛盾。在多数人的喝彩声中,西柏林市长蒙帕尔先生指责西德总理“消极”,对联邦共和国“富翁般的行为举止”表示遗憾,就是这种矛盾的反映。事实上,德国领导人没有人也不想把他们的思想全部说出来。要克服的障碍太多了。冒四个托管国中一二个大国拒绝的风险,有可能把柏林墙废墟上新生的希望毁于一旦。他们想,首先应该平息对重新统一的、强盛的德国幽灵的恐惧心理。因此,希望18日的巴黎会议避开这种讨论,而在缓一口气之后,比如在爱丽舍宫的晚宴和斯特拉斯堡理事会之间的三周内再深入加以讨

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方面也加强了压力,不让作出任何决定。他向波恩传达了“口信”,同时把“口信”的内容抄送给我:“我呼吁科尔总理采取必要的紧急措施,以避免形势恶化和不稳定。我们驻柏林的大使接到了立即与三国派驻西柏林政府的代表接触的指示。我希望你也能给你的代表下达适当的指示,以阻止事态朝着不受欢迎的方向发展。”他在考虑什么呢?口信末尾表述得明明白白:“当在联邦共和国出现煽动狂热、拒不承认战后现实——即存在两个德国的现实的声音时,这类政治极端主义只能被解释为企图破坏(民主德国的)民主化和复兴进程。”

12国晚宴就是在这种气氛中举行的。我先让赫尔穆特·科尔讲话。他长时间地发挥他所捍卫的论点:德国统一和欧洲统一是不可分的。尽管他没有明说,人们也理解:既然无法确定统一的日程表、范围和组织进程,既然这种状况在国内引起如此多的犹疑观望,在国外引起如此多的敌对反应,还不如让事实来澄清形势。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将怎么做?他们是否已准备好朝着民主制迈步?他们是否同意合并成一个国家,或者死守莫斯科所能接受的极限,即成立仅仅由特别协议结合起来的两个“国际法实体”的官方方案?人们是否该等待由民众骚动来加速事实的进程?上周在柏林的索昂堡区,来为建立统一国家进行辩护的勃兰特先生和根舍先生受到了群众的欢迎,而他却受到了群众的侮辱。他现在还余悸未消。他也不可能不知道,在无人能提供担保的情况下,12国的伙伴们对德国统一所持的保留态度。最后,对苏联的激烈反对是不能正面顶撞的。

其他人轮流就欧洲团结、东方的演变和西方的一体化、民主的胜利和通过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巩固这种胜利的必要性发表演说。

简言之,人们应鼓励改革,促进重视人权,着手进行迅速、自由的选举,积极准备将深入讨论德国问题的斯特拉斯堡理事会。即使有人提到统一问题,也只是简单暗示,好像不小心说走了嘴似的。

晚宴后,我重新阅读了我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稿,我找到了今晚谈话的所有内容:参加者对欧洲的自由进步感到高兴;注意到12国共同体的凝聚作用及其对东方舆论的作用;重申帮助从极权帝国中解放出来的东方国家振兴的愿望;为自由经济的最新信徒波兰和匈牙利的启动提供方便并为此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工作;支持民主共和国的改革;对在南斯拉夫开始发生的危机提出问题;授权共同体“三驾马车”(当时为法国、西班牙和爱尔兰)制定一项促进东欧发展的现代化的银行草案;建立一个培养干部和促进国际机构向新的民主国家开放的基金会。

我与西班牙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爱尔兰总理豪伊先生一同记者们谈话时,记者们都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一样小心谨慎,只有两位除外。一个问我:“在今天晚宴上,你是否谈到了两德统一问题?”对此,我简单地回答说:“没有。”另一个问道:“在东方演变的后果中,你是否提到了与欧洲战略均势直接有关的后果?”我说:“提到了。正如你刚才那样,是转弯抹角提及的。一切都将在现存的联盟范围内或在进行裁军问题谈判时进行。”我那些对话者的好奇心仅限于此。每个人都知道,昨天的世界刚刚发生历史性的裂变,而今天的世界不知道明天的欧洲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按什么速度形成。

在爱丽舍宫会晤四天后,我在欧洲议会上用15天前使用过的几乎同样的措词再次说明我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我问过我自己。我认为,对于最初的感觉和激动,在看清楚以前,是应该有一

段时间的；各国人民已开始分清他们的雄心、他们的深刻愿望，还有他们的梦想同现实之间的距离……”这些事件使我坚信，“无论如何，强大的、结构牢固的共同体对于整个欧洲是主要的成功因素……；共同体应该显示其特性、其决心，加强其机构，巩固其团结。这就是在欧洲共同体大厦即将建成之时应该记取的教训，以使其向东方开放成为可能。”

读者可能指责我思想僵化。为什么口口声声欧洲、欧洲？世界上发生的其它范围广泛的事件同样也要求给予关注。我对此是有认识的，我没有遗忘其它的、即使不通过国家的力量就能够动员各国人民的事业：贫穷国家的发展；有利北方反对南方的殖民公约的继续存在；通过联合国建立足以遏制武力和暴力的国际法治；民族主义的复苏。即使欧洲不可能为一切找到答案，但它在经受四分之三世纪的屈从、有时甚至是屈辱之后，再次登上舞台一事，将使我们这些国家首先是共同体国家重新获得创造历史的机遇，而不是对历史逆来顺受。如蒙大家认为我这样思考问题，不是屈从于野心或报复心，我将不胜荣幸。但若大家把我的欧洲情绪称为自豪感，我将乐于接受。

由于我不想中断对 1989 年 11 月和 12 月间德国形势及其政治、外交环境的回忆，我前面没有把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由法国右翼反对派挑起的一场小小的争论上来，这些人当时指责我未以欧洲共同体的名义强行参加预定在 12 月 2 日、3 日在马耳他领海举行的布什—戈尔巴乔夫会晤。现在我来回忆这场争论只是为了澄清事实，因为某些人之所以一再争取我同意迅速召开欧洲理事会，除了因为德国事务外，据说还为了让最高层听到欧洲的声音。我对这项计划是犹豫不决的，我也不能肯定那些制定计划的人是否

真正相信这个计划。自从存在这类会晤以来,至少从丘吉尔、那个美国人和那个苏联人参加的雅尔塔会晤以来,从未接受过第三国与会。当然,我同其他人一样,甚至可能更急于——重复何用呢?——看到这种两国统治的结束。但理智要求我多一点耐心,以便使成熟的、从苏联威胁下解放出来的、由于统一而变得强大的欧洲能在本世纪末达到它的应有地位。我觉得应该为此而工作。因此,我不仅指出欧洲未被邀请,也指出我不大重视此类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会晤。何况我难以想象这样的场面:欧洲理事会主席请求在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旗舰上安排一个折叠加座,在谦恭地汇报爱丽舍宫晚宴的情况后便悄悄离开,让布什和戈尔巴乔夫继续就只能由他们处理的各种问题,例如裁军问题进行谈判。对他们来说,裁军问题比其它问题重要得多,而欧洲人对此没有任何发言权或行动权。因为欧洲人或者不拥有原子武器,或者像法国那样,虽然拥有原子武器,但由于它的核武库与美苏的潜力相差太大,参加谈判将失去一切,因此宁可置身于谈判之外。我不能设想参加这类活动会产生与预期相反的结果:欧洲跪倒在它自称能与其平起平坐的人的脚下。由于马耳他两位对话者就全球问题交换看法时不会对我们大陆的命运产生任何现实的影响,我更看不出欧洲共同体的缺席会对自己构成什么危险。我们已不再处在瓜分世界的好年月。对此,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心中有数。他们无意明显地介入欧洲的辩论,因为他们越来越把它“遗忘”了。并非因为他们缺少对12国施加影响的手段,而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别的渠道,不必公开进行干预。乔治·布什的一封信证实了我的分析:“我愿在公开宣布前让你知道戈尔巴乔夫和我将在地中海会晤,回顾国际形势,讨论苏美关系……。我不认为这次会谈是一轮细节

谈判。同样,我不期待我们在会晤中就一些重要问题签署协议。正如你知道的,自从我就任总统后,我还没有机会会见戈尔巴乔夫总统,虽然我们经常通信,但我希望与他建立私人接触……。”我向11月15日的部长理事会通报了信件的内容,并作了一番评论,让人想到爱丽舍宫的晚宴没有提供新的重要情况,以证明有必要向两位“杰出的舵手”派出一名特使。然而,考虑到反对派的愿望,而且因为保持连续的对话本身也是有益的,我便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约定于12月6日在基辅会见。这对于了解他准备做些什么并于第二天向斯特拉斯堡首脑会议的参加者通报是大有益处的。我还同乔治·布什商定12月16日在加勒比海的圣马丁岛的法属部分会晤。

不久,我回到欧洲议会,向其报告巴黎晚宴进行的情况。我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决定性作用再次表示敬意。我把欧洲共同体描写成大陆未来的“唯一的真正凝聚点”。我强调欧洲共同体要通过充实机构来显示自己的特性。我最后问道:“欧洲共同体是否已满足了对它寄予厚望者的期望?欧洲共同体是否真正听到了马佐维耶茨基关于不要让富人的欧洲和穷人的欧洲永远继续下去的焦急的呼吁?”同一天,我在接受《巴黎竞赛》杂志采访时再次接触统一问题。我说,“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德国人民的意志……但是,这个人民的意志不能没有国家的同意,即两个德国和德国地位保证国的同意。”我通过波兰的例子就承认现有边界这一先决条件打进了一个楔子:“波兰实现了形势的彻底改变,但出自团结工会的马佐维耶茨基总理,不失时机地表示它的国家仍是苏联在华沙条约内的忠实盟友。这是因为从最近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边界问题原封未动,它不是在一个激动的时刻就能解决的,虽然这种激动

非常可以理解。”显然，波兰在宣布德国统一的结果有效前，想得到国际保证；在确保奥得—尼斯河边界的永久性之前，它不会放弃与如此可怕、如此可憎的俄罗斯的结盟关系。

在这个困难问题之外，科尔和我利用巴黎理事会和斯特拉斯堡理事会两次会议之间的短暂时间，确定了未来几年建设欧洲的行动计划。11月27日，赫尔穆特·科尔给我写信。他的信反映了他对可能加剧的“12国之间的巨大分歧”的担心，还据实强调了庞大的预算赤字、税收协调方面的迟缓以及对人员流动的阻挠——未来的目标是消除阻止经济和货币联盟前进的障碍。作为附件，西德总理草拟了一份将要递交斯特拉斯堡理事会审议的1993年前的工作日程表。他特别要求决定举行一个分三个阶段进行的政府间会议：第一阶段从1990年底起，由意大利主持，讨论经济和货币联盟问题；第二阶段在1991年12月以前，讨论理事会、委员会、议会的机构改革方案；1992年为第三阶段，根据单一市场的实现程度，欧洲理事会最终走了经济统一和政治联盟的道路。然后是1993年，批准会议的结论。

这封信说明，西德总理虽然处于国内动荡不安的论战和辩论中心，仍一往无前地致力于欧洲的事业，而德国统一又加快了欧洲事业的进程。我们之间经常谈到有必要重新启动四年前在卢森堡所发动的机器，当时，我们竭尽全力从我们的伙伴们，特别是从撒切尔夫人那里争取到了关于单一市场的协议。我们商定，不必等到即将开始的关于德国地位的谈判，我们就把火烧旺，使共同体为欧洲人民提供一个比市场更为激动人心的希望，比一般商业往来更广阔的天地。科尔选择这个时候向我重新提出这个方案，意味着柏林墙倒塌后发生的事件没有使他改变我们原先确定的欧洲统

一和德国统一的双重目标。但是也有一点细微的差别：西德总理显然希望等到意大利轮值主席时才开始这个进程。我的观点略有不同。11月27日我通过回信向他表示：“同你一样，我认为应该就日程表取得一致，因此，我向你确认，我将在斯特拉斯堡提出召开政府间会议的日期问题。”我继续说：“在以后的阶段里，政府间会议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我们在马德里所一致接受的平行性和互补性的原则基础上……我同你一样，除了经济和货币联盟外，还希望欧洲联盟。”一句话，我们就主要问题取得了一致：会议的筹备工作应在1990年12月欧洲理事会前完成。

四天后，赫尔穆特·科尔答复我：“首先，我愿再次强调我在欧洲议会上曾经强调过的，目前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变化比任何时候都更要求决定一项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政策……。1991年的政府间会议应该为1991年在荷兰主持下的欧洲理事会讨论这些根本改革方案准备一项政治协议……。这个有活力的日程表的目的在于预备1992年、1993年批准新条约……。我想在这里再次强调，由于内政的原因，如同我在这里向你描述的那样确定明年的日程表，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距两年后被称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预定的时间：1989年12月5日，前后相距不到一个月。不论外交界还是法国和德国的新闻界怎样对我们两国间的“不和”窃窃私语、评头论足，我们两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对话仍在继续进行。未来的欧洲联盟条约已经包含在我们当时的谈话中了。

七、同戈尔巴乔夫在基辅会谈及 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会议

在基辅,当我抵达政府大厦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马上接见了我,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匆匆叙述了马耳他会晤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会谈的第一个主题是经济,乔治·布什一开始就声称准备向苏联提供一笔实质性的援助。我的印象是,他们的谈话随后陷入了泛泛而论的泥潭之中。美国总统将他的好牌留着,打算等到对莫斯科的底牌有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再打。而戈尔巴乔夫一想到将不得不出卖他认为应当维护的家产以换取一元押金时,他也就缩了回去。我的主人对草拟裁军协议谈得更多一些。我在这里概述如下:1990年重开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战略武器削减50%,双方各裁员100万,停止化学武器的生产和现代化,贝克和谢瓦尔德纳泽两位外长1月、3月、4月的会晤日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关于取消海军舰艇而不是潜艇的核弹头的建议被退回专家们再研究。海上巡航导弹和整个海军航空问题无一得到解决。

布什和戈尔巴乔夫都想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军备竞赛,但不想因此背离各自的战略抉择,这是一清二楚的:布什想保证他的武器在欧洲大陆及其海域的存在,以便由此让其盟友放心;戈尔巴乔夫则恰恰相反,旨在从欧洲拆除部署在两个集团分界线附近的进攻性武器,并争取取消快速反应部队。乔治·布什没有欺骗我:两人会见是为了相互更加了解,暂时不期待取得更多的成果。他们的应变能力和事变的逻辑无疑会引导他们有朝一日达成谅解。但

是,最糟糕的错误莫过于自称赶在了时间前头而实际上却浪费了时间。简言之,曾经害怕再次成为一场交易的筹码的欧洲,现在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两个大国正在思虑别的问题呐。

当我们进入谈话的关键即德国统一问题时,我那对话者的声调强硬起来。他对我说,“(科尔的)十点计划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第三点有强权的味道。”不久,朗朗·迪马向我报告,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刚才在隔壁房间里与他会谈时态度还要严厉。赫尔穆特·科尔方案中最刺激谢瓦尔德纳泽的是关于“民主共和国经济、社会制度激进的、不可预料的变化,改革宪法,结束执政党垄断”等提法。两位苏联国务活动家还扩大批评的范围,指责西德总理的计划是“否定二十年的政治生活”。他们是不是有意夸大其辞呢?他们在强调不怀疑科尔有“复仇思想”的同时,却从他的言语中“辨别出一种”对和平的威胁,他们问道:“关于联邦德国不会对奥地利或波兰使用同样语言一事,苏联得到了什么保证呢?”或如:“重新统一后,是不是没有西里西亚、科尼格斯堡等等地方了呢?”在后来的记者招待会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较为外交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重申他的主导思想:“我们与两个拥有主权并且都是联合国成员国的德国打交道”,这意味着它们的地位不是由西德总理一句话说说了算,或者由联邦德国单方面的意志所决定的。然后提出警告:“在我们社会内部进行着的变化丝毫不改变赫尔辛基的原则和进程,忘记这一现实是不合适的。”他补充说:“确实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重新统一的问题,但是应尊重事实,尊重我们大陆的历史演变。”最后以下面这句话作为结束:“我不认为这是今天的现实问题。”这一切都是以一种激动的辩护词式的语调说出来的,偶尔在这儿那儿因为一丝微笑或一个平静的转音而使语调稍

许变得柔和一些。我一边听一边尝试着解释他的思想。他无法像他过去的前任一样,简单地说声“不”就能阻止事态的发展。反之,他可以希望延缓事态的发展,把赌注压在拖拖拉拉的外交上,争取一年或二年的时间;希望在这期间实现可为他和东德领导人提供民主借口的改革,这是争取部分人民接受一个持久独立国家的思想并说服西方盟国保持现有均势的唯一办法,因为除德国之外的西方国家曾从这一均势中得到过最大的好处。但是,我仿佛觉得,事态的发展出乎他的预料。由于不得不正面提倡新思维并重新安排联盟结构,他知道自己很容易受到国内哪怕是任何小小事故的摆布。一切都建立在他的个人权威和威信之上。如果其它共和国像波罗的海国家一样闹分裂,如果民主共和国离开他而融入西方集团,这时他的权力将意味着什么呢?但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我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身上看到的始终是一个满怀雄心捍卫斯大林和彼得大帝遗产的爱国者。我发现他坚守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不超过经验和事实教给他的那一点;他准备牺牲他日益感到空洞无物的教条,但当联盟的生存成为问题时,他是极为敏感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参观基辅几座最漂亮的纪念性建筑物时谈到了这些。基辅曾经拥有 400 座教堂(许多教堂在革命后消失了),他对此由衷地感到自豪。但在晚宴前,他向我描写了他与我在就餐时即将见面的乌克兰共产党新领导人之间的“困难”,强调指出在各地觉醒的地方民族主义同他的帝国观之间的撞击是历史性的一搏。他对撞击的结果表示乐观。他说,“没有一个共和国可以离开其它共和国。它们在联盟内部的联系太紧密了。即使意识形态的联系中断了,比分离主义梦想更为强大的传统和共同利益还会保留下来。”对此,他与哈萨克、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伙伴

们讨论过。这些人都是官僚体制的重臣,同他一样经历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等前任政权的曲折和竞争。他们之间有共同的语言,保持着同志关系。但能保持到什么程度?他向我列举了其中的某些人,他们曾以理论严谨出名,在党校讲课,直到最近,其所作所为还像最纯真的正统派信徒。“就是这些人,”他开玩笑地说,“现在却试图通过标榜与莫斯科拉开距离来恢复自己的‘童贞’了。”他重复道:“我看这不奇怪。人就是人嘛。但我坚持自己的立场,因为我仍深信,不管如何,所有人都宁愿参加重建一个协调的、在领导世界事务中有重要作用的大集体,而不愿意自我孤立,把自己与伟大的过去隔离,从而丧失自己的未来。”因此,他打算向他们递交一份以联邦制为基础的联盟公约,设想新的联盟具有有力的结构、一个统一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以及若干共同的目标。我提出异议,说这种尝试已经受过挫折,他的任何倡议均无结果。他反驳说,他马上就会提出一项更合适的计划,理性终将占上风。他重又说到波罗的海国家“急于求成”、“缺乏现实主义、有打乱计划的危险”,云云。他向我保证,“我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我压根儿不会拒绝这些国家宣布自治。他们很快就会感到遗憾的,我们将看到他们回到我们这里来。他们的经济完全从属于我们的经济,他们要求独立的愿望无法对抗这一明显的事实。但是他们想冒进,有可能在联盟内外引起不可逆转的‘竞相溃逃’的局面。”“不用很久,”他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各主要共和国就会同意我那把各种对立倾向调和起来的制宪方案,我将提供一个符合人民期待的民主演变模式。否则,一切都将崩溃。我不相信,如果灾难降到我们头上,欧洲的其余部分能幸免于难。”

这一时期,我同他还有许多次别的谈话——推心置腹的谈话。

对于他,人们将会说那是当时一位真正的历史“信差”。他以充沛的精力抵偿谈判时立场的虚弱,靠非凡的灵活性来突出自己的坚定性。我不认为他对他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生硬态度会有什么结果寄予幻想。他需要德国,德国同样也需要他,这就使人预感到将会达成最后的妥协。但是,过早暴露自己的想法可能使他失去本应精打细算地使用的王牌,因为它们实在太脆弱了。他至少还拥有“堵刹”的能力,他尽量使用,从而为他的利益服务。当前的利益是不作任何让步,需要以隐晦的威胁相要挟,以便一切都按所期望的秩序进行,首先是挽救联盟,然后把已经失去的让与西方。

参加记者招待会的记者们好奇地等待着我自己的声明。有几个编辑部已经宣布,我到基辅来的意图是阻止德国统一,并且为此依靠莫斯科的支持。按常规,我在戈尔巴乔夫之后讲话,因为我在他的国家里。我首先澄清事实。我是这样开头的:“我提醒各位,法国是联邦德国的朋友和盟友。这个盟友关系是由戴高乐将军和阿登纳总理 1963 年签署的爱丽舍条约所确定的。20 年后,我与科尔总理一起从条约中我的前任们留下空白的军事问题引出了结论,结果是创建了第一支法德部队,开了未来欧洲军的先河。作为联邦德国友好国家的法国,对于有关德国人民的问题不能漠不关心。并不太久以前,法国本身也曾被分裂过,我这一代人经历了这场悲剧。我们怎么会不理解今天正在经历这种悲剧的人们的感情和愿望呢?”我再次坚持为使德国统一成为可能所应具备的各种条件——无非是老调重弹。一方面是用民主的方法:这就要求民主共和国的机构和做法作出必要的改变,最后达到让人民有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的目标。另一方面是和平的方法:这就要求保证现存边界的不可变动性。

在最后一点上还有些模棱两可的地方。回顾一下赫尔辛基的原则,就可知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论点是有道理的。两个德国的主权以及由此引出的权利事实上是由我们签署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协定保证的。民主共和国政府同联邦共和国一样可以利用这一协定。其保护国苏联也一样。相反,在我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每次声明和谈话中,对传统的欧洲边界和两德之间边界所作的区别,即使具有历史的效力,也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何况在我们这个不稳定的欧洲,传统边界的概念是始终模糊的,仅仅是建立在若干思维惯性的基础之上的。和平条约总是由战胜者强加的,直到战胜者自己被战胜并成为他们过去对别人施行过的独断专行的牺牲品。国际法是一种飘忽不定的法律。但是,确需一套游戏规则。在45年里听任潜伏的冲突——冷战摆布的两个敌对军事集团在赫尔辛基和平地确定了这一规则,这件事所标志的进步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破坏这一规则等于是发疯。那么,为什么要把两个德国排除在这个规则之外呢?下面就不再重提了,我在这里对此解释得够多的了。人们不能把尊重法制建立在临时性法令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军事占领往复运动的基础之上。最终,历史的偶然要服从于现实。民主德国的人民已用行动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我相信人民的本能。他们对自己和自己命运的想法要比国际学家正确得多。当然,戈尔巴乔夫不同意这种解释。但是,他理解这种解释。他并不排除统一的可能性。这就足以使统一成为可能。莫斯科条约尽管用词含糊(“如果条件成熟就赞成统一”),但还是为统一开辟了道路。戈尔巴乔夫在签署该条约的同时,不就是默认了统一吗?我们刚刚处在一场看来很艰巨的谈判的开始。立场的对立是惊人的。尤其因为,某些至关重要的实际考虑使政

治辩论更加沉重了：50万苏联士兵驻扎在东德，与居民发生哪怕是最微小的事端都可能诱发难以估量的后果。

我原本就想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主要谈谈德国问题。但这里那里，人们对此表示惊讶，对此表示愤慨，这叫我怎么说呢！我从不遮遮盖盖。我把关于这个议题的这种对话看作法国外交政策的迫切需要。即使共产主义专政和斯大林的野蛮使法国坚定地选择了与西方结盟和建设“欧洲”的道路，但若我们向东方关上大门并把俄罗斯从我们的地图上一笔勾销——过去曾有许多政治家出于反共主义而曾接受这种诱惑，也是违反历史的严重错误。还是应该讲清楚。戈尔巴乔夫和我就是这样做的。德国统一向这两个欧洲主要邻国提出了同样性质的问题，尽管它们过去的做法显然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这里人们选择了重新和解，然后是友谊；而那里人们在继续遏制变化。但是，谁能怀疑事态发展的趋势呢？几个世纪来，下面这条教训从未过时：俄罗斯与法国的谅解是欧洲的均势的主要因素之一。欧洲现时的困难使这一谅解更加必要。但是，一天结束了。戈尔巴乔夫除了邀请罗朗·迪马和我以外，还请了乌克兰共产党的四位领导人出席晚宴。当我们告辞时，这四位领导人郑重其事地向我赠送了一件礼物：一个有着漂亮身材的哥萨克投弹手的大型彩陶器，并对我说：“乌克兰战士从来没有离开过一个战场而不日后重返的。”于是，他们开怀大笑起来。

在斯特拉斯堡理事会开会前一周，我从罗朗·迪马那里收到一份关于欧洲各国对德国统一的态度综合报告。他向我指出东欧笼罩在强烈的恐惧之中。不仅苏联是这样，波兰也是这样，那里对奥得—尼斯河边界十分警觉，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如此，那里官方的《红色权利报》认为赫尔穆特·科尔的建议“与现实不符”。匈牙利

的调子较为节制,承认“德国的统一出自一种天然的愿望”,但“统一的条件不可能迅速创造出来”。西方多数政府继续持谨慎态度。荷兰外交大臣范登布鲁克注意到“重新统一本身不是目的”,但应与东西方接近的过程相吻合。费利佩·冈萨雷斯认为,没有理由“改变目前的政治地位,而应朝着使两德之间联系更为畅通的方案努力”。意大利总理朱利奥·安德雷奥蒂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内称“双方深信,作为欧洲大陆安全基础的均势应该得到维护”。在里斯本,在雅典,人们担忧的是另一类问题。他们直率地希望不至为欧洲共同体的援助“挪用”到民主共和国和其它东欧国家而付出代价。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首都表示了同样的担忧:欧洲共同体和自由贸易区四家联盟之间的关系不要由于共同体向东方“倾斜”而遭殃。最后,同往常一样,玛格丽特·撒切尔显出与众不同的态度,向那些愿意听她话的人重申统一“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联邦德国从未被免职的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访问伦敦时从未听到过比这更多的话了。

就在这些日子里,12月5日我向有关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写过一封信,信中我确定了理事会的议事日程。一方面,我预计讨论将会涉及执行“单一文件”、经济和货币联盟、社会宪章和对东欧国家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我草拟了一份声明稿,里面强调了以下几点:

1. 12国对预示着欧洲基本制度的分裂将告结束的变化表示满意;
2. 欧洲共同体支持那些走上民主道路的国家;
3. 12国将是未来欧洲统一的参照点和辐射中心。

对我向我的伙伴们通报的那篇声明稿,提出了两点保留。一

点是由英国人提出的,要求不提“欧洲联盟”;另一点是德国人提出的,要求写上一句明确支持德国统一的话。外交部长们的助手政治司长们惯常在首脑会议开幕前交换看法,他们也认为如不对波兰西部边界采取立场,提及统一将有困难。

会议于12月7日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科尔总理尽管说话很谨慎,但还是同他前两天给我的信中宣告的那样,希望德国统一的“天职”能明确地得到承认。玛格丽特·撒切尔用她自己的话说,固执地“不肯把手放到转动的齿轮里”,频频对所有可能近似于作出承诺的方案提出先决条件。罗朗·迪马和我两人坚持把统一的前景和正式承认德国外部边界联系起来考虑的意愿。把德国统一和欧洲统一协调起来的意见比较容易地取得了普遍的支持。由联邦德国代表提出的方案经过激烈的讨论,最后作了修改。被保留的段落列举了“包括尊重条约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所有原则”在内的若干条件。

八、与东德领导人互访、同东德反对派会见

法国与东德建交可追溯到 1973 年 2 月 9 日,当时埃里希·昂纳克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此后等了 6 年,一位法国政府成员弗朗索瓦-蓬塞先生才访问了东柏林。在 1983 年东德外长奥斯卡·菲舍尔先生来爱丽舍宫与我谈裁军问题后,两国的政治往来就密切起来了。作为回访,克洛德·谢松去柏林主持了我同文化联谊会的开幕式。东德当局当时让人告诉我,他们愿与法国更多地交往,而且是要在最高一级的。为使这些意向具体化,当时的总理洛朗·法比尤斯于 1985 年对民主共和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两年过后,菲舍尔再次来到巴黎,交给我埃里希·昂纳克的一封信,信的内容依然是谈裁军和安全问题。那封信既反映了苏联的论点,也陈述了民主共和国自己的担心,因为一旦发生冲突,其领土特别容易受到攻击。我通过回信指出,正当美国和苏联在日内瓦谈判关系欧洲未来的裁军协议之际,欧洲人相互之间讨论自己大陆的利益问题是有益的,也是正常的。我邀请他于 1987 年内来法国。事实上,过去我曾多次表达过这一愿望,但没有确定时间。现在我觉得时机成熟了。1985 年以来,埃里希多次访问西欧。他从意大利开始,会见了总理贝蒂诺·克拉克西,在梵蒂冈会见了约翰-保罗二世。接着他去了希腊、瑞典、荷兰。与此同时,继洛朗·法比尤斯之后,欧洲共同体的多名人士,诸如比利时首相维利·马尔滕斯、希腊总统萨采塔基斯先生前往东柏林访问。在他们之后还有奥地利总理和瑞典首相。

更有意义的是昂纳克先生对联邦德国的访问。1987年3月15日,科尔总理向他建议4月30日在西柏林会晤。但是苏联从1981年以来,由于欧洲导弹事件,一直阻止民主共和国同西德接近。苏联的这种否决权已曾迫使昂纳克婉拒过赫尔姆特·施密特的一次邀请,这次他又拒绝了。理由是时间不太合适。不久,俄罗斯领导人变得较为善解人意,取消了禁令,东德国家元首才得以从9月7日至11日到联邦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先后访问了波恩、杜塞尔多夫、埃森、萨尔布吕肯、特雷夫斯、慕尼黑、达豪、诺德基兴等地。对这次“历史性”访问,双方都看作是一次成功,相互说了许多有礼貌的有时是热情洋溢的话。当昂纳克说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可能有一天不再分离而是联合”时,大家激动不已。演说的声调、主角们显而易见的良好愿望都突出显示了那被人们认为是更有前途的变化。

我这方面,从6月起,我就把我将对民主德国采取的主动行动告诉了西德总理。他感谢我想到征求他的意见,但没有提出任何原则性的反对意见。进而,在一次私下谈话中,他强调我的主动行动是有益的。这不是我们有关这个问题的第一次谈话。3月在尚博尔宫、5月在柏林参加庆祝建市750周年之际都谈过。1988年6月1日,在埃维昂,赫尔穆特·科尔向我通报了他最近一次对民主共和国私人访问的印象。简言之,两个德国的领导人在联邦德国的会晤为落实埃里希·昂纳克对法国的访问提供了方便。双方商定,埃里希·昂纳克将于1988年1月7日至9日进行一次国事访问。这一日程得到了遵守。

我前面说过,在1988年初,法国是第七个接待东德国家元首的西方国家,但是,作为对柏林和整个德国享有权利、负有责任的

四大国之一,法国是第一个。在埃里希·昂纳克抵达巴黎前夕,我向民主共和国的电视台介绍了我对这次访问的主要期待:“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法国人有我们的朋友,有我们的盟友,他们同我们一样属于欧洲共同体,特别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但是,我希望大家打开大门,而不是把它关上。”同样,在1月7日晚的国宴上,我强调了近两个世纪以来为我们的多元化民主和人权与公民权利等观念提供灵感的自由精神。我说:“让这种精神重新成为整个欧洲的共同财富吧!如果欧洲人在自由问题上分离的话,怎能想象他们会在和平问题上取得一致呢?”接着,我转身对我的客人说:“我们正在估量现实的分量和从旧轨道上摆脱出来所需的努力。让我们善于抓住时代向我们提供的机遇;或者,当机遇姗姗迟来之时,让我们善于促进其来到。请相信我,我们已为此做好准备。”我们在巴黎就双方真正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几次热情的更是坦率的谈话。昂纳克不是等闲之辈。这个萨尔人,生硬、沉着,体现着苏联化的德国那战斗共产主义的不可调和性,他会至死忠于体制——尽管这个体制正在他周围倒塌,他也会在不可挽回的事情出现时硬着头皮对抗戈尔巴乔夫。但是,他有谋略,有一种真正的历史感。当他讲起他青年时代的反纳粹斗争时,他的声调是充满正义的。人们甚至会暂时忘记他自己已成为另一个集权政权的主宰了。

虽然在他访法时我们制定了一项我对柏林进行一次国事访问的计划,但自1988年1月至1989年10月6日,即在整整20个月期间,事情始终悬而未决。这年10月6日民主德国的国庆节,我按惯例向他发去了传统的祝愿,人们又谈起了这次访问。在共产主义世界,特别是在民主共和国国内,事态发展越来越快。我对昂纳克的模棱索索并不感到惊讶。尤其是因为,柏林上演了一场使

人头晕目眩的“政治芭蕾舞”，一直演到12月6日。10月24日，昂纳克离开政权，埃贡·克伦茨马上取代了他。11月15日，被视作革新者的德累斯顿市长汉斯·莫德罗被任命为政府首脑。12月6日，埃贡·克伦茨辞职。国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和全国国防委员会代理主席形式上委任给一位经济学教授、共产党的同路人曼弗雷德·格拉赫。莫德罗保留其总理职务和实权。邀请访问一事正好同这一磨难的进程相交错。11月2日，昂纳克请人转告我“他希望并确信政治对话将同他的接班人以相互信任的精神进行下去，有利于两个国家和两国人民，有益于和平”。因此，我向埃贡·克伦茨确认我接受……爱丽舍宫的一份公报宣布了访问日期：12月20日至22日。但埃贡·克伦茨也离职了。五天后，汉斯·莫德罗写信约我：“我相信，联合政府的复兴纲领也将推动同法兰西共和国建立具有新的性质的关系。根据这一精神，我对你在民主共和国的访问预表欣赏高兴。”现在，只需加以组织了。

我如期于12月20日抵达柏林。我访问的时机是否合适，一部分德国新闻界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接着，法国新闻界也跟了上来。法新社驻波恩特派记者指出：“西部的德国人担心密特朗阻挠统一。”《图片报》在思考我是否“在西德总理背上击了一掌”，是否曾寻求布什总统的支持，以达成“反对统一的阴谋同盟”。12月21日的一个电视节目把法国人民和政治负责人区别开来，认为对法国人民来说，“德国统一是不言而喻的”，而政治负责人却“被统一后的德国将使法国失去强国地位这一念头所困扰”。《时代报》把我比作梅特涅，称我有着“同莫斯科结成针对德国的反联盟的想法”。我已经谈到过的对我的攻击行动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并且至今我还看得到其后果。根据攻击者的说法，我似乎是敌视德国统

一的。我是在同德国领导人紧密联系之中、在同西德总理相互信任的气氛之中致力于欧洲建设的,因此当我看到再度出现某些德国“舆论制造者”对法国的疑虑以及那种种顽固的、深刻的、可能是无法磨灭的仇恨时,我颇感意外。这可能是一种怨恨的表现:他们怨恨为纳粹主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能容忍 1940 年的战败国加入了 1945 年战胜国的行列。我在与戈尔巴乔夫基辅会晤后又对民主共和国进行访问一事,为这种攻击提供了主要事实。西德总理府本身对我不久将访问柏林也颇为激动,因为赫尔穆特·科尔理所当然希望成为柏林墙倒塌后第一位前往东德的西方领导人,而现在却有被人超前的危险了。

我前面提到过,我曾亲自告诉西德总理,昂纳克邀请我前去访问。但计划迟迟未能落实,在此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访问的条件。然而我仍保留了我的出访计划,因为我渴望了解这个国家,在那里正决定着欧洲的部分命运。德国统一的命运尚未得到确认,我希望法国参与进去,以于己合适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最后,赫尔穆特成功地调整了他的约期,比我早 24 小时到达柏林。他在德累斯顿与汉斯·莫德罗的会谈使两位德国领导人就“睦邻关系”、“绝对尊重国际法的原则和标准”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系中实现契约共同体”的愿望达成一致。事情恢复了秩序,大家都各得其所。

东德政权在 1989 年最后一个季度的不稳定状态的焦躁不安与先前无法忍受的固定不变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反映了依旧处在柏林墙倒塌冲击下的舆论状态:虽然多数舆论急于结束现存的制度,但对于作何选择还是迟疑不决。昂纳克被免去总统职务五周后被开除出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全体领导成员辞职。前两天,

即12月1日,人民院修改宪法,取消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作用。12月8日,原来的负责人,其中包括埃里希·昂纳克和维利·斯多夫,被控滥用权力、挪用公款和贪污。在特别代表大会上,德国统一社会党改变了起首字母缩略名,在新主席格雷戈尔·居西的领导下变成了民主社会主义党。马路动乱后只有几天就在政治机器首脑部位出现的这些动荡,又为抗议运动提供了新的事实。11月20日在莱比锡发生的一次游行集中了20多万人。在这个变成造反派首都的城市里,可以称为拒绝党的队伍日益扩大。这个党不使用暴力,当局也试图避免暴力,只是反复作出善意的保证、控告前负责人、解散政治警察、悄悄地提及统一问题。事实上,莫德罗、居西和新的领导班子掌舵很稳,但不想放弃东德的特性。我知道他们期待我的访问能为民主共和国作为主权、独立国家的地位提供庄严的保证。埃迪特·克勒松在一份报告中向我证实了这种精神状态。这份报告陈述了民主共和国外贸部长格哈特·拜尔先生的以下谈话:“我请求你,请你的总统12月22日谈判、行动、讲话和缔约时都要强调他是在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主权国家谈判、行动、讲话和缔约的。整个民主共和国,包括我们的反对派,都期待你的总统突出我国的主权。”我可以证明这种说法的准确性:有组织的反对派(新论坛、民主觉醒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多数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与多数居民(据民意测验为一半至三分之二)特别与多数青年相反,他们是与政府的观点相一致的。然而也有细微的差别,百分之六十七的人真心呼唤一种“人道的社会主义”,百分之三十三的人则喜欢西德模式。汉斯·莫德罗正是试图尽量利用这种阵线不清的状况,提出两个德国之间实现“契约共同体”的方案,希望借以阻止“始于基层的重新统一”。

在我访问柏林和莱比锡两个城市时，我的公开谈话所涉及的都是同样的问题。第一天在正式晚宴上向国务委员会主席和东德的官员们祝酒时，后来与东德电视台记者及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的学生、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辩论时，与法国在柏林的侨民会见时，最后在记者招待会上与记者们再次辩论时，都是这样。在莱比锡的大学生面前，我阐述了法国对德国统一、边界和欧洲共同体的作用等问题的立场。读者们都已看到，所有这些问题我在前几个月已经详尽地阐述过，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还会反复阐述。我的德国对话者如此焦虑不安，那些记者到处跟着我，在我每句话的语调、用词、提法中找毛病，以至我不得不一再解释，不怕重复，也不管是否让新闻界感到厌倦。但是，在审查事实前，就提出起诉，以便找到对我的意图进行攻击的理由，那是毫无意义的。

为数众多的大学生在大学里等候我，在我经过之处，组成了密密的人墙。我使劲地在热情如火的欢迎人群中开辟出一条路。在这样拥挤的人群中走上楼梯，可说是“战功卓著”。但大家情绪都很好。当校长致欢迎词时，我注意到梯形教室太小，已被想要进入的学生包围了。我请他们进来，他们就坐在各排椅子的空当里、台阶上，坐在被用作讲台的桌子的前后左右。大家人堆人，没有空隙。还有几百人留在教室外面，有的爬在窗口上，有的挤在附近的走廊里，拒绝“撤退”。我介绍这些细节，是为了让大家了解直至那时仍然是被隔绝的那个德国的青年是多么贪婪地想接近任何一个来自那既可怕又神秘的西方的人士，因为他们过去仅仅是通过联邦德国的电视来了解西方的。在莱比锡之前，我曾与苏联监护下的两个国家的大学生进行过同一类型的辩论，一次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另一次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在布拉迪斯

拉发,我们大使馆的一位参赞告诉我,满教室的一千来名听众中,只有十五至二十名大学生,其余的都是政府官员。在索菲亚则相反,人们可以感到已经出现了反对派。我的对话者对排在我身后的官员们采取了咄咄逼人的蛮横态度,没有听到一句赞扬日夫科夫总统和政府的话。大家争着发言,使我联想到法国习以为常的那种混乱。我从他们对当局的指责中看到了政权垮台的预兆,我欣赏年轻人在以草菅人命出名的警察的眼皮底下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在莱比锡,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情况。可以看出,辩论是由大学的负责人按照辨明是非、取得实效的愿望组织的,而不是为了服从某些禁令。人们问我在图林根的沙勒当战俘时我自己的故事,问我几年后与维利·勃兰特一起乘汽车从鲁道尔施塔特出发沿着我第一次逃跑的路线旅行的情况。勃兰特和我那时受到图林根专员的接见,他还邀请我们共进午餐,但毫不违反苏联世界的规矩。我讲到餐后吃点心时负责接待我们的高级官员所致的酒辞如何生硬、乏味,把大学生们逗乐了。我问这位官员是不是遇到过什么困难,问他计划化失败的情况,他说没有,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可以让人对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则建设的社会提出任何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保留。大家讨论了当时的各种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但谁也没有提到自由主义。当我们谈到统一的可能性时,我重申了读者已经熟知的观点:“德国人的统一首先与德国人有关。只有自由的、公开的、民主的选举才能让人知道两边的德国人心里在想什么。在作出决定以前,先要进行这种测试,这是一种有益的测试。应由德国人自己说他们想干什么。”不知是出于谨慎,或是只因为并无把握,我的听众们没有长时间停留在这个题目上,这使我感到惊讶。当时,当我与东德人交换

看法时,他们全都表现出这种谨慎态度。我并不把这种谨慎解释为对德国的未来不感兴趣。但我认为,对我来说,未能从中知道更多的情况那是很遗憾的。我们谈到了边界。我追述了建立在边界不可变动性基础上的赫尔辛基条约的条款,但我把德国的情况作为例外,其理由我在本书中已写出陈述:“我认为,两个德国之间的边界与其它地方的边界相比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

我们谈到了欧洲。我重申德国人民在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前夕,应该考虑到欧洲的均势。德国人民不能无视这样一个现实:一方面,东德是华沙条约国的积极成员,有外国军队驻扎其领土上;另一方面,联邦德国是北大西洋联盟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德国统一和欧洲统一应同步进行。我得到的全部回答就是点头表示同意。显然,莱比锡的大学生在认真听我讲话的同时,并未对他们不久的未来妄加臆测。

12月22日出席柏林记者招待会的记者们所提的问题更为尖锐,这或许有助于我更清楚地说明两个月来我在众多的谈话中反复阐述过的观点。希望读者们原谅我在这一章翻来覆去地旧话重提。如果他们感到厌烦,可以跳过这一章往下读。如果他们认为在这种问题上念珠的每一颗珠子都不是多余的话,那就请他们耐心阅读。但是,当我被问到,为使统一成为可能,我所主张的民主道路意味着什么时,在我通常的说法中加了几个“重音”：“西德人和东德人将投票。投票后,他们将选出议员。选出议员后,多数派就出来了,政府将从多数派中产生,政府将提出纲领、发出信息。如果从两边都传出‘立即统一’的信息,那好,民主道路就走完了……。统一还是不统一,立即统一还是分阶段统一,莫德罗说的‘契约共同体’还是科尔总理说的联邦形式,完全可以自由设想。

这一切都是德国人自己的事。我不是属于那些挡道的人。我说，祝愿德国人民的愿望得以表达，德国人民的愿望得以实现！”

这些话也许使东德领导人感到失望。但我不是来讨好谁的。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柏林当局相反，我不相信德国分裂的永久性，也不躲藏在那依然竖立着的无形之墙后面；这堵墙是建立在各大国 1945 年时的力量对比之上的，而在 44 年后，这些大国已无法任意左右比它们的意志更强大、更迅猛的事变了。只要苏联退出赌赛，德国统一就不会威胁和平。但是，历史的常数困扰着我。触动重新统一后的德国的外部边界，或者更简单地，让如此严重的一个问题停留在外交朦胧之中，这将严重损及欧洲的前途。正因为如此，我愿看到德国人就其东部边界做出担保。我对记者说：“只要涉及欧洲的地位，事情就与我们有关……。这是一个应该认真对待的微妙问题。但愿德国人能清楚地认识到：谁也不能打边界牌。这就是欧洲 12 国在斯特拉斯堡一致通过的决议的真实含义，西德也签了字。该决议申明，德国统一是完全正当的，也可能是令人向往的，但它应该遵守该决议参照赫尔辛基条约所规定的国际准则和原则。”

当然，这些平息不了 11 月以来围绕我的德国政策所展开的论争。对我的诽谤者而言，还应更进一步。应该干些什么呢？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有说。除非说，我本应做出一种象征性的姿态，发自我内心，打动德国人的心。这个观点对我有触动。当赫尔穆特·科尔第一次参观柏林墙的废墟时，我曾试图陪他去。如果那一天我能同一位曾与我共同为法德友谊和欧洲建设艰苦奋斗过的人在一起，我会感到高兴的。做做姿态是容易的，但是，我也要考虑到法国的其他伙伴以及我们将要开始的谈判的得失。最后，尽管我

对能看到欧洲分裂最敏感的标志被推倒而感到喜悦,我认为还是应该纯由德国人自己来庆祝这一胜利。

何况我究竟要证明什么呢?从那遥远的年代,战争刚刚结束,作为一名年轻的议员,呼应“欧共体之父”的号召,我参加了由丘吉尔主持的在海牙举行的历史上第一次欧洲代表大会(那是1948年),到赫尔穆特·科尔和我在凡尔登会晤,面对那使人回忆起曾在那里进行过上千年冲突中规模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那场战斗的纪念碑,手携着手,确认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从创建法德部队——作为一支共同军队的萌芽,作为直到那时为止主权国家间军事一体化独一无二的例子(更难得的是,这两个国家在传统上是敌对的),到承诺在德国与法国间建立共同政策、共同货币和共同防务——这一承诺后来在马斯特里赫特进一步具体化,并成为拥有三亿四千万居民的欧洲共同体的基石,没有任何事实能否定我那使当代最大胆的历史性创造之一日臻完美的意志。没有,我无需证明什么,而且我不屑这样做。

那些日子里最有效益的事是我同反对派代表人物的两次会晤。第一次是在莱比锡,12月21日;第二次在柏林,是翌日早晨,格旺德霍斯乐队的著名指挥库尔特·马聚尔和圣一尼古拉教堂的总主持马齐里于斯牧师是莱比锡反对派运动的杰出代表。库尔特·马聚尔在格旺德霍斯乐队接见了,然后邀请我去斯塔德费法尔餐馆参加一次不拘形式的友好午餐,下午为我在大音乐厅举行了短小的管风琴音乐会。音乐会结束后,我们进行了谈话。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看到他是可能把德国人吸引到他周围的人物之一。但是,统一实现后,他远离了政治,当第二年我在巴黎遇见他时,他所关心的只有音乐。我无论如何忘不了这位民

主派的视野和那平静的勇气,除他的艺术之外,他那可靠的判断力和应变精神本来是可以为国效劳的。

我在大音乐厅还认识了马齐里于斯牧师。这位圣一尼古拉教堂的总主持,鼓励采用借助于象征力量的精神价值威力的行动方式,而不是同现政权进行直接的、不对等的对抗,他是他同胞们希望的体现。他在我看来也是一位被内心生活的戒律所引导、深信灵魂的力量能使子弹的威胁后退的人。莱比锡的反抗运动集结在他教堂的周围。教堂蜡烛那细小的火焰,最微弱的风吹过都会倾倒,但马上又直立起来,这表达了弱者具有战胜不幸的无穷能力。从一个教堂到另一个教堂,从圣一尼古拉到圣一托马斯,里什特尔牧师在那里等着我们,我能估量出经过改革的教会在捍卫继希特勒之后共产主义又声称要将其化为灰烬的文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烛光连着烛光,蜡烛的光焰照亮了大地,那是帝国国会纵火没有做到的,烛光高高地向天空升腾,压倒了宗教裁判所火刑的烈焰。在圣一托马斯教堂,管风琴奏起了一首古老的宗教歌曲《她是一朵玫瑰花》和让-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一段清唱剧——巴赫的坟墓正好建在圣殿中央。接着是一片寂静,我们当时所处的境况造成了那样一种和平与永恒的奇特印象,仿佛天底下还存在着那崩溃中的世界的喧闹和狂暴进不去的一片净土。在格旺德霍斯乐队,库尔特·马聚尔和弗雷德里希·马齐里于斯向我解释了10月9日盛大游行示威时发生的事:在圣一尼古拉教堂组织“恢复民主和平祈祷”后,有七万人聚集在教堂广场处摔跤场周围。昂纳克政府已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曾想下令开枪。马聚尔和马齐里于斯率领一个小型代表团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进行谈判,结果是游行示威者同意安静地集中在一起。从那时起,每星期一,越来越多的反

对派人士参加“和平祈祷”，直到 50 万这个数字。马聚尔强调，这一切都是有序进行的，没有喧闹，每晚 6 时开始。随后他微笑着说：“他们每星期干一次革命，每个星期一晚上，下班以后。”

至于他们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他们对前景的估计，我特别注意到他们不急于争取统一。他们说，“在游行示威者中间，在 5 月 6 日选举（这是当时确定的日期，后来提前到 3 月份），投票支持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将不足 3%。这是一个失去声望的、令人讨厌的党，一个将被抛弃的党。我们也不信任联邦共和国政府支持的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因为该党的全部纲领就是颂扬两德模式，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色彩。我们梦想建立一个理智的、精神的运动。我们毫无姑息、毫不妥协地抛弃共产主义，对于饥饿的不幸的人民，我们害怕他们容易受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社会的诱惑。比较下来，眼下莫德罗是最轻的祸害。5 月 6 日的选举将对变化作出决定。”

第二天，我在我下榻的帕拉斯特旅馆与柏林反对派的主要人士共进早餐。出席早餐的有：民主共和国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伊卜拉希姆·伯姆，“民主觉醒”的活跃分子之一沃尔夫冈·许尼尔，“新论坛”的共同发起人巴贝勒·伯莱和让·雷希，福音派新教红衣主教会议主席曼弗雷德·斯托普。通过他们的谈话，我再次发现，他们对统一，至少对“强行军式”的统一持犹豫不决的态度。社会民主党主要由知识分子和接近西德社会民主党的神职人员组成，12 月 13 日由福戈尔和伯姆先生在柏林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证明了这一点。它也是在最近成立的政治组织中唯一对德国统一问题表态的，自称“赞成承认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的现实”。伊卜拉希姆·伯姆甚至说科尔总理的十点纲领“急于求成”。他对我说：

“四十年的时间不足以建立也不足以破坏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我希望它将在欧洲内部通过自决来实现。”他还引用了维利·勃兰特的名言：“人的统一先于国家的统一。”他讲话后，由社会主义者、基督教民主人士和生态学者组成的“民主的运动”的代表许尼尔先生提醒我，这个运动的代表大会已表态支持“在欧洲秩序内实现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并把莫德罗和科尔先生头一天达成一致的“契约共同体”扩大到其它国家（波兰吗？）。

至于“新论坛”的两位发起人，他们谈话一开始就说明他们的运动不是一个党；看得出来，在他们的思想里，这不只是简单的细微差别。首先谈话的是巴贝勒·伯莱。这位年轻妇女的表情、态度和用词都映衬出她讲话中的理想主义。她认为，11月9日是“一个真正的分水日”，这一天对所有人都是一个冲击。“东边的人”有摆脱了多年牢狱生活的感觉，但失去监护人后，他们至少需要六个月的时间反思。她最后说：“迅速举行选举，这还为时过早。四十年里制造的价值不应该被遗忘。”雷希在发言中建议人们对东德人要有充分的耐心。如果东德人怀疑对德国拥有权利和义务的四大国阻止统一，他们就会造反，从此只愿依靠他们自己；如果那种与西部德国人平起平坐的愿望推动他们主张立即重新统一，而在实际上，一旦迅速重新统一，在个人之间将会出现比今天更多的差别和不平等，因此，有必要推迟选举。然后，他说了下面这句话：“反对派是在否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重新统一的思想飘浮在水面，与任何东西都没有联系。”最后一位发言的是曼弗雷德·斯托普。他在感谢我进行这次访问之后，人们对统一、重新统一和民族等概念思考太少表示遗憾。他认为，“未来的关键在于用什么办法处理经济问题。”东部德国人看到，在边界的那一边生活着与他

们一样的人(特别是在勃兰登堡南方,那里与东德人使用同一种方言),而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比他们自己高得多。斯托普认为,即使教会的理想有所寄托,它也应考虑这一现实。他同意巴贝勒·伯莱的观点,希望民主共和国除联邦德国外还有其他经济伙伴。对此,他提醒说,“勃兰登堡历来与法国有着活跃的关系。”我注意到,随着自由的到来,东德确实应该准备度过一段困难的时期——当然,与它迄今承受的困难相比,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的经济弱势在长时期中仍将是一个受援国家的经济弱势,因为它即将进入的所谓自由世界同样是无情的,只是以其自己的方式显现而已。我还说,德国人不能因为他们历史上某一个令人恐怖的一瞬间而世世代代受到惩罚;外国干涉其内政定将产生相反的、灾难性的后果;何况这样做是不公正的,在战后半个世纪的今天,这甚至是一种侮辱;最后,东德人在1945年受到了很坏的待遇,他们被分离、被压迫、被遗弃给一个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我们西方人对此应该有所补偿。就这样,我又重申了我所珍视的、但在法国继续未被理解的论点:普鲁士是某种文明与文化的策源地,这种文明与文化同我们法国人所宣称的文明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普鲁士不必怀疑自己。在谈话结束后的个别交谈中,我推心置腹地对斯托普说:在我们这个文明化的弱肉强食社会里,软弱不是好事,东德人将很快因吃了亏而懂得这一点。但我坚信,在本世纪结束前普鲁士将恢复其真正的地位,成为德国和欧洲最富有的人才与资财库之一。

对未来的这种信念我在两天前,在极其不同的场合,即在向另一种公众——政府官员们正式祝酒时也曾表达过。在向国务委员会主席曼弗雷德·格拉赫致辞时,我颂扬了柏林墙的倒塌:“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开创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这一事件在世界上

激起了喜悦和热情。它也令人担心。因为意料之外的事件总是令人担心的。我不属于害怕历史变动的那种人。我带给你们的信息是法国给德国人民，给全体德国人民的友谊信息。这也是对东部和西部德国人民的成熟表示信任的信息。最后，这是团结一致的信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建立一个和平、开放和自由的欧洲的愿望。”在返回巴黎的飞机上，与法国和联邦德国连篇累牍地敌视我这次出访的评论相反，我为度过那些时光感到幸福。

九、确认奥得一尼斯河边界不可变动

就德国承认其东部边界而展开的讨论从此成为我与赫尔穆特·科尔谈话的主题,在四个监护国和两个德国之间为达成协议而面对面地交换看法的讨论中也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不是议程中唯一的议题。但是,如果说美国更关心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东德将发挥何种作用的话,如果说苏联和英国在需要谈判的所有领域以同等力度抵制美国的要求的话,法国却把边界问题看作重中之重,虽然它对于德国放弃化学和生物武器以及在怎样的条件下转移职权也并非漠不关心。

后来我曾自问:对于一个永远只能政治解决的问题我是否过于强调了它的法律方面? 尽管由于时间的拖累,在永无休止的利益冲突和情绪对抗的双重压力下,任何政治解决办法都会有消耗殆尽的一天。历史的不断折腾使我懂得,当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种种条约都会变得徒有虚名。从青年时代起,我看到欧洲地图就像万花筒里的彩色几何图形那样,至少被打乱和重组了四次。大家都知道,凡尔赛条约、特里亚农条约、圣一日耳曼条约的结果是什么,风向一转就被撕成了碎片。德黑兰和雅尔塔协议曾把我们欧洲一分为二,30个国家分到分界线两边,当时大家都答应不再触动那些重新拼搭起来的积木块,但现在还剩下什么呢? 1989年极其巨大的轰隆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两个帝国中的一个粉碎了。今后,44个国家将在这同一个小空间里寻找自己的坐标;且不算那片“灰色地区”。在那里,由于民族特性未获承认,造反和内

战正风起云涌。然而,我并没有放弃一个社会只有通过它的机构才能生存的思想。欧洲也是这样。既然至今一切都建立在力量的基础上,而力量本身又只服从于暴力,那么就让我们打破这种逻辑,代之以自由契约的逻辑。如果作为理智产儿的共同体,选择了持续的结构,那么,战胜者和战败者这些概念都将属于我们的史前时代。我们大陆的狭窄性,由其三分之二的居民组成的共同体的产生,欧洲的东部和西部都感到有生存下去的需要,都感到有摆脱亚洲和美洲对我们的钳制从而影响全球命运的需要,这一切都促进了这种觉醒。我梦见上帝为德国和法国指定了相同的命运,它们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的对立就是记号。我自己也在为此工作。机缘注定这两个国家没有别的出路。如果它们都保留着我毫不迟疑地称它们为伟大的本能中最美好的东西的话,那么它们将懂得,这是一个与它们的伟大本能相称的计划。对于我在这里所描绘的计划,我深知这将年复一年地被打乱、受干扰,将超越本世纪。德国和法国首先自己要相信这个计划。法国过去一直向往自我隐退并幻想英雄史诗中那“孤独的辉煌”;德国则总是在它的两种志向之间摇摆不定:要么成为扎根欧洲联盟的一个民族,要么成为帝国野心即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者。世界其它地方的强国将随时准备阻止不属于它们的秩序的到来。为了把一小块土地升格为国家,在第一道篱笆处竖起界标,有人用炸弹和放了炸弹的汽车杀人;而在街角、在医院对死者的怀念始终被无数面国旗所遮盖。我的观察力减弱了吗?欧洲还在继续离散,而我却期待它进一步集结起来。但若不从最困难之处着手的话,还能从哪里开始呢?要求德国人对他们与波兰的边界作出担保,这就是那“最困难之处”,因为这意味着德国人在他们的雄心和野心之间将作出最终

抉择。出于现实主义,他们准备这样做。他们签署赫尔辛基协定时即已承担了义务。他们知道,只要从欧洲现有架构上拆除一个零件,尤其是“那个零件”,这个架构就会倒塌,而这对所有人也包括他们自己都是不安全的。对恐怖和毁灭的记忆至今犹新。重返世界大国之林的前景太微弱了。

两国之间的统一接近了,但它撞到了另一堵墙上。这是那些丢失的风景如画的省份,如波米兰尼亚、马祖里、西里西亚以及古普鲁士的摇篮,现在成了波兰的领土和俄罗斯的一小部分。斯德丁改名为什切青,布雷斯兰改名为弗罗茨瓦夫,科尼格斯堡改名为加里宁格勒。过了一千年,条顿骑士们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如果我是德国人,我会同他们一样感到痛苦,如果谁请我放弃这些土地,我会把这种请求撕得粉碎。就这样,那些背井离乡的人,在自己的国家成为难民的人,作出了反应。他们聚集在一个活跃的团体“被驱逐者联盟”里,大声对政府对新闻界施加压力,拒绝肢解,揭露背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科尔及其部长们迟疑不决,那没有任何不正常的地方;要求他们把斯大林单方面强加的法律看作国际法的一项原则,对他们来说那是过分的。他们很想对我们说:“请把这件事放一放,请给我们这个被损害的民族一段适应的时间。不管发生什么事,请不要急于发动无论如何将把我们带到你们想要我们去的地方的那种运动。”我的坚持却令人不快。联邦德国的报纸对此进行了揭露。他们的一个论据是说对了,即我把1945年的德波边界看作既成事实,因为我的观点是不是同时也“批准”了后来被人称为“种族净化”的行动呢?因为新的边界线为大规模和强制性的移民提供了借口;德国人被从割让给波兰和俄罗斯的地区赶走,而俄罗斯则从被它吞并的土地上把波兰人全部

清除。

出于政治、宗教或纯粹的经济理由,居民们从一国迁移到另一国,甚至从一个大陆迁移到另一个大陆,这类例子在人类历史上是不胜枚举的,但注意到这一点毫不意味着可以原谅当代的野蛮行径。从15世纪到18世纪末,约有1200万至1500万的非洲男人和妇女成为贩卖黑奴的牺牲品,他们脚套铁镣,被扔进欧洲的航船,被运往美洲。到了20世纪,本以为这些陋习已经过时。但是,1919、1920和1921年的条约重新绘制了欧洲的地图,某些少数民族的问题仍是通过这种方式,即大规模迁移居民的方式解决的,而这种迁移是经过那几个口口声声把文明挂在嘴上的民主大国签字同意的。按照1919年11月27日同盟国与保加利亚签署的讷伊条约,53000名应定居在希腊领土上的保加利亚人同被迫离开保加利亚国土的44000名希腊人进行了交换。在土耳其,1922年士麦那发生的灾难导致90万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和25万在色雷斯和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外流。在同盟国与土耳其之间签订的洛桑条约规定19万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离开原居住地,以换取生活在希腊的38万穆斯林返回土耳其,从而形成了两国之间的迁移活动。1944年至1945年,轮到了德国人被驱逐出普鲁士、波兰、波希米亚、苏台德地区、匈牙利和奥地利。有人估计为此被迁移的人约有1500万。雅尔塔会议后,即1945年4月21日,苏联同波兰签署了一项协定,该协定把俄罗斯东部的一块土地划给波兰(科尼格斯堡周围的另一块土地还给苏联),并把奥得—尼斯河东部地区委托给波兰暂时管理。

波茨坦会议决定把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德国人迁走。于是就驱逐了200多万德国人。与此同时,100万波兰人从割让给苏联的领

土上迁出来,来到上述德国人遗弃的土地上定居。西方人屈从了斯大林制造的“既成事实”(哈里·杜鲁门语)。在爱沙尼亚(25000人)、拉脱维亚(5万人)、北布科维纳、南比萨拉比亚、黑海沿岸和塞尔维亚地区的德国人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我肯定会有遗忘。在伏尔加河地区的德国人1941年被指控为庇护几百万间谍和破坏者,因而被驱散到哈萨克和西伯利亚。这一待遇不只是针对德国人的。40万芬兰人被俄罗斯人驱逐出卡罗利阿,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波兰人(100多万人)被迫返回波兰,而定居在波兰卢布林东部的乌克兰人却朝相反的方向越过边界。

确实,作为这些手段主要受害者的德意志人当他们胜利时,其所作所为也别无二致;而俄国人在掌权的地方,到处都推行这种制度。无论如何,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事实,也是1945年6月5日同盟国在柏林一致商定的权利。那一天,美、英、苏、法宣布接管“对于德国的最高权力,其中包括德国政府、德国最高司令部和州、城市及地方当局掌握的全部权力”。四国还决定,将由它们确定德国或构成德国领土的任何地区的边界和地位。

最后,它们命令德国军队撤离1937年12月31日德国边界以外的所有地方。简言之,确定边界的责任从此共同落在四大国的肩上。德国当局对此表示同意,当时征求联邦德国宪法法庭的意见时,该法庭确认,它只有信赖和平解决。不久,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波茨坦开会,并于1945年8月2日确定,德国的东部边界从波罗的海海岸的施维内明德西侧开始,沿着奥得河、尼斯河顺流而下,直至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相接。虽然三国不顾所作承诺,未邀请法国政府参加波茨坦会议,但法国在五天后还是赞成了这条闻名的奥得一尼斯河线;同时表示,德国的边界问题,无论东

部还是西部,北部还是南部,都构成一个整体,只有通过“有关大国”共同研究才能得到解决。1954年10月23日签署巴黎协定时,西方人又旧话重提,并得到了联邦德国的配合。他们宣布他们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整个德国问题的和平解决,将与德国谈判解决办法,边界只有等德国问题解决后才能确定。直到那时仍强调更倾向于德国长期分裂的戴高乐将军利用这一机会修正了自己的立场。他在一次招待会上这么说:“只要德国人不否定现在的边界,并倾向于有朝一日为了合作、自由与和平而加入整个欧洲的契约性组织,那么在我们看来,完全自由地重新统一为一个德国,那是德国人民的正常命运。”

我同赫尔穆特·科尔关于是否承认德波边界的分歧,是在那段困难时刻有损于我们应努力保持的谅解气氛的唯一分歧。并不是西德总理否定一项符合赫尔辛基决议的要求有其充分的理由,而且他承认,这项要求迟早将会被提出来,但有若干动因促使他推迟他该对此表示同意的时间。作为维护联邦德国多数人利益的绝好领路人,他不愿意过早地直接面对他的同胞们的不满;但如果因此把他这种态度简单地归结为内政的原因,那是不公正的。在我看来他在处理重大的欧洲问题时表现得既谨慎又坚决,注意细节,忠实于自己的信仰。一种非常可靠的本能终于使他得以在十年期间保持了自己的权力,而且丝毫没有放弃他的“双重计划”,终于成为实现德国统一和欧洲统一的西德总理。我们的社会选择,我们的政治承诺,我们各自的交谊圈子,可能还有我们的性格,本应“命中注定”把我们分开的。然而,我们高举我们两国谅解的旗帜,并且通过我们密切的私人关系,从而赋予了欧洲共同体它所缺乏的冲力。我是接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并且希望它成功,但我学会了尊

重与该党竞争并曾把它排挤出国家领导事务的那个人。我感受到他极为通情达理,了解人的力量,能承受打击,我也注意到他的认识方式,太多的知识分子低估了他的敏锐性。当然,我们之间也出现过不一致。比如,1987年7月,在波恩举行的七个工业大国的一次首脑会议期间,罗纳德·里根希望在会议开幕前会见我,我到达科隆后,美军的一架直升飞机在航梯下接我,一刻钟后,把我安置在美国驻联邦德国使馆一位成员的花园里。总统及其全体政治智囊正在那里等我。罗纳德·里根虽然极其亲切,但没有把时间浪费在礼仪上,而是直截了当地警告我,这次七国会议他真正重视的是未列入议事日程的两个问题。首先是战略防御行动,即通常说的“星球大战计划”,这在那些年是时髦话题,其内容是把我们的星球用卫星包围起来,这些卫星能观察到瓦尔帕莱索(智利)的大街上步行者的脚步或一对情侣接吻,因此可以窥测并发现一切假想的敌对活动。为实现这个雄心勃勃的事业,他们希望得到我们的协助。其次是几乎立即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内就世界贸易问题重开谈判,而且罗纳德·里根认为应优先谈判农业问题。听他的意思,一切都已就绪,只等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总干事阿瑟·马克尔向该组织103个成员国提出问题。我断然拒绝把关于国际贸易的辩论局限于一个方面,而且只限于在日内瓦总部确定的有争议的基础上进行,但已属徒劳。我的态度一点也没有破坏他的乐观情绪,他向我保证他已征得主要伙伴的同意。我们不欢而散,随即参加了七国的全体会议。在会议中间休息时,我乘机就这两个问题征求赫尔穆特·科尔的意见。我发现法国将可能是孤立的。但因七国正式会议要谈其它问题,所以这次冲击被推迟了几个月。

1983年在威廉斯堡(美国弗吉尼亚州)举行的另一次七国首

脑会议上,法德阵营出现了第一次裂痕。罗纳德·里根有意让大西洋联盟宣布同日本之间牢不可破的利害与共关系。我除了不喜欢这种突然的即兴外交外(拟通过的文件是在散乱的碎纸片上着手草拟的),我也对有人竟能变地理魔术,直至把大西洋搬到鞑靼海峡,并且急急忙忙地改变 24 年前经过深思熟虑和几个月的讨论才确定的西方游戏规则感到惊讶。我的否决权阻止了七国达成协议。一纸泛泛而谈的公报挽回了面子,但罗纳德·里根掩盖不住他的愤慨。赫尔穆特·科尔则把避免切断联系作为头等大事,整个下午都在对立双方间充当和事佬,却也未能见效。与法国团结一致关系的破裂,他对此只能坦率地表示遗憾,因为他是极其看重这一关系的。

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991 年在布鲁塞尔决定调整其欧洲的军事机构时,又发生了同样的面子问题。使联盟适应我们大陆的新情况,这是明智的,但我不信任这个变化将要采取的形式。尤其因为,由于没有明显的敌人,美国人的军事设施弱化了;与此同时,他们却增加了政治方面的压力,以便把一切都控制在自己手里。我不希望随着苏联帝国的烟消云散,我们的盟友却在我们建立的各种政治和军事机构中加强其存在。然而,乔治·布什提出的建议,尽管方式比他前任更为巧妙,但却限制了我们共同体机构的活动自由,特别是共同防务的第一个环节——西欧联盟的活动自由。赫尔穆特·科尔在基本问题上,即共同体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军事手段这个问题上,同意我的意见,但未能同我一起直到最后仍保留我的意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它在欧洲的作用问题再一次揭示了联邦德国与法国之间潜伏的纷争,此事不足为怪。因为我们尚未从战争最后的漩涡中脱身。美国对联邦德国的影响要比对法国

的影响更深——无论如何,比较更有成效。一个简单的理由是:被自己的安全问题困扰的德国,当美国总统在这方面表态时,它不具备任何发表意见的余地。但若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的政策是存心系统地与美国的政策标新立异,那也是不准确的。海湾战争同样可证明这一点。同样,我通过1983年在联邦议院的演说,为因在欧洲部署潘兴导弹而分裂的西方阵营的重新团结做出了贡献。但是,我不能接受法国像太多的其它国家那样屈从于我们那个集团的意志和利益。科尔理解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并且我想他正在等待时机表现他的这种精神,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后遗症迫使他小心从事,只有大多数的情况下,当那些悲剧对他的影响淡化时,他才会不那么谨小慎微。

不管如何风云变幻,法德这两个国家的伙伴关系坚持下来了。西德总理和我对于欧洲建设有着相似的看法。我们都把这种雄心视作我们行动的基石。这种一致性可能是由于我们各自从战争中获得的经验:他当时15岁,目睹了祖国的沉沦;我则因为参加了战争而能估量欧洲人所遭受的无穷损失。科尔后来深受康拉德·阿登纳的为人和所走道路的影响,一段时间后并把自己看作阿登纳思想的真正执行者。他对阿登纳怀有真诚的仰慕之情,当他向我叙述西德前总理以88岁高龄,在柏林市郊的勒恩多夫私宅如何接见他时,不无一种深情的讽刺意味。据他说,阿登纳当时刚刚结束凯旋式的退休后旅行,伴随着他的是欢呼与颂扬。但这位前总理却为人们的忘恩负义而痛苦呻吟,并用茫然的手势指着花园里的玫瑰花——他失宠的明显证据,对他的拜访者说:“看看他们把我变成了什么东西。”至于我,则对过去的生活和想象中的未来这一对立的统一感到满足。1940年,我是战士,后来当了俘虏。逃出

来后,我在抵抗运动中战斗。通过这些严酷的接触,我学会了认识德国人。我尊重他们。70至80年代,当我听人谈论德国经济奇迹时,我对那种把德国人民令人钦佩的努力归诸于“非理性”的说法感到愤怒。德国人民跌倒了自己爬起来,在遭受自身历史上最大灾难时,对自己的命运仍保持信心。“奇迹”一词对于德国人民来说是有点不公正的;对于那些同我一样在战后立即走遍了所有德国城市的人来说是让人受不了的。我眼睛里至今抹不掉那种景象。当时,作为法国人,同希特勒的殊死斗争还深深印在脑海里,我对法兰克福和纽伦堡的大街所残留的东西感到恶心又充满同情:那是两排烧焦的树桩之间的朦胧空间,从地下室爬出来的幸存者在废墟中游荡的黑影,就像那可怕的夜间幽灵。为什么说是“奇迹”呢?在25年里,我看到了一个国家的人民通过顽强的努力,重新成了人类冒险事业的主角。而这一切,靠的只是人民的劳动、勇敢和牺牲精神。我得加上一句:非凡的天才。到天上去寻找另一种解释,那是徒劳。

这一背景情况将使读者们懂得德国和法国怎样得以越过苏维埃世界临终所造成的暴雨地带却未对两国新的同盟关系造成严重后果。处理如此敏感的德波边界问题而没有导致危机,这就是证明。我每次与赫尔穆特·科尔会晤(从1989年11月至1990年5月共有8次)时,都强调了这个问题,而我每次都听到同样的论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能对一个属于统一后的德国权限内的问题表态。就这样,西德总理在八个月里死守这一立场,联邦议院议长、基督教民主联盟杰出成员莉塔·聚斯穆特夫人要求立即由两个德国议会的一项联合声明确认奥得—尼斯河边界。他回答说,这一倡议“在目前是不可接受的”。同样的建议在议会的多数派中引起

了相互矛盾的反应,自由党的反应是支持这个建议,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反应是混杂的,占主导地位的是不支持这一建议。事实上,在他自己的营垒里响起了反对西德总理的声音。1月6日在斯图加特,副总理兼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宣布不同意他头头的观点:“从宪法的角度看,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现在就说:我们,德国人,所有德国人,无论今天还是将来,都不会对波兰的西部边界提出怀疑。”2月9日,他在波茨坦重复了这一论点,支持在3月18日民主共和国的选举之后由两个德国的议会作出边界担保的想法;接着又于2月27日在波恩建议由联邦共和国、民主共和国和波兰三方签署一个条约。以不注意分寸而出名的自由党主席拉姆斯多夫伯爵在一次广播讲话中竟说出这样的话来:“在两个德国合并之前不想最终确定波兰西部边界的人应该知道,这两个国家合并不了,因为如果事先不就边界问题作出决定的话,我们在全世界的伙伴们就不会同意德国的统一。”反之,基督教民主联盟议会党团主席阿尔弗雷德·德雷格尔及其总书记埃万·雷伯尔站在西德总理一边。后者称所有其他人的态度“在政治上是轻率的”。难民协会联盟使这场多种音调的论战升了级,称聚斯穆特夫人及其他的竞争者都是“东部德国的掘墓人”。

但不久,这场争吵就在事实的力量面前却步了。当戈尔巴乔夫懂得苏联已失去其最大的王牌,即谁也不再相信它会以军事干涉相威胁时,他的现实主义便为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在这个会上四个监护国和两个德国将研究为实现那人人都看出不可避免的统一所应采取的步骤。于是,无可奈何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她特有的方式低头了,这就是为挫折洒上一片辉煌的光晕。就这样,古老的点金术如今起作用了。它在一般政治中常

常把失败变成了胜利。这对撒切尔尤其容易,因为她运用这种点金术早已得心应手:好的论点在欧洲首脑会议上差不多总是被否定,她每次回国后都要求助于这种点金术,在下院用豪迈的语调发表演说,结果这些论点总是为她在国内赢得罗马式的凯旋。

1990年伊始,我要求罗朗·迪马在总统府和外交部之间组织一次反思务虚会,以确定如何处理马上就要成为现实的德国统一问题。务虚会的结论是,应紧急询问西德领导人有何想法,不必再等3月18日的选举。因为在这之前什么都不干比现在就讲清楚,会带来更多的不便。必须立即进行谈判。罗朗·迪马向我递交了一份报告,内称“如法国公开要求进行这种讨论或谈判,不可能不激起德国舆论的愤慨,也不可能不导致德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从而使后续工作更加难做;但若由一位德国负责人对四国拉上一把,情况就会不同了”。从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处获悉他也同意这些看法后,罗朗·迪马向汉斯-迪特里希·根舍作了试探,看他是否准备为欧洲的利益而捍卫由德国同四个监护国进行讨论的思想。法国和它的三个伙伴将接过“弹回的球”,提出了一个日程表。根舍对这一劝说作出了积极的回应。2月10日他在会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后从菲斯科表示,希望“法、英、美、苏四大国与两个德国政府就统一问题举行会议”,还说“这次会议之后还将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这将使德国统一的进程置于全欧的范围”。汉斯-迪特里希·根舍这样做,更多的是考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命运,而不是波兰的边界。事实上,德国的一部分舆论正在为德国一旦统一后能自由地制定其政治、军事方针而奋斗。另一些人则力主整个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而把大西洋联盟的界线一直推到奥得-尼斯河线。根舍建议采取第三种解决办法:苏联军队

撤出民主共和国；民主共和国离开华沙条约；统一的德国仍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但在这个德国内部原民主共和国的领土将实行非军事化，以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设施远离苏联边界。再者，召开4加2会议符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愿望。他曾于2月2日写信给我：“我认为，由我们一起以应有的注意力关注德德事务的演变，以免发生必然损害欧洲的震动，这是符合我们共同利益的。”三周前，谢瓦尔德纳泽先生给罗朗·迪马的一封信已经让人意会到，莫斯科意欲超越柏林地位问题而讨论整个的德国问题。

再也没有理由等待了。研究有关监视天空的计划即被称为“开放的天空”计划的35国会议正在渥太华进行。在那里，直接有关的6国外长发表公报，宣布“实现德国统一的各种外部问题，包括邻国的安全问题，将在不久举行的会议上加以审议”。4加2会议就这样开始了（德国人立即纠正为“2加4”会议）。第一次会议5月5日在波恩举行，第二次会议6月22日在东柏林举行，第三次会议7月17日在巴黎举行，最后于9月12日得以在莫斯科签署了一项“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

赫尔穆特·科尔既不愿意开会，不愿意签约，也不愿意接受华沙领导人的要求让波兰与会，最后不得不勉勉强强地作了让步。但是，他继续表现得极其神经过敏，惧怕盟国成为德国不受约束的主宰。欧洲均势有可能受到统一的强烈震撼，我知道赫尔穆特·科尔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同时进行两种谈判时，也要把两者加以区别。2月14日我在接受法国8家地方日报采访时借机表示：“从简单的契约共同体到由联邦共和国‘吸收’民主共和国，中间还有邦联或联邦，假设是各种各样的。有谁不理解这个被长期分裂

的人民对统一的渴望呢？当法国被德国军队占领、分裂时，我作为法国人参加了抗战。要让现在这一代人对半个世纪前的历史负责，那是不公正的。何况法国人和德国人在重新和解后相互之间从那时以来已经建立了牢固的友谊。但愿德国人知道，我和多数法国人一样，兄弟般地祝福他们顺利实现自己的天命。但是，不论采取什么形式，统一必然带来某些与法国直接有关的后果：和平解决的内容，边界的确定，加入共同体，军队的驻扎，结盟状况。我的义务是关照法国的安全和根本利益。”我国的外交就是从这个角度并根据这些原则来对待 6 国会议的。

波兰惹出了谈判者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难题。它应不应该参加会议？西德总理对它的出席投一否决票。为了更加保险，他故意提高要价，要求波兰赔偿由于从德国原有省份驱逐德国人所造成的损失，并要求给这些被驱逐者予特别地位。于是，我收到了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及其总理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的会见要求。我建议 3 月 9 日见面。这一消息的宣布立即见效。在会见前一天，西德联邦议院投票通过了一项赞成加快承认边界进程的决议，该决议既不提赔偿损失，也未提特别地位。我由罗朗·迪马陪同，在爱丽舍宫蓝厅里接见客人。四年前，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访问利比亚和突尼斯后回国途中拜访了我。那次访问曾引起激烈的论战。现在是他那年访问后首次重来巴黎。维斯瓦河桥下逝水如斯夫。站在我面前的不再是那宣布“战时状态”的人。那时，他向我讲述了他面临的两难境地：或者以祖国的灭亡为代价选择拒绝的荣耀，或者服从莫斯科的命令以挽救所能挽救的东西。是英雄，还是叛徒？在他的同胞们眼里，他可能是叛徒；但对历史来说，他或许是英雄。他知道，他不得不严厉惩处他同胞们

的抵抗,并因而不得不承受仇恨和蔑视的重压。但他接受了。他对我说,这是他的义务。他感到,与其让苏联重新占领他的国家,让其为所欲为,不如采取主动,避免最坏的事态发生。

他在西方受到一片责难。报界猛烈攻击他是人民的刽子手,是苏联无耻勾当的执行者。西方的许多领导人曾恳求他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红军的干涉。他们告诉他,不这样做会给我们大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法国外交部长克洛德·谢松、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西德总理施密特都对他讲过这些话。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契莱克从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梵蒂冈国务卿卡萨罗列红衣主教、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口中听到的也是同样的语言。这些活动都记载在他1992年出版的《锁链和庇护者》一书中,并附有下述评论:“西方对我说,要不惜一切,只要苏联不对波兰进行军事干涉就行……一切?一切是什么?怎么做?同谁一起做?可惜谁也没有向我们提出解决办法。最多,当我们谈及我国所经历的危机的严重性,谈及罢工、游行、无政府主义,特别谈及不可能与团结工会对话时,他们向我们表示他们也感到担心,表示或许另一方也有责任;但通常还是那句老话:请行行好,同团结工会达成谅解吧!但特别要做到在波兰城市的大街上看不见苏联坦克……。”这悲痛的心情,这些矛盾,这种内心斗争是符合他的为人、他的经历和他那被打断的历史的。我感觉到这一切。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接见了。同一时间,成群结队的人因为无法进入爱丽舍宫大门,便集合在巴黎残老军人院附近波兰使馆的窗户下,向我和我的客人喝倒彩。在他们中间,有一贯热心于普遍揭露侵犯人权罪行的好事者,也有我的几位私人朋友,他们被长期的愤怒冲昏了头脑,以至于有意不想知道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为同样的事业服务。当我听

到这种可敬而又徒劳的抗议声浪时,我观察了一下雅鲁泽尔斯基。他面部平静,黑色的眼镜遮住了他的目光,我从他那镇静的神色下面看出了巨大痛苦的痕迹。他叙述了他那乡村贵族的童年,15岁那年与他父母和妹妹一起被放逐,由于年幼体弱,过于沉重的面粉袋把他的脊柱压得变了形,他父亲疲劳饥饿交迫而死,他与母亲分离了长长的三年,他在被编入红军的波兰部队里接受过严格的军事教育。他不埋怨俄国人和苏联的制度,但告诉我他寄希望于他的朋友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这一切是为了什么?读到他书的最后就明白了。在那本书里反复出现那使人感到阵阵刺痛的字眼:“波兰……我的祖国。”当他按照他的职务检阅完仪仗队离开爱丽舍宫时,我对他的为人已深信不疑。我对罗朗·迪马说:“我们会见的不是一个暴君,也不是一个冒险家,而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这一判断很久以后得到了雅鲁泽尔斯基最强烈的反对派之一,曾按战时状态法被捕入狱的亚当·米赫尼克的证实:“有朝一日大家会知道载入波兰历史这一页的那些人实际上把波兰从苏联的干涉中解救了出来……。1981年12月,这种威胁是现实的,来自保守分子的政变也是现实的,雅鲁泽尔斯基和他的班子通过预防一场政变和一场军事干涉而拯救了波兰。”

两位波兰领导人对西德联邦议院的让步无动于衷,对德国的诚意显然持怀疑态度。为了证明他们的固执态度是有根据的,雅鲁泽尔斯基和马佐维耶茨基,在客厅的桌子上摊开波恩基督教民主联盟中央向八天后将参加投票的被驱逐者和难民以及民主共和国的选民们散发的一本小册子中央的两页地图。这种地图一边为红色,另一边为鲜艳的玫瑰色,既没有图解,也未标明边界,但画出统一后的德国领土,不仅包括两个德国,而且包括1945年失去的

土地。这一文件是在 1989 年 11 月 10 日、11 日基督教民主联盟不来梅代表大会上散发的,标题是:“何为德国?”回答是:“东部省份一直是德意志帝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早在 1975 年 7 月 7 日,联邦制宪法庭就确认:“位于奥得河和尼斯河东部的领土战后未被战胜国吞并。因此,从国际法的角度看,1937 年 12 月 31 日边界内的全部领土始终是有效的。这就是我所由出发的原则。”当我向我的对话者表示异议,说“这是竞选宣传”时,他们告诉我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在议员们的鼓掌下在同一个联邦议院所发出的指责:“让波兰加入谈判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尽管如此,我仍劝他们在外交活动中不要太生硬。法国认为,西德联邦议院的决议虽有进步,但还不够;认为由波兰的全权代表参加将辩论他们国家利益的会议是必不可少的;法国将帮助他们,条件是波兰人要同德国人开始认真地对话,无论如何对话要比冲突好。因为谁都不能从冲突中获益。没有模棱两可的余地。我向他们介绍了 3 月 1 日罗朗·迪马在柏林的演说:“一般的声明,不管如何庄严,都是不够的。对如此实质性的问题,必须要有条约性安排,并经过批准。”不过,我没有控制赫尔穆特·科尔当时的恶劣情绪,他从那时起对我们的外交部长态度始终有点冷淡(他曾在我面前低声抱怨:“他去柏林干什么?”我回答他说:“去干我要他去干的事。”)。无论如何,这种斥骂向我证实了我关于德国极度犹豫不决的看法。我们同意谨慎从事,但不放弃主要三点。在同波兰领导人会谈后,我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是这样做的:“法国支持波兰的要求,以使奥得—尼斯河边界的不可变动性能由一项国际法律文件确认并宣布,这就意味着法国的立场比西德联邦议院通过的声明所表明立场走得更远。不论最后结果怎样,我们认为波兰应该参与将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谈

判。”我们的两位来访者回到波兰，对法国的立场放心了。德国官方未作反应。无关紧要的语句之争到此为止。法波会晤标志着论战告一段落。尤其是这次会晤正好与讨论这个问题的 4+2 谈判吻合。7月17日，波兰参加了4加2会议。9月12日，最终解决的条约在莫斯科签字。条约规定，德国和波兰将通过一项根据国际法具有强制力的条约确认现有的边界。早在6月12日，联邦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的议会已经各自投票通过一项措辞相同的文件，要求德国和波兰相互承诺无条件地尊重对方的领土完整并建议通过条约确认现有边界，两个德国政府先是接受这个文件作为政府文件，然后转交华沙。波兰声明感到满意。再过了五个月，即11月14日，一项符合所作承诺的德波条约签了字。

就这样，一场使法德友谊经受了考验的争论结束了。双方都为成功地控制了争议，没有造成损失而欣喜。如果法国对一项根本性的要求沉默不语，或干脆放弃，那有什么好处呢？我曾说过，只要边界问题不解决，德国统一问题就不能结案。从今以后，这个案子了结了。

卷四 关于欧洲建设的附录

一、走出雅尔塔

今天的欧洲,是最近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由此形成的实力对比的产物。这其实是一场人为的分离,毫无根据,既没有地理的根据,也没有历史的根据,更没有文化的根据。就我个人而言,我常说,倘若有朝一日欧洲能够摆脱我所称的“雅尔塔的欧洲”的话,那它就太幸运了。对公众舆论来说,这称呼意味着一分为二的欧洲,一边是苏联的影响占优势,另一边是美国的影响占优势。至于我,我相信或说我希望欧洲的独立。我祝愿它进一步走向政治统一,必要时再走向防务统一。

我们应当在东方和西方国家之间建立起密切和谐的关系,而不管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如何。不要把我们自己禁锢在那些阻挡我们对话、交流,阻挡我们走向共同政治前景的狭隘领域里。我永远不会赞同一项可能把这种希望拒之门外的政策。为着实现这一希望,我正努力奋斗。

我很明确:我们有我们的朋友,我们有我们的盟国。我们有那些与我们同属一个共同体的国家,特别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但我愿大家把门打开,而不是把门关上。

摘自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电视台记者问。1988年1月6日于爱丽舍宫。

二、德国的前途

问：您怎样看待德国的未来？

答：你的问题过于浮泛，我此刻无法回答。

问：您是否认为目前有人正为德国统一而奔走？

答：肯定有。统一德国，那是所有德国人都关切的事。这是相当好理解的。这个问题提出来已有45年了，而且随着德国分量的增加而变得日益重要。在经济生活方面，德国已经有了分量；在政治生活方面，分量正在形成。

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否可能更多地盯着“东方”，而不是共同体国家呢？

答：你是说德国在某种意义上倾向东方吗？我不这样认为。如果联邦德国想同苏联及其周围的国家保持更好的关系，谁会感到惊奇呢？地理和历史推着他们这样做。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无论是推翻其同盟关系，或是为实现苏联尚未准备接受的统一而牺牲其欧洲政策，都不符合德国的利益！它也没有这种意图，至少我这样认为。

问：您同戈尔巴乔夫总统谈过这个问题吗？

答：德国人对统一的向往在我看来是正当的。但它只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来实现。

问：那么，苏联还是持否决态度吗？

答：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称此为否决。请你再读读戈尔巴乔夫先生和科尔先生在波恩会晤后发表的公报原文吧。我似乎发现两

国之间气氛的改善并未给双方的外交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问：您能想象没有所有欧洲国家的同意德国问题就会解决吗？

答：不。德国问题不可能在那些负责监督有关条约的执行并负责监督联邦德国安全的国家之外得到解决。德国人有选择的自由，这不错。但苏联和西方国家如要达成一致，就意味着必须进行一场名副其实的对话。

问：由于戈尔巴乔夫先生访问德国而重新发动的关于各国人民自决权的讨论不是走向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吗？

答：可以肯定的是，用一句医学术语来说，这一无可否认的权利将不是靠“产钳”来实现的。首先要两个德国政府一致同意。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另一个。两个德国间的关系问题，这是根本的。联邦德国领导人，我会晤过的那些领导人，从未打算通过加剧欧洲内部的紧张局势来获取统一。

问：联邦共和国不试图起一种被人称为 Sonder Weg 的特殊作用吗？它是否会转向 Mittel - Europa 和苏联，甚至听任中立主义的诱惑呢？

答：联邦德国敏感的观察家们确实注意到了一种现实的舆论变化，但毫无迹象使人可以说民选的政治负责人、政府、总理本人改变了立场。更何况联邦共和国在 12 国共同体中的欧洲政策还在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我已就德国的地理位置、它的历史回答了你们的问题，难道还要我重复吗？法国注定要实行一项地中海政策，因为它有一扇窗户向地中海、非洲和近东敞开着。谁能指责德国关注东方，关注波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呢？德国已重新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强国中的一个，它自然希望看到自己的政治作用不断增强。我对这一切毫不感到意外。我

已把这一情况融入我关于欧洲和世界政治的想法中,这同时也促使我强化法国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力量与存在。

摘自答《新观察家》、《独立》、《El Pais》、《共和国报》、《Die Suddeutsche Zeitung》等报刊记者问。1989年7月27日于巴黎。

三、对东欧动荡的初步思考

人人都将异口同声地说：对欧洲来说，也许对整个世界来说，自上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目前东欧正在发生的事情了。我们在其中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秩序架构正在我们眼前解体。那是雅尔塔的欧洲（这一称呼虽然从历史角度看并不那么准确，但已约定俗成），那是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的欧洲，被分成不同集团、不同制度的欧洲。我们还没有与那个欧洲告别。历史并非一条平静的河流。要像今天所发生的那样，从一种均势转向另一种均势，这就意味着会有碰撞、倒退、漩涡的危机。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旧秩序我们已经熟悉了。我们是在其中生活过来的。用运动员的话说，它已找到自己的“步点”；用法官的话说，它已形成自己的规矩；简言之，它已成为习惯。新的均势，本质上是令人向往的，但它要求我们具有我们的先辈很少有过的那种想象力、意志力、奋斗精神和坚韧不拔。这种均势将是多元的。对将要发生的问题，答案不会是单一的。一句话，事情将更加复杂。但这又多么令人激动，多么充满希望呵！就像 1789 年的关键时刻那样，人们听到的是人民的呼声及其喧闹声。那是人民的决心左右着那使城墙和边界倾塌的事件。那是人民指明了这一即将结束的世纪和未来时代应走的路。这是伟大的信息！又一次，人民行动起来了，而一旦行动了起来，他们就将决定一切。

以什么名义？以自由的名义，就为了自由。自由地生活，自由

地思想,自由地行动,自由地工作或者自由地爱。有两个国家行进在这一运动的前列:波兰和匈牙利。然而我们得注意,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完全是因为苏联——至少是其领导人——了解并接受了这样一种演变之故。而这种演变使苏联本身突然陷入了新的困境,这演变同苏联在旧秩序中原有的明快的步态相反,将引导它用迟疑的步子走向吉凶难卜的明天。

戈尔巴乔夫先生在这里面起了突出的、历史性的作用,我们必须帮助他。我知道,几乎到处都有一些战略家正在估算他成功的机率,并且认定不如同他的继任者打交道也许更讨巧。我们知道我们已有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有什么。苏联人也不知道。让我们在还能够的时候尽我们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吧。但自然仅仅是帮助、是贡献,而不要企图去替代这个国家的当局,也不要承担那些不属于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应当帮助找到尚存的一切机会,哪怕是微弱的机会。我相信人的意志。我相信人对自身命运的把握。我还发现,人们在那里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即使一再濒临深渊也坚定不移。如何让无数的各式人等认同现存风纪的变化呢?如何避免新获得的自由像飓风那样席卷一切,以至把本应保留的东西都毁于一旦呢?

局势因国而异。瞧瞧东德极度苦痛的情况吧,然而东德的购买力比某些共同体国家还高呢。因此,并不是贫困把它推向造反,而是其他某种东西,人们把它叫做“对自由的向往”。

对此,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住,无论是最封闭、最僵硬的制度,无论是已经久远的历史,无论是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传统,无论是严密的思想体系,都阻挡不住。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因为来了另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自己有幸拥有的东西,这就是自由。

我们看到了发生在东德的这种运动,但怎能认为那些未被点名的国家将能顶得住这种运动呢?怎能认为问题将仅仅发生在华沙或布达佩斯呢?

我昨天在巴黎同科尔总理一起吃晚饭。他对我说:“在匈牙利发生的支持新共和国的游行中,队伍前列打着一块横幅,上面写道:‘匈牙利找回了欧洲’。”让我们注意务必使它如所应当地找回欧洲。这是有传染性的。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首都到另一个首都,在整个欧洲那一部分,这运动将沿着同样的方向,也将经历同样的矛盾,或将遭遇同样的制约。事先虽然毫无约定,然而一切都已写在历史上,让我们祝愿这页历史迅速了结,我们能在其中发挥某种作用。请你们看看有关帮助波兰的事吧。这将是我所处理的唯一具体问题。应当怎么办?立即援助!法国在最近48小时中,特别是今天早晨的部长会议上已决定加快作为直接援助的贷款的速度并增加其金额。欧洲怎么样?同法国一样。某些国家比法国多一些,另一些国家少一些。问题不在于投入一场我们之间的竞争。如同你们当中有几位所建议的那样,我们应当把我们各自的直接援助放到一个篮子里来。

我由此得出了我的结论。我们之中有谁没有听见某些知识分子、记者、政治家的辩论呢?现在东欧解体了,门也打开了,这难道不预示着西欧也将发生深刻的变革、倾塌和崩溃吗?不言而喻,这场辩论总是在围绕着两个德国打转。这里面有些我不理解的东西。按照这些人的说法,我们仿佛处在均势外交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我们曾看到,当出现严重情况的时候,一个国家(具体指德国)会由一个阵营转向另一个阵营。但是,最近几个世纪以来,在世界历史中曾起某些作用的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中,有谁不是这样做

的呢？当时，改换门庭就是忠于自身的最有力的证明。而当欧洲共同体已存在数十年的今天，我们是否还停留在那个时代呢？东欧结构的崩溃是否必定自动地由西欧结构的解体相伴随呢？这难道不应该产生与此相反的效果吗？德国人民渴望恢复自我，既然这是向我们大家发出的呼唤，既然这种呼唤来自东方并求助于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将何以如此指责德国人民呢？一句话，我的结论直截了当：我们必须迎风前进，加强、加速欧洲的政治建设。这是对我们所面临的难题的唯一答案。

摘自在欧洲议会的讲话。1989年10月25日于斯特拉斯堡。

四、德国统一应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进行

我将根据你们向我提出的问题,就这点或那点作一些说明,在科尔总理刚才所说而且我完全赞同的话之后,请原谅我不再作长篇大论。

正当在欧洲东部发生着我们众所周知的事情时,科尔总理一开始就突出了建设欧洲的意志。他借此表达了一个我愿加以强调的观点:东欧的事变进展越快,我们越应加速和加强欧洲共同体的建设。应当赋予欧洲一个稳固的、一致的、有抵抗力的“极”,以便把如今使各国人民关心、激动的各种运动统管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将作为欧洲理事会主席前往出席斯特拉斯堡理事会的原因。我将像最近在这同一个城市、在欧洲议会上所做的那样,强调某些在我看来是根本方向性的问题。我已列举过这些问题,我就不再重复了。何况这些问题很简单,你们都了解。我们至少可以说,经济与货币联盟应采取一种新的姿态,还有社会宪章。也不要忘记其他诸如触及环境、视听产品的问题,有关人们所称的洛美第四的问题,即我们欧洲同一大批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协定问题。我将要求斯特拉斯堡的欧洲理事会会议就召开一次政府间大会表态,大会将讨论一项新的条约,将于1990年举行,由意大利主持。

以上就是我们刚才谈及的发生在欧洲各处尤其是东德的事件促使我作出的某些一般性的安排。

问:人们在这里听到德国政界人士说,德国的邻国和盟国对德

国统一可能并不那么热情,甚至有点害怕。您是否害怕可能的德国统一?

答:不只是政界人士这么说,记者们也一样。主要是在德国,但法国也有。

这很正常,因为事关本世纪末一件决定性的大事。我对这个德国问题给予极大的重视,但统一之事不应被置于害怕或赞成的层面去看。重要的首先是人民的意志与决心,不管事情马上发生或是以后发生。重要的是这样一事实:德国人属于一个民族,他们将生活在有待确定的一个国家或一种社会结构中——对此我不再多说什么了。对此,只有德国公民的意志才能作出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替代这种意志。当然,这件事不会以随便什么样方式,在随便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人们常说:不要把和平当儿戏。因此,这件事应当是一个和平的进程。另一方面,它应当是民主的,这是先决条件,因为我们说过这是人民自己的决定,这件事也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有关。正如你们所知,存在着由战后各种协议所规定的,也因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这一事实而形成的某些特殊保证。

这一切都有待摆到桌面上来。重要的是德国人想干什么,他们想要什么,他们能要什么。对其中一些问题,到时候我会发表我的意见。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目前状况究竟如何?它的变化将达到何种程度?它的领导者们想要什么?被领导者们想要什么?用何种速度、达到何种地位或实行何种结构?在这些被领导者中是否也有统一的问题?我期待着事实俱在的一天,以便完成我的报告。

我现在回答你开头的问题:我不害怕统一。对我来说不存在

这样的问题,因为历史在前进。历史摆在那里。历史是怎样的,我就怎样看待它。我认为,德国人为统一操心,这是正当的。只要他们愿意,只要他们能够。法国将改换自己的政策,使其能以最符合欧洲和法国利益的方式行事。我不再老调重弹了。我要说,答案很简单:随着东欧的演变,西欧应强化自身,加强自己的结构并确定自己的政策。

你要我作出预测……

我本人,我的生命在继续延长的同时,现已开始大大地缩短了……因此我不能作出预测。但从目前态势观之,如果未来10年内我们看不到欧洲出现一种新结构的话,我将感到惊奇。我很理解,许多德国人渴望于此。不过他们要懂得,历史不是这样造就的。存在着这样一些国家:它们之中有些上千年以来有些数百年以来,已经习惯于相互为邻、彼此争吵、势均力敌。当人们谈论德国统一问题时,这些条件应考虑进去。我的预测是以明显的事实为根据的:这就是事情进展迅速,很迅速。接下来,事情的进展并不会像已在谈论统一的那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快。但从今以后,任何一位欧洲政治家考虑问题时,如不把这个情况摆进去,那就无法自圆其说了。在我看来,这是不言而喻的。我所做的并不是确切的预测,统一之事提出了如此众多的问题,我将随着事情的不断发生而逐一加以考察。

问:您能证实您将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吗?

答:好几年前,我就着手组织对大部分东方国家的国事访问了。我多次访问过苏联,访问过匈牙利,最近则是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波兰。我愿继续下去。在昂纳克先生主持国务时,我曾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列入我出访的日程。没有理由修改我的计

划。我不是去拜访这个或那个人,我是去访问一个民族及其国家。当然,时势可能创造某些机遇,但我未发现有什么情况妨碍我前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现在的问题是确定一个日期。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但不会太晚。

问:您是否想到,凭借您拥有的巨大影响,在“另一个德国”访问期间您可能推动实行自由选举吗?

答:在所有我往访的国家里,在恪守礼节的同时,我总要维护我所珍视的那些思想。我从不掩饰我对民主制度的偏爱。我无意教训接待我的那些国家,但我想表明我支持人民,支持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发展。何况,当我前往某一特定国家尤其是存在这种问题的国家时,我不只是会晤官方领导人,我还会见其他思潮的代表人物。这正是我在我刚才列举的国家访问时所做的。我拜会领导人和反对派。我将继续这样做,包括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问:您对东德那种“孤胆骑士”式的做法没有使波恩恼火吗?

答:有鉴于联邦德国在这场关于两个德国关系的辩论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我认为不存在你所想象的各行其是的问题。我没有统计过根舍先生和迪马先生究竟会晤了多少回——由他们告诉你可能比我说得更准确。但我认为,大概每隔十来天,他们就要在欧洲某地见上一次面,间隔不会长出许多的,两次会晤之间,就打电话。我们不是通过新闻途径了解德国方面动向的。一般来说,我们事先得到了通知。这种交流是双向的。我们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利益、反应本能地不同,这是自然的,历史能作出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致力于欧洲的相互接近而且致力于欧洲统一的缘故。所采取的步骤不只是经济与货币方面的,不只是社会方面的,而且还有政治方面的。我们好像已经有条件走得更快了,因此,我

们所做的努力并不如你所说的那样分散。往后,德国方面或许会有这种或那种创意,对此我或将提出保留意见,但目前尚未发生这样的事。一旦发生的话,我将会告诉总理,而迪马先生将会通知根舍先生的。反之,倘若我们的德国伙伴发现法国“抄了近道”,他们不会不向我们指出这一点的。而目前,我们之间对话的效果确实很积极。

摘自在第 54 次法德磋商后同科尔总理一起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1989 年 12 月 2~3 日于波恩。

五、继续从事欧洲建设

我感谢你们在贵校欢迎我,人家告诉我,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大学。在这座城市里曾聚集了许多学者和商人。它曾拥有作为德意志文化主要中心之一的一切条件,而它果然成了这样一个中心。对一名法国人来说,知道歌德、莱辛、菲歇、瓦格纳、李卜克内西以及许多其他人物曾先后坐在这些课桌里,站在这些讲台上,这显然是感受强烈的。你们这里曾三次荣获诺贝尔奖。在这个国家成立的第二天,一些著名的研究者,诸如欧内斯特·布洛克·韦尔纳、克朗斯、沃尔特·马尔科伊(所有历史学家都熟悉他关于法国革命的著作)就在这里安了家。当人们知道这些之后,就不会再对今年秋天的一切都在这个文化思想和信仰的城市开始感到惊奇了。人们把莱比锡称作“英雄城”,对一个历经沧桑的城市来说,这是有根有据的。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里书写着贵国的历史因而也是欧洲的历史。

我不准备讲一堂历史课,我想你们知道得够多的了。但无论如何,你们知道刚庆祝过 200 周年的法国革命所具有的意义及其反响,校长先生刚才也恰好提到了这一点。确实,200 年前,法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汇集成强大的力量,这是群众的力量,这是正义的力量。他们开始把国家引向始终有待争取的自由、平等、博爱。

到今天,就像 200 年前那样,一些欧洲国家的人民正在寻求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寻求建设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在那里,人

人都将是平等的,首先是在法律上,而且尽可能在事实上;在那里,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大陆的所有人之间,在这块注定要统一的大地上,将实现某种兄弟之爱。我们在巴黎知道,1789年的革命信息你们这里也领会了。而我的祖国由于所处的地位而更能理解和分享对自由的热忱。我以它的名义对你们说,并通过你们对全体德国人民说:在他们经历那些触及其历史与灵魂最深处的事件之时,法国同他们站在一起。法国和边界那一边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一起工作将近两代人的时间。这对于建设一座和平大厦,争取用命运与共来抵制对抗及历史的争斗来说,实在是极其必要的。我们起先是6个国家,然后是9个,再然后是12个。我们正在建设人们所称的“共同体”,而我们认为,东欧各国将同我们一起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至于采取这种或那种方式,则由它们自己去说。

这一切自然要花时间,但只要愿意,已经能够起步了。无论如何,人们可以考虑各种不同的实用性计划,例如开展大学之间的交流,让大学生们能在欧洲四面八方自由来往,这是我们12个国家间作出的决定。从今以后,一名大学生可以到他愿去的任何地方。我们为此在共同体内部通过了若干贷款计划,以便使一名在意大利波伦亚大学入学的大学生可在巴黎大学继续读书,而在牛津大学完成其学业。为什么不可以有朝一日在莱比锡呢?

很清楚,在这新的千年之始,一场大规模的民主革命正在欧洲进行,我们在这里也感觉到了。人们期待着在你们的社会里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我们社会里也一样。我坚信,那激励着青年人——你们这一代青年人的思想,决不是简单地照抄样板,我将以能听到你们的答案为幸事。我需要知道你们对历史骤然向你们提出

的问题将作何回答。

问:我们知道您反法西斯的历史。您曾被关进战俘营,您曾在抵抗运动中战斗。反法西斯主义也是我国的一块基石。因此,您是否同意我说反法西斯主义顺理成章的结果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欧洲中部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

答:你使我忆起了往事。我第一次来德国,那是作为战俘,在Thuringe。你知道,俘虏的唯一出路就是逃亡。我这样做了。我是步行的,所以我得以漫游了德国。我不能说我对此留下了恶劣的记忆。我躲过了战争最严酷的或者说最野蛮的日子。我在你的同胞们中间遇到了许多好心人。他们中有许多是工人,有的已经上了岁数,也有一些负责看守战俘的伤兵。

很久以后我旧地重游,确切地说就是访问图林格地区,并同我的朋友、德国前总理威利·勃兰特一起沿着老路又走了一遍。第一次我是步行的,这第二次我们坐汽车,因为我不能硬要威利·勃兰特走这么长的路!我再一次看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得以同我当年被关时的村子及附近城市的居民们说了话。然而我不免有点惊讶:当地政治与行政负责人请我们吃午饭,吃饭时我提了一些问题,例如“这里该有些事情不那么顺利吧?……法国有,到处都有的”。回答很简练:“没有。”午饭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一切都挺好。谈话快结束时,我的主人来了灵感,他对我说:“是的,有些事情不那么好。领导班子里没有足够的妇女。”他说得有道理,那是一个错误;但也许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人们本来可以告诉我的!简言之,交流不易。话虽这么说,我们还是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很友好。当我想到那两场把我们分开的世界大战时,我觉得德国人民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和平讨论还是很开放的,我为此感谢德国人。

我们必须超越以往的对立。

我第三次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就是现在。你们瞧,我对贵国的了解并不太多,要不就是通过书本,这是不够的。

反法西斯主义……。接着,很自然,当我回到被德国人占领的法国时,1941年底,12月,在一个被一分为二的国家里——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只有选择战斗。我去法国,到各省去,有一段时间我去了英国,然后去阿尔及利亚。1944年初,我又回到法国。我看到了这场可怕的战争的所有重大时期。在停战次日,我去了联邦共和国,看到法兰克福、纽伦堡以及其他一些城市极度破败,几成废墟。实在的,战争太可恶了。人们互相摧毁,就像疯子一样。因此,你们所说的反法西斯主义,那也是保卫和平的某种形式,是否定用暴力强加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我的理解。意识形态是神圣的,舆论宣传是必要的。甚至有一整套学说来说明这个世界,说明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说明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人人各取所好,这也是好事,但当一个人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别人时,那他就犯了侵犯思想罪,那就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请你们注意,人们还知道其他一些例子。因此,我觉得我同你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或许应提及德国统一问题,至少是统一的可能性问题。

我的立场极其简明:无论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下统一——对此我们后面再说,德国的统一,首先涉及的是德国人。唯有自由的、公开的、民主的选举方能让人们准确了解两边的德国人究竟想要什么。首先必须经过这场考验,这是一场很好的考验,然后才能为德国人作出决定。应由他们来说他们想要什么。

诚然,有许多游行示威仿佛显示了德国人想要什么。但是,应由他们在自由、秘密的选举中民主地表达自己的意志。目前,还存

在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都享有主权。它们是各自国家的主人。人们不能一笔勾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欧洲现状。这不是你们的错误,这也不是我的错误,但事情就是这样。在欧洲,围绕着两个军事集团,凭借着两个集团间的实力均势,以由若干国际协议记载并约定的边界为基础——最近的一个协议是在14年前,即赫尔辛基协定——,已建立起某种秩序——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倘若人们在这里触动边界,那么几乎到处都会动起来的。但我认为两个德国之间的边界与其他地方的边界性质上是不同的。因为这是在一个民族内部制造出来的边界,而不像欧洲其他地方,那通常存在于两个民族之间,尽管那些边界并非总是公正的。你们知道,例如在外斯洛文尼亚、在莫尔多瓦问题上的领土要求,你们知道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土要求,你们知道围绕波兰所表达的领土要求。在触动这一脆弱的结构之前,必须保持冷静。人们有权在狂热和渴望的驱使下行动,但无论如何得带上某种程度的理智。因此我说,德国统一根本上取决于德国人民。如果德国人民决定应当这样做的话,反对的不会是法国。

但是,德国人民在下决心时应顾及欧洲的均势。在东部,不能对它作为所谓的“华沙条约”集团极其活跃的成员国(连同部署在其土地上的强大的外国军队)这样的现实置之不顾;联邦德国也不能对其相类的处境(连同它的西方盟国)嗤之以鼻。因此我说,德国统一也是你们邻国的事。它们无权代替你们作决定但有权关注欧洲的均势。这差不多是一对矛盾:作为正命题与反命题的这两个不同的分析要素正等待着转化为统一命题。我认为这是可能的。这就是说,应当同时推进德国统一和欧洲统一,否则,我们将走向失衡。你们在投票时有义务思虑及此。

但是,当事关德国人民内心深处的向往之时,不管是朝这个方向或是那个方向,我们法国人,我们应当理解他们,并始终站在自由这一边。以上就是我对于目前存在的德国问题的简约而扼要的想法。

因此,欧洲共同体在这进程中的作用将是重要的。因为这一个组织可以同诸如贵国那样的国家缔结协议。另外,它应强化自身以便使德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德国的问题,而且是整个欧洲的问题。这样,我们就能协同一致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

摘自在卡尔·马克思大学同学生、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会见时的谈话。
莱比锡,1989年12月21日。

六、奥得一尼斯河边界不可变动

问：您认为德国联邦议院昨天就边界问题通过的声明完全令人满意吗？它能否消除在这个问题上已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暧昧状态呢？

答：为了恰当地回答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请允许我把它放在相应的背景下来考虑。首先，我要提醒那些可能还不知道的人：联邦德国是法国的朋友。我们两国是盟国，并一起参加了某些广泛的组织，特别是欧洲共同体。因此，法国一贯愿意既尊重德国的利益，更尊重德国人民。在如此长时期中曾是我们敌手的德国人，现在已是我们的伙伴。我们甚至乐意把联邦德国和法国用以克服历史上悲剧性的争议、建立一种牢固谅解的方式作为模式加以推荐。当然，每当碰到重大利益问题尤其是欧洲均势问题时，发自我内心深处的这样一段开场白不能不伴随着精确的说明和严密的定义。

首先我要用简单的一句话来作答：法国认为奥得一尼斯河边界，也即德国——今天的东德与波兰之间的边界是不可变动的。因此，不清楚表明这一点的任何声明对法国来说都是不够的。

为此，法国支持波兰的要求，使奥得一尼斯河边界的不可变动性由一项国际法律文件予以宣布并约定。这表明，我们法国人的立场比德国联邦议院通过的声明所显示的立场走得更远。不管怎样，我们认为波兰应同其他国家一起参与围绕这个问题举行的谈判。由谁召集呢？既然我希望能有一项国际法律文件，我同时也就希望能尽快就此进行谈判，无论如何应在两个德国统一之前。

既然如此,我们觉得让波兰参与是正常的,让它参加涉及其自身边界的全部谈判,这是最起码的。我们将提请6国集团注意波兰的这些要求。6国集团就是4国加2国。

我很满意德国政府、德国议会所作的决定,我觉得它更符合我们的相互利益,符合欧洲均势与整个欧洲前途的利益。但我想,这一声明还应明确某些细节,特别是——尽管不言而喻,但说开了更好:这条边界并非随便哪一条边界,而正是奥得—尼斯河边界。我们这样说并不打算抹掉历史的悲剧。我们知道战争造成的创伤其痛苦达到了何种程度,但这事关欧洲与和平的利益。

问:您刚才暗示了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紧密合作。您是否已把您对联邦议院昨天通过的声明的评价告诉了科尔总理?

答:最近的一个星期一,我同科尔总理通过电话,也就是说在联邦议院的声明之前。他让我预感到会有这样一个声明。我事先不知道声明的确切文字,我们便约定本周末或下周初,也就是说明天或星期一再通话。我们进行这样的谈话已有数月之久了。我一直对他说,友好地说:我认为,作为一个先决条件,德国明确宣布赞同边界不可变动性原则,这是责无旁贷的。

问:您打算用什么办法让德国当局,让科尔总理认同您的立场,认同您关于这条边界的观点呢?您不担心此事会在巴黎和波恩间造成问题吗?

答:不担心。不知道为什么会成问题。我想这也是他的意见。只要说出来就行了。

问:在渥太华会议决定举行4加2会议之后,马佐维耶茨基总理要求波兰也能与会。苏联人,谢瓦尔德纳泽外长马上说“同意”,法国也这样。但具体怎么办呢?是5加2呢?还是4加2,但在讨

论边界问题时旁边另加一张桌子呢？

答：你的想象力过于丰富了，或者说太过贫乏了。人们会作出选择的。可以肯定的是，应由波兰人和德国人就边界问题的解决办法进行讨论。他们与此直接相关。无论如何，也应由“4”就此发表他们的意见，人们甚至可以说，应由他们以某种方式对这个国际文件提供担保。可能由6国提出倡议，确定方针。为什么是“6”而不是“5”呢？因为存在两个德国。问题正在于要使对边界问题的讨论能够作出决定，我不说“宣布生效”、“予以颁布”，而只是在统一之前作出决定。只要未统一，那就是6国，一旦实现了统一，那就是5国，但那时会议将进入另一个阶段。以上就是我所能给你的回答。

我还想就这个微妙的问题补充一些情况。我们并未局限于边界问题以及国际担保问题——这是我们会谈的重点。我们决定经常会晤，特别是在外长一级，以便商讨所有领域尤其是技术和经济领域中各种形式的合作问题。我们决定尽力为尽快举行必要的预备会议做出贡献，以便创建马佐维耶茨基总理所称的“欧洲合作理事会”，并走向我所称的“欧洲邦联”，目的在于当欧洲各国都进入一种完全民主的代议制度之后，试图为它们找到一种共存的方式。

其次，我要指出，所有这些讨论只有在与某些预期理由相比时才有一点意思。法国一开始就表明了它的立场：两个德国的统一问题属于这两个国家公民的自决权。而我们如此尊重德国人，以至并未对此提出任何先决条件，何况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历史使我们成了朋友，而不再是敌手。但我们同时又说，这一自决权只能在两个国家现有边界的范围内行使。因此，范围早应确定了。这意味着承认德(国)—波(兰)边界，即人们所称的奥得—尼斯河线，对

此不应有丝毫含糊。因此,双方都不会感到意外。导致德国领导人沿着他们所走的道路来讨论这一困难问题的原因,那属于他们的职能,他们的权力。但法国的立场已由罗兰·迪马先生最近在柏林表明了。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曾明白说过,法德友谊应由此而得到加强。在相互尊重的国家之间,这是非说不可的话,因为从可能的统一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属于所有欧洲国家当然首先是德国邻国的权限范围之内。而波兰和法国正是曾卷入本世纪那严峻历史的两个邻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老是想着这些被称作安全、边界、盟国、活动余地等后果的原因。而我们法国人则还想着如何根据德国人为实现统一而采取的步骤及其速度来考虑 12 国欧洲共同体的问题。以上就是我想提供给诸位的全部说明。这一切都围绕着欧洲均势这一主要问题。也正是为此,我预先提出了一个我已多次谈到过的欧洲邦联的方案。

问:马佐维耶茨基先生说,波兰最担忧的是德国的统一。您理解这种忧虑吗?

答:去年 11 月 3 日,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前举行的法德首脑会晤后,我在波恩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当时说,只要德国统一以民主与和平的方式完成,我就不怕。我今天实在没有什么好补充的。我相信德国人民。

问:波兰是否将参与 6 国讨论?

答:不。波兰不是 6 国集团成员,这是清楚的。但当触及波兰事务尤其是波兰边界问题时,那就同它有关了。显然,波兰应参与将要作出的决定,也就是说应参与制定有关的国际法律文件。按照事物发展的逻辑,这项工作应从两个德国同波兰交换看法开始。

但我知道,从本周起 6 国就开会了,正在进行磋商。我想,此事将是他们会谈的中心问题。

摘自同雅鲁泽尔斯基总统、马佐维耶茨基总理和米歇尔·罗卡尔总理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1990年3月9日于爱丽舍宫。

七、为实现欧洲邦联而努力

当克里斯托夫·博尔热尔向我建议参加你们的会议,至少出席欧洲大学生会议的开幕式时,我当即感到了这次会见的必要性。不仅因为我想以此表明我赞同这次会议,赞同你们所做的全部工作,而且会议的主题也值得一顾。这是一个好机会,使代表着大部分欧洲国家的自由派大学生们得以超越国界,相聚数日。

在我看来,此事由法国发起,这很重要。这个会议,这次大会在巴黎举行,这很重要。我从中看到了对众多协会、各方面负责人所做的大量努力的报偿。这些协会,这些负责人懂得我们每个国家的命运首先是在欧洲决定的。而当我谈欧洲时,我自然不是想着一个欧洲而忘了另一个。

我想谈谈本来意义上的欧洲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不存在一个结构统一的欧洲,如果我们每个国家都闭关锁国,如果我们重新回复两次世界大战之前那种精神状态——人人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注定取代别人,其结果已尽人皆知,那么不言而喻,我们每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我们各国大学之间的相互连接,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上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懂得的道理,因为我们亲身参加了那场战争,我们从中汲取了教训。由于我的年龄关系,我本人从战争第一天起,在1939年和1940年,就当兵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第一天,有多少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啊!首先,我能活下来吗?然后,从我们这些国家,从我们共同的文化,

还能剩下些什么？还有，谁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他是我们的敌人？这些对抗的根源是什么？它们是常存的吗？它们将是无休无止的吗？

第一次，20年之前，在法国，150余万死者未曾有机会回答这个问题。1945年，在欧洲，又有多少十万、百万人死亡？在苏联，死了将近2000万人。而在德国，那是什么样的灾难呵！我们之中每一个人都为这野蛮时代的复归付出了代价。于是，有一些男人和女人开始懂得必须同这种习惯势力决裂。他们设想了有关国家间初步的接近，这种接近的真正实现只能以传统敌人之间的和解为基础。其结果就是法德和解的成功尝试，须知德国和法国在不到一个世纪中曾有过三次大的冲突。

这种和解自然只有通过逐步而切实地建立相应的结构才可能存在下去，例如贸易结构、通信结构、共同工作的结构等等，而心理上的转化是第一位的。昨天还是战场上的死敌，今天怎么见面呢？身上背负着几个世纪的重负，怎么办才好呢？慢慢地，人们发现，历史的经验和成功的意志终于压倒了下意识的敌对反应，比人们原先能够想象的要容易一些。

我还记得，我出席了和解中的欧洲的第一次会议，那是1948年，在荷兰，会议由温斯顿·丘吉尔主持。当时有德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还有其他一些人。在三年间，他们成功地实现了一种转变，以至于他们随时准备从事一场新的冒险、一场伟大的冒险、争取和平的冒险，不断取得进展。从法德和解起，人们开始建立第一批机构，然后是6国共同体：3个所谓比荷卢经济联盟的国家——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还有西德、意大利和法国。慢慢地，这个组织逐步扩大。那时我们是6个，现在我们是

12个。最近一次扩大涉及西班牙和葡萄牙。而其他国家的申请也已不断涌来。哪一个欧洲国家,至少邻近共同体的国家,不希望某个时候能加入这个组织呢?随着不久以后,1700万东德人的加入,它将代表着34000万居民。这不仅是一个强大的人力资源,而且也是一个有机构、有权力的组织。农业、工业、贸易政策方面的权力,技术、运输、通讯手段、科研、大学方面的权力,……这就构成了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世界上势力最大的贸易组织。而期望并未到此为止。假如经济上更加统一,用于科研方面的投入将使共同体成为世界上势力最大的工业组织。假如政治上进一步统一,欧洲没有理由不同那几个政治、经济大国一起置身于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之列!不管怎样,1993年的前景——这是我们已经确定的期限,即人们称之为12国统一市场的前景将使我们12个国家的公民们得以自由通行,得以毫无国界限制地居住、工作、建设各自的职业与生活。

这将带来许多问题,就不一一列举了。眼下,我们必须处理这件事,今后二年将用于完成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我们甚至想到,为能圆满建成欧洲大厦,可能需要拥有一些经济手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开始讨论并确定一个计划、一张日程表,以期建设一个以货币统一——货币欧洲为基础的经济欧洲。由此出发,倘若你没有哪怕是一项共同的政策,你怎么领导经济、技术、各国间的移民、各种交流,还有大学呢?你怎么进行这一切呢?由此产生了实行更大程度政治统一的方案,即由德国、比利时和法国提出的、但其他许多国家也在考虑的最新、最近的方案。这种政治统一将以一些共同的机构为基础,而不仅仅通过各国领导人的会晤,虽然这些会晤是友好、亲切的,虽然这些在这一位或那一位主持下经常

举行的会晤,如同最近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的会晤那样,使 12 国得以交流各自的观点。应该走得更远一些。但我对你们所说的这番话并不直接接触及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有些国家同共同体包括欧洲自由贸易协会 6 国订有合作契约,订有各种协议,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奥地利和瑞士。这些国家的观念与我们不同,它们讨厌建立强制性的经济机构,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充分民主自由的国家,不妨碍它们遵奉与我们相近的审美、伦理和文化的价值观。即使传统不一,对话还是容易的。

还有中欧和东欧的国家。我不排斥任何人。有的国家较早脱离那个集团,如南斯拉夫;有的国家依然独自呆在一边,如阿尔巴尼亚。有一些国家正处于特殊的困境,如塞浦路斯;而其中两个已正式申请加入共同体,它们是奥地利和土耳其。最后是苏联及你们各自的国家,它们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我说的是“过去半个世纪”,但就其中某些国家而言,时间可能长得多,可能追溯到 1917 年革命,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

对这些国家,既然我们正在成功地建设了不起的 12 国共同体,我们能把它抛在一边,听任命运的摆布吗?我们能忘记,历史、地理、文化、我们一致的利益都要求我们把力量加在一起,而不是走向分离吗?

然而有一个问题:这一团结的倡议是否应仅仅由 12 国共同体提出来呢?这 12 国是否应当像某种新的势力那样给它所喜欢的国家以“特赦”,并专断地决定你们各国的命运,按其一时的心境保留恩宠或予人冷落呢?简言之,你们每个国家是否将处于屈辱的境地,不得不因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而向它要求施舍呢?

你们的国家难道没有一部和我们平等的历史吗?它们对文化

的贡献和它们的尊严难道低人一等吗？为什么它们之中哪怕有一个国家将会被排斥在欧洲共同的事业之外呢？

不过，必须头脑清晰地讨论这个问题。那些国家中任何一个目前都无法承受那些我刚才称之为强制性的机构。而为了避免遭受经济困难所造成的恶果，它们不能成为 12 国的市场吗？但若如此，它们有多大的可能性来保卫它们自身，保卫它们的特性，而不至于成为对债主唯命是从的客户呢？这是个问题。如果它们仅仅是求助者、央求者的话——它们有权这样做以便改善它们人民的处境，那么它们将不会长久耽于这种依附的地位。人们很快就会看到一种造反的愿望，看到某种对难以容忍的局面的抗拒，因为这些国家人民的历史、潜质、能力、机会同我们自己的这一切本来是旗鼓相当的。

正是为此，我求助于我命名为“欧洲邦联”的前景，但我毫不强加于人。那是 1989 年 12 月 31 日，我向法国人发表讲话，当时我们刚刚结束，刚刚庆祝过差不多已成为整个自由世界节日的法国革命 200 周年。我强调指出了我们欧洲发展的前景，就像那第一批法国革命者所实行的路线那样，我开宗明义说道：“我们必须首先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在共同体内部取得成功。必须使它完善，必须使它改进，必须使它运作得更好，必须使它超越自身内在的矛盾与自身的民族主义以及一贯存在的自我保护主义。”正是由此产生了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设想，产生了政治统一的前景。必须赶快行动。因为实现共同体单一市场的期限是 1992 年 12 月 31 日。这就是说，我们只剩下二年半的时间来完成业已着手的工程了。二年半呵，如果我们不想最终走向一个没有灵魂、没有前途、没有自豪、没有欧洲自身特质的那样一个泛泛的贸易共同体的话，那实在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否则,很快地,这一切都将在利益驱动下分崩离析。我们所做的一切,所流的血,所受的苦,所洒的泪,所作的牺牲,并不是为了按 1914 年前人们所了解的样子,或按 1919 年奥匈帝国分裂后人们所了解的样子,来重建某一种欧洲,人们必须随他所生活的世纪一起前进。我甚至要说必须随他所生活的千年一起前进。我们现在是 1990 年,我们此刻所有的思想都应朝向未来,朝向由于新世纪、新千年即将到来而形成的时代的特殊象征——这要求助于想象力。

从这共同体的欧洲出发,我现在开始我的第二个目标:向整个欧洲的人民说几句话,向另一部分人说几句话,为他们勾画一幅远景,而不单单是梦想,一种建立在经济与文化基础之上的——包括技术,这是不言而喻的——政治结构。我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早越好,将建设起这样一个欧洲:在那里,首先是所有各国人民都将相互会合,他们的领导人将一起讨论共同的利益问题,人人都能以同等的尊严为自己辩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些国家说:“你们明天就将进入 12 国共同体,13 国、15 国、20 国。”它们还无法承受这种冲击。而共同体本身,其事业也尚未成功到足以把其他合作伙伴纳到一个广泛的自由贸易区中来,且不说这种自由贸易是违背共同体创始者们的初衷的。我们尚未准备好,还需要时间,需要发展,需要改革各国经济。因为总需要能对各国的发展水平加以比较吧。但是,你们这些来自那些国家的大学生们,只要有志就能事成,你们是有能力这样做的。你们有历史,你们有传统,你们有由我们共同的文化塑造出来的男男女女。

我们曾如此频频在战场上见面,我们也曾在大学校园中碰头。种种形式的交往,无论是尚武的还是和平的,我们都实践过了。我

们曾经相互对抗。过去,我们的知识分子,当他们感到渴望时,他们就去会见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在某个时代,当人们在这里尤其是在法国遭到迫害时,他们就去柏林避难。当我们那些18世纪的伟大知识分子感到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无法说话时,感到思想和写作的自由受到某种威胁时,他们就远走他乡!不一定要去民主国家,那个时代还不存在民主国家。但存在一种传统。在柏林有这样一种传统,在俄罗斯也有某种宽容的传统。请想一想吧,我们这些国家是经过几个世纪才形成的,在此期间,边界、人民、地图无不受到了实力对比关系的影响,而我们也因而曾有成百上千次的机会相互切磋,得以彼此了解。

那么,一个邦联,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所有愿意并且具有代议制度——我说的是民主制度——的国家之间应当缔结一项公约。我刚才说过了,但我乐意重复一遍。不会禁止别的国家参加,但他们得等一等。假如我们想能一起工作,我们就得说同样的话,有同样的价值观。存在着其他一些场合,我们在那里可以同那些不赞同这些价值观的人们见面,还可以同他们讨论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回头再说。

然而,为什么不设想一种比共同体更灵活的结构呢?在这种结构里人们可以讨论经济、文化问题,可以讨论安全问题。在这种组织里,人人平等,讨论可在外长之间进行,可在经济部长之间进行,需要时可在专业部长之间进行,必要时也可在国家元首之间进行。不管怎样,只要有权的政府负责人每年至少聚会三四次,就能形成一起工作的习惯了。应当有一个常设机关,一个常务秘书处,要精干,但要能代表所有欧洲国家,任务是一起准备材料,相互通报这里那里取得的进展、遇到的困难。这是某种试验田,人们在其

中可深入学习相互接近的办法、为他人服务的办法、既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又对共同利益有用的办法。

假如我们有朝一日作出这个决定,那么,那些刚刚摆脱了令其压抑的控制的国家,那些恢复了独立自主、真正主权的国家,那些向往更多自由的国家将不会孤立了。不应当局限于试图达成地区性的谅解——这当然是令人高兴而且有益的,就像我们目前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之间所看到的那样,还应当推进同处于困境中国家的联合。那将是个广大的共同体,拥有 34000 万居民,集合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几个国家,也有几个不那么富裕但却能相互支持的国家。为此,得有一个组织,所有国家都应在一个常设的机构里工作,以便不断前进,并在共同利益受到威胁时发出警报。

天地是广阔的。而作为欧洲纽带的,现在是、将来还是它的文化。有人曾经这样说,我乐意重复一遍。我要引用共同体欧洲创始人之一的让·莫内说过的一句话:“假如需要重新开始的话,我将从文化开始,而不从经济欧洲开始。”这确实是整个欧洲的负责人们可以大展身手的天地。暂且不说虽非越来越严重但却越来越众多的安全问题。

有待了解的是:刚刚经历过恢复自由之狂热的那些国家是否会试图只为自己谋利而迫不及待地获取合同呢?好几个共同体欧洲的国家在这场世界性竞争中互为对手:竞相诋毁你们的国家,从那里攫取剩下的有价值的东西,吸引那里的精英到它们国家工作。就像我们曾经看到过的那样,当西欧尚未装备好的时候,这个地区的精英们曾流向美洲——这种情况如今还在继续。人们是否将会看到你们国家的精英,因为西欧生活更好,因为西欧有更多的机会而被它所吸引呢?这种情况不应发生。但为此应有一个人们会聚

的地方,讲话的地方,作决定、协商、为建设更强有力的组织做准备的地方。这就是我所说的邦联。

所以,我热情鼓励那些有条件的国家加入欧洲理事会。在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是一个运作良好的机构,很开放,有权讨论我在这里提及的众多问题。为了处理安全问题以及某些政治问题,那里有人们所称的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即赫尔辛基的欧安会。在那里,全体欧洲国家,加上美国和加拿大,可以聚会、见面。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这是一个难得的机构,这是所有欧洲人唯一能够真正会聚的所在。应当继续下去。预定将有一次会议,那是苏联建议的,法国第一个表示赞成,也有些国家表示保留意见。如今,问题解决了,欧安会将在年前举行,好像是在巴黎。这是件好事。

人们需要讨论裁军,常规裁军应与核裁军启动和化学裁军同步。人们需要调整同盟系统。如果不再有敌人,同盟的基础是什么呢?还有领土问题,尤其是德国统一后特有的领土问题。这边,军队属于华沙条约,那边则属于大西洋联盟。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应在今后几个月内解决,而欧安会这样一个组织正好使我们可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参与下讨论这些问题,因为这两个国家也参加了大西洋联盟。

我曾建议通过人们所称的“尤里卡计划”来创立一个“技术欧洲”,如今这项计划在视听技术方面获得了新的成果,这就是能同日本和美国技术媲美的高清晰度电视。我从一开始就要求此事别限于共同体国家,结果我们现在 18 个欧洲国家与此有关,而不是 12 国。这意味着为企业在生物领域、在机械或光学领域获取高技术合同提供便利。无一领域被排除在外,最有效率的企业,最优秀

的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学者围绕着各种合同结合起来,并非总是18国,只要你愿意,可以3国或4国:这边可以是丹麦、瑞典、西班牙和法兰西;那边可以是英国、芬兰,如此等等。为什么不让这个技术尤里卡计划向能正常参与的东欧、中欧所有国家进一步开放呢?如果这样,你们国家中那些有竞争力的企业,尤其是你们的科研和技术人员就能参加到欧洲建设中这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中来了。

还有其他许多问题有待一起探讨。例如环境问题——污染是不问国界的,通讯手段问题,等等。这正是共同体所要做的,还要把我们不能完全掌握的时间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在共同体内部,有着如同德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那样的大工业国,也有不那么富裕的葡萄牙、爱尔兰或希腊,但这三个国家享有与其他国家同样的权利。在欧洲理事会内,假如它们说“不”,它们的“不”同大国的“不”,分量是一样的,即使它们的资财并不同等,它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这个邦联内部,也应照此办理。最不成功、最落后的国家也应享有同等的尊严,因而同最富有、最繁荣的国家一样,拥有接受或拒绝的同等权力。假如你们不提供这个条件,不提供保持尊严这个条件,很快地,伤口就将重新裂开,争论、吵架、对抗、冲突、少数人的造反就将加剧,我们就将重睹那19世纪冲突所造就的病弱的欧洲,好个自掘坟墓、长时期中不再参与支配世界命运之决策的欧洲。

然后,还需要结束军事集团的划分。所有这一切都应当准备起来,所有这一切都应当加以讨论。但这一切讨论应关起门来,在虽无普遍权力却有限定权力的会议上进行。也需要共同征服空间,而且尽一切可能让空间免设“国界”。这正是我们在欧洲之外,

在南极洲所从事的事业,包括对这最后一片净土的保护。面对属于我们大家共同的需要,自顾自的单干显得那么荒谬,以至我国呼吁建立一批人们可在其中进行经常性讨论的机构,以使对话不至中断。前景是广阔的,但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我热情鼓励现有的机构,我列举过的机构,如欧洲理事会、欧安会、尤里卡等等坚持努力。简言之,总有一天将需要把所有这些经验集合起来,使欧洲复归于欧洲自身。

我之所以愉快地甚至激动地向来自全欧洲的男女大学生们讲话,那是因为我欧洲的前途充满信心,假如不这样的话,我就将有违我对法国人民的责任。因此,我要说:“加油!继续前进!集合起来,展开辩论,迫使迟疑不决的政府接受你们的意志,在你们每一个国家造成一股热烈而坚定的潮流。你们是自由人,显出你们的本色来!”谢谢。

摘自在欧洲大学生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说,1990年5月10日于巴黎科学城。

八、法德伙伴关系

我想我们可以怀着某种自豪的心情来注视已经走过的道路。只要对最近这二年加以回顾就可充分显示这一点：德国和法国从来没有如此集中、如此顽强地一起工作过。我认为，我们两国从未为自己也为整个欧洲获得过这样多的积极成果。我认为可以说，我们法国人同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这种特殊层次的关系。

然而，法德友好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既非天然，也非自动。我们两国的历史极其复杂，有时甚至是极其悲惨的。贵国一位哲学家所珍视的“前定和谐”调节不了历史的流程。尤其因为我们两国的历史如此长久、如此复杂，以至数百年来彼此对抗的机会大大超过了相互协调的机会。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建设的过程，其动力是双方无时不在的政治愿望，其有利条件是我们的前人所创造并由我们努力改进的工具和程序。

我们曾不得不靠着对一种共同最高利益的自觉来改变、来超越我们在利益与感受方面的差异。对这种共同最高利益，我们在我们的人民面前、在世界面前是负有责任的。我们采取了一些主动行动。当历史还在犹疑之间——因为历史曾多次犹疑不决，某些行动曾显得“胆大妄为”。

我们曾经历了 80 年代初因苏联威胁而陷入困境的欧洲，经历了东欧的动荡、南斯拉夫的悲剧、货币风暴、经济危机，……请允许我到此为止，否则这单子就太长了。我们从未袖手旁观。正是以这一种最高利益的名义，我认为有必要于 1983 年向德国联邦议院

宣布法国同德国团结在一起；赫尔穆特·科尔在马斯特里赫特支持了经济与货币联盟；我们于1984年在凡尔登陵墓前默哀致意；我们把我们两国引上了日益密切的军事合作之途。起初，某些首创性行动激起了一些负面反应。但最后，它们增进了德国与法国命运与共的思想，这一思想靠着事实的力量正日益为人们所接受。

在这历史进程中，友谊的分量不是简单的润滑作用或是一系列政治技巧的运用——何况这样做可能被视作粗俗之举，这里面有着一种我认为是不可替代的人情的分量。

我想到的是那几百个小时的讨论，是多少次肩并肩的战斗，是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

您提到了其中的一次：今年7月14日，您作为德国总理出现在香榭丽舍大街。我们一起检阅了我们两国士兵的游行。在我们个人之外，那是几代人的会聚。

如果今天，我们所称的“法德姻缘”已成为某种欧洲晴雨表的话，那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人们观察着我们，为我们听诊。只要稍有一点假想的不和，所有编辑部和各国政府就紧张起来了。当我们表现出情投意合，就会引起嫉妒和猜疑。然而我们所有的伙伴都知道——如果还不知道的话，我今晚愿向他们重申：法德谅解的全部意义在于它是为欧洲统一服务的。

总之，这正是科尔总理在1989年那些日子里，当他打算捍卫德国统一事业时所说的话。是的，在欧洲统一框架内的德国统一，为欧洲联盟服务的法德友好。

如今的问题是推进这一联盟。因为并非所有危险都已排除，并非所有悲观主义都已消失。经济气候放晴如被证实，那将有助于我们的努力。已经取得的成果是可观的，应当加以巩固。还会

有踌躇不决的时候,舆论将等着瞧立竿见影的效果。内政方面的问题及其外部并发症将会推迟约定的时间。必须有坚强的神经并且坚定不移。要善于等待,以便作出决定,取得成功。

12国已集体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将在实践中判断马斯特里赫特的成果。永远不要借口推动或创新而忘记我们已经确定的计划。这个计划已经足够雄心勃勃的了。人们可以开辟新的工地,但让我们先完成已开工的项目。

优先目标是明摆着的:继续走向经济与货币联盟;稳定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强化共同防务的雏形;以大规模的基建计划配合经济复苏;让我们的民族特性、我们那受世界性商业庸俗化威胁的文化、我们的语言以及我们自身——我们越团结,我们自身就越完善——获得发展所需的全部机会;建立起能使自由通行与安全保卫协调运转的制度。我衷心呼吁尽快实现申根协议,希望今后不再出现新的障碍。

最后,在强化结构的同时,“欧洲”需要扩大。对于奥地利、芬兰、瑞典,这差不多已成事实;挪威正在讨论中;其他一些国家提出了申请。这就提出了机构方面的问题,这将是1996年政府间会议的中心议题,而且已经引起许多争论。

赫尔穆特·科尔将出席那次会议。我本人,我将从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瞧着它,但我的祝愿与你们同在。应当成功。那次会议将难于主持。那时将由我们的西班牙朋友担起这份责任。但得由我们,德国人和法国人,来准备“场地”,因为今后二年我们两国将轮流担任主席。我们得增强各机构的合法性。我们得准备好极有可能接纳中欧、东欧和地中海各国,因为它们正挤在联盟的门口,并期待着由此增加它们的安全与人民的福祉。

有 20 个或更多成员的联盟是不会像 12 个国家的共同体那样运转的。重要的是，“欧洲”扩大后不要丧失其行动能力。不言而喻，未来的扩大将给现有的成员国尤其是纯贡献国——我指的是德国、法国和英国，提出许多问题。它们为欧洲所拿出的钱要比得到的多。这三个国家承受的负担已比 12 国中其他 9 个伙伴之和更重。因此，同那些打算加入的国家——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权有朝一日成为欧洲联盟的成员，将要根据各个国家不同的经济状况进行复杂的谈判，以免只由我们这几个国家来承担欧洲复兴所需的全部经济努力。因此，需要极其认真地加以讨论。对这些问题，人们是无法投机取巧的。

至于机构，它们应越来越民主。在这方面，我们之间没有困难。它们应日益走向以筹划共同政策为目的。你们瞧瞧今天的欧洲在试图预防或解决冲突方面多么无能为力呵！你们瞧瞧前南斯拉夫发生的事情吧，瞧瞧明天在其他国家可能发生的事情吧！我已能够在地图上指出什么地方将要出事了！当然我的预测并非总是准确的。对这种缺陷，这种无能，不能责怪欧洲联盟，因为只是从马斯特里斯特条约以来，“欧洲”才承担了它以往没有的这样一种责任。但你们看得到，时间很紧迫。

我不同你们从头到尾地谈论“欧洲”了。但既然我们谈到了“欧洲”和法德友好，我就想强调一下新闻界的作用。确实，在我们的公众舆论将如何认识欧洲建设这个问题上，媒体的责任是极其重大的，因为这已成为一场公众的辩论。这不再是一个小团体、一批精英、一个社会阶层或者一个社会职业集团的专利了。这些人过去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他们发动了机器。但现在，这是大家的事了。这是公民们的事了。不管怎样，“公民的欧洲”，这是所

有技术性与政治性组织的最终结果呵！

我本人，当我令人几乎普遍惊奇地要求进行公民投票以通过马斯特里斯特条约时——没有任何宪法条款规定必须这样做，我所追求的就是在我国确认这种演变。我知道这是要冒风险的，就像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这样做都要冒风险一样。公众舆论所关心的事并非总是同那些热衷于历史或通过旅行、通过业务关系而对历史有所了解并对欧洲未来有某种预感的人一样的。

因此，法国承担了责任。嘿，勉勉强强通过了。何况还有人 against 结果提出异议，说赢票太少。但若我们输了，人们就会对我说，这是民主！现在我们赢了，这还是民主！法国人民承担责任了。这一结果将不可能因少数几个人的行动而改写。我们总不能随着国内政治的每一个变动而否定人民的承诺吧！

我对公众舆论的演变抱有信心。尽管每隔三个月，各种民意测验、不满的浪潮、政治难题或国际上的争议促使许多社会职业界的人士纷纷揭露欧洲联盟、欧洲理事会、欧洲委员会……每当这种时候，人们真想说：“今后再也不求助于舆论了。因为我们有可能看到我们如此艰难地建设起来的大厦被打翻在地的景象。”不对，这是错误的想法。相反，应当寻求辩论与比较。而新闻界，无论是视听方面或是文字方面的，都能为舆论提供思考问题所必需的素材。

我们所从事的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人们才能看清取得的进展。人们还会碰到灰心丧气的时候和慷慨激昂的时候。重要的是不要失去连续性，让时间与历史去梳理头绪，分清主次吧！科尔总理同我一样还记得 10 年前有关欧洲问题辩论的性质。1982 年时的欧洲共同体出了故障，正为由 10 个成员国过

渡到 12 个成员国而苦恼。如今,人们讨论主权、单一货币、防务,考虑联盟向本大陆所有民主国家开放。简言之,英勇壮举今后将以理想和对共同利益的认知为支柱。

我要感谢那些为此做出贡献的人,尤其是科尔总理。人们可以说,就我而言,他是一位工作上的伴侣,一位富有想象力的伴侣,因为历史的缘分使我们共同承担了长达 12 年的政治责任。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感受到他对我的友谊有时是挚爱的表示,我对此既非毫不在乎,更非无动于衷。对我来说,政治责任离不开感情因素。搞建设不能只用石头或水泥。

我有时讲起下面这个并非我创作的故事:那是在中世纪,一位陌生人看见工人们把石头一块一块垒起来。他便停了下来,向石匠们发问:“你们在那里干什么呀?”“你瞧,我们在垒石头呀!”接着,他走向在稍远处干同样活的另一群人,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你们在干什么哪?”工人们回答道:“我们在造一座教堂。”全部差别就在这里。我们所做的正是试图建造一座教堂。多谢你们乐意指出这一点。

摘自在德国新闻媒体颁奖典礼上的讲话,1994 年 11 月 25 日于巴登—巴登。

九、问心无愧

我今晚到你们柏林来,是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身分,我也以这个身分向你们讲几句话。由于这是我作为总统这个角色所演出的最后几幕中的一幕,我对能在这里同你们在一起而感到自豪。

这是我该为德国做的最起码的一件事。为了今天的德国,但也为了那被历史、地理、文化不可分离地同法国拴在一起的传诸永久的德国。

这两个兄弟国家的冒险经历如此奇特、严酷,如此异乎寻常、难于置信,因而不得不逾越千年才得以相互承认各自的现实,相互容纳,相互团结,在科学、哲学、政治方面相互学习,一起复归自身的源头。

当然,对这个题目,我们可以说很长时间。这差不多是以往历次讲话的基本内容。人们知道这些话,但有必要不断重复。我们是死里逃生呵!

“欧洲”是半个世纪中在成堆废墟、灾难和尸体上建设或曰重建起来的。这不单纯是诚意或善意的结果。这还因为我们的先辈们承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负。我相信,我是你们中间不多的——这是你们的福气——曾作为士兵而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员。1945年5月8日那一天,我是巴黎的一个士兵。假如知道一个25岁的年轻人当时想些什么,那或许是很有意思的,起先是吃败仗,然后是打胜仗,反对谁?为了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摆在面前。停留在我们已经到达的地方,那是容易的。认为可以通过

实力、通过暴力、通过强权法则解决一切问题,那也是容易的。但恰恰是一种良心的觉醒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我来你们这里纪念 1945 年 5 月 8 日,正同德国总统和总理今天上午在巴黎所做的一样。我想深入发掘一下 5 月 8 日的意义。因为我们的后代将会诧异地想道:为什么这么多曾如此相互厮杀的人们能会聚一堂呢?为什么要庆祝这样一个胜利与失败相混的日子呢?在这一天,各方都要统计并哀悼自己的死者,但有时竟忘记了,人们正是从这些死亡中令人赞叹地觉醒了,觉悟到什么是文明所能造就的,什么是文明所不应做的,什么是未来所期待的,什么是未来所禁止的。简而言之,这种觉醒就叫做生之战胜。

我刚才告诉你们,我在巴黎度过了 1945 年 5 月 8 日这一天。50 年后,我们来到了柏林。当我提到我所扮演的、即将结束的、但今天仍为我所有的角色,即主宰法兰西民族命运的角色之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我们这些国家负责的政治家们从这边和那边所做出的异乎寻常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无比巨大的成功。

要是没有丘吉尔最初的一再呼吁,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我本人曾有幸听从了这些呼吁。要是没有那数十名来自我们每个国家的欧洲人,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我所指的自然是舒曼、莫内、阿登纳、加斯佩里及其他许多人。他们在同一时刻从经受的同一灾难中得出了超越各自国界的同样的结论。昨天的敌人成了今天的朋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在德国存在着争论。不可能没有争论。我们庆祝的是一场失败呢?抑或是一场胜利?是什么样的胜利呢?无疑的,那是自由对压迫的胜利。但在我看来,那首先是欧洲对欧洲自身的胜利——这就是我想要留给诸位的唯一启示。

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聚集在一起。我无法区分在

我领导我国的14年中,这位或那位国务活动家,这个或那个国家的人民为欧洲联盟的建设做出了哪些贡献。我暂且只说欧洲联盟,因为自从1989年11月以来,在联盟之外,又有了向整个欧洲、向整个大陆开放的问题。尽人皆知,50年前由于需要,产生了一个临时性的结构,但那不过是明天将要建设的结构的序幕,只有后者才将最终使“欧洲”获得其真正的意义。

在结束之前,我想补充一点说明。我经历了欧洲联盟建设的所有阶段以及与其有关的所有事情,约翰·梅杰刚才十分正确地提及了这一点。我也经历了战争本身,而我知道,胜利最后来到我国是经过许多迂回曲折的。

一次迂回通过英国的天空,一次迂回通过非洲大陆,一次迂回通过俄国辽阔的土地及其人民的英雄壮举,一次迂回通过美国新世界的纵深——它尽其天职,哪里失去自由或自由受到威胁就往哪里抢救。但还有那个国家,我的祖国,它先是被战败、被占领,然后同盟国一起,靠盟国的帮助,但也通过自身全心全力的反抗而看到了胜利。那是对集中营、焚尸炉暴行的反抗。为此忘却了所有的价值观念和人类的美德,忘却了生命及对生命的尊重,从而也忘却了希望,忘却了一切能呼吸、能长大、能年复一年再生的事物。要知道:春天的到来不光是为了植物。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想作证而不予仲裁的原因。胜利、失败,是谁的胜利?是谁的失败?我虽不想评判,但我还是要回忆一下,在希特勒君临欧洲,我还是一名战俘的时候,我所看到的人和事。那是在德国的一间单人牢房里,我失去了一切,甚至我的身分,接连几个月,不再有任何希望。天空是阴霾的。这难道不是那刚刚主宰了欧洲一部分的骇人听闻的思想体系的胜利吗?怎么能相信生活在其他地方的除我之外的

其他人呢？怎么能在已有上千年历史的纳粹德国还保持希望呢？然而，我却恢复了希望，因为我认识了一些德国人。

是的，我认识了他们。有时，那是我的看守，那些负责阻止我恢复自由但没有成功的德国士兵。那是贵国人民的一部分，他们实际上避开了上面的指挥、命令，并未沾染上虚妄的激情、偏执和初期胜利的喜悦。他们也许并不自觉，但却抵制了这一切，只因为他们正直的人。

我什么时候认识他们的呢？在战争期间。在哪里？在德国。后来，当我越狱逃跑，回到法国，回到被占领的法国时，我对德国与法国之间的对立进行了思考。我发现——我在别的地方这样说过——，我在我的国家发现人们做了一切努力来准备反对德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在大部分欧洲国家情况都一样，因为几个世纪来，我们已积聚了被我们愚蠢地称作为“世袭敌人”的东西，是的，就是这个话，“世袭敌人”，他们就在那里！

“世袭权”并不长久，生物学法则抵抗不过另一种法则，它走得更远，那就是人类记忆的法则，那不得不生活在同一星球上的民族之间利害一致的法则。这个星球正日益变窄，日益破败，这处于危难中的星球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大家应当一起来拯救它，而不是用空袭、用炸弹，用其他摧毁性的手段来毁灭它——只要人们愿意，这些手段是足以摧毁地球的！

因此，我告诉你们的并不是我作为国家元首的经验。法国的欧洲政策在我之后将继续下去，就像它在我之前已经开始那样。或许方式不同，但归根到底，历史比人强，历史指挥一切。总会有人在那里提醒这一点的。我们所做的事应继续进行下去，并将继续进行下去。我刚才说过了：首要的共同的胜利，那就是欧洲对自

身的胜利。

那么明天,应使已经完成但未结束而且永远不会结束的事业日臻完善。意见分歧,彼此对立,相互竞争,嗜血成性,杀人成癖,你们瞧,就在欧洲这块地方,这一切怎样继续存在于某些国家,存在于这同一大陆的某些地区,就在离我们几百公里的地方。因此,我们的精神状态应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那些战斗过来的人们的经验的基础之上。这就是我所能留下的最后的信息。在1947~1948年,那时候,我就曾想参加第一次欧洲大会,因为我曾是一名士兵,因为我了解我周围存在的仇恨,因为我意识到,这种仇恨不应超出为欧洲、为欧洲而生活的必要性。我意识到,这些兄弟,即使曾是敌人,但首先还是兄弟。我这里说的只是欧洲,是我生活的大陆。总有一天,这一忠告将适用于地球上的全体居民。

以上就是我想对你们说的。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庆祝我在1945年曾为我的祖国感到欣喜的那场胜利。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强调一场失败,因为我早就了解德国人民身上的长处:它的美德,它的勇敢,还有它的制服——这样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甚至包括那些即将大批死亡的士兵们,他们是勇敢的。他们甘于献身。那是为了一桩不道德的事业,但他们的行为本身与此毫不相干。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应当体会到这一点。欧洲,我们创造了它,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让我们忠贞不渝。让我们沟通过去与未来,我们将问心无愧地把接力棒传给我们的后继者。

摘自在欧洲大战结束50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说。1995年5月8日于柏林。本文原载弗朗索瓦·密特朗所著《关于欧洲的11篇演说(1982~1995)》,水族馆出版社,1996年。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